以色列当代女作家小说丛书

Weeping Susannah

[以色列]阿罗娜·基米/著 邹红云 顾慧琤/译

哭泣的苏珊娜

走进一个都市少女的

内心隐秘世界

解剖青春的情感密码，冲出桎梏，撕破另类情网恍然发现

它们竟是如此相似，

不管地域，国情和种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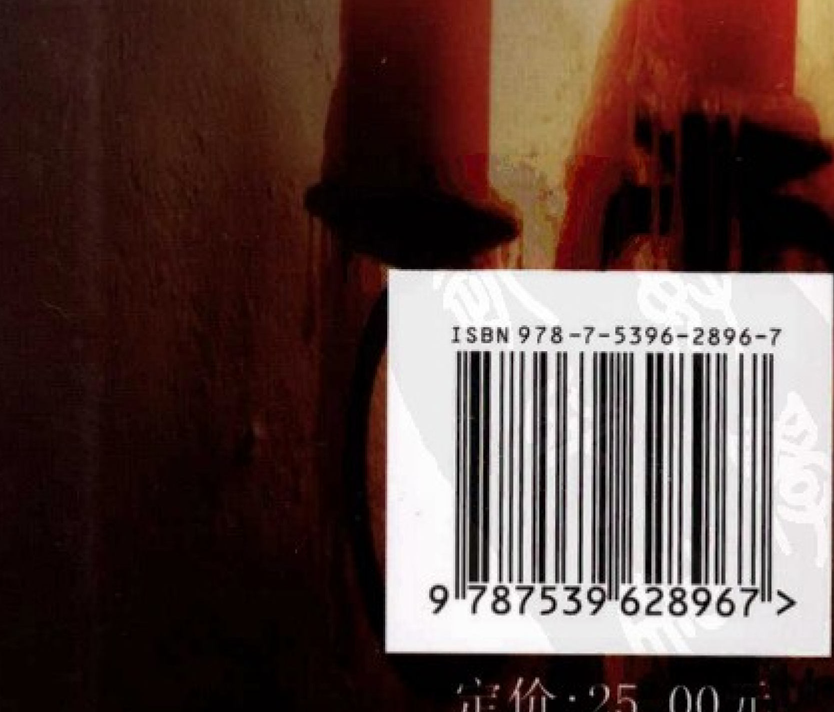


安徽文艺出版社

以色列姑娘苏珊娜从小失去父爱，和母亲一起生活。母亲对她的一切几乎包揽，又由于她和当时的总理（拉宾）同姓，给她带来了无尽的烦恼，渐渐不愿和别人打交道，仿佛筑起了一道围墙。

可当她那长得帅气、充满才气的堂弟尼奥来到她的身边后，打破了原有的平静，俩人渐渐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情感。这时，苏珊娜的母亲对此又进行了干预，并对他们的友谊提出了质疑，使得苏珊娜陷入了更加痛苦之中。

小说对单亲家庭、当代年轻人的情感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描写和探讨。



ISBN 978-7-5396-2896-7

9 787539 628967 >

定价：25.00元

以色列当代女作家小说丛书

Weeping Susannah

哭泣的苏珊娜

[以色列]阿罗娜·基米／著　邹红云 顾慧琤／译

走进一个都市少女的

内心隐秘世界

解剖青春的情感密码，冲出桎梏，**撕破**另类情网恍然发现

它们竟是如此相似，

不管地域，国情和种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哭泣的苏珊娜/[以]阿罗娜·基米著;邹红云,顾慧琤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8.1

ISBN 978-7-5396-2896-7

Ⅰ.哭… Ⅱ.①阿…②邹…③顾… Ⅲ.长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Ⅳ.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7106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01457

哭泣的苏珊娜 [以]阿罗娜·基米 著 邹红云 顾慧琤 译

责任编辑:欧子布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义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1000 1/16
印　　张:18.75
字　　数:265,000
印　　数:4000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396-2896-7
定　　价:2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简介

是苏珊娜·拉宾无法容忍别人，抑或别人不能容忍她？两者必居其一。她不愿面对人类交往的苦恼折磨，宁肯作茧自缚，躲在与母亲共住的小小公寓里，那位母亲一心爱她，为她包揽了一切。

因此，当苏珊娜的母亲告诉她美国堂弟尼奥要来家住时，苏珊娜很不安，更确切地说，她吓坏了。事实确实如此。客人——她喜欢这么称呼他——很快就赢得了母亲的喜爱，而且——更糟糕的是——摧毁了苏珊娜精心构筑的孤独之堡。接着有一天，客人主动提出要教她画画。苏珊娜不禁被她那位美丽而神秘的堂弟所展现的迷人世界所俘获。然而，人们并不顺心如意，生活也是一样，苏珊娜的母亲——毕竟也是为客人住在家里负责——对他俩日益增进的友谊渐觉担忧，对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提出了质疑：尼奥究竟在以色列做什么？

这部阿罗娜·基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风趣、朴实，充满才气，极为生动地描写了一位妇女在巨大的疑惑和不确定性面前努力地确立起自己强大而独立的身份，这就像以色列国自身一样。

译 者 序

本书作者阿罗娜·基米毕业于以色列拉马甘市的Beit Zvi表演艺术学院(Beit Zvi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当过话剧和电影演员。1993年,她开始写剧本、散文,担任过记者和戏剧导演。1996年以来,她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一本短篇小说集和一本儿童书。

《哭泣的苏珊娜》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于1999年,当年就在以色列获得了该年度的"伯恩斯坦最佳长篇小说奖"。"伯恩斯坦奖"的宗旨就是奖给当年最具独创性的希伯来文小说。之后,该小说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还荣获了法国2002年度WIZO奖。至2006年为止,该书已被译成了12种语言,分别是丹麦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瑞典语、葡萄牙语、芬兰语、希腊语、德语、西班牙语、克罗地亚语和波兰语。作者因此成为扬名国际的新锐作家。

初读此书,是在2003年上半年。当时我们并不知晓有关作者的这些情况,纯粹是为此书本身的故事内容和写作手法所吸引。少女时期丧父的女主人公苏珊娜一直生活在母亲的羽翼之下,一切听从母亲的安排,她颇具艺术才能,敏感而多虑。堂弟尼奥的到来,使她在心灵上产生了什么变化?她是否能一点点走出母亲给她设下的爱的牢笼?作者采用意识流手法以第一人称对苏珊娜所进行的大段大段细腻的心理描写,让读者很容易进入她的内心,以她的眼光打量周围的一切,真切地感受她的心路历程。作者语言生动诙谐,比喻形象别致,让人经常有耳目一新之感。如尼奥在谈话中形容苏珊娜"生活在自己的壳

里，像颗没成熟的珍珠”。作者在描写人物方面有其独到之处，书中的人物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问题和鲜活的个性。作者描写场景细致，这大概跟她学过戏剧当过剧作家有关，读起来仿佛历历在目，犹如观看电影一般。

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问题。虽然这是一部描写个人心理的小说，但它涉及了许多方面，如美术、音乐、文学、电影，以色列政治文化风俗以及希伯来语等等。为此，我们做了不少功课，想办法查阅了大量的资料，阅读量之大远远超过本书篇幅，虽然辛苦但受益匪浅。另外，书中有一些地方很难实现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如由谐音引起的误会，及多处的押韵等，在翻译中让我们推敲很久，我们尽自己所能，基本上保留了原书的风味。必须一提的是，我们有幸得到了加拿大籍犹太裔朋友 Louise Miller 和其儿子 Michael Miller 热情而耐心的帮助，他们使译者对犹太人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有了较为准确的把握，对语言文字的理解更为透彻，书中一些地方出现的希伯来语则完全依赖他们的相助才得以完成，在此我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考虑到我国读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与以色列读者不同，译者添加了 100 多条注释，以方便读者阅读。

由于译者学识有限，书中不免有错误和疏漏之处，如能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将不胜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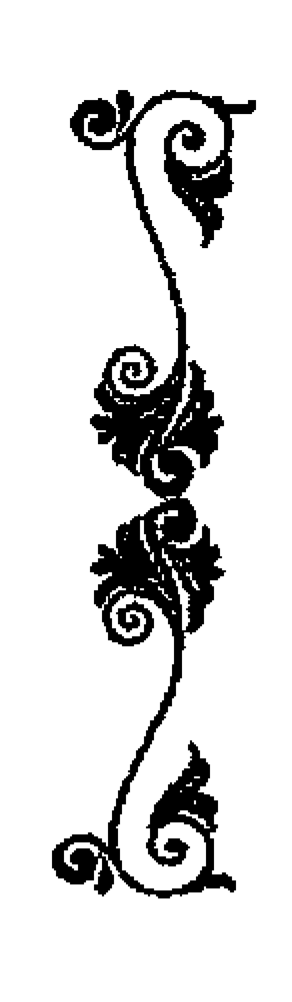
译　者

2007 年 4 月



目录

CONTENTS



并非沾亲

大家对我的名字苏珊娜·拉宾都习以为常了，他们不再问我与那位大人物是否沾亲带故。好在我的生活并不真像是从石缝中迸将出来的那样，一下子有许多的人要结识，也就几乎无须做这方面的澄清。自然有时会有些例外情况，于是我不得不讲述起关于我的姓氏变迁兴衰和演化形成的故事，及其后者的原因。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作解释的这个担子落到了我母亲坚实的肩上，她担待着，内心充满着履行职责的自豪。我必须指出，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令人筋疲力尽的过程，在这种时刻我对母亲的钦佩真是无以言表。有些情况下她往往会夸大其词，造成戏剧般的紧张以及细节上的堆砌，引得其听众直后悔自己最初颇带礼貌的好奇。因此，总体来讲，我的姓氏尽管有着民族的荣耀，却可以说主要是没完没了地造成误解和尴尬的源泉。



当然也会有些例外，虽然到头来只是使得总的法则更加突出，却可以产生某些好处。比方说，前些时候，钢琴家拉杜·鲁普[1]来到我国，预定要在曼音乐厅举行独奏音乐会，母亲最要好的朋友尼哈玛建议我们仨一起去。自然，我们也邀请了阿曼德一同前往，可他说不喜欢肖邦那些波兰伤感音乐。阿曼德也是母亲的好友，通常有文化活动他们都一起参加，可阿曼德——让他听萨第[2]、德彪西[3]，甚至勋伯格[4]这些造诣极深的作曲家的音乐才会愿意，否则——哈哈——就别浪费时

① 拉杜·鲁普：罗马尼亚钢琴家。
② 萨第（1866—1925）：法国作曲家。
③ 德彪西（1862—1918）：法国作曲家，被看做是印象派音乐的奠基人。
④ 勋伯格（1874—1951）：美籍奥地利裔作曲家。



间了。

不管怎样，阿曼德拒绝后，我们便乘61路去了特拉维夫，前往“再看一回”售票处，到了那儿母亲开始伸手到包里摸钱夹，此时却发现演奏会的票已经售空。卖票的妇女建议我们留下姓名和电话号码——如有人退票她会通知我们，虽然她自己并不相信会有此等事，因为以色列人对拉杜很是着迷。于是，母亲给了她的姓名，艾达·拉宾，那位妇女马上问她与总理拉宾有否亲戚关系，还没等母亲开始她惯常的解释，尼哈玛插进去说：那并不重要吧，是亲戚又怎么样？票子会突然从树上长出来？这个全凭关系的国度！这个第三世界的国家！她把我们拽了出来。

而真是奇之又奇，就在第二天早上，售票处打来电话通知我们有三张座位在第三排中间的票。三，三。我自己正好是三十三岁。因此，一定意味着什么。

我老是关注于这样的巧合，尽管尼哈玛和母亲都说只有愚昧的原始人才这样做，除此之外，还有的那就更糟糕了，是那些妄想狂们，他们认为是外空或什么地方在向他们发信号。然而我并不就此打住，即使我想打住也办不到，因为我渴望懂得事物背后的规律，即便是用奇特的方法。

顺便说一声，母亲竭力与尼哈玛争辩，认为我们是靠诈骗得到的票子，因为我们并不是真的本家，可尼哈玛撅起嘴巴说：艾达，行行好吧，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母亲当然就朝她吼起来，像她一贯那样：尼哈玛！那是纳粹的口号！可尼哈玛说你可以向任何人学习，更何况德国人，他们毕竟是有文化有文明的民族。身为大屠杀幸存者的母亲无法赞同这个同样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尼哈玛这番很成问题的主张，对她狠讲了一通有关邪恶的大道理，弄到最后尼哈玛快哭了，说母亲从不理解她，不然就是不能正确地理解她，这都是因为母亲是大屠杀后的妄想狂，要愿意的话就去把票退了，我们不去听肖邦，就待在电视机前算了。她这样说母亲真是蠢，因为被临床诊断为大屠杀后妄想狂的实际上恰恰是尼哈玛自己，她疑心所有人都怀有谋杀、犯罪和

邪恶的意图。一场激烈的争论爆发了,她们援引每个朋友过去所表现出来的妄想狂的例子,证明自己针锋相对的看法,直到最后因为时候不早了只得和好。她们从不彼此交恶着上床睡觉,这样就不至于做噩梦,第二天早上醒来也不至于心情不好。尽管被迫和解,这件事却大大地破坏了气氛。而当我们打扮齐整、芳香四溢地去听音乐会时,心里还是非常欢喜。至于如何得到票子,则真的并没什么关系,特别是像与尼哈玛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争论究竟也只是巧言夺理,没什么可烦恼的。

最近几个星期,关于我们姓氏的问题出现过两次,让我感受到了变化和多事。有时候,几个月里也不会有这档事,我那奇特的姓名——苏珊娜·拉宾——静静地存在着,毫不令人吃惊,被我自己、周围的所有人以及显然连掌管姓名的神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如此,事情还是来了。头一次是我们收到通知说有封挂号信。和母亲一起赶到当地的邮局,发现在那儿工作的是位新职员。纵然长着张讨厌的胖圆脸,我还是喜欢她的表情,因为她张嘴吐掉灰兮兮的小块口香糖时,歉疚地朝我们笑了笑,露出上下门牙间宽宽的缝。这立马显出了她的可爱,使得我和母亲飞快地交换了下眼色,对这个有趣的发现都很欣赏,好像用我们秘密的语言在说:她是不是很可爱?这位新职员看了看我们的通知就到那些挂号邮包和信件中去搜寻,吃力地摆动着她宽阔而低悬的臀部。当她回过身来将信交给母亲时又可爱地咧了咧嘴:给,拉宾,请签名。紧接着,她突然闪现出一丝怀疑,皱起了眉头,带着新的兴趣打量着我们:你们和总理是不是亲戚?母亲历来视澄清真相为人生中一大使命,马上开始解释说我们这个拉宾并不是像任何人可能认为的那样是某个普通的拉宾诺维兹的希伯来语形式,而是一个外国姓氏拉宾尼安的缩写,这是我父亲的姓氏。他于三十年代出生在敖得萨[1]一个有着不寻常历史的犹太家庭:他的祖父从波斯去那儿出差,与祖母坠入爱河就留在了俄罗斯,那儿立刻因他那不寻常

① 乌克兰南部海港。





的姓氏引起了骚动。

母亲将身体重心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准备好讲述那段有趣的经历——复述我们的生活史，这样的事随着一年年的过去越来越稀少了。她用下巴示意我从包里把香烟拿出来给她，没等抽完第一口烟，就已开讲起故事来了，同时像龙一样把烟从鼻孔中喷出来：当阿弗兰穆，也就是我父亲移居以色列参军时，拉宾是他的指挥官。他便把姓缩短成拉宾，一则出于对他长官的崇敬，二则不会带有太重的离散犹太人的味儿，这在当时是时尚。数年过去，父亲加入了玛派党，即以色列工党，一次他甚至去拉宾的宅邸拜访了他，而他自己从未立志从事政治生涯，因为这不符合他的个性。他太温和，性格软弱。这时，那位新职员打了个哈欠，看看我们后面是否还有人，可以把她从余下的故事里解救出来，然而邮局里空空荡荡。母亲并不把这粗鲁的举动放在眼里，继续往下讲。她的——也就是指我的——父亲，她说，总是蛮有理由认为自己是个艺术家。那可对他没好处。当艺术家可并不只是过得快活，喝酒，还有——原谅我用这字眼，搞女人。这可不容易。你还要有那样的性格。结果他成了室内剧院（Chamber Theater）的书记员，塞了这孩子——也就是我——满脑子的希腊神话和诗歌。我自己——也就是我母亲——在本－西门（Ben-Shemen）基布兹[①]长大，接受的是很像样的犹太复国主义和农艺的教育，却并没让各种蜜蜂叮在我帽子上。即使可以说我的——也就是她，我母亲的——生活并非一片美好，父母还是把我送上了离开德国的最后一班火车，而他们自己、我的大弟弟特奥，还有小弟弟阿哈隆，那个一条腿短一条腿长的，都在布痕瓦尔德[②]遭到了毁灭。

此时这位邮政职员丝毫不难为情地看起放在她前面柜台上的妇女杂志来，但这并不影响母亲，她已深深地陷进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中去了。她斜倚在柜台边，使自己站得舒服，继续着她的故事。幸运

---

① 以色列的集体农庄。

②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南部一村庄。1937至1945年德国法西斯曾在此设立集中营，残酷屠杀了数万名反法西斯战士。

的是，他——也就是我父亲——她说，恰恰死在1977年大选之前，也就不用眼睁睁地看着工党下台。她记得和苏珊娜——也就是我——在他去世前几天到特尔海秀摩[1]医院去看望他，他抚摸着我的头发说：苏珊娜，这是我们的国家，它属于劳动人民，一直是而且将永远是。所以别担心，我们这次也会打败修正主义派的。

这当口她只得打住，因为有个戴草帽的小个子老人走进来站到了我们后面，似哮喘般喘着气，那副痛苦的表情让人感到，要是我们不马上离开，每一次喘息可能就是他的最后一口气。

离开邮局时，我跟母亲说：你不必告诉她整个故事，她显然不感兴趣。母亲竭力与我争辩，说这是个有趣的故事，因为它有历史意义，不管怎么说，是那职员问的，她自己明明白白地问的：你们和总理是不是亲戚。我阴沉着脸保持沉默，因为她知道我是对的，而我就想要她承认这一点，最终她屈服了，说：你是对的，苏珊娜，有时候我就是经不住诱惑，像旁观者那样用一种超然的方式来谈你父亲。何况我碰到过几个不认识的人？我说：你可以一直跟我谈他，你能跟我讲，跟尼哈玛讲，跟阿曼德讲。她大笑着说：哎哟，得了吧，我把每件事都跟你们讲过一百万遍了。接着她看了我一眼：怎么，你为你的老母亲感到害臊了？我说：当然没有，我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爱你。我闻到她身上的气味，那是一种尽管干干净净却因老年所致的陈腐味儿，我还闻到她头发里一股淡淡的煎东西及防头皮屑的鸡蛋香波味儿，我为自己能克服这种厌恶感很是骄傲。

我最为痛苦的一件事就是对所热爱的人感到厌恶。对于尼哈玛和阿曼德，特别是对母亲。有时候，我讨厌她的某些举动，比如她临睡前取下假牙的动作，或者在她穿着睡衣上厕所时，那硕大而松塌的乳房，没了乳罩的撑托，在肥胖的肚皮上方晃来晃去的样子。每每这时，我既惊骇又无法不盯着看，仿佛这厌恶中有某种我需要的东西，令我沉迷，使我不能将批判性的眼光移开去。我觉得生平最可怕的事就是



---

① 特尔海秀摩（Tel Hashomer）：城市名。



她发现这些经常使我受不了的感觉，因此我非常努力地想出了多种老到的伪装欺骗手法来不使她难过，不伤她的感情。现在也是，我一觉得厌恶，就抱住她，并且越抱越紧，啧着嘴在她耳朵上发出夸张的亲吻声，直到她说：停住，够了，什么让你这么兴奋？一边拆开那个挂号信封。这对于坦诚的苏珊娜·拉宾是个多么辉煌的胜利，她成功地将自己的思想，将内心中一切的丑恶，掩藏了起来。

信是我们在美国的亲戚白艾蜜写来的。白艾蜜的第一任丈夫是我父亲的堂弟——诺亚叔叔，他丢下白艾蜜逃走了。有一天他就这么不见了，在稀薄的空气里消失了，留下白艾蜜和一个幼小的孩子，一文钱都没有。原来诺亚叔叔声称自己是百万富翁并且表现得也像那么回事——这使得白艾蜜在忍受了多年本·古里安[①]经济紧缩制度的限制后燃起了爱情之火。他在从白艾蜜的生活中拔腿之前，也卷走了她少得可怜的积蓄，这种行为，如他在告别信里指出的，实为形势所迫，但他深深地感到抱歉。大家都说这太可怕了，这是犯罪，他逃不脱惩罚，到头来是要坐监狱的，他得偿还从白艾蜜那儿偷走的一切，还有复利的利息，更不用说精神上的赔偿以及抚养孩子的补偿。可没人知道上哪儿去找他，实际上也没费太大劲去找。简而言之，诺亚叔叔在我们家族神话里是个完完全全的反面人物。如果有人费神提到他，也只是要贬低他，岁月过去得越久，积累的细节也越多。譬如，有些人说他是个靠不住的冒险家、骗子、嗜赌成性的赌棍。另一些人则说他是个国际大骗子。他们说他在每一个去过的城市里都有老婆。他们说他参与了将铀用以色列的船只运往南非的勾当。有时他们甚至说他可能是双重间谍，同时为以色列和伊朗效力。但关于诺亚叔叔生活和各时期情况不论时下的说法如何，大家一致认为幸亏他离开了白艾蜜，只希望那个孩子将来不要像他父亲那样烂，因为从外表和遗传基因的观点来看，他俩就像一个豆荚里的两颗豌豆。

---

① 本·古里安(1886—1973)：波兰裔以色列政治领导人。积极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30年组建玛派党，并于二战后组织抵抗英国。以色列独立后，他成为总理(1948—1953，1955—1963)。

大家都为白艾蜜感到难过，但他们也指出她本该开始时多点理智。这些谈话的结果是白艾蜜追补了一些理智，学了门园艺课，并且到基布兹上生活去了，因为那儿养育孩子的条件非常好。大家希望她在集体农庄里起码不会有问题和风险，但白艾蜜天生有招惹问题和风险的才能，很快她就沾上了一位美国志愿者。表面上看，似乎白艾蜜的麻烦到头了，但结果发现这个男孩曾在越南战争中当过兵，从战场回来时头脑就不大对劲。不过因战争而有点精神错乱在我们以色列人看来并不是新鲜事，而且战争对于一个年轻人心灵的负面影响当然不能成为理由来阻止一位不再年轻和美丽的女人嫁给他。因而白艾蜜的决定得到了她所希望得到的一切支持和鼓励。婚礼在基布兹上举行，一些情景和气味的片断仍存留在我的记忆里——一串串彩色的灯珠挂在树木间，凉爽的夏夜到处有蚊子在灯光照射下歇斯底里地盘旋，田野里飘来淡淡的干草和肥料味儿，以色列爱国歌曲和外国歌曲在巨大的喇叭里轮流吼着，桌子设在空旷的草坪上，一个个干草垛，一束束鲜花，还有农庄上一群群大大小小的孩子洗过澡穿着盛装，仿佛遥不可及，怀着各自的秘密和心事，在桌子腿和成年宾客的腿间跑来跑去。

然而，尽管有着这诸多的喜庆，白艾蜜和美国人的幸福并不长久，至少在基布兹上是这样。就在批准接受两口子完全成为这个集体成员的大会召开前两星期，新郎倌被发现与几个年轻人在一起抽大麻烟卷。这个集体赶快对小两口宣告了判决，他们带着白艾蜜的儿子，离开了集体农庄，离开了这个国家，前往美国，经过多番漂荡，在纽约定居下来。

父亲还活着时，我们一度去看望过他们。这次旅行几乎完全从我的记忆中淡去了，除了一些模糊的印象：跟着母亲和白艾蜜在街上没完没了地走，父亲穿着汗衫在看英语电视，两个女人在小厨房里做饭、交谈到深夜。希伯来部分主要包括：谈论关于我们家族各个分支及兴衰变迁的历史，严厉批评诺亚叔叔并对他性格进行分析，以及轮流讲述她们各自生活中所遇到困难的故事。白艾蜜的丈夫赫伯，身材魁



梧，长着几乎透明的浅蓝色眼睛，他那熊一般的模样令我很害怕，他对我每说一句话，无论多么轻柔，都会使我飞奔到母亲厚实的屁股后面以求庇护。

我记得那个孩子是个可恶的小家伙，不停地用英语与他母亲和继父尖声地唧唧喳喳，带着夸耀和不屑，不理睬我们这些侵入他生活的乡下人。我拒绝和他做朋友，因为我害怕他，虽然他比我要小好几岁，并且他父母说他在许许多多方面是个真正的天才，尤其在绘画方面，这也是我感兴趣的方面。由于他的傲慢与他那发育得并不完美的身体不相称，我对他的注意里掺杂着轻蔑，并很快将这种轻蔑集中到他的腿上，那又弱又白似兔子般的腿，从短裤中露出来，就像又硬又细的通心面。

母亲读完白艾蜜的信说：真是说来什么就来什么！我们刚刚在说不认识的人，瞧，来什么了！真可惜我们没谈到百万美元。我说：怎么，她写什么了？母亲说：来，我们到咖啡馆去坐坐，吃点冰激凌。于是我知道发生了重大的事情。结果，这确实近乎一场变革。以下是母亲告诉我的：就是白艾蜜的这个儿子，这个傲慢的小兔子，已成长为有学问的人兼生意人，将要来以色列。白艾蜜信里说他已来过几回以色列，但因他的性情颇为特立独行且具破坏性（这一性格缺陷无疑是从他亲生父亲那儿遗传来的），加上年轻人常有的逆反心理，他前几次旅行都不愿意造访这个家庭，也就是母亲和我。可现在他要返回老家，如果母亲和我能招待他住上几星期，她将非常感激我们，因为虽然他是出差，并且能跟以往一样住得起像希尔顿、雷迪逊这样的豪华酒店，但要是她知道一家团圆将会非常高兴，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老年的到来，你会逐渐认识到这才是一个人生命中所能留存的东西，不是吗？

我们俩的冰激凌——巧克力和香草的——送上来后，母亲看着我，问我觉得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我不明白。她说：就是一个陌生人要来我们家住。我想行啊，我这么说。她又一次仔细地看了看我，说在她看来我似乎并未真懂其中的含义，但另一方面这小伙子也许会很不错——毕竟，他是个有学问的人——这会对我有好处，不管怎么

说，我们眼下能怎么办呢，因为白艾蜜并不是真在请求——考虑到她出名的敏感，而只是通知我们他的到来，所以我们除了接受这不可避免的事实并且从最好的方面来希望又能做什么呢，因为很显然母亲是不准备把他扔到街上去的。整个谈话使她变得平静了，她放松下来，专心致志地吃冰激凌。我看着她，看到有一大滴冰激凌从调羹上掉了出来，在她裙子的低领口上淌着。这是一条夏季的裙子，缀有蓝色、棕色和白色的小花。夏天她总是穿短袖低领的衣服，将胸部当中黝黑而皱巴巴的乳沟和一大片衰老的皮肤露在外面，以求更加透气。此时这一大滴冰激凌不偏不倚滑进了人体上的这条大分水线，母亲打开自己的包，取出一块纸手帕旁若无人地擦起来，仿佛我们不是在公众场合，没人会看着似的。我觉得脸红了，并且马上为我这种厌恶心理感到羞耻，也为母亲感到羞耻，但我控制不住。

顺便说一下，这也是我为什么从不和别人一起吃东西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所能做的最暴露自己的事之一。有时，我看别人吃东西。我看到他们大嚼，看到他们有意或无意掩藏的饕餮，看到他们的贪婪。人类此种时刻暴露出来的兽性使我困窘退缩。



在诊所门诊部，他们总是建议母亲把食物放在我面前，即便我们是在餐馆或有旁人在场时，即便在我不可能去碰它时都这么办。这样，或许，一点一点地，在适当的时候，我就可能会开始吃起来。母亲听从了这些指示，但我们几乎总是在家吃，除了去咖啡馆吃冰激凌和酪饼。她为我叫了一份，到头来把我的那份也吃掉了。

其实，更广义地来想，与身体有关的一切都会引起我的尴尬和厌恶。过去，倒霉的时候，大便后我甚至不会换卫生巾或擦拭自己，我觉得太恶心了。我尽可能不去想这个，要不是母亲给我洗和换，真会危及我的健康。甚至到现在，我已长大成人，也不喜欢冲澡，母亲老是得提醒我。我觉得每次又要看到自己全身赤裸很是为难。我的身体又弱又瘦，我不愿意一次次地记起它的模样。这是我的权利。也是我为什么总是穿着封闭式长衣衫的首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我不能忍受触及别人的目光。有时，我甚至不由自



主地感觉到他们的想法，这跟触到烧红的熨斗一样会伤害我。

由于我的这些怪癖，我们总是设法确保让我遇见尽可能少的陌生人。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再去参加由就诊诊所安排的那些小组活动。母亲认为，所有这些与专业治疗人士的会面和小组动态交流会只会使我觉得更暴露，这绝对没错。因此我们现在只是每月一次去和我的社会工作者莉维基谈谈。实际上现在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感觉良好，并且过去几个星期我已经开始与母亲和尼哈玛一起去海滩。她们为了使肌肉结实，玩一种很重的球，名叫医疗球，我则坐着看海。我努力使自己向前方凝视，这样别的东西都不会在我的视野里，于是，这种一切都进入我体内触摸我的感觉，变成了一种美妙而有益的感觉，我觉得海就是我，我就是海，这是我当下所认为的最好的感觉。

至于最近发生的第二件与我姓氏有关的事，甚至比第一件更为特别，而且与莉维基有关。莉维基就是莉维卡·芬瓦赛尔，门诊诊所里的社会工作者。虽然莉维基与我年纪相仿，这种居高临下的地位让我觉得她比我成熟了好几岁，这个优势使她表现得好像我是个深受耳聋困扰的少女。我喜欢莉维基的是她那外表和神情之间的反差，她长着圆溜溜的眼睛、胖鼓鼓的鼻子和嘴巴，却露出与她脸上各个稚气的成分相矛盾的严肃和自负的神情。我们彼此认识已有几年了，这使我们间的关系差不多是友好的。莉维基非常想结婚，但因为是个女权主义者她又鄙视自己的这个弱点。她很佩服母亲，这个生活中没有任何男人却能应付自如的坚强女人。莉维基对我也特别有好感，这是出于我对艺术的爱好，因为她也渴望除了乏味的社会福利工作领域还能在诸多方面发展自己。实际上我觉得自己并不值得她钦佩，因为我的艺术爱好，虽然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这些年来已经缩减为只是去听听市政府开的课程以及在家画些画、做些小雕塑了，这个职业，与其说是表现艺术家内心火一样燃烧着的真正的创造力，不如说是与设法保持心智健康更有关联。即便是想想这件事都会让我觉得隐隐作痛，因而每当出现这个话题时我更喜欢避而不谈。我在父亲去世后那些痛苦的岁月里放弃了做一个严肃艺术家的所有梦

想，事实上我很庆幸它们不再回来打扰我的安宁。

不管怎样，上一次我们去诊所定期会面时，莉维基看上去严肃而神秘。我带给她几件在家做的木刻，还有两个泥娃娃，这是在过去一年里发展起来的真正技艺。其中一个是雅瑟·阿拉法特，另一个是英国诗人珀西·比希·雪莱。我做阿拉法特是因为他是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像极了”中的木偶，做雪莱是因为在阿曼德作为礼物送给我的英国诗选上看见过他的画像，认为他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人物。那些诗歌和他本人的这种美使我极为感动，以至于渗入我心，使我充盈着香槟那清亮气泡般的透明和鸢尾、玫瑰和温室兰花花瓣般的温柔。每当我读着这些诗看着他的画像，一阵阵小小的兴奋涌遍我全身，一直到脚趾尖，让我激动，令我喘息，好似一群罕见而精美的热带蝴蝶被困在了心中令我震颤。

头几回我陷入这种冥想就哭了起来，连经验丰富的母亲起初也搞不懂我们这儿所谈的并不是通常因受到侵犯而痛苦时的一阵阵哭泣，而是喜悦的眼泪。她马上按摩起我的脑袋来，喃喃地数落着父亲。父亲热爱诗歌胜过世界上的一切，并且使我也染上了这种疯狂的情感。后来我跟她解释说这是好的眼泪，闪烁着内心喜悦的眼泪，她终于放了心。

莉维基接过泥娃娃，把它们放在桌子上以便作仔细的审视并发表她博学的见解，但她无法集中思想，过了一会儿，她说：这正是我想跟你谈的。我惊讶地问：关于雪莱？母亲问：关于阿拉法特？莉维基焦虑地问：哪个雪莱？是那胖的？是强奸受害者援助处的？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我说：不是什么援助处的，是英国人，珀西·比希·雪莱，诗人。母亲指着我说：看看她，她又开始为太多的美而哭泣了，这全是因为她父亲和那些诗。莉维基说：真有意思，我刚才没注意到这是雅瑟。我说：我什么也没开始。母亲说：使我心悸的是为什么会有人想做凶手的玩偶。莉维基说：另一个有魅力的家伙是谁？我说：他不再谋杀任何人了。我差一点就要哭出来了，最后莉维基说：行了，行了，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我们都不做声了。





莉维基的消息是这样的:位于罗西皮那(Rosh Pinna)的一个社区中心正在建立,是为像我这样有情感问题的人而设的,条件是得有艺术才能。国内最好的教师和艺术家将到那儿教授绘画及用金属和大理石雕塑。除了纯艺术,还可能学到实用的艺术品交易之道,你可以靠买卖诸如陶器、金银制品、瓷釉作品等等谋生,还能与相关领域的职业艺术家进行联系,他们将来还会帮你找工作。这个社区中心坐落在一个古老但经过豪华装修的土耳其式建筑里,是由一位澳大利亚百万富翁捐赠的,他还提供资金从海外引进教师、购买材料和其他东西。

这一切慷慨之举的缘由是这个澳大利亚人的女儿患精神分裂症自杀了,之前她曾画过几幅画,做过几件雕塑。讲到这里,莉维基咯咯地笑起来,嘲讽意味很重地转了转眼睛。母亲问她为什么笑。莉维基说她看过澳大利亚人为他女儿的作品而组织的展览的目录,实际上那个可怜的姑娘完全缺乏才能。接着,她看着我严肃地说:那,当然跟我们没关系——这儿的"我们"指的是莉维基、母亲和我,虽然像苏珊娜这样的人没有个百万富翁做父亲很可惜。尽管我们与这位社会福利工作者关系友好,母亲却对她极为愚蠢的话很敏感,马上提出异议:她的才能跟她父亲钱多钱少有什么关系?要是她没什么才能,她父亲不是百万富翁就不可惜了?莉维基很怕母亲,明白自己犯了个错误,就说:别介意,艾达,这不重要。可母亲坚持说:那什么重要?莉维基说:重要的是,甚至不光是重要,简直妙极了的是,我,苏珊娜·拉宾从数百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了这个艺术社团二十四名成员之一。

此刻,莉维基脸色因快乐而变得粉红——她想告诉我们这个最后的决定是怎么做出的,因为在我和一位做木雕刻的患孤独症的年轻人之间作抉择时曾经有些犹豫。这真是困难的选择。那个男孩很有才能,我也很有才能。他有点神经质,我也有点神经质。特别任命的委员会成员们无法决定,因为一切考虑因素彼此抵消,最后他们打电话给百万富翁在以色列的代理律师艾德尔生先生,征求他的意见,艾德尔生先生一听到其中一位候选人的名字,也就是我的名字是苏珊娜·拉宾,他说,就是她了——也就是我,因为,试想,那百万富翁女儿的名

字叫苏珊娜，给她起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喜欢某件绘画作品，而拉宾又是他景仰的一位政治家，于是就决定让我去罗西皮那。

莉维基不做声了，胳膊肘撑在桌子上，手托着下巴，看着母亲和我，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瞧我，是不是像你们的仙女教母？

在我看来，很显然母亲并不认为莉维基是我们的仙女教母。她盘起腿，从手袋里取出香烟，带着一种冷漠的表情等着莉维基用桌子上两个孩子亲吻造型的打火机给她点烟。接着她深深地吸了口烟，看看我，看看莉维基，又看看我，说："苏珊娜，帮我个忙，到接待处旁边的自动售货机上去给我买瓶苹果酒。"她从钱包里拿出几个硬币给我，我正打开门要离开房间时，她几乎是大叫大嚷地说：不要那种冒泡的，那会引起我的胃痛。我尴尬地退回来，看看莉维基，又看看走廊里是否会有什么人听见。但莉维基坐在那里，脸紧张地绷着，想听听母亲对她的建议所作出的反应，走廊空空的。于是我关上门朝自动售货机走去，我走得很慢，想要多耗些时间，因为我明白母亲想跟莉维基谈一些与我无关的事。



在自动售货机旁，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站在那里抽烟。见到他的第一刻我就不喜欢他，但我知道自己必须完成母亲布置的任务，否则她会生气的，而且在她饿了或渴了时，就没法和她谈话了。我往孔里塞进去一个五谢克尔的硬币，摁了摁选苹果酒的按钮。没有动静，我继续摁，可售货机没反应。我想可能苹果酒卖完了，将希望锁定在芒果汁上，但也没动静。我于是摁起所有的按钮来，特别是那个应该退还我钱的按钮，但机器似乎并不服从我。我能感觉到它的对抗，沉默不语但怀有恶意。我不再摁这些按钮，似乎想用这办法让它明白我并非又是一个口渴之徒，可我的任务是如此的紧要，接着那个抽烟的男人跟我搭话了。"怎么了，宝贝，"他说，"机器吞了你的钱？"我没答理他，他继续说："看，你没试过可乐以外任何东西，我敢打赌你没有。那么继续试……你要我来做吗？你干吗不搭话？你是个势利眼，是吧？行，这不干我事……你想要我去找个工作人员来骂骂他们没把机器修好，这些疯子？不要？行，这随你便……相信我，这儿这些家伙他妈的



什么也不给，他们以为到这儿来的都是百万富翁，他们觉得，他们可以收走你的钱，让所有的可乐都留在里面…… 你不想要我帮忙？真的？这不干我事……"

那男人说话这当儿，我继续试着那些按钮，虽然内心深处我已知道将会一无所获。接着，他凑前来，向我探过身子，秘密地低声说：他们都是婊子。

我能闻到他气息中难闻的陈腐味，他站得这么近。我因恐惧和厌恶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突然，话从我的嘴里自己蹦了出来：谁？谁是婊子？那男人向我靠得更近了，几乎碰到我，说：他们所有人。接着，他将回答作了更详细的评述，好像我们在做生意上的买卖，必须得说清楚以免引起误解：这儿每个人都是婊子，或婊子养的，尤其是接待处的西加丽特。那个人，连屁都不放，才不管别人会因精神紧张而神经错乱。你等得快死了，那母狗才给你和罗丝诺预约好。总有一天，我还会搞她，妈的×。罗丝诺也是婊子，要没精神科医生的药方，你别想从她那儿拿到一粒药，她以为她是谁呀？我还要叫她懂点事，妈的×。

他停了一分钟，用眼睛揣测着我，我觉得他好像正用那褐色的大手触摸我，我退缩着，感到他的目光滑过我的胸部、肚子，然后是我体内的各个器官：脾、肝、卵巢，揉着我的子宫，用他肮脏的手指甲戳着我的肺，占有性地拍着我的心脏，接着又从体内出来，到我覆盖着一层干干薄皮的嘴，到我不健康的皮肤，到我湿润的前额，停在了我的眼睛上，将它们捕捉进他那狡猾而空洞洞的罪恶眼睛里，欣赏着我女性的丑陋：你干吗发抖呀，宝贝？是因为用了"好度"[①]？别介意，告诉他们给你三已芬迪药，那药两下就会让你不抖了。别着急，相信我，莫依希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明显流露出来的恐惧激励着莫依希往下说，显然他是想要安慰我。你可知道你很聪明？你叫什么名字？让我猜猜。奥娜？尼玛？雪莱？你不想告诉我？太糟糕了。雪莱真的适合你，你可知道？

① 药名，即氟派啶醇。

他最后的话使我内心感到震颤。多么离奇的巧合？诗人那纯洁的名字从精神变态者的口里说出。此时，莫依希开始摁起自动售货机上的按钮来，重复着我刚才徒劳的动作，似乎他的触摸能使机器起死回生。他想交谈的需要更强烈了：你听到我在说什么吧？整个诊所就是一撮疯子，都是婊子。他们屁都不给。来吧，动一动，你怎么了，你在乎那钱？说拜拜，钱，au revoir[①]，钱，让钱见鬼去吧。要么就别挡着我的路，走开一秒钟，看我莫依希怎样用一分钟时间把整桩事搞定。

在他身边再待上一秒钟我都受不了了。我的背被紧紧地挤压在机器和墙之间的角落里，我就像条掉了尾巴的壁虎一个劲地向边上移。而他则煞有介事地退后几步，接着来了个野蛮如猩猩般的跳跃，朝那台沉默的机器冲过去，使出全身力气踢它。

片刻间，安静极了，一切都凝固住了——空气、时间、陌生人、我自己，接着，随着像赎罪日[②]羊角喇叭吹出来如雷鸣般的声音，几十罐饮料开始从机器里滚出来，与此同时，莫依希开始尖叫起来，与这山崩般的轰隆声极为协调。他那低沉的声音变成了歇斯底里的假声，回荡在诊所空荡荡的走廊里：哎哎哎，你这母狗，看我因为你出了什么事，我的脚折了，操你娘，我要让这儿工作的人把警察喊来，因为这是你让我干的，你这婊子，叫你爹烂在坟墓里……



我开始尽可能快地跑起来，在地砖地上滑翔，像赛车手一样转过拐角，那诊所里消过毒带药味的空气不消我帮忙在自动地进出我的肺，我的脑袋里一只无形的手紧压在我的眼睛上，像要将眼睛里的液体都挤得喷出来，我跑呀跑呀跑呀，直跑到写有“莉维卡·芬瓦赛尔，社会工作者”牌子的门口，我如子弹般射进房间。母亲和莉维基正面对着面，悠闲地抽着烟，咖啡杯放在她俩前面的桌上，空气中还存留着她俩愉快谈话的芬芳。只有站在了她俩面前，我才哭起来。

---

① 法语，意思是“再见”。

② 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圣日。在新年过后的第十天，犹太人彻底斋戒，停止所有工作，聚集在会堂内祈祷上帝赦免他们在过去的一年中所犯的罪过。在圣经时代，犹太人这一天在圣殿举行献祭仪式，将一头公山羊杀死祭奠上帝，把另一头山羊放逐旷野，让它带走犹太人的一切罪孽。这就是所谓“替罪羊”的来历。



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感到筋疲力尽。而对于母亲，整个事件就像是情感的燃料，只是用来给她的电池充电。和护士们、保安们、诊所的行政所长以及好奇地聚集在自动售货机旁事发现场的旁观者们一一说明情况之后，在莉维基陪我们去公共汽车站的路上，母亲甚至仍有足够的劲儿对她大肆训斥，为的是莉维基钟情于某位男士，作为回报，那位男士想将她那小套间的客厅变成模特摄影的工作室这件事。

尽管一路上我都坐在那里将鼻子和前额紧贴着车窗，凝视路两旁布满灰尘的街区，母亲却仍继续指责着莉维基关于去罗西皮那艺术社团的提议，并且告诉我越来越多与她一起待在家里之重要性的理由。从前我有几次离开家的可能，出去工作或学习，因此，我对母亲所说的理由中的大多数已非常熟悉了。这些理由包括：一些女士与其母亲生活一辈子的例子（诗人利亚·高博格[1]，作家德伏拉·白伦[2]和她女儿齐波拉，还有佩塔蒂克瓦市[3]尼哈玛的亲戚特兹拉）、对这个提议本身的谴责（如果这个百万富翁决定在沙漠里设立一个蹦极跳运动员的社团，她也会想把我送过去吗？）、有关总的人类状况在哲学高度上作出的结论，尤其是我们和莉维基的状况（没有唯一正确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过活的方式，因而试图为别人作判断或作决定都是无意义的。她自己生活的方式有什么重要，难道要让一个接一个的人到她家里去探索她、发掘她？）这一切，至少在我看来是完全多余的。我并不想离开母亲，近期不想，将来也不想。她知道得很清楚，鉴于这，她的独白大概是想消除她内心无法用肉眼看得到的矛盾，这种矛盾她从未告诉过我。

这就是近来发生的与我名字有关的事，我前面说过，我叫苏珊娜·拉宾。自那以后，一切如常。我们与尼哈玛去海滩，去健康维护组织（HMO）的诊所（母亲腿上和背上的问题不知什么原因加剧了，尽

---

① 利亚·高博格（Leah Goldberg，1911—1970）：希伯来女诗人。

② 德伏拉·白伦（Dvora Baron，1887—1956）：希伯来女作家。

③ 佩塔蒂克瓦市（Petah Tikva）：城市名。

管天气温暖宜人)；和阿曼德坐在他的杂货铺里，观看电视上的“幸运转盘”节目和竞选宣传。除了日益临近的竞选，议事日程上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堂弟将要从海外来——我们琢磨着他长什么样以及住我们家会是个什么情况。尼哈玛因为他有学问而激动，阿曼德则很嫉妒，因为他又有学问又做生意，而我那很实际的母亲主要关心的则是他如何跟我们在一起生活。

而我，令每个人大为惊奇的是，对这个话题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我读英国诗选，读古老的希伯来语克尔恺郭尔[①]的传记(这是尼哈玛从她家天花板下面的储藏处找来的)，又做了两个诗人雪莱的泥娃娃，还练习画画，因为我在透视上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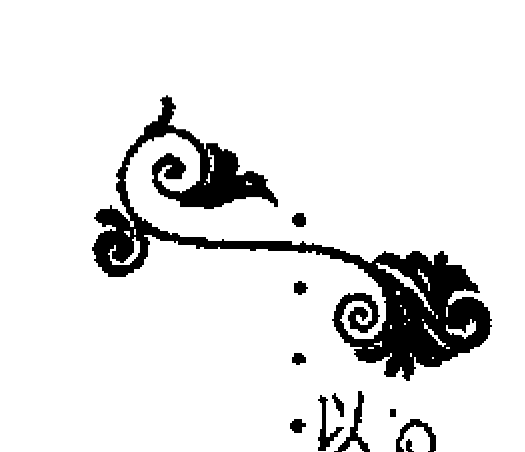
五月底，在堂弟预期到来的两天前，我和母亲去阿曼德的杂货铺买点东西做准备。

顺便说一下，阿曼德的店并不真是个杂货铺而完完全全是个小超市。它的名称也叫做：“不骗你超市”。大家说，换句话说，也就是母亲和尼哈玛说，阿曼德白手起家到今天这番光景真是了不得。他曾一度在航空业当雇员，有个他爱慕的妻子，名叫玛格利特。他们生活在霍伦[②]，没有孩子，是因为玛格利特的问题，她病得很厉害。尼哈玛知道这事比谁都多，虽然母亲也比她落后不了多少，她含蓄地指出，这个玛格利特在临死前那段日子，装满大号和小号的便盆得从她身子下面取出来，这一细节比其他任何事使我更能相信阿曼德的情感细腻，因为我自己平时差不多一到厕所就想吐。尽管要端这些便盆，并且又没有孩子，阿曼德甚至连想都没想过要和玛格利特离婚。他关心着她的各种需要，全身心地照顾她，直到她病情恶化去世。阿曼德没有再婚。他离开了霍伦，来到拉马特甘[③]生活。起初开了个杂货铺，后来发展壮大成了“不骗你超市”，甚至还有了名助手，阿齐兹，一个胖子，我们去

① 克尔恺郭尔(1813—1855)：丹麦宗教哲学家，现代存在主义先驱。他坚持在寻找宗教的真理时个人决定和信仰选择的需要，因而反对新教教条和黑格尔主义。他的著作包括《非此即彼》和《恐惧与颤栗》(均出版于1843年)。

② 霍伦(Holon)：以色列中西部一城市，靠近特拉维夫－雅法地区。

③ 拉马特甘(Ramat Gan)：以色列中西部一城市，为特拉维夫－雅法市的郊区。



时总是朝我微笑,好像我俩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似的,我呢,也向他报以微笑,因为他的微笑并不侵入我,而是温和地停留在我的上方,我非常喜欢。

阿曼德也朝我微笑。经常笑。总的来说,他是喜欢我的,去年他开始教我法语。我同意听他的课,因为我想表示礼貌,但我却没有多大长进。我学到的主要是如何恭维人,因为这是阿曼德自己的专长,比如说:Que belle chemise.①

母亲采购完要做菜的东西,我们就把大包小包都交给了阿齐兹,开始走回家去。这是个平常的日子,太阳已开始有点夏天炎热的味道了,这种炎热将影响我们今后数月的生活。母亲和尼哈玛走在前,阿曼德主动提出要陪陪我们,和我一起走在稍后一点的地方,阿齐兹则拿着大包小包殿后。一路上差点又和德国种洛特维勒犬遭遇,但母亲老远就看到了它,让我们都及时穿过了那条路。那条洛特维勒犬主人是吉第·伯查科,住在我们对面的那座楼里,以前是个军人。这条洛特维勒犬是个黑毛的畜生,长着方方的大脑袋、肉鼓鼓的肚子,每当它看到有人沿街走过去,就会狂吠起来。在这些街邻中,这狗选中了我成为它强烈仇恨的聚焦点。只要一看见我,哪怕是在数十米之外,它就会狂暴起来。要是我没有及时穿过那条马路或躲进一座楼里,它的吠叫就会变成群狗愤怒而无休止的齐鸣。这般侮辱真是受不了,有时我还未等它张嘴就哭了起来。我认为自己流泪是因为我内心隐隐地觉得它的仇恨有道理。它知道我是谁,它透过我们之间的距离就能嗅到我的痛苦,透过街上的气味,就能辨出我的害怕,我体内原本松弛的肌肉绷了起来。只要这仍是我们俩之间的私事,我权且可以忍受它的仇恨,尽管可能不太公平。然而,可怕的是,它的吠叫将我暴露于全世界人面前。它凭着肮脏而恶毒的洞察力所认识到的真相将成为公有财产,又一次把我暴露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

这次,母亲踩点踩得非常精确,我们趁狗还没注意到就穿过了那

---

① 法语,意为"多漂亮的衬衫"。

条马路，或者也许它是专顾于狗的心思，而忽略了我们的存在。我们继续走路。接着，很是突然，最怪异、最离奇的景象映入我的眼帘：走近我们住的大楼时，我看到了诗人雪莱。

诗人正背靠在安有信箱的墙上，抽着烟。他头发很长，比诗选画像里的颜色要深些，还戴着太阳镜，除了这些细节外，那真是他——同样傲慢而苛刻地撇着嘴，同样白皙的额头，同样有点女孩气的下巴微微向前突出，同样的闲散和忧郁笼罩着这个陌生的外国人全身。

这番景象是如此的荒谬，如此的疯狂，如此的与我、与我们、与拉马特甘、与二十世纪不相干，我马上将它归咎为自己近来的孤僻状态，断定这只是幻觉，但令我惊讶的是我看见每个人都停下脚步盯着他，仿佛诗人真站在那里，活生生的。一刻彼此相认的短暂沉默，接着，年轻人用手指头很快地弹了一下，便将烟扔到远处草坪上，往前迎了几步。尼哈玛第一个缓过神来，急忙伸出手去，他却没理她，以一种放松而友好的姿态面对着我们一小帮人，却并没能掩饰住他性格中的粗野无礼。

他将墨镜的镜片瞄准了母亲，上方那一对眉毛拱了起来，问道：是艾达？我是尼奥，白艾蜜的儿子。母亲大叫起来，完全被这不正确的时间搞糊涂了：可我们原以为你只……他面带我所见过的最为奇特也最为迷人的微笑打断了她的话：是的，我知道。我坐了班早一点的飞机，从伦敦飞过来。那儿有一家日本餐馆我很喜欢。





蓝花瓶

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存在会使你，换句话说也就是我，想消失掉。不想让他们看着你，用他们的目光来触摸你。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坏人，也不是因为他们粗鲁、凶暴或傲慢。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与你，也就是与我，作对。事情就是这样。

我们的客人就是这样的人。

有些人越是坦率，就越难以琢磨；越是诚实，就越知之甚少。也许你并不想了解他们更多，但他们是否真实、是否诚恳、是否过分，这些问题在你心中，也就是我心中，产生一种感觉，让我觉得很不知情。令人感到很秘密，使人觉得不自在。你知道他们在说实话，没在撒谎。也许是实话太多，也许实话也需限制一下才能做到坦率。就像欣赏马奈①和毕沙罗②的画，得向后退几步。我知道他们的体验是真实的——他们能将某个事物及其对立面同样令人信服地放在一起。两句截然相反的话在他们嘴里能极为和谐地存在在一起。

我们的客人就是这样的人。

有一些人会使你感到难为情，非常的难为情。并不是难为情于做像参与交谈这样复杂的事，也不是难为情于行尴尬之举——如交谈中途去小便，或是吃通心面。不是。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场。事情就是这样。

① 马奈（1832—1883）：法国画家和印象派的先驱。他的作品如《草地上的午餐》（1862 年作），在当时引起极大争议。

② 毕沙罗（1830—1903）：法国印象派画家，以其乡村景色的描画出名，作品有《果园的花季》（1877 年作）等。

也有的人会使每个人都坠入爱河，完完全全是正当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使出解数吸引人。恰恰是因为其本身如此。

有些人会使你产生需要，某种需要，一种漫无边际、不可思议的需要。我们的客人也像那样的人。

也有些人（他们的数量少之又少），能马上就和母亲很合得来。

是的，当然是。到现在应该是很明显的了——我们的客人就属于这样的人。

我不喜欢我们的客人。他将我在家里的生活变成了无路可逃的监禁。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特别专横的事。他就是那个样子。

我名叫苏珊娜·拉宾，跟谁都不沾边。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想出来。我不想做任何事。在自己房里也不想。甚至连画画或做泥娃娃都不想，虽然这些通常会使我心平气和。我小心地坐在椅子上，不躺下，因为一躺下就会进入我自己，接下来便很困难。躺下来时，起先我会觉得很放松，接着便开始觉得我将再也出不去了。我将无法睁开眼睛。

有时，我想死。并不是因为我不快乐。仅仅是因为对于我这是很愉快的事。当在外面的表演艰难得无法忍受时，我就躺下，闭上眼，感受我内心的世界，这世界是那样的安宁，以致一想到与母亲去杂货铺或冲个澡甚至都会使我感到胸口闷闷的想作呕。

六月里，空气开始炎热起来。对着我吹的电扇使空气流动着，令我感觉还真不错，我溶解了，我听之任之，我与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床、物品、那只蓝花瓶（喔，蓝花瓶）——体内和体外没有了界限。

客人是选举日来的。可他并不和我们一起坐着看电视到深夜，焦灼地等结果。他在睡觉。母亲为他准备了父亲的书房作卧房，这书房父亲从没有用来工作过——他在剧院的办公室里工作。但他认为男人需要个书房。母亲收到来自德国的赔偿后，我们便搬进了这套公寓房，这比以前住的房子大许多，父亲就有了自己的书房。他常常把自己关在里面数小时，有时，我从钥匙孔往里偷窥，看到他在读书，大多



数是诗歌。普希金、里尔克①、阿赫玛托娃②、拜伦、布莱克。房间里一股橙子、香烟和睡觉的人呼吸的气味。甚至在夏天,没有橙子时也如此。我进去时父亲总是很高兴,他会给我念点书里的东西,即使我还不能明白诗歌的意思,也能感受到催眠般的节奏,它吸引着我,直到我学会自己读诗,变得和他一样沉迷。

父亲读书时有两种姿势:要么仰面朝天躺在床上,手里拿着书,腿抬起不经意地在脚踝处交叉着,靠在墙上;要么拿着书趴在床边的地板上。有时他会用吉他弹些俄罗斯歌曲。这些歌曲叫做浪漫曲,很悲哀、很朦胧。有时兴致上来,他会为母亲和我演奏,并解释歌词。尽管他只知道一点点和弦,却会伤情地弹唱,脑袋歪在一边,眉毛微微蹙到一起,中间形成两道垂直的皱纹,梦幻般的眼神对着吉他的颈部。有时,我想,要是舔舔那皱纹,极有可能味道很苦涩,就像柠檬皮。有一次我真那样做了——我拥抱了他,舔了舔他两眉之间的地方,想看看是什么味儿。真的很苦涩,但更像没加糖的可可饮料,并带有一股婴孩的味儿。最为重要的是总有一缕黑发滑落下来遮住他额头的右侧和右眼,显出不对称的美。甚至在他谢了顶仍在弹吉他时,我还会想象那缕黑发,仿佛那是他的组成部分,就像性格特点那样。

Atvari potsikhanku kalitku
I vidzhi vdzhivini sad slovno tzhen
Niye zabudzh potsimnuyu nakidku
Kruzheva na galotku nadzhen

母亲心中早已知道歌词的译意及其语音,有时会随着他翕动嘴唇,末了总是叹叹气,说说那些过于多情的俄罗斯人,神情严肃异常。

---

① 赖内·马利亚·里尔克(1875—1926):德国诗人,他的散文常以神秘色彩的抒情性和恰当的幻想而著称,并且深深地影响着20世纪的德国文学,他的文集包括《祈祷书》和《杜伊诺哀歌》。

② 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俄国女诗人。

她无法宽恕他的欺骗，而他则无法克制住自己。一次，我听他说不是他爱女人——仅仅是她们爱他，但就他而言，他爱的只有她，而她说：噢，阿弗兰穆，行行好吧，我不是你母亲，我是你妻子。她的声音怨怨的，有点颤抖，然后就到厨房里做事去了，那里发出一阵锅碗罐盆乒乒乓乓的声音。

轻轻地打开小门
影子般走进迷人的花园
别忘了那黑色的头巾
还有你发上的饰带

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切，还有我们做的游戏、那些黄色的笑话，以及父亲一有机会就给我念的那本希腊神话，直到旧体希伯来文的外国故事成为我幻象与空想世界里不可分割的部分：狡诈的奥德修斯、英俊的帕里斯、点金术的米达斯、奥林匹斯山上的众居民，希腊和斯巴达英雄们有着健壮的体格，不妥协的性格，与反复无常的诸神吵个没完，这些神一会儿和他们结盟，一会儿又折磨他们。这些我都记得，还有更多，但此时不是沉湎过去的时候。让逝去的岁月安宁吧。

对父亲无尽的爱，对他弃我们而去的痛苦记忆，每日都存活在我心中，就像地下的水滋养着每个念头每个举动的根部。我一直不停地感到惊讶，一个人会带给你多大的痛苦和绝望，令你无法正常地做事并且恨他。要么，就忘记他。这真是乱糟糟的情感，进化带来的乱糟糟的情感。可能唯人类独有，这些大自然中有依赖性的畸形儿。父亲去世离开了我，使我失去了主心骨，使我无法在没有他的情况下活下去。他是我的生命。用逻辑来推理，从他离去的那一刻起，我的生活就再也不是原来样子，或许根本就不能称其为生活。我很幸运能支撑着活了下来。这当然多亏了母亲，多亏了她全身心的关爱，多亏了她无穷尽的牺牲。因为母亲将她的生命献给了我，与我的生命融合到一起，直至无法分清哪是我的哪是她的。她的爱与父亲的截然不同。父





亲从不认为我很弱小或需要帮助。相反,在他眼里,我是力量、忍耐和秩序的化身,有时做得好像是他在需要我。其实他活着时,我从未感受到过他去世后的那种贫乏无助。

他的房间依然是我的神殿。我常常走进去,躺在他的床上,将脸埋在他的旧被褥里,试图从已逝久远的过去汲取一点力量,而我也仿佛早已将自己留在了那个过去。

在这个房间里母亲竟然安顿了客人。

他刚喝完咖啡,就说自己筋疲力尽得休息了,因为他有一个星期没怎么睡觉,说完便走进去关上了门。这个男人将要住在我们家里,对于这一点,我仍未明白过来。我的意识很怪异,一大特点就是能将对一个既成事实的认识稍稍再推迟一点,仿佛这段短短的自欺时间会给我些工夫适应根本无法适应的东西。

晚上阿曼德和尼哈玛来看电视,等待竞选结果。听到客人在睡觉,他们俩都很失望。尼哈玛说:他整个白天睡觉干吗?到头来白天总会变成夜晚的。接着,阿曼德说:也许他会起来一下,和我们喝点咖啡,再回去睡?母亲拒绝了他的建议,他们坐下来看电视,很快就把客人抛到了脑后。母亲拿来一碟自己做的指形小饼,大家吃饼喝茶谈正在发生的事,试图猜测最后结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预见。于是我们坐着,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疯子帽商茶会上的客人,电视机的作用就如同打盹的睡鼠,很少能引起与会者的注意。尼哈玛兴奋异常,用种族主义者的言辞说着反对派,这些话在文明圈里是应该闭口不谈的。阿曼德保持着一种神秘的表情,好像他已经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只有母亲很紧张,瞪着屏幕上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们,等待着投票站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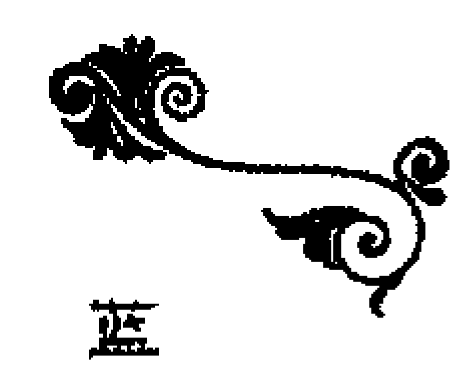
我对大选并不在意。我不在乎谁当总理。我没有社会或政治意识。我像个无政府主义者,但只是为了肤浅的原因。世界在我看来就是个舞台,属于那些强大、凶残、渴望权势的人们,而我对于他们则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这是母亲从来没能传授给我的极少几件事情之一。她总是觉得一切都在她掌握之中,没有什么问题是她不能改变

或解决的。可实际上，情况通常并没有改变，比如，就像以色列的情况：淡然不关心政治的苏珊娜·拉宾和热心参与国事的艾达·拉宾，她们所具有的影响同样不予重视。要是我告诉母亲，她对国事的热心参与、在电视机前的热烈争论，所有这些对于推进和平的进程或制止通货膨胀将不起一点作用，她会认为我是疯了。在她看来，要不是她对于每日新闻作热烈的反应，那个极端正统犹太教的德埃里早就当以色列的总理了。然而，实际上，忠实的母亲和淡漠的我，为国家做得成的都只有同一件事——把自己拽到投票站去行使公民的职责。中东的和平甚至连眷顾都不会眷顾一下。

我针对母亲所产生的这些危险想法会使自己进入到非常奇特的状态。比如，今天早上，母亲带我到设在本地小学的投票站去。有一刻，我独自站在屏风后面，突然心血来潮，觉得完全有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做一件不能原谅的事情。猛然间，我的头脑中有了这样的想法：我能做出谁都不会知道的惊人的叛逆之举。我能背叛母亲，在自己的良心上永久抹上一个丑陋的污点。要是我不去正儿八经地投票，而是把票投给某个阿拉伯政党，或更为糟糕但同样大胆地投给——马哈尔（Mahal），这个可鄙可嫌的利库德党[①]，老天会罚我下地狱吗？像个声名狼藉的家庭医生在将听诊器按在病人胸口时想象着她的乳房那样，我站在屏风后面，用不道德的令人震惊的念头使自己激动不已。

马哈尔。内塔尼亚胡。马哈尔。内塔尼亚胡。马哈尔。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我的手指头划过这些选票。我，这个有着骄傲的名字苏珊娜·拉宾的人，就要伤害这个国家、这个政党以及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家里所有亲切的东西。我将伤害母亲，这个领取养老金的老人，以前的市自来水公司主管，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及模范公民——艾达·拉宾。还有我逝去的父亲阿弗兰穆·拉宾－拉宾尼安，如此具有象征意义地在拉宾上台的那天去世。眼神忧郁的西蒙·佩雷斯和上帝将我一个人留在屏风后面，让撒旦来引诱我，拽我

① 以色列右翼党派的政治联盟，长期为以色列执政党。





耳朵，它伸出舌头，嘲弄般地向我笑：做呀，做呀，做呀，罪孽，罪孽，罪孽。我想起了遥远的儿时的一首歌，那是街上的孩子们常常朝我唱的，此时在我耳边大声地回响着：苏珊娜，苏珊娜，苏珊娜，他要来抓你，苏珊娜，他要揪你这丫头，折磨你个够，他要来抓你，苏珊娜！

突然我听到了守护天使的声音。亲切而熟悉的声音，像往常一样太响了点，在问一个看不见的人，可能是一个小天使：对不起，厕所在哪儿？沿着走廊走往右拐？你可知道那儿有没有卫生纸？母亲朝需要的方向走去，脚步声单调无变化，但坚定有力。我立刻平静了下来，一切又变得清楚而纯净了。撒旦引诱的企图被挫败了。我知道我得做什么。

因此，我在最后一分钟拯救了自己的灵魂。我将正确的选票放进了信封，痛苦地认识到，在那广大的被称为民族的人群如猛狮般的吼叫声中，我那细微的声音是多么无足轻重。标着 Emet①（工人党）和佩雷斯的选票一投进那两个黑洞洞的选票箱里，我便周身轻快喜悦。我微笑着出现在走廊上，感到孩子般的满足，心里甜蜜蜜的。我在照母亲的意愿做事，高兴地看到她眼中的喜悦，知道我有多好多听话多值得她爱时，总是感到这样的满足。我看到她从走廊远处的尽头向我走来，将裙子这儿拽拽那儿扯扯，以致谁都不会搞错她在刚才的几分钟里做了什么。此时，我竟不为她那令人厌恶、不知羞耻的举动难为情。我有礼貌地朝进来时检查过我们身份证的女士微笑，心里愤愤地说：宝贝，我们还要看看，到底谁将被搞个够。然后挽起母亲的臂弯：嗨，结了，我们去亭子那边喝杯可乐。

而现在，在这个结果我也起了作用的决定命运的晚上，我更喜欢看主持人而不去想这个国家将会发生什么。看来主持人也不担忧国家将会发生什么。显然，两种可能他都高兴。有时，他轻轻地舔舔下嘴唇，向薄嘴唇戴眼镜的女作家或是戴着像阿曼德那样圆顶小帽（这种圆顶小帽是犹太男子在祷告、学习、吃饭等时戴的）好挖苦人的表演

---

① 希伯来语，意为“真理”。

者提个逗趣的问题，尼哈玛称阿曼德已成为了再生的犹太人。我想着他们，他们怎样生活，节目结束后回家做什么。他们的生活迷人而绚丽。他们不去健康维护组织的诊所，不怕当着别人的面吃东西，他们与其他作家和主持人亲吻拥抱，打扮得体，朗声大笑。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国家无论发生什么事，跟展现在我们普通居民面前屏幕上嬉闹狡黠的狂欢毫不相干。

母亲一次次地起身去沏茶，回来时总是焦急地问：哎，怎么样了？尼哈玛总是回答：别问了？你着什么急？我们正在赢。慢慢地，就变得像大白天那样清楚无疑了，她说的并不对，我们，也就是他们并没在赢。这个情况越肯定，阿曼德就越开心，尼哈玛则越闹腾，喊得越多。她喝着茶杯里的鸡蛋利口酒，嘴里斥责着阿曼德：怎么了，你高兴什么？像你这样没用的东西正在毁坏我们的国家。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就因为你龌龊报复的天性。这样说有什么意思，你自己瞧发生什么了——那法西斯分子就要当你的总理，为什么？我问你呢。因为你还在跟我们算老账！你很清楚我在说什么——哦，滴滴涕（DDT），哦，临时难民营，哦，果尔达[1]说了什么，哦，古里安做了什么！为什么？我来告诉你确确实实是为什么——因为你怀恨在心。这就是原因！我问你，你从哪儿知道的？哎，从谁那里？你不知道？我来告诉你！从你最恨的人——阿拉伯人那儿！你怎么能从你恨的人那儿知道事情？既然我们已经在谈这事，我就来告诉你怎么的吧，这是历史事实。你在他们中间想都没多想一下就被同化了，在被逐出西班牙前后[2]，你跟他们热乎得跟房子着了火一样，而德裔犹太人保持他们血统的纯净，不受外邦人的影响——你读过《送奶工图维埃》[3]吗？没有？你该去读读！你和他们打成一片，把他们荒唐的念头都学了过来，现在你恨他们也恨佩雷斯。谁都会以为他做了什么天知道对不起你的事，即便是他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做！一个多么可亲可敬的人。



① 果尔达·梅厄（1898—1978）：以色列第四任总理，第一位女总理。

② 指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

③ 是意第绪语作家 Sholem Alechem 的作品。





我说得对吗？你再说呀，告诉我，告诉我佩雷斯做了什么？讲个小小的例子。我告诉你：他没做任何坏事！你不投他的票，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要讲原则。就是这样，要讲原则。仇恨，就是仇恨，我对不？

阿曼德大笑着说她是个可怕的种族主义者，他希望她不要当着没有幽默感的人这么说，否则他们会用她来做烤肉串，或做成他们从阿拉伯人那儿学来的其他菜。这更惹火了尼哈玛，她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数落来到以色列的摩洛哥犹太人，讲他们的苛求和落后，讲他们如何不在一流的部队单位服役。阿曼德说他不是摩洛哥的而是突尼斯的，尼哈玛朝他摆摆手，责怪他找碴。这当儿，母亲关掉了电视，说够了，该睡觉了。阿曼德看着我眼睛，说：Bonne nuit, ma belle①，并抓起我的手，用他温暖干燥的大拇指暗暗地摩挲了一下。我很快将手抽走，大家彼此道别。我们听到楼梯上尼哈玛的声音仍在朝阿曼德嚷嚷。

我坐在桌边母亲的对面，桌上是空茶杯和放指形小饼的碟子。我俩默不作声。我看着她，而她看看我，又把眼光移开去。接着，她的思绪渗透进我的脑子，都是些关于父亲、她自己和我的想法。

于是，我全神贯注地听她讲，内在的自我开始不知不觉地组织和命令自己，直到我的表情逐渐变得跟她的一模一样。我的嘴巴变得僵硬，紧紧地闭着，嘴角朝下，脑门沉重而紧张。

她叹了口气，说：嗨，太糟糕了。显然指的是选举。她的痛苦在我胸中难以忍受，于是，我拿起一块指形小饼吃起来。我目不斜视地嚼着，嚼着面饼碎块和腻腻的黄色奶油，与这堵喉咙的东西搏斗着，嚼呀嚼呀，直到把整块消灭掉。她看着我，眼神呆呆的。我吞下最后一口时，她说：哎，好吃吗？我回答：很好吃，非常非常好吃，妈妈。

第二天早上，在开始我们每日的海边之旅前，来得很早的尼哈玛在厨房里跑来跑去，对客人仍在睡觉表示不赞许。真奇怪，她嚷着，依

① 法语，意为“晚安，我的美人”。

我看你应该去查查，看出了什么事。他或许是病了，或怎么的。或许他死了！睡梦中停止了呼吸。别那样看我，艾达，真有这样的事发生！母亲说：到底是什么事？来吧，苏珊娜，拿上折叠椅，趁天还不热我们走吧。

大海悄悄地赢走了我的心。我对它从不厌倦。我们彼此相望。在我们之间的是母亲、尼哈玛和那个医疗球。衰弱的老腿、凸起的青筋，戴着色彩鲜艳的游泳帽（尼哈玛），戴着老式的太阳镜（母亲），她们在阻止死亡的临近。我不怕死亡。我害怕的是死亡与我之间的东西：生活。

回来的路上我们又遇到了吉第·伯查科和他的狗。当时母亲正就昨晚上尼哈玛对阿曼德的行为与她激烈地争论着，没能及时地使我们穿过那条马路。

那条狗对我的仇恨就像人一样伤害我。这次它也是先有节奏地来几下短促而克制的叫唤，很快便转为不顾一切的狂暴的歇斯底里，好像我就是我自己这个事实对它的存在是一种严重的侮辱。它怒冲冲地叫呀叫呀，解读着我可怜的弱点，在它眼里这一弱点令人厌恶得难以忍受，它只希望我会从地球上消失，省得令它想到这般巨大的弱点竟可存在于活的生物体里。而我呢？自然，我哭了起来。我们在近旁的长椅子上坐下，母亲摩挲着我的头直到我平静下来。

夜，如同黑暗潮湿的旧帷幕，降临了。客人仍在睡觉。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我在看科学频道上一部关于恐龙性交的电影。一位灰白长发的英国教授解释着它的经过，并用上了玩偶和动画，随后他甚至还在一位穿紧身连衣裤、戴蝴蝶领结的女助手身上演示说明。助手脸上保持着一种科学研究的严肃表情，我为此很佩服她。她看上去就像一个认真做着他们那样工作的人，也不问问关于她以及一般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说法。不像我，要在她的位置就会这样做的。但我不展示恐龙之间的性交，我甚至不能展示人之间的性交，无论戴不戴蝴蝶领结都不能。而另一方面，那位客人当然能够展示宇宙间任何动物的性生活。这个想法不知为什么使我很慌张，我便换了频道。





该喊醒他了，这真的看起来有点奇怪了。母亲显然是出于第六感觉来拯救我脱离那令我不安的思绪，她站在厨房门口，取下了围裙。

我跟在她后面走过过道，到达父亲的书房门口时，我后退了一步。她看看我，征得认可，然后毅然决然地打开了门，随即按亮了灯。"尼奥，尼奥，该起来了。工党联盟竞选失败了。"

后来在与客人一起的几个小时里，我才开始体会到这个降临到我头上的灾难有多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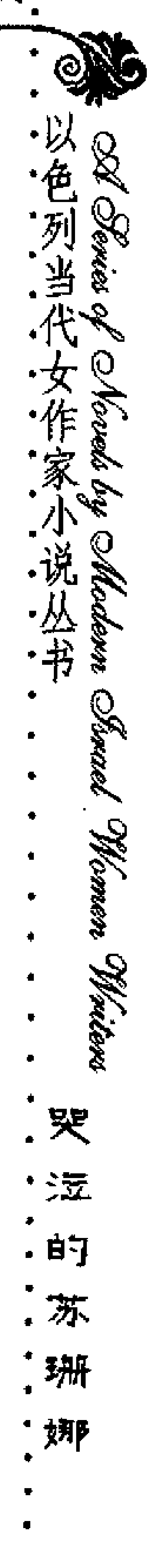
这种感觉，在他冲完澡穿着牛仔裤和肩膀处脱了线的白色旧T恤衫出来那一刻便在我心中涌了起来。他的头发往后扎着，但有几缕短发却没扎进马尾辫里，他将它们夹在了耳朵后面。他的脸上仍留有长睡以后的痕迹，眼皮有点肿，嘴唇看上去不如先前那么好看那么富有生机，傲慢的讥笑也不明显了。他与母亲之间所发生的一切是一种特例，两个人一开始就能彼此理解对方。有某种东西使他们相互心领神会，有某种东西在他们的反应及对彼此觉得的兴趣里完美而精确地运作着。就像上帝的恩惠。

正如每一份友谊开始之时那样，这份友谊一开始就伸出了灵敏而微妙的触角。他们间的谈话在屋子里就像一只软软的透明章鱼优雅地在空中挪动着它的爪子。总体上，当事人都故作小心不让彼此走得太近，以这种情况所能允许的缓慢速度发展着，因为他们预先就知道这种亲密的关系肯定会来。首先客人想知道我们那个巴伐利亚大碗橱的意义。这只巴伐利亚大碗橱是在得到了德国的赔偿后我们手头有点宽裕时母亲购得的物品之一。她是从一对德国移民老夫妇那儿买来的，我觉得那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东西。它又大又重，用深紫红色的木料做成，到处刻着鲜花、水果、海上女妖和半人马。中间一格有个玻璃的推门，里面陈列着母亲为节日准备的精美餐具：贵重的罗森塔尔瓷餐具、烛台、银器，还有几个小雕像——猫头鹰蹲在一本镀金的书上，一对丑陋的牛头犬深情地讨好着对方。然而，最主要的是碗橱的几扇边门。每扇门中央都有个胡柚大小的人脑袋向外凸着，左侧是个女子，右侧是个男子。男子长着谜一般的胡须，脸旁是柔软的卷发，

气质高贵但面无表情。那女子粗野些，头发松散着，一副粗俗的乡下姑娘模样。不过，因为她是被雕刻在带有鲜花和半人马的橱门上，也就有了王者风范。小时候，自然而然地我会想知道他们是谁。母亲的眼光特别实际，说他们就是普通人。而父亲，啊，我的父亲每次都会编造出不同的东西——有时他声言他们是希特勒父母的脑袋，有时他会说他们是德国诗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和他的情人凯瑟琳，她是个半雌半雄体，但却是他灵感的源泉。

客人问起碗橱，但母亲从来不喜欢谈论碗橱，因为她一点都不知道是谁制作的，上面的雕刻是什么意思，只得开始从记忆深处挖掘原来主人给她的点滴情况——上面的人物可能是木匠的亲戚，可能是当地的官员。她边说边给客人上着晚餐：烤鸡、土豆泥、剁碎的肝、茄子和蔬菜色拉。客人说自伦敦到现在，换句话说就是整整两天，没吃过任何东西了。他把所有东西都吃光，又要了一份鸡和土豆。他和母亲说话时不断地叫着她的名字：艾达，这个好吃极了。再来片面包就太好了，艾达。艾达。我渴死了。天啊，多迷人的盐罐，艾达。而她，则想知道日本菜是什么样的，他解释说生鱼可切成各种精美的形状。她很吃惊，要求知道详细的情况：是什么鱼，长得什么样，味道好不好。日本菜当然味道好（天啊，艾达，真是又精美又健康，极具审美情趣，艾达）。还有那些航空旅行，可真不容易（太可怕了，艾达，简直是噩梦，艾达，幸运的是我从纽约到伦敦坐了商务舱，艾达，但我极讨厌坐飞机，因此坐商务舱也没什么两样）。虽然艾达自己这辈子至今只坐过几次飞机，并且总是激动得像头一回坐，客人的话却使她发现了自己身上那份见多识广者的世故，她点点头，深表同情。当然，她明白——那种不舒服和受限制。由于母亲天生不会造假，她很快转到了议事日程的另一个话题上：白艾蜜和赫伯怎么样？这一回轮到客人言简意赅的回答了（跟以往一样，艾达。他跟各种阿拉伯人和波多黎各人相处，母亲则像往常一样唠叨个没完，你是知道的，艾达）。

在这高峰会议如屋子着火般热烈之时，那个不讲礼貌又不懂文明的苏珊娜·拉宾在干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我就坐在冰箱旁角落里我



的小凳子上，一边听着一边凝视空中。

当然，我更愿意消失。到我的房间去。去读那本糟糕的旧诗选，或旧希伯来文的克尔恺郭尔，看看窗外的街道。什么都行。但我知道要是我离开，就会引来注意和多余的问话，因此我觉得待在原地并且表现得像我不存在则更为简单一些。有一刻我很恐惧，客人想把我也拉入交谈，问我如何对付暑热，但母亲给我解了围，开始解释起来：晚上七点钟的微风（多令我高兴）、电扇（每个房间需要一个）、各种空调的价格差异（你不会相信的）、空调的缺点（它们使空气变干，害苏珊娜立马得感冒，它们还会发出噪音），他们过去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晚上坐在门廊上吃西瓜喝悬钩子果汁，那是阿弗兰穆还活着的时候）。由于客人的眼界也使母亲的眼界得以扩展，她也进入了炎热这个话题的学术层面，给他提供了一则最初是从尼哈玛那儿听来的消息（这是尼哈玛因渴求知识，阅读《现代》增刊所获得的），是臭氧层的窟窿引起了全球尤其是以色列普遍变暖。他可巧听说过那个愚蠢的理论，说这个洞是由——原谅我这么说——新西兰的羊群放屁造成的？（真令人震惊，艾达。从没听说过，不过我相信是对的。别看它们的外表，艾达，它们可是些可恶的动物。）

客人对她所说的一切都表示出兴趣，似乎她提供的消息不但引人入胜而且非常重要。不消说许多，他便造成了谈话活跃且无拘无束的印象。或许是由于他眯缝着眼注意倾听，或许是由于他对所说的任何事情注意力集中且精神放松，他对于每一则新的消息脸上表情都有着细微生动的变化。

到喝咖啡的时候，我们转移到了客厅。换句话说，也就是母亲和客人兴高采烈哈哈大笑着进行了转移（让我来拿小饼子，艾达。你能拿这盘子吗，尼奥？这是德国瓷器吗，艾达？小心门柱，尼奥，等等）。苏珊娜·拉宾这个扫兴的人跟在他们后面，声音很轻，两手抱着凳子。

我能做什么呢？我挨着那株喜林芋坐在凳子上，希望一有可能就溜出去。接着，慢慢但很肯定地，我开始感到越来越不安，这种不安的性质和起因很快我就清楚了。在我的眼睛漫无目的地巡视空间路程

的其中一站,我碰巧瞥见了客人湿漉漉的头发,突然我明白:他在我们的洗澡间里——母亲和我的洗澡间——冲了个澡。马上,这潜在的不安以其全部的力量突然变成了清醒的意识。黏糊糊的热汗开始从我手掌上的毛孔里渗出来。我们的洗澡间很小,天花板附近布满潮湿的斑点,那浴缸母亲每年都要用水杨酸洗,用粗砂纸擦,然后再刷上特殊的涂料,那里还有我放卫生巾的盒子、我的洗发香波、我不想洗头发时戴在头上的塑料浴帽,还有——最糟糕的——我的短裤。就是我冲澡前脱下来的那条短裤,母亲在我后面打扫拖地后便将它放进了洗衣篮。我记得有时会有毛发粘在肥皂或浴缸的边上。我记得母亲那硕大的乳罩有时就搭在毛巾杆上,还有脏兮兮的梳子、抗生素软膏、痔疮霜、防真菌感染的药霜、对付便秘的石蜡栓剂,还有去除疣子的液体,还有软化她脚上硬皮的浮石。我们洗澡间的一切都展示在客人的面前,一切私密的、不为人知的东西都暴露无遗,使我们,特别是我非常脆弱,我的丑陋、我的赤裸、我嘴里的气味、我的痛苦和我那令人生厌的肉欲的人性都没有了遮掩。因为我们住在三楼,他站在喷头下面,有时水会变小,这时,凭着他那讥讽的嘴唇和嘲弄的眼睛,心里会作何感想?他反感吗?他是否会用他好奇而可怖的眼光逐一扫视这些细节,处理接受到的信息,直到最后形成一种总体上的反感?他怎么能这样?怎么有人敢进入我的家,观察一切隐私的东西,在十分钟内就发现了最隐匿、最秘密的东西呢?

我盯着他,眼里满是愤恨。他懒洋洋地半靠半躺在沙发上,偶尔顽皮地扭动一下光光的脚指头,从撅起的嘴唇里吐出烟来。为什么他会这么舒服?人怎么能这么舒服?他们从哪儿学来的这些姿势,不仅真的舒服而且也很中看?这些姿势不会泄露任何其主人不想让你预先知道的情况。

比方说,我感觉舒服时的姿势很丑陋。我从不会暴露给任何人看。我盘腿坐时,我的背往往要弯下来,和别人在一起时,我得提醒自己把背挺直。我的手臂要么像两块破布悬在身体两侧,要么就交叉在胸前,多半时候是不安地在这两种可能之间进行变换,而他——这位



客人——将他的身体摆弄得就如同天鹅绒衬垫上的钻石珠宝，展露在所有的人面前，他还搔着耳朵背后，还变换着姿势，仿佛这是个没有穷尽的保留节目。隐秘的和公开的东西在他身上结合在了一起，非常和谐，我毫不怀疑他独处时也是这样坐、这样躺、这样动的。

我恨他。

我听到母亲告诉他选举的事，他听着，问了几个尖锐的小问题，撅起嘴巴表示反感（总理当选人恶魔般的本性），摇摆下巴表示赞同（左翼分子的傲慢），听到透露失望结果（我们这方输了，敌人那方赢了）的这部分内容时紧咬下嘴唇戏剧性地表示震惊。母亲提起了前一晚剩下的鸡蛋利口酒，接着客人说了声："哎哟！我忘了。"便走进父亲的房间不见了。母亲还记得我的存在，看了我一眼，问：哎，你觉得怎么样？我们这位亲戚不是很不错吗，愉快而友善？我尽量保持平静的表情，也不多眨一下眼睛，只是拉开了点嘴巴，露出漫画般的微笑。这使她很担忧，她那"你怎么了"的问话正要出口，客人出现了，打断了我俩间无声的对话。他手里拿着瓶瓶包包，把这些都放在了小咖啡桌上，母亲则急忙麻利地将烟灰缸和玻璃杯移到一边去，好像是在为一位垂死的病人准备急诊手术。

一想到得对这些礼物作出表示我就很恐惧。我看着他用马爹利科涅克白兰地、一个闪闪发光的罐子内装一瓶形状如透明粉色的女性躯干有着突起的胸部的香水（母亲说："这是时下才出来的东西。你刚才说它叫什么，葛尔荻艾？"）赢得了母亲一阵阵的赞美声。接着，令我惊骇的是，一小团丝绸展开成一大块漂浮的云彩，寻找着地心引力，直到稳定成了一件细吊带的蓝灰色裙子，所有的眼睛都转到了我身上，他的声音在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适合你，但我坐飞机前一天经过'唐纳·凯伦'时，我无法不买下它，它的线条那样简洁而完美，你不这样认为吗？"母亲说："噢，多漂亮，但恐怕不太适合苏珊娜，她穿这样的东西有点太害羞了。"他马上把裙子扔到沙发上，仿佛这是块晚餐后用过的餐巾，母亲则撕开一包牌子不熟悉的香烟的玻璃纸，并向早已在开巴伐利亚碗橱玻璃门的客人指点喝白兰地的杯子在哪，好像他就是

我们中的一分子，这个家的一员。好像他就属于这儿。

他俩喝着白兰地，抽着烟。我也举起满满的酒杯，这是母亲硬要我拿的。我的嘴唇沾着浓浓的苦涩，等着这夜晚的逝去。我用一个令本人愉快的想法安慰着自己，那就是：等大家都上床歇息之后，我就可以去小便了，这是过去半个小时里我渴望做的事。这个举动是一种生理上和象征意义上的解脱，是对一晚上受折磨的补偿。这一前景非常鼓舞人心，以至于母亲和客人之间的闲聊听上去也没那么恼人了。

现在轮到母亲提问了，她问得很热心。从他俩的谈话里，我得知他并不太喜欢他的母亲，岁月对金发美女（这是我们家指她时的代号）并没有很仁慈。她干瘪了，枯萎了，如今她看上去就像是揉皱了的点心包装纸。这个比喻是母亲得出的，她已经在喝第二杯了，她哈哈笑着，作了这番非议。我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他的继父赫伯身体不太好。作为回报，母亲给他讲了白艾蜜遇见赫伯的故事：在集体农庄上时，他在美国志愿者中是最成熟，也是最勤劳的，一度他还被委以重任掌管乳畜群，然而由于大家都知道越战后他思想不集中，他们派白艾蜜一天数小时地去督促他，以确保他不会给同一头奶牛挤两次奶。类似于挤奶营业室的私人秘书。那当口，在我看来客人脸上似乎掠过了一丝阴影，似乎是这个感人的家庭庆祝开始以来头一次他拒绝合作，但他做得非常体面而客气，母亲甚至没有注意到他是怎么使她那关于患弹震症的赫伯的话题转到了父亲在六日战争中所受的伤上来的，当时狙击手的一颗子弹巧妙地射进了他的右半个屁股，却没伤到其他任何地方。所有这一切自然而然地引到了关于客人的生父诺亚叔叔的一场谈话。此时，母亲情不自禁地谈起来，随意地讲着一些情节、次要情节，并且作着解释。

我得知客人是个艺术品经销商，来以色列是想购得俄罗斯移民带到这个国家来的艺术品。确切地说，这并不是他的领域，他的专长是本世纪中期以来的美国艺术。但既然颇有利可图，他也就同意了做这事。

他们总是说人们喜欢谈论自己的事。我认为这绝不是真的。人





们喜欢讲述自己非常独特的故事。故事由一系列的事实经过加工、处理、形成风格、经过审核然后提炼成最终的模式,有着开头、中段、结尾和寓意。所有不想要的细节都被删除或朦胧化,讲述者想要强调的东西都得到了强调,因而故事并不是此时此刻发生着的活生生的、正在发展的事情,而是对过去经过精心选择的回顾。故事是一种无生命的东西。一些复杂而深奥的故事可能会包含诸如不奉承讲述人的事实,但这些事实总是插入得非常恰当。如果暴露出某个弱点,讲述人立刻会得到称赞,因为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弱点,这种意识人们会因他将这些事实放在首位而很明显就能看出。

一些讲故事的就更是老手。他们知道如何制造某些本来实际上是故事却伪装成平常谈话的东西。他们在适当的位置停顿、升高或降低声音、停上分把钟找寻合适的词。他们是演员,他们表演得越有天才,故事就听上去越像真实而自然的讲话。

因此,是的,人们喜欢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是否喜欢谈论他们自己呢? 我认为人们真的并不喜欢谈论他们自己。

客人是个绝好的演员。在喝空了半瓶白兰地之后,他的叙述才能由于在说听双方循环反馈中不断释放的肾上腺素的滋养而增强了。母亲脸颊泛红,脱了鞋,盘腿坐在扶手椅子里。她的脚踝纤细匀称,小腿光滑丰满,甚至很有青春活力,然而在她微微提起的裙裾下面,尽管黑糊糊的一片,还是可能猜想到那我所熟知的肥胖而松弛的大腿。对于这片裙裾下面显露出来的黑暗我很以为耻。一片危险的黑暗,不小心动一下,就会变为光亮之下一块布满青筋的老肉。

此时,她想知道客人为什么放弃了画画。为什么,大家自打他这么高时(她比画了下从地板上算起的高度)就知道他是个特别有天赋的孩子——可他的主要天赋在于画画方面。他画得多漂亮。还有他后来的诸多成功,以及他在纽约和伦敦的学习。客人作答时,他的表演达到了当晚的顶峰。长长的独白,中间变化着他叙述的速度和情绪——有时快速而激昂,有时做沉思状仿佛在征求我们的意见(是的,在故事较为敏感的地方,还劳他看了我一眼),然后突然表现得很忏

悔，之后声音又变成了傲慢却故意很幼稚的口吻。假如我再多花一点儿生命与人交谈而不是默默地从旁观察的话，我会相信这儿正发生的一切是谈话。真正的谈话，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当然是客人与母亲），就像火车上陌生人之间的障碍突然都奇迹般地轰然倒塌了。

当然他想当艺术家，一个画家。他将自己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毅力都放在了这个目标上。但当他取得了在伦敦的硕士学位，应邀到数个有声望的美术馆展出他的作品，甚至还以对一个初出茅庐的人来说高得出格的价格卖掉了几幅画后，他意识到自己出不了新东西了，意识到一切都已经发生过了（你知道那样的，艾达）。这就像是在旅行中的车里从后窗向外看东西。他发现自己身处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对话时引用套着引用，包含着闪烁其词的智力上的诡辩，而他就得用这样的诡辩办法将自己定义为艺术家（你明白吗，艾达）。噢，艾达明白一切，这跟在健康维护组织的诊所及银行里她要处理的那些问题很相似。因此，是的，在一个后现代主义超级诡辩的世界里，一切都已经做好了，留给你做的也就是去对先于你的东西作出反应，通常是以冷嘲热讽的态度。因此在他看来，继续创作、做个艺术家，意味着陷入到自作聪明这个无底的泥潭里去（当然我能那样做，艾达）。但一想到那样就感到厌倦。他反感那样不停地作反应、作反应。他想自主行动的愿望使他走得更远，到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不太有魅力的地方去，在那儿他觉得自己始终在创造新生活，每日虽只一点一滴地，但发自内心，而不是对早已做就的东西作没完没了的连锁反应（因为我们是在每天上千次的小选择中创造自己，艾达）。总而言之，这些问题过于复杂。当个艺术家意味着什么？有什么样的要求？当个艺术家就是要到众神那儿去偷取火种。做普罗米修斯，要求有某种激情、某种献身精神，还要有内在的方向感。要有张与合之间的平衡关系。能脱离这个世界，同时又能通过观察和批判性的思考与它进行对话（生活，艾达，人性，艾达，艺术，艾达）。是的，是的，是的，艾达点着头。要是她不明白这些事情，那么，凭上帝的名，谁真能明白呢？是的，是的，是的。

我半听半不听。客人的声音抑扬顿挫地传入我的耳朵，悦耳文



雅，有时候会飘来几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词语组合。内在的方向感？张与合之间的平衡关系？多好的问题！我确切地知道他在谈些什么——我感到背上在抽筋——我觉得背很痛，好像负着上吨的东西。我非常想去小便。现在我真得去小便了。

这个愿望在他们仍在谈论家庭里的事情时已变成了一种需要。既然我们的亲戚并不多，我希望这场会谈很快就会没什么好说的了或是他们会觉得累了要上床去休息。但是随后，我开始明白他们将永远不会累，永远永远不会。

其实，他们为什么该累了呢？客人睡了三十三个小时后吃饱喝足精神振奋，而母亲在寡居多年之后渴望碰见新面孔。这个好奇的客人躺在沙发上，好像他是这个屋子的一部分，好像他是巴伐利亚碗橱上的第三个脑袋，有着她的血她的肉。那个门牙间有缝、站在柜台后冷漠拒人的邮政新职员如今被客人比到哪里去了？

仇恨使才智更加敏锐，仇恨使我想起了通常不注意其存在的东西。仇恨使我不仅参透动机而且作出评判。

我需要小便。这是个无路可走的处境。站起身穿过房间到达厕所，脱下裤子坐在马桶上，听凭小便滴滴答答的声音在这寂静的夜里放大，钻进坐在客厅那两个人的耳朵——这个想法使我的两个耳朵发热，我触摸了足有一分钟来检查它们是否着了火，并用湿冷的手掌给它们降点温。

有时这股尿意变得难以忍受，放任自流似乎是唯一的可能性了。我想要是尿在裤子里，也许他们不会注意到凳子下的小水潭。当他们最后结束愉快的会晤时，我会找个借口继续坐在原地。在他们回各自的房间之后，我会用一块湿布去除掉这个可耻的证据。

然而，当然，这是个无法接受的解决方案。这个办法只是为了避免你在任何时刻去想比这情况更为糟糕的其他事情。只不过分散分散注意力而已。

接着我作出了决定。这阵紧迫感一过去，我就站起了身，轻轻地宣布要去睡觉了。母亲和客人都很惊讶同时有点尴尬，好像他们刚才

忘记了我的在场，说了些不是给我听的话。主要觉得尴尬的自然是母亲，但客人也站了起来：哦嗬，真是很晚了，我们在这儿坐了多久了，艾达，时间过得真快，是吗？我已经开始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客厅，突然母亲以比往常更响的醉醺醺的声音叫住了我，尽管她是在和客人说话，我却像根木柱子矗在那里。

"噢，你可知道苏珊娜也画画？不是我懂得太多，是他们说她不缺乏才能。"

几乎没换一口气，她转向我，面带一种不容反对的神情说："苏珊娜，给尼奥看看你的画。那些素描，特别是尼哈玛侧面像那一张，或许再拿一两个泥娃娃，给他个整体的印象。哎，去呀，在等什么呀？没理由难为情的。他是家里人。"

她的建议使我一动不动。要不是这种情况，我就会看着她，将我的痛苦透过她的醉意传达给她。也许她就会明白我的情况，保护我免遭她慷慨大方带来的后果。但是不。我知道目前任何努力都会毁坏一切，就在此地，在这树枝形装饰灯照射的光圈中，我会站着，一切的耻辱都将尽现无遗：尿液的溪流飞溅而下，弄湿我的两腿、地板，往各个方向涌动，淹没客厅、家具、客人、母亲这个楼里所有的住户、"不骗你"超市、各个小巷、狗儿们溜达的公园，健康维护组织诊所、整个拉马特甘，一个幸存者都没有。

我走完了到卧室的那几步，用仅剩的一点力气克制住自己不冲进去。相反的，这渴望的时刻越近，我越慢了下来，以至于我溜进房间时几乎显得若无其事，我关上门，轻轻地松开了门把手。

只有到了那时，我才冲到房间当中，像只困兽般四下打量，尽管我早就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书桌上方书架上的空花瓶。我把它放到脚边，撩起裙子，褪下短裤，不让它与鞋子相缠绕，精确地使自己位于花瓶正上方，然后蹲下来，将阴部贴着瓶口，好像它是个拔火罐，就要清除掉体内毒害我生命的一切瘰疬和忧伤。

接着尿就出来了。

我尿呀尿呀尿呀，涌动着一种逐渐解脱的感觉，就如同平生头一



回在经历一件事那样让我感动。这就像一阵哭泣使长久忍耐的痛苦释放了出来。生活发生在一个悸动的时刻，真实而独立，并不是对任何事情作反应，就像客人刚在演讲中提到的万事应该发生的那样。

我瘫软疲乏地又出现在了客厅里，手上拿着自己的作品，交给客人。我非常累，对任何事情再也在乎不起来了。而他——嘴角边叼着烟，眼睛眨着，以防烟呛进去——一张一张地翻看着素描，接着他抬起脸来面对着我，而我注意到了他皮肤底下紫色的血管。

"听着，这张看上去不错，但下回我要更加好好地看一看，我不想过于肤浅。现在我累坏了。"

苏珊娜·拉宾，这是我在作品上的签名。这个习惯始于我在医院就诊的那些日子，以便顾问不至于将画搞混。

我跟谁都不搭界，我从没有跟谁搭界过。唯独母亲，她与我密切相连。母亲——一个我所热爱的出色的妇女。其实我很难相信自己能过或者会想去过没有她的生活。我们是亲密的朋友，我没有真正的秘密瞒过她，也许只有小事情我不想烦她或使她难过。

而现在我跟客人也搭界了起来。他将住在我们家里。他将看到洗澡间里我的短裤、我洗最隐秘处用的肥皂。他可能会看到我吃东西或坐着的姿势很丑，他可能会听到我冲马桶。他将一点一点地侵入到每个地方，这个家的每一平方厘米，我们生活的每一角落。这个我唯一觉得安全的地方将会消失。我存在着，没有一点皮肤，神经都裸露在外头，一直到他也侵入了我，那时我就根本不再存在了。我将与自己都不搭界了。

自从客人到来之后，我越来越退缩，尽量不离开自己的房间，听着他来来去去。我知道这样做使母亲很担忧，但我也没办法。母亲自头一晚与他一起喝醉以后，又恢复了通常忧虑缄默的那个她。她觉得很愧疚。

我曾读到过关于奥斯卡·王尔德的事情。他是个极会挥霍的人，一天他抱怨说要使他的生活方式和他买的那两个明代蓝色大瓷花瓶相称真是越来越难了。

我的生活方式恰恰与我房里的蓝花瓶极为相称。这个花瓶是尼哈玛买给母亲作生日礼物的。我晚上往里面撒尿已有一个星期了。我怕客人没睡着，会在寂静的夜里听到我的声音，那尿溅入花瓶的声音。母亲很快就察觉了我的行为，但她从不和我说什么。每天她进来整理房间时就把花瓶倒空。我们不谈这事——有什么好谈的呢？我看得出她很难过很忧虑，我内心感觉到她的痛苦，就好像是我的痛苦一样。但她能做什么呢？把客人扔到街上去吗？

尼哈玛和阿曼德也不喜欢客人。各人有各自的理由。这些理由有的是公开宣布的，有的则是深藏不露的。尼哈玛公开宣布的理由是她无法忍受客人，因为在她眼里他是个轻率不可靠的家伙，有着诸多阴暗的勾当，大多不让人知道，并且利用了母亲的好心肠和纯真无邪！那深藏不露的理由是客人正在取代她在母亲心目中的位置——那个类似淘气孩子的位置，可以被允许说令人生气且不负责任的话，而慈爱的父母则惊骇但仍微笑地摇着脑袋。好啦，好啦，你这淘气的小东西！

阿曼德公开宣布的理由和尼哈玛的完全一样。他那深藏不露的理由呢？哎，这个帝国主义的客人也取代了他的位置——我们家如今有个男人了。即便他并没有做任何男人的事情来剥夺阿曼德的权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的义务——他不在墙上钻孔，他不帮母亲拿沉重的篮子。但潜在的可能性呢，女士们先生们，潜在的可能性！

遗憾的是，我和尼哈玛、阿曼德共同烦心的问题对事态并无用处。显然是因为这些理由致使我们对他都下了否定的结论。我们的反对缺乏力量。我们太依赖于母亲，自己不会出去上街示威。而且这儿也没有任何游击战。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都有自己的烦恼。这样的事态甚至能导致国家灭亡。

我过着安宁的生活，非常安宁。这样的生活应该会带来心境的平和，但我并不觉得平静。相反，我感到巨大而烦人的紧张，没有发泄的途径。我想到了修禅宗的佛教徒、僧侣们。他们安宁地过着沉思默想



的生活。他们很平静。我那内在的自我也努力想作沉思,但大多数时候内在的自我疲乏而空虚。一切都堵住了,封得死死的。

葛兰菲迪希·韦奇伍德

对事物已经变化的认识是慢慢到来的,甚至对那些喜欢变化的人也是如此。谁期盼变化。我讨厌变化。也许这就是我更难以注意到变化悄悄开始的原因。我的脑子玩着奇特的游戏,将现实隐藏起来,不让自己知道,也许这样能保护我免受刺激。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还是更愿意尽可能快地看见真相,无论它有多严酷。我喜欢这样。是的,变化就像一只丑陋的独眼猫悄然而至。它躲在壁橱底下,藏在厨房手巾后面,静静地坐在阴暗的角落里,直至时候到了,你才开始看见它存在的迹象。

于是事情也就这样发生了。我从一个在客人眼里几乎不存在的实体变成了感兴趣的小焦点,一个有人跟她说话、有人向她问安、有人征求意见、有人分享见识的人。一切都小心谨慎,非常低调,然而确实有这么回事。

比方说,客人要我再次给他看看我的画。就是那些他在我们家头一个欢快的晚上我被迫展示到他冷漠的眼皮底下的画。他说的时候,叫着我的名字,如同到目前为止只称呼过母亲的那样:哎,苏珊娜,什么时候给我看看你的画?我紧靠着通往洗澡间和厕所的过道上的那堵墙:啊,啊,我不知道,今天晚上。他那理解的微笑以及说"行啊"时呼出来的气息灼烧着我的脸。幸运的是,他忘记了这个提议,但它仍然悬在空中,随时都会被重新提出来,这取决于客人的情绪和记忆。

又一次,在电视机前看"探索"频道,他也跟我闲谈:看这个印度豹的脑袋多小,苏珊娜。一只很可笑的动物,但从另一点来说,这小豹子是不是蛮可爱的,你不这样认为吗,苏珊娜?你会愿意宠爱它吗?承



认你会，苏珊娜！

他是那样的随和友善，很快我就知道了他讨厌看关于鸟类和天气的影片。而乌龟却使他觉得很有趣：看看，苏珊娜，它们正爬到自己的蛋上去，所有的小乌龟要变成烙饼了。母亲给我们拿来了三明治，换句话说是给他——他只坐在桌边吃饭，而我呢，前面已经提到过，只在没人看着的时候吃。他是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见鬼，我把芥末滴在沙发上了，艾达。烤牛肉简直好极了，艾达。还有可乐吗？）

他开始早起了，最近他总是在我们去海滩前和我们一起坐着喝咖啡。母亲给他拿来报纸，他和尼哈玛争论，由于某种原因，他总想使我也加入讨论。尼哈玛听着他说，嘴张得大大的：你不必为选举结果这么沮丧，利波太太，用点宿命论并不会伤害你，最糟糕的事是国家将遭到毁灭。也就是说，此刻国家可能将遭到毁灭，那我们就会像以前那样重又变成流浪民族。你必须赞同我的话，也要赞同犹太人在散居[①]时更加出色的历史。事实明摆着。请注意二十世纪文化和科学上犹太人起的作用——弗洛伊德、马克思、爱因斯坦。而我们到这儿来以后发生了什么呢？想想太可怕了。一个丑陋的帝国主义小国。谁需要它呀？你怎么认为，苏珊娜？利波太太，你被佩雷斯的男性魅力吸引住了？我认为他穿西服真是帅极了。你觉得呢，苏珊娜？

作为回击，尼哈玛想知道他在以色列所做生意的性质，但他成功地遏止了她：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怀疑，利波太太。我在这儿所做的事连一丝一毫的犯罪都挨不上。要是你认为俄罗斯黑手党只能卖给我偷来的艺术品，那你真是低估了他们。除此之外，我还得告诉你，俄罗斯黑手党压根就不存在，这只不过是美国联邦调查局阴谋接管中东的掩饰手段。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这儿有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你那位优雅的朋友佩雷斯先生是以色列同谋者的头头，当然还外加联邦经济情报局的头头。你笑什么？去问苏珊娜，她对暗藏的真相很敏感。对吧，苏珊娜？

① 犹太人在外的散居从公元前6世纪起，那时犹太人被驱逐到巴比伦，在以色列外边散居。

就这样说呀说呀，直到我们出发去海滩，他去做自己的事情。我呢？我不作反应，即便想说我也不能搭话。我把这些求援看成他在我们家所造成的巨大不安的仅仅一小部分。我并不追根究底。显然是因为我没注意到过去的这个星期他压根就没费过一点点劲想把我扯入他的生活，一丝一毫都没有。无怪本周末那次稍有变化的对话使我十分吃惊，只有在那以后，我才开始明白这整个儿事情就是个阴谋，他那些小小的建议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夏日呈现出了其特有的浓重油腻，不给人任何疑问的余地。我们开始早一些去海边了，因为早上十点钟的时候，太阳已经晒得令人难以忍受，海滩上满是如猿人般十来岁的青少年在展示他们的年轻。我甚至知道了辨认最时髦的样式——男孩穿大而肥的齐膝短裤，躺在沙滩上露出像小鸡样瘦瘠的小腿时，可隐约瞥见他们的私处。女孩们胖胖的大腿闪着防晒油的光泽，穿着剪裁奇特的新款泳衣，显得高大而笨拙，使她们的身体看上去不成比例。

人的身体是多么丑陋而讨厌。这一切使我又注意起了一向在意的自己的身体。蚂蚱似的身躯，极瘦的腿，驼着的背。这个身躯的存在和与我之间的关联甚至在冲澡时我都尽量视而不见，仿佛它是个得时不时呵护的物体，一台食物处理器，一个马桶，或是一台洗衣机。我洗澡动作快效率高，遏制了一切关于它的念头。

我们从海滩回来时，客人通常都坐在厨房里，他把那儿临时配备成了自己的办公室——电话、书信、信封、文件。后来他出去办自己的事，母亲便让我吃饭。之后我才能重新恢复自我、回到自己的生活并做自己的事情，只是客人那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存在使一切更受约束。

事情变得明朗起来是在母亲小心翼翼地敲我房门的那一晚。我正和衣躺在床上，听着电扇嘎吱嘎吱的声音，努力想让几乎觉察不到的凉爽吹向我，热焐在我身上就像个笨重多毛的动物，比如熊什么的。我周身围裹着衣服和脂肪。一切都令我窒息。母亲用她那令人宽慰的老一套劝说我走出房间到客厅去。他在那儿，当然以他通常的姿势坐在沙发上，翻着报纸。





小小的细节有时能为无法解决的情况找到出路。全神贯注于小细节,就会将该情况分解掉,使它失去意义,因而也就去除了它的情感内容。而有时则相反——它给毫无意义的情况赋予了一些小小的意义。我要看看那巴伐利亚男人的脑袋,看看他整洁的小胡子,看看那木刻的卷发罩着他刚毅呈弧形的雄山羊似的前额。我要看看母亲的手,看看那些淡褐色斑块,看看关节处失去了光泽皱巴巴的皮肤。我能看看她的嘴或暴露到领口的皮肤,但那会令人作呕,不是我现在想做的。不,我需要集中注意于某种中性的事物。主要是不能去看他,因为要是看着他,他的在场就会变得具有侵犯性,仿佛他在触摸我,用他的长发搔弄我的脸,对着我呼气,将我毁灭掉。

她对我说,尼奥有个极妙的主意——上剧院看戏。他工作太辛苦了,需要休息一下。而我,苏珊娜,何不和他一起去。那真的会很不错,因为我也喜欢看戏,可机会不是总那么常有,现在尼奥在这儿,不要错过了这个机会。

自然,我体验着从惊恐到瘫痪的各种感觉。这并没有任何影响:她已作出了决定,他也一样。我的生活由他们摆布。她要我什么东西?她爱我,我回答自己,但什么是爱?她那劳什子爱是什么?我喜欢父亲的爱。我沉湎其中。我讨厌她的爱。我知道有时是这样,但并不总是如此。我要尽量做到公平。我知道那种爱很重要。这是一个我甚至不敢问自己的事实。但有时候,当我处境危险,当我极度恐慌之时,我就被迫看待爱,双眼大睁着看她对我的爱,我认为这是上帝创造的最可怕、最无意义、最自私、最有欺骗性和最能产生虚妄希望的东西。至于我的爱,目前我不想考虑我的爱因为我知道内心中并无丝毫爱。只有依赖、害怕和忧伤占据着整个的我,还有,我知道自己无法单独生存。但这一切是什么?我坚持向自己解释着自己。这样做至少我对自身就不陌生。我不放弃。我力求精确。

我不知如何来抵抗。我对此不感兴趣,因为无论如何这场游戏是已经事先定好了的。我没有抵抗所需的精力供我支配,也没有那些能够使我和外界相连的言辞、道理、逻辑推理方法。于是,两天后,我的

头发做成了佛来明戈舞蹈家的发型，身穿蓝色衬衫黑裙子，耳后洒上了数滴母亲那黏糊糊的雅诗兰黛牌香水，胳膊弯里(就是抽血化验的位置)也洒了点儿。我跟着客人走到街上，站在街灯光亮里盘旋的大群蚊子中，等着出租车来把我们颇为隆重地载往剧院。刚才他还和母亲在楼梯间道别时开着小玩笑，面带微笑，边往楼下走还边挥着手，非常的放松和逗乐。而现在则大相径庭。他也不知道怎么对付我。

出租车里有股很浓的味儿——司机的汗味儿。我知道我们俩都能闻得到，窘迫使我缩到了后排座位靠窗的角落里，好像这汗是从我身体上的毛孔里冒出来的。他自己则坐在座位的正中间，像往常一样控制着领土。我感觉到在我和他昏暗的侧影之间、我蜷缩的身体和他伸展开的大腿之间有种小心翼翼的气氛，漠视着我的存在。既然我们现在单独在一起，没有母亲在场保护和缓解，连他也无法欺骗自己，装着一切都如他喜欢说的那样，好极了。我们默默地坐在车里，这种沉寂时而被司机收音机沙哑失真的男声所打破。神经兮兮的调度员性急地把司机们遣来派去。他的声音乏味而疲倦，像名埃及军官在指示他的士兵开始撤离位于苏伊士运河上的哨位。



我不知道客人和母亲选的戏叫什么名字。我忘了问。我努力地回忆她在给我梳头时说的话。很有趣。一部喜剧。“你能受得了多少悲剧?”她问。“整个国家都不景气。”她对于这个国家，或对于这个世界，或对于各种各样其他的人总有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不消说，我是没有这种感觉的。有时候，我会抱怨起某种痛苦或沮丧，她说：“是的，每个人都要经历同样的事情。”她尽量使我的体验变得不再为我独有。近来大家都很累，大家都染上了病毒，大家都认为要爆发战争了。顺便说一声，这儿“大家”指的就是尼哈玛、阿曼德、健康维护组织诊所的电话接线员，以及尼哈玛的儿子阿米尔，他与他的家人住在海法。那大概就是大家。

我们在迪曾戈夫大街与乔治王大街的拐角处下了车，我立刻被淹没在了充斥着煤烟、废气和快餐连锁店难闻气味的潮湿空气里。我出起汗来。真是糟糕。我很容易出汗，特别是脸上。我害怕客人会注意



到并且整晚都厌恶我。但客人走在我前面有两步远的地方，连头都没回一下看看我是否还在后面。我在人群中努力往前走，而他在他们之间以令人困惑的优雅姿态导着航，我只看到他的后背。我眼睛死盯在他扎马尾辫的橡皮筋上，这样我就不至于在那些气味里迷失，遭行人脚的践踏及胸部和汗津津腋窝的挤压。

剧院是个经改造的电影院，我记得母亲的解释。旧的马克西姆（Maxim）电影院改造成了剧院。如今他们上演迎合大众的戏剧，具有娱乐性、喜剧性。"喜剧"这个词被重复了许多遍，此刻在我脑子里像苍蝇般嗡嗡地盘旋着。喜剧，喜剧，喜剧。

那么会发生什么？我会大笑——哈哈哈。我的眼睛会盈满泪水，我的右手会抱住肚子以防它笑破？客人呢？他会将脑袋像在家里沙发上那样向后仰，如影星般地晃？他会微微撅起嘴唇露出里面的湿润和丰满？我们会一起大笑，偶尔交换一下眼色，然后因我们共同觉得的有趣而笑得更响？噢，呵呵，啊，哈哈哈！多有趣。真好玩。

我怀疑。

"你是否比较喜欢坐在某个地方？苏珊娜，苏珊娜！"

我瞪着他。不，我无所谓。我更喜欢上帝那关注的眼睛神圣地一眨就把我很快地从这儿带走，把我放回到家里，我的房间中。我想拿起诗人雪莱的玩偶，感觉黏土慢慢地吸去我手里的热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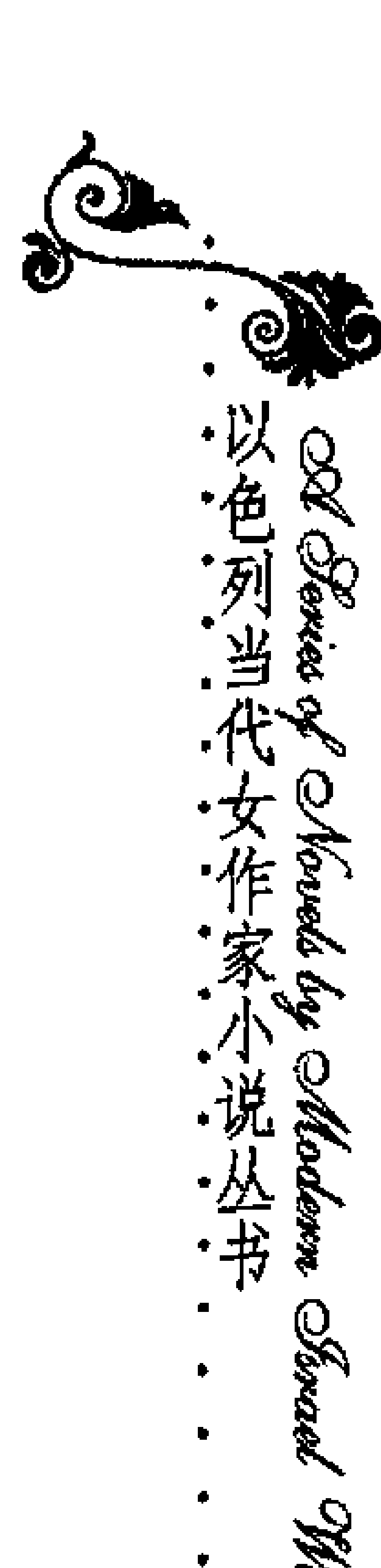
我继续瞪着他，直到他耸了下肩，付了钱，从售票人那儿拿了票。他两张票都自己拿着。这又一次破坏了那自然熟悉的规矩——我和母亲及尼哈玛去看戏的时候，她们总让我拿着所有的票。是我将票子递给引座员，仿佛我掌管着这个探险队。这个习俗自我小时候就有了，是由父亲设定的。但如今，他成了领头人。我跟在他背后，挤进观众席。他是怎么避免挨到人的，即便是在拥挤的人群中？而同时这每个人都碰着我，用他们的肩膀、大腿内侧、难闻的气息或者身上的肥膘。碰我允许，碰他却是禁止的。

那么，苏珊娜，你们玩得开心吗？谁？我和客人的后背？哦，我们玩得好极了，我熟悉了他肩膀的每一个动作。你可以这么说，我们，我

和他的肩膀，关系亲密。它们看不出我有多么恐惧、多么汗津津，而我也很听话。它们到处移动，我就朝着它们带的方向走。极其和谐。这种关系极深，无法用语言表达。

我们的座位在正中间——大厅的中间而且是那一排的中间。在我的前面、后面、两边是人头的海洋。后面的人我看得见面孔、不停动着的嘴巴和眼睛。前面的人则只有各种覆盖着的头发，有时一个人转向邻座，就会显露出他的侧影。真是一片奇特而多毛果子的田野：黄色的、黑色的、多刺的、蓬松的、平滑的、卷曲的。大厅和世界就像是一个关于人们生活的彩色电视节目，我看的时候并不能明白他们在谈什么、他们因什么而高兴、他们为了什么而生活。他们的生活对于我很陌生。一切生活对于我都很陌生，有时甚至我自己的生活也如此。因此，我观看着，观看着在我面前放映着的多彩的电影。像个迷惑而好奇的外星人，努力地根据我书里读过的东西，根据自己已获得的寡少的知识诠释着眼睛所看到的东西，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我周围厚厚的玻璃泡使我无法以一种体验的方式处理这些信息。去达尼诺蔬果商店考察时，我在一大袋沙沙响的蒜头皮中翻找，我的手指摸索着我随便抓到手里的蒜瓣，用手摸去感受它的凉爽坚硬，用牙咬去感觉它浓烈的冲味。

灯灭了，戏开演了。出现在台上的有一女二男。过了好一阵我才意识到他们在用不同的方式一遍又一遍地演着同一出戏——一次用俄罗斯腔，一次用瑞典腔，一次用歌剧的调子。这是从莎士比亚之类的戏剧里选出来的一幕。我几乎无法全神贯注于正在发展的剧情。思想上的不安达到了新的顶峰，无法忍受的害怕越来越多，还有彼此粘接的思绪就像疯子写的化学书里无穷无尽的变异分子链。我闭上眼睛，努力地做着深呼吸。仰仗着一个字，这个字将使我平静，使我回到灯光笼罩的安宁中去。家，家，家，我在脑子里喃喃着，努力想把自己心中狂奔乱跑的魔鬼赶走。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是焦虑攻心，莉维基准会这么说，她什么东西都能说出个名称来。我不能再想了，这得停下来。接着我抬起右手，将牙齿戳进了食指和大拇指之间的肉



里。我牙关绷紧,咬了起来。手越疼,我越咬得厉害。

突然,我明白了自己是谁。我完完全全明白了。

我是个生物。

一个坐在自己的洞穴里窥探人们的生物。眼睛很尖,找寻着邪恶的迹象、找寻怯懦、找寻丑陋。即便它不去找寻——那也是它所看到的东西。当然,美也会使它满意——尽管那要稀少得多。找寻丑或美,爱或恨,有点意义的东西,强大有威力的东西。

我为什么需要这个?很简单——否则我就会睡着的,缩进裹着棉毛的深穴中,脑子一片空白。于是,我坐在深洞里作着判决:这一个给予他幸福长寿。那一个让他在痛苦和民众的鄙视中死去。砍掉他的头!用苹果安慰他!那是苏珊娜想施恩时你所得到的东西。

我的王国藏得很深。没人猜得到它的存在,没人猜得到我的存在。这是否要紧,对我来说没有区别。我坐在洞穴深处,只有眼睛伸在外头,就像蛤蟆的眼睛。憎恨,热爱,赞赏。那很好,那很糟,那很美丽,那很讨厌。细枝末节。化解为细枝末节。神圣在细枝末节中,上帝在细枝末节中,地狱也是如此!我凭着力量,凭着鲜艳的色彩找寻细节。否则我什么也看不见。我看不见柔和的色彩,看不见灰色的宁静高贵。

我残疾了。我什么也感觉不到。我开始往下沉往下沉,沉到空虚里去。我害怕空虚。诗人雪莱很美。世上有美丽的艺术。美丽的人们。比如那个坐在我右边的劳什子客人。母亲的脖子很丑,尼哈玛嘴边的皱纹。人的身体。人的灵魂。无穷无尽的丑恶之源。

也有丑恶的艺术。我同样欣赏。主要的是刺激,不至于使我死去。丑,美,都一样——关键是度与量。一根能紧抓着使我的头露在水面上的救生索。诸多的刺激就是一根根细细的救生索,就是颠簸在波浪上难以驾驭的救生筏。

我牙齿陷得更深了。我似乎开始能感觉到血的咸味,嘴唇上暖暖的、湿湿的。我咬得更厉害了。

这样那样,这样那样。丑陋或者美丽。这些刺激不会使我死去。

生活中能刺激我的东西很少。这是不是像我这样的人的通病？像我这样生活得平静无事的人？未必吧。拯救是在小细节上的！非常小的细节上。

没人知道我所做的这一切。对我来说真是幸运，否则，他们可能会杀我，掐死我，给我身上涂柏油粘羽毛以示惩罚。我幸亏不重要，几乎不存在。我微不足道，不会发出危险信号。一个普通人，性格孤僻，乏味。这是我的运气。也许，如果看我太透彻，或者触摸我，他们会发现——我没有真的皮肤，我是透明的。没有任何真正的屏障。我得时刻为屏障操心，设立屏障，像狗一样守卫自己的边界，就像我们街上那只洛特维勒犬。我很容易受到侵犯，被发现。我得提防。汪汪汪。

愚钝居聪明之前，晦涩位清楚之上。

汪汪汪。

我吠着。我在内心中吠着。我的嘴，我的唇湿漉漉的。那是血。我的血。皮破了。再使劲，再使劲，尽量使上颚的牙齿碰着下颚的牙齿。疼痛非常剧烈，以致我无法感到。过度的疼痛根本就等同与没疼痛。

汪汪汪汪汪。

很快一切将会过去，留在我嘴里的是一点点皮和肉。一小口生的汉堡包。我将吞它下肚吗？吐出来？吃下去，苏珊娜，你就会又大又壮。汪汪汪汪。我真的没注意到自己什么时候哭了起来。只是客人那“苏珊娜”的一声叫带上了惊叹号，我才睁开了眼睛，记起了自己身在何处。他脸在黑暗中看着我，舞台灯光照得四周昏暗朦胧，足使我能看清他的表情，与其说是关切，不如说是不解。

“天哪，见鬼，你在干什么？把手从嘴巴里拿出来。怎么了？告诉我怎么了！你想走吗？你不舒服吗？回答我！”

他跟我说时我照办了。我将咬伤的手放在膝盖上，只有此时，剧烈的疼痛才侵袭起我来。血的味道，一下子又陌生又熟悉，暖暖的，有点甜，充满了我的嘴，沿着下巴滴下来。在我牙齿咬住手时，我一直本能地吮吸着血，小心地不让它流到衬衫上但同时也不吞下去。而此刻





我松开了手,牙关大开,好像我突然得了脑瘫,血便慢慢地稠稠地淌下来,我用另一只好手的袖子将下巴上的血擦掉。

我哭得更响了。我感觉不到,但我听到闷闷的哭泣越来越频繁,我的胸脯一起一落,呼吸在我的肺里一进一出,快节奏地断断续续,我知道这是我,随着一分一秒地过去,哭声越来越响,就像个葬礼上专业的恸哭者。

前排的人开始回过头来。黑暗中毛茸茸的影子在愤怒地发出嘘声"嘘——","静点","出了什么事?"逼着客人采取行动。又等了几秒钟,他抓起我的胳膊肘,开始拉我出来,挤过愤怒的观众。那些观众眼中闪烁着正义的光,露出不赞许的神情,很快又将注意力转回舞台上的故事中去了。又一次,客人那难以捉摸的单薄身躯似乎在空中滑翔,避开那些戳得我生疼的膝盖。我挤过这些坚硬的膝盖,弯下腰不挡住舞台,感到他们的愤恨渗透进我的心,羞得我两颊发烧。

到了外面,客人让我坐在本-锡安林荫大道旁的一张长凳子上。空气凉爽些了。我把被咬过的手藏起来。痛楚轻一些了,更均匀些了。我为自己感到难过,为这个被称为"我"的生物感到莫大的难过,以致我哭得更凶了。我知道这种感觉,当我和母亲在一起时(当然我通常和母亲在一起),她知道如何使我平静下来。用平静单调的话语,并将她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上把我的眼睛也遮住,把我和那可怕的世界从我的视野里隔绝开,直到我的脑袋垂在她手里,像个沉重而毛茸茸的椰子。

客人当然不知道这些办法,他没办法帮助我。他放弃了努力,坐在那儿抽着烟,等着我自己平静下来。我不能容忍别人对痛苦,特别是对我的痛苦漠不关心。他默默地吞云吐雾使我更为恼火。

抽完烟,他用我已经熟悉的快捷而准确的动作扔掉烟头,使橘红色的余烬飞入黑暗中。接着他慢慢起身站到我面前,抓住我双肩旁的胳膊处,把我拉起来站在他对面。我的肚子差点挨到了他起伏的肚子,他的眼睛与我的相平。我想:他是要拥抱我安慰我了。也许他会拥我入怀,将我吸入他体内,直到什么也不剩下。

客人凝视着我的眼睛，眼泪还在从眼眶里往外淌。他的神情很专注，没有一丝的逗乐。他将我的肩膀抓紧了点。现在他跟我说话了。语气的平静并没有不使我意识到他本意上绝对的严肃性，因此他一说“现在安静下来，要不，我就当场宰了你”，我马上就止住了哭。就此收场。

到了我们下一个目的地，客人才注意起我的伤口来。他领我去那儿的方式与先前的不同。这回是我摇摇晃晃地走在前头，他大踏步地跟在后面，每当我胆敢慢下来时，他就轻拍我的背，催我向前。就这样，我们像迷途的绵羊和果敢英俊的牧羊人，沿着本－锡安林荫大道走着，经过了哈皮玛剧院（Habimah Theatre）和曼音乐厅，拐入一条我不知名的黑暗街道，直走到一家带有粉红色霓虹灯招牌的酒吧前。有一刻我曾试图扎根在人行道上不移一步，之后便被一股来自后面明确无误的力量推了进去，推进了地狱般昏暗的空间，空调送来冰样的冷气。

尽管很暗，我还是马上就注意到这儿的多数顾客都比我们年纪要大，那些人早就过了四十。但还没等我仔细打量这个地方，客人又推起我来，把我推到角落处的一张桌子边。他让我坐在一把椅子上，背对着别的桌子，面对着一扇饰有灯光的门，显然那扇门后面是厕所。旁边还有另一扇门，通往厨房，门边两个年轻的女招待站在那儿吃吃笑着，其中一个短发，很瘦，穿着短裙，另一个胸部丰满，长着张快乐顽皮的猴子脸，披着卷曲的长发。客人将双手放在桌上，露出他通常那样的愉快神情。这使我得出结论他已不再因剧院里的事生我的气了，我真的开始努力平静下来。我在膝上握着受伤的手，尽量使它放松，借助我很久以前发明的意念集中练习来化解疼痛：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疼痛上直到它变成你意识中唯一的东西，一点一点地，它就会失去自身的意义，就像是一句你重复了多遍的话。客人朝哧哧笑着的女招待挥了挥手，那个猴子脸卷发的姑娘没朝她的同伴看一眼，也没打住最后一声笑便走了过来。





"葛兰菲迪希·韦奇伍德。两份。"

她的胸脯悬在我们之间的桌子上方,就像一双奇特而巨大的胡柚,但客人仿佛视而不见。

"加冰块?"她显然无意于马上离开,将客人留给像我这样的一个人,难以想象我会是如此英俊的这个人的亲密伙伴。客人朝她瞥了一眼,面带一丝微笑:"我的——不用加。"然后扬起眉毛询问我:"苏珊娜?"那双胡柚也微微朝我这边晃过来点。这份不需要的关心哽得我说不出话来,我摇了摇头。

"那么,两份都不加。"他说,他猛地将下巴转向吧台,把她打发走了。

我们仍沉默着,但我知道交谈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只希望自己将不必回答或者不在很大程度上参与这场谈话,希望他会为我们俩包揽所有的活。我知道我不对,虽然我不确切知道我有多大的错,更糟糕的是:我怎么能改变任何东西呢,因为毕竟我就是我,我改变的可能性是我所能想象的最为有限的东西。客人从他皱巴巴的金烟盒里拿出两支烟,把两支都叼在自己嘴里,以魔术师般的灵巧点着了烟,然后将其中一支挥了挥递给我,仿佛在说:Ole![1] 同时将他口中剩下的那支抽了一口,接着靠回椅子里仿佛在说:现在该谈正事了。我用好的那只手接了烟,刚把它放进嘴里,客人就很快地来了个向前的动作,倚在桌子上说:"听我说,苏珊娜·拉宾。我有几件事跟你说。你很可能不喜欢其中的一些,但那是我们所有人每天都得应付的老一套现实。Kapish[2]?"

我冲着迎面吹过来的烟温顺地点点头。

"亲爱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已经观察你两星期了,我能告诉你的是,我所看到的情况,不说令人震惊的话,也似乎是很不妙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的行为就像是实验室里做过大脑两半球残酷实验的动物。当然,我明白,在家里你被当做疯子,然而,我发现你是在过分

---

① 法语:好极了!

② 意大利语:明白吗?

渲染。既然我们已谈到了疯子，我将确切地告诉你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那种在某个大晴天会拿起一挺机关枪，不预先警告一声就扫射街邻的人。但那和当前的事不相干。就是说，不直接有关。现在，就我所了解的情况，部分问题在于我待在你们家。当然，我能离开，但我现在还无法跟你解释那样做会对我的一些计划及目前的可能性造成多大的不便。一旦做完了在以色列的生意，我将重新回到所习惯的经济平衡状态。可眼下，坦白地说，我连遮丑都拿不出一文钱来，搬到旅馆去住，在我看来，实在太不现实了。我的建议是走出你把自己逼进去的那个疯狂角落，我们共同努力建立对双方都有利的朋友关系。更别提你母亲了，她在忠实地做母亲和承担好客的职责间左右为难，那都是因为这个情……"

他突然沉默了，表情也凝固了，仿佛有人按了个看不见的"暂停"键。这时，女招待将笨重的方形威士忌酒杯放在我们面前，设法引起他的注意，并友好和善地笑了笑。她认得清在尽职责过程中非常熟悉的这一刻——令人讨厌地突然打扰顾客的说话——然后挺着胸面带尊严地退回到厨房边去。

"干杯。"

客人没等我举起杯子就急不可耐地迅速吞了一口，然后马上想把他的话说完，生怕失去了契机，其实这契机无论如何都已经失去了。

"相信我，我明白家里来了陌生人不方便。我不知道自己能忍受几多天，我真佩服你至今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但尽管如此，我相信你能再作一小点努力，那样我们会皆大欢喜。或许你会逐渐看到我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难以忍受。得了，来吧，喝了它。"

有些事情不管我们如何设法隐藏终将会暴露出来。我还没来得及呷一小口杯中的酒，客人就抓起我的手腕大叫了一声："天哪，这是什么?!"流血的伤口就显露在他的眼前，明摆在我俩之间的桌上。他默默地仔细看着我的手，微微地自顾自点着头，然后向我投来了迄今为止他最为锐利的责备眼光。

接下来的仿佛是一些不真实的时刻。我被带到厨房，那儿帮我忙

的一位是神情羞怯、脸上有麻子的洗碟子泰国人，另一位正在谢顶、充满活力，客人称之为诺阿姆，显然是此地的经理，急救箱拿了出来，点缀着齿印的月牙形伤口由客人用消毒剂加以清洗，涂上抗生素药膏然后包扎好，他显示出了令人惊讶的医术。这过程中，客人要么对我轻声但可怕地咕哝（真是他妈的疯子，见鬼，我的老天，等等），要么对充满活力的诺阿姆含糊地解释——大概是脚下打滑，跌到了尖锐的物体上。

之后，当着女招待的面，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桌子边。客人立马又要了酒，这次有两倍之多。

“你可知道我们现在在喝什么，老虎口小姐？”

我细细地品了一口。就我所能辨别得出的，这是威士忌，是个特别干特别辣的品种。

“你喜欢喝吗？我希望你喜欢。这是葛兰菲迪希·韦奇伍德。上回我是在特别不愉快的情况下和一个令人讨厌的亚美尼亚人一起喝的，我希望这一回会给我补偿性的体验。可你为什么该给我些快乐呢？你没有家庭的感觉。我希望，你记得我们是一家人？”

他终于挤出了我的一丝微笑。他跟我碰了一下杯。

“所以，根据所发生的事，我明白你并不喜欢这出戏。老实说，我也不喜欢，但似乎无法跟你相比。”他窃笑着。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总的来说，我讨厌戏剧。女演员都很胖，说话太响，所有的戏都很无聊。你看呢？”

令我宽慰的是，他并没有真的期盼我回答。他的情绪越来越好，我希望他会继续这样自娱自乐，一直到我们回家的时候。他继续高声谈着戏剧，突然他看了我一眼，这眼神要在其他情况下真会吓我一跳，但现在我已经知道了：无论他有多凶，总有某种东西会缓和他的言语，一个语调或一个眼神，要不就微微地扬一下眉，都会削弱他话语的力量，使之成为至多也就是孩子气的逗趣。他有一种才能，说起最为可怕的事时听上去并不伤人。

他伸出手，将我的下巴很快向左转了一点，用几根手指头托着它。

"就是它。他妈的……我真见鬼!"

"怎么啦?"有一刻我生怕他又发现我脸上有什么损伤,发现以前我没注意到过的什么东西。

"你知道你是谁?你可有什么想法?"

我不知道说什么,只是用包扎过的手将威士忌酒杯捏得更紧。

"我来告诉你你是谁。我来确切地告诉你。你是哭泣的苏珊娜。听我说。这次来以色列之前,我去拜访了一个人,我的一个客户,就是那个我前面提到过的亚美尼亚人。他想向我炫耀,于是就给我看了他卧室里的一件艺术品。一件漂亮的彩色马赛克镶嵌工艺品,六七世纪的作品,那是拜占庭的初期。作品表现的是苏珊娜,她可能被封为圣徒也可能没有,全身赤裸地站在池塘里哭呀哭呀,为什么?因为池塘岸上站着两个拜占庭的长老在骚扰她,想要她跟他们上床,如果她不干,他们将去指责她放荡,是个淫妇,那样她就会被用石头砸死。明白吗?那时没有女权运动,人们往往相信各种受人尊敬的老者和性欲狂的话,而不会去相信一个年轻女人。这就是那件马赛克镶嵌工艺品,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和那个苏珊娜像极了,就像一个豆荚里的两粒豌豆。你明白吗?我到这儿的第一天就看出来了——平而宽的脸,苍白的皮肤透出光亮的色泽,还有温顺的眼睛。"

"最后怎么了?"我问。我并不清楚这儿所谈的是恭维还是侮辱。不管怎么着,任何提及我容貌的话都会引起我极度的窘迫。

"什么的最后?"

"故事的最后。长老们的下场。"

"哦,那个呀。一切都解决了。他们把苏珊娜往将要砸死她的地方领,所有的犹太人正往那儿去,并说着:啃!啃!啃!淫妇来了。就在这紧要关头,孩童丹尼尔来了,派他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犹太人的上帝耶和华自己。这个具有先知的孩子走到平台中央,宣布苏珊娜百分之百清白,婊子养的是那长老。因此他们处死了俩长老而不是苏珊娜,因为观众们已急切想用石头砸某个人的脑袋,苏珊娜回到了丈夫身边,孩童丹尼尔长大后成了先知丹尼尔。那就是我多少知道的



内容。"

"是《圣经》里的？"

"出自《新约外传》。写于《旧约》和《新约》之间。我的意思是要你明白，无论从审美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你都是赢家，不要再像擦地板的破布那样对每一点小事都哀怨不停。把威士忌喝完，跟你一起喝酒真是难受。"

我照他说的做了。这个场所已经越来越拥挤了，每时每刻都有人到来。女招待们不再在厨房门口哧哧笑了而是露出焦虑的神色冲来跑去。我记不得前一次和别人在夜晚上这么拥挤的地方是什么时候了。也许从未有过。我想仔细看看这些人，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一股柔柔的暖意传遍我全身，这是我在喝的葛兰菲迪希带来的暖意。我听着喧闹的音乐，客人已经不再称之为"老年人的音乐"了。同时他也已厌烦了谈话，坐在那里抽着烟，凝视着窗外黑暗的街道，草草喝完了他的第三杯酒。生活已经很久没有触摸我，而此刻，我感到生活正在触摸着我，在烟味、香水味、酒味里，在人们的低语里，在厨房门的砰砰关门声里，在与禁忌的事物关系暧昧的外国音乐里。生活触摸着我，将讨厌的事物变成了诱人的东西，使我的大腿内侧颤抖不已，我的尴尬没有消失却变得模糊而隐秘，像只温顺的狗待在我身旁，不再在我的内心里狂吠。

我看着沉思的客人。突然，他看上去不那么完美了。他一向似乎被雕琢得无可挑剔——虽然是有机物，但却可与大理石苍白坚硬的完美不相上下。他瘦削的双颊与下颚和眼睛凹陷处可怕的黑暗相呼应。他的下巴很尖，头发一直披到肩上，原来的橡皮筋，不知掉在路上什么地方了。他没有一丝一毫往常的傲慢和迷人，样子看上去就像个慑于毫无怜悯的强烈反差中的孩子或老人，就像那些记载不发达地区老人孩子或者从集中营里解放出来的囚犯的富有表现力的照片。一阵揪心的怜悯冲击着我，使我想要和他说些什么。说些温柔的话，就像在母亲看上去特别痛苦或丑陋时跟她说的那种话。说些什么去驱除他的忧郁，也消除我因发现他的不幸、并非有意闯入了他的内心世界而

感到的内疚。

就像关系密切的人们通常敏感于对方的注视，客人这方面也不同一般。一俟我的眼睛在他脸上多停留几秒钟，他就醒悟过来，朝我现出微笑，向女招待挥了挥手，用大拇指和食指比画了一下好像是写字的动作，结果是要买单。然后我们步入了夜晚之中。

我们默默地走了约十分钟。客人并不说我们要去哪里，我顿时失去了刚才看到他的脆弱时所积聚起来的勇气，除了像平常习惯的那样作出反应，不再有想去接近他的冲动。因此，我就走在他的旁边，不提任何问题。既然我远不是自己原先想象的那样危险，现在甚至还有点令人愉快。我们走到乔治王大街交通岛上的榕树丛前时，客人突然停下脚步，仰起头，将手指头放到嘴唇上发出一种声音。声音非常奇特，像是鸟或什么动物发出的。还没等我明白过来正在发生什么，数十只展着翅膀的黑家伙离开了树丛，开始在我们头上方滑翔起来，俯冲下来，又升上去，一大圈一大圈地飞着。

是蝙蝠，我马上意识到，并抱紧脑袋，待在原地一动不动。我的记忆从安稳的沉睡中惊醒，各种恐怖故事、真实事情以及与我们周围到处存在着的可怕而讨厌的生物有关的诸多魔鬼形象潮水般地都涌入我的脑海。我尽量想引起客人的注意，但又得小心翼翼地不做出多余的动作，以防蝙蝠会向我俯冲下来，用爪子揪我的头发。他站在交通岛中央缠绕在一起的树枝下，伸开手臂，魔鬼般地大笑着："嘿，爱哭的宝贝，看看你约会的人是谁——我是恶魔，阿斯蒙帝斯①，别卜西②，我控制着黑暗的势力！再到什么地方去喝一小杯，怎么样啊？"

他接触人是多么轻松。我看到他碰触母亲——手上，胳膊肘上，在交谈过程中那些平常的轻轻接触，以强调某一点，为说服某件事。



---

① 英文名为 Asmodeus，魔界七君主之一，七大罪中的淫欲、前智天使，号称审判公子。生性热情又好女色，平时是一位待人和气、贪玩好色的风流男人，穿黑色绅士服披着披风；可在非常时刻却可以六亲不认，冷酷异常，完全一个魔君本色。希伯来语中为 Ashmadai.

② 别卜西（Beelzebub）：魔王，弥尔顿作品《失乐园》中堕落天使之一，其魔法仅次于撒旦。



他牵起我的手拉我去剧院是多么轻松。我,这个从未碰过别人的人。现在他走过来拥抱我,并没要将我的手从头上移开,然后领着我走,差不多是在小跑,好像他正把我从在掉炮弹的地方救出来,直跑到那该死的有树有蝙蝠的交通岛落下老远老远他才松开了我。

下一个我们去的地方远没有前一个地方那样别致,非常拥挤,充斥着啤酒味、油煎味和烟味。客人让我坐在吧台边的高椅子上,而他仍在我旁边。强烈的音乐,那异国味很是瘆人,喧闹的声音使人无法进行任何交谈。我缩在那里,看着客人将酒灌进喉咙,饥渴程度就像在前一个酒吧我看到的一样。他时不时地催我喝威士忌加苏打,对着我的耳朵高声说着悄悄话,他那湿润带酒香的气息让我的耳朵觉得暖烘烘的:“你还好吗?我过得真是太高兴了,我有八辈子没喝酒了。”我点点头,尽可能地表现出信服,生怕他会又操心起我来,那样我又得回答,得作反应,打破这降临到我身上易逝的平静,这平静像个看不见的树脂玻璃罩将我跟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屏蔽开。

我想母亲。当我发生了什么事而她并未参与时我总是想她。任何事情。而这样的思绪总是很烦人——如果我体验到的是愉悦,就会很内疚,因为她仍为藏在心底永恒的痛苦所包裹,这种痛苦自父亲去世后我也开始充分意识到了,因为自打他死后,我也承受起了这份痛苦。这不是孩子恐惧困惑的猜测。她总是每件事都和我分担分享。她的家人——我,他——是她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也许因为自从她自己的家——她的母亲、父亲、大弟弟特奥,当然还有一条腿短的小弟弟阿哈隆——当她住在本-西门还是小姑娘时就在大屠杀中死去后,我们实现了她的梦想,建立了新的家庭。之后,哦,我是怎样的认同她,好像我目睹了她在生活严峻的青年时代的每时每刻。她总是卖力工作,总是尽心尽力,总是尽她所能做有用的人,那是她的优点。一只丑小鸭没有变成天鹅而是变成了极其普通的鸭子。一只鸭子,其价值是根据它能帮多大忙有多顶用来衡量的。我相信纵然父亲老是恭维她那踝部纤细的腿,他其实是爱上了她不知疲倦的帮助。和父亲在一起,她感到了一种成功——这是一种作为女人作为人的成功。即使是

在他对她不忠，令她失望，使她为他忧虑好像他也是她孩子时，她知道没有她，他的存在将会变得脆弱、空虚和孤独。由于知道这一点，她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意义。他一去世，我们俩就被孤零零地留在了这个世上。没了既温和又要求苛刻的父亲夹在中间，我们俩拧成了一股绳。这个事实使我感到很安全很幸运，除了像现在这种时刻，当我觉得自己正在品尝她无法企及的生活的某一部分之外。

这种感觉难以忍受，我毅然决然地大口大口吞着酒，仿佛它是一种药，客人很快又要了一杯放在我面前，微笑中露着坚决，不给我任何反对的余地，而我居然也并不试图去阻拦一下。

时间似乎在这拥挤的屋里也在我的心里融化掉了。只有威士忌中苏打水的硫磺味外加不动的泡沫向我表明时候比我认为的要晚得多。客人草草喝完他的第 n 杯酒，同时用脑袋轻轻地示意我溜下座位投入他的怀抱，他拖着我相当沉重地来到外面。我们开始沿着夜晚的街道走，留意着找一辆能把我们载回家的出租车，他此时仍紧拥着我。他抱着我的方式有点奇特，后来我意识到他全部力量都倚靠在我身上，几乎悬挂在我肩头，沿着人行道拖着脚。突然，他脱离开我，急急地朝着与街道交叉的黑胡同踉跄了几步，还没来得及有所遮掩，便呕吐起来，一手抓着胃部，另一手搭在一座楼剥落的墙上。他觉察到我在走近，示意我离远点，他瘦削的背部一次又一次地抽动，直到他吐尽了嘴里剩余的呕吐物，然后倚在墙上，重重地呼吸着，试图朝我挤出一丝告慰的微笑。即便是在这昏暗的街上我也能看得出他有多苍白，他的前额和上唇满是汗珠。他以一种单调的声音说着，其中的漠然和所表达的歉意很不搭界。

“我喝得太多，很抱歉。我今天听到我的继父赫伯过世了，是昨天夜里。他生了病，是癌症。这是预料到的，但还是……你知道。”

他用自己裸露着的手臂擦着嘴。

“别告诉你母亲，没必要让她知道。这种时刻没人需要横跨大西洋的安慰电话。在适当的时候我会亲自告诉她的，好吗？”

我顺从地点点头，同时，我惊讶地发现和他分担秘密的可能性要





比平常把我听到的每一则新消息告诉母亲的紧急需要更为诱人。

我对母亲的背叛,加上他的坦诚,使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温暖的感觉。

我觉得我得问点什么。我想问他是否爱他的继父,但客人看上去好像在他身上一使用"爱"这个词就会降低他的尊严似的,因此我选了一个委婉的问法。

"你喜欢他吗?"

由于某种原因,"喜欢"这个词在我看来似乎去除了我问话中冒昧令人不快的因素,但客人甚至想都没想过会令他反感。他的眼睛就像蹲在一堆垃圾里的猫的眼睛那样,在黑暗中朝着我闪闪发光。

"喜欢?我不知道。自今天早上以来,我一直在努力回想他的脸,可我想不起来。我从纽约艺术学校毕业后发生了一件事。我烧掉了所有的作品。好作品也烧掉了。别问我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答案。我就是有一天夜晚在父母家的后院里把它们烧了个精光。然后,躺在以前我住的房间的床上,眼睛盯着床上方切·格瓦拉[①]的招贴画。一张赫伯千儿八百年前自己贴上去的已经老旧褪色的招贴画。早上,他们——他和我母亲——发现我烧了那些画,他就来到我的房间跟我谈,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想看着他,我他妈的也不想听他要说的话。于是我全神贯注地盯着切的眼睛,直到我差点哭起来,然后我叫赫伯滚开。现在我一整天都在试图记起他当时的脸。他的表情。他是否刮了脸,他的头发是乱七八糟还是梳理整齐地盖过他秃掉的地方。我所能记得的只是切那该死的眼睛。"

客人发出一阵奇怪而惭愧的大笑。

"我甚至记得他屁股坐下来时床的吱嘎声,可他的脸——我记不得。我努力地想啊想,想得起来的就又是切那该死的眼睛。所以要回答你的问题我是否喜欢赫伯——见鬼,我一点头绪都没有。否则,我是会记得的,你认为呢?尤其因为那根本不是意义之所在。"

---

① 古巴传奇式游击队领导人。

我的舌头又干又黏。

“那意义是什么?”

“没什么。我原以为能用在以色列这儿挣的钱帮他点忙。他的医疗保险很糟糕,不包括许多治疗。现在,当然,天平整个儿失衡了。”

“那现在怎样? 你要回纽约去?”

“那正是我所不知道的。最糟糕的情况是我将挣到钱,钱将是我的。赫伯,不消说,现在是用不了这钱了,对吗?”

我动了动嘴唇,找不到话来回答,这时,突然客人离开了墙,以惊人的速度踉跄地走到路边招呼一辆出租车,车发出尖锐的刹车声,慢了下来。他看都没看我一眼就钻了进去,我也随后笨拙地挤了进去。我希望他会在旅程中继续跟我说话,但直到车停在拉马特甘的房子外面,客人仍缩在后座的角落里,头后仰着,任由从开着的车窗外猛刮进来的冷风吹着他的脸,一句话也不说。



诗人和圣母

月份是六月，深渊是往常的深渊。我在脑子里尽量确切地向一位看不见的听者描述着自己思考的过程。仿佛在我的头脑里存在着一种超人，他对我的关怀无边无际，更重要的是，他拥有无所不能的力量。每当我以绝对的准确成功地描述出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时，这个人就能诊断出我的毛病，参透我那存在于黑暗中的秘密，接着，好像挥一挥魔术棒，就会开出彻底治愈我的灵丹妙药。我抱有很幼稚的幻想，认为整个事情就在于是否能把病症描述准确这个问题上。一旦我做到了，这些病症就会消失，一大片白茫茫的安宁将永远降临到我身上。

我努力了又努力，但所汇报的东西含糊而普通，事实缺乏真实性。我甚至无法向我自己讲自己的事。主要的事是不要停止努力。苏珊娜·拉宾——像个弱小的西绪福斯①——一次又一次地将石头滚到山顶。主要的事是要带着欢乐去劳作。我忙活的时候唱着歌，快乐就一定会到来。

那次和客人外出已过了整整一个星期，我们没再有机会交谈过。他似乎心不在焉很不友好，仿佛处于长时间酒醉的痛苦中。早晨他的脸又皱又肿，情绪很差。在母亲和我收拾完毕，等着尼哈玛去海滩时，他会坐下来，周围都是一堆堆的报纸，用希伯来语和英语跟电话另一端的神秘对象交谈。即便是母亲，尽管她一贯非常注意自己领地的生活方式，也发现自己正在这种忙碌郁闷的办公室气氛中效力——走之

① （希腊神话）希腊古时国王，因作恶多端，死后堕入地狱，被罚推石上山，但推上又滚下，永远循环不息。

前给客人再冲杯咖啡，倒空他的烟灰缸，捡起掉到地板上的订书机，做这一切时一声不吭，以防打扰了他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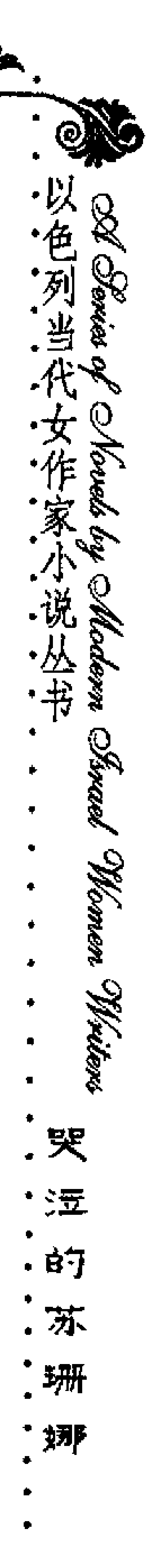
由于有了这严峻的新秩序，我们的——母亲和我的——早晨开始得甚至比以前还要早。也许原因还有太阳，现在上午中段时太阳就变得白热猛烈了。因为母亲和尼哈玛都怕太阳晒，她俩尽量使自己的日常生活顺应这种变化，好像太阳是某个代替了他们死去丈夫的专横的族长，所以我们就提前一个小时出发去海滩。

太阳现在真的很糟糕，充满了欺骗性。就我而言，太多的光线等同于太少的光线——因为你不再去看细微之处了，那些小小的细微之处。我内心存在的要素。那发白的光线使弧线变平，使棱角变圆，拭去了我身外和内心所发生事情的细小差别。

最愉快的时候是我们从海边回来走进寓所的那一刻。那一刻，光幕消失了，我眼前出现绿莹莹的晕圈，一点一点地我开始又能看见细微之处了：沙发、巴伐利亚碗橱上的男女人头、喜林芋植物。那些物体，进来的那一刻昏暗模糊，渐渐地重又恢复了以往熟悉的轮廓，我将它们吸收进体内，平静下来。一切仍在老地方。我的生活还在以往凉爽安全的地方。

客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度过夜晚，听他带来的小录音带上的音乐。在诸多我不熟悉的乐器伴奏汇成的刺耳声音中，一位女高音在歌唱着。每次我经过客人紧闭的房门，都能听见他放的音乐。有时，天热得我睡不着，我就听着这用英语唱歌的高嗓门，融入夜晚的沉寂之中，与蟋蟀的吟唱、远处偶尔开过的汽车声，还有我晕乎乎脑袋里如雾般的思绪会合在一起。

这样过了一周，当我确信我们之间的友谊就像突然开始那样已经突然结束时，他喊我了。这是个平常的夜晚，母亲正和阿曼德坐在客厅里，阿曼德刚开始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他急切地想说明这本书在情感和理性上对他自己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而对于母亲，她拒绝理解是什么使他那么激动：他，阿曼德，和沙皇时代的俄国，与基督教道义上的困境有什么相干？因为这已是他俩就这个话题进行的第



二次讨论了，我就任由自己变得厌烦，眼睛茫然地瞪着，直到觉得厌倦透了，便走出了那个房间，紧接着，我刚走进过道，客人的门打开了，乱蓬蓬的脑袋伸了出来，他大声地"喂，喂，喂"，示意我走近点。

神圣和亵渎之间的界线是多么的窄呀。

要亵渎神圣，不必杀头猪放在神殿的台阶上。放肆的鸟儿在敬拜者纯白的祷告巾上拉一点屎就足够了。父亲的房间展现在我眼前，它遭到了冒犯和亵渎。我惊骇地看到，一个熟悉的地方由于陌生人的入侵变成了什么样子。几个小变化，这个地方就不再是从前的样子了——从前是个神殿，父亲自己的圣堂——现在变成了客人的卧室。

其实也就是改动了或者增加了几个小细节。台灯如今竖在了床旁的一张椅子上，照出来的金黄色光线所产生的舒适感令人几乎觉得尴尬。床上罩的不是整洁的法国勃艮第旧床罩，而是乱七八糟的床单，旅行包的肚子大敞着，就像一条五脏六腑都流散出来的鲸鱼，状如立方体的小立体声音响系统摆在地板上——一切都强烈地表明着侵入和冒犯。

父亲的桌子即便是不再使用之后，母亲仍虔敬地拭去上面的每一点灰尘。我瞥见一些报纸、硬币、磁带和空咖啡杯、香烟、杂志混杂在一起，就像十来岁的青少年卧室里的一堆垃圾。

然而在那里最强烈最奇特的东西是气味。房间此时笼罩在一些来自远方的香味中，那就是：陌生人的气味。这些味道产生了无法忍受、无法抵御、令人心动的结果。

"坐下。你在盯着看什么？你可不是在博物馆里。"客人一屁股坐在了没收拾过的床上，拍拍他旁边的床垫，同时将一件皱巴巴的T恤衫扔到房间的对面角落里去了，我走过去，犹豫片刻之后，将臀部按在了床的边缘上，离那个不怎么为人着想的客人尽可能的远。客人似乎把这看成了亲昵的表示，马上蜷起双腿，用裸露的手臂抱住双膝，后背倚靠在墙上，一支点燃的烟在嘴里晃来摆去，话就要出口了。

"那么，你过得怎么样呢，苏珊娜？你已经把我忘了吗？你知道，我们既然已经开始就应该继续下去。你觉得呢？你怎么约了一次就

想摆脱我，尽管上次约会是多么令人激动？那剧院、咬手、一块儿喝醉，都很不错，但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哦，苏珊娜，苏珊娜，我们要履行职责。你难道不同意？”

“什么职责？”我不能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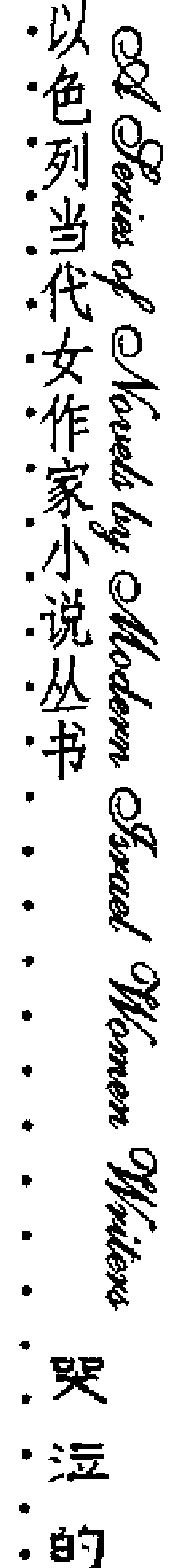
“社会职责，社会的和社交上的。”客人为自己傻乎乎地玩文字游戏而哧哧笑着。“你母亲，也就是我婶婶艾达，让我保证，作为一个见多识广的人，我将对我们之间的友谊承担责任，我承认自己因为工作的压力和其他各种不足道的原因，一直忽略了这个职责。但现在是将事情纠正过来的时候了。”

“我母亲请你和我交朋友？”我轻声地反问。他洋洋自得地点了几回头，将几个烟圈吐向空中，用燃着的香烟如匕首般地戳它们。

我感到脸变得绯红，双颊发烫。我把脸转过去，朝向门，这样客人就不会注意到我的难过，这种难过几乎使我战栗。她请求他和我交朋友，这多丢人！她怎么敢这样？她怎么能背地里这样出卖我？我原以为我们俩对客人的看法是一致的，都把他看做是无恶意的暂时入侵者，他在我们这儿的逗留，我俩只有通过相互支持才能应付过去。这毫无疑问是对我不告诉她有关他继父之死的惩罚。如今我的背叛行为像飞去来器又返回到我身上，并将在今后惩罚我、教育我。我觉得自己正在畏退和收缩，就像母亲和尼哈玛的那个充气床垫被拔了塞子后的样子。我准备好了承受这一轻率行为带来的所有尴尬，站起身，朝门的方向转过去。

接着，客人做了一件在我们交往过程中已做过好几次的事：他读出了我的想法，并且马上作出了反应，仿佛他正在和我的潜意识进行着一场完全自然的对话。

“你为什么感到受了侮辱？你以前怎么想？你难道到现在还不了解她吗？她为你担心。自打我来以后，你一直像个影子一样在家里鬼鬼祟祟，所以她想帮助解决我俩之间的问题。她这样做不错，因为我太心不在焉，可能自己意识不到哪儿不对劲。你们俩就像是穿着一条裤子过活，你怎能指望她不干涉你的生活？不怎么可能吧。你不问问



自己，她怎么从不因为你手上的咬印大叫大嚷？是我搞定的，我跟她说话使她平静了下来。”

我站在房间中央，长长的手臂毫无生气地垂在身体两侧。能够毫不尴尬地离开房间的那一刻已经溜走了。我内心对于下一步该怎么办丝毫都不知道。我所能做的只是等待外界会有什么征兆，能使我决定是走还是留，或者采取某种行动。

“哎，到这边来。”客人从床上溜下来，在桌子和窗户之间的地方翻寻起来，直至找到一个用棕色纸包着的大家伙。“我想让你看一件可能很好玩的东西。”

我犹犹豫豫地向他走过去，心里纳闷他在忙什么。他与包装纸较量着，努力地想把它完好无损地取下来，但几秒钟后，他失去了耐心，把它撕了下来，露出里面的东西——一幅俄罗斯东正教大圣像，约有八十厘米长，五十厘米宽，画的是圣母玛利亚膝上坐着小耶稣。

“嗨，”他向我现出满脸的微笑，“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很吃惊？”

“很不错。”我很拘束地说。

他看上去很失望。

“不错！那可不是我想问你的事。好好看看。明白了吗？”

我摇摇头。我看不出来有任何特别的东西足以诠释这番热情。

“你一点都看不出来？”还没等我有机会觉得受了侮辱，他很快地取过放在桌上的梳妆袋，摸出一件东西，原来是面小镜子，直推到离我脸很近的地方，以至于我什么也看不见，他问道：“现在看出来了吗？”

当我再度摇头时，他把我推到母亲放父亲衣服（只放那些最好的）的旧衣橱前，猛推开门，使我站在了里面的长镜子前。

端详镜中的映像是我最不能提起兴致的事。客人站在我背后，以轻柔得令人吃惊的把握，双手托着我的脑袋，将它微微地倾向我肩的一侧，笨拙地把我所有的头发撩到一边。之后，他摆弄起我的下巴来，先移向右侧，再移向左侧，直到他显出了满意为止，然后他回到书桌边，拿了圣像，回来站在我身边，双手托着它，这样它被反射在镜中面

对着我。

“真是见鬼，方向反了，但没关系，你能明白我指的是什么。或者你还是不明白？”

现在我明白了。圣母像上的脸和我自己的脸相似得惊人，毫不含糊。与我所熟悉的那几幅拜占庭油画不同，她的脸画得很自然。眼窝的那些阴影，那些精美的线条，那从鼻子到脸颊、从脸颊到下巴的柔和过渡栩栩如生。

“我原以为我看上去像《苏珊娜和长老》那幅马赛克镶嵌工艺品中的苏珊娜。”我说。

“那是我原先认为的，直到我意识到你看上去像晚期俄罗斯圣像中大多数的圣母玛利亚。这是不是很有意思？”

我沉默不语。

“哎，你不高兴吗？”客人不耐烦地问，好像是我派他满世界找寻面孔像我的妇女画像似的。他返回桌边，想要将画像重新用撕破的棕色纸包起来。

“我不知道。老实说，我习惯于使人想起各种事情。这总是使我很尴尬，因为我知道我的脸长得很特别。”

“可是真的？那么别人说你使他们还想起什么？”客人对于和其他观察入微人士就我这个人拥有同样的看法显得很恼火。

“我跟着母亲和尼哈玛去图书馆剧院（Library Theatre）看话剧，那个剧院附属于一所叫做‘茨维氏’的表演学校，校长总是说：‘苏珊娜·拉宾，要是阿莫多瓦[①]曾看见过你，他准会马上把你抓去拍电影。’我一直不知道这是不是恭维。”

“当阿莫多瓦电影里的女演员！你知道，他可能是对的。但我在此给你看的是跟你一模一样的肖像。那又是另一回事，你不这样认为吗？”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喜欢人们谈论我的长相。”

---

① 佩德罗·阿莫多瓦（1951— ）：西班牙导演。



"我明白。你认为这里隐含着某种批评。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你的脸充满着,真的,充满着灵感。"

我头一次注意到他激动的时候说起话来带着点儿美国腔,他以一种拖音使元音和辅音的发音变得含糊,因而使他的希伯来语显得柔和,并且赋予他作为游客的势单力薄感。我为自己不能作出更为热情的答复来使他高兴而感到难过。

"是谁画的?知名人士?"我尽量显得感兴趣。

"老天,你这辈子都去了哪儿?圣像通常都不是有名的画家画的。但这幅,既然你问了,恰恰真是某个重要人物画的。这是乌沙科夫的真迹。是十七世纪后半期的。看见了脸部特写上的写实主义了吗?那是他的画派。袍子上偏绿的棕色色调、双眼里的微光、眼睛下面的阴影——看得出她有多悲哀,所有这一切都透出柔和。但总体轮廓都绝对是古典的。完全就像十二世纪最初的圣像。那就是为什么这幅圣像也被看做是拜占庭艺术的原因,尽管它画得要晚得多。看看这姿势,手放的样子。所有一切。这是弗拉基米尔市的圣母玛利亚。你可知道它值多少钱?可知道它有多珍贵?这种东西你通常只能在博物馆里才找得到,私人收藏里是看不到的。而你,生活在自己的壳里,像颗没成熟的珍珠,你在乎什么呢?你们之间的相似,难道压根没使你激动?"

"有一点。也许。是的。"我又一次因自己的漠然感到愧疚,"这不过是因为我对圣像懂得不多,仅此而已。"

"见鬼,它和圣像有什么相干,我想给你看的是什么?我对圣像又知道多少?我专门研究的是大卫·沙利[①]之类的屁股。那又怎么样?如果一个人不是专门从事那个领域的,难道就意味着他得失去好奇感?"

客人直对着我的严肃神情使我感到自己像个小资产阶级俗人。对我来说,幸运的是,他一认识到我无意于回答,就停止了对于我在艺

① 大卫·沙利(David Salle,1952—):美国画家。

术上的愤怒。

“但你知道什么？我理解你。我完全理解你，因为其实真的也没什么使我感兴趣。我自己振奋起来是希望到头来会被自己的热情所感染。”

他陷入忧郁中。我觉得说任何话只会惹恼他，使他更忧伤。我们是完完全全两种人。这很清楚。现在这种差别显得很突出，就像谁放了个屁一样令人尴尬，每个在场的人都竭力不去注意它。该走了，但不知什么原因，我留了下来，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如果你对圣像知道不多，那你又为什么做这种买卖呢？这难道不会使你在识别赝品方面很薄弱吗？”

“当然会，阿莫多瓦女士。这方面我当然很薄弱。我是从一个朋友那儿买的这幅画。这是真品，但明天我要去见一位女士，是我的一个熟人，我希望她能使我和一位圣像修复家联系上，今后他能对我购得的东西有所帮助。”

“但起初是什么使你干上这一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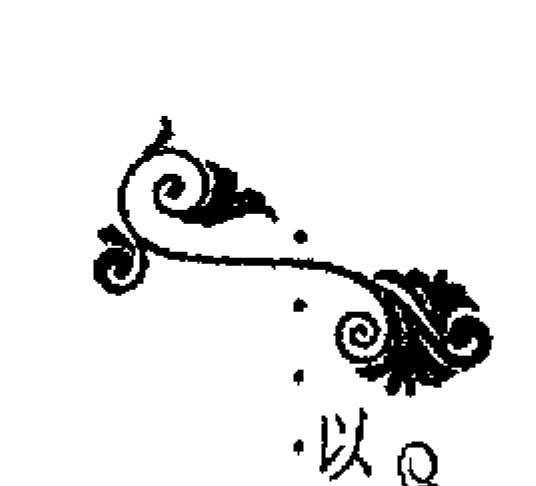
“我已经告诉过你，这是个大把挣钱的好机会，我需要钱来支付不包括在我继父医疗保险中的治疗费用。碰巧我在……在一处社交场合遇上了这位亚美尼亚的收藏家。他是个殖民巨富，在德克萨斯开采石油的。他肚子巨大，身上的西服是在阿曼尼 & 约瑟夫（Armani and Joseph）定做的。有一半时间他说的话你一句也听不懂，因为他就连睡觉的时候也叼着古巴雪茄，十足是个讨厌的家伙。但我不能突然对他说：我不再需要钱了，所以你可以拿走你的圣像，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不能那样做。这不符合职业规范。”

“那么，你实际上是在帮他忙？”我想要把真相了解清楚。

“当然是在帮他忙。你知道，亚美尼亚是个长期受苦难的民族。我想帮助他扩大圣像收藏。”

“我想你刚才说过他是个很富的家伙。”

“你真是决计不想明白任何事情。他富有又怎么啦，会使他不那么有人性？不那么像亚美尼亚人？要是你掐一位亚美尼亚富人，难道



他就没被掐着？要是你踢他的胖屁股，难道他就没被踢到？我是想帮他个忙，仅此而已。所以看在上帝的分上，别烦我了。这张他妈的纸撕破了我已经够不安的了。"

客人放弃了想把画像的包装纸恢复到原样的努力，在书桌上坐了下来。身后的台灯在他脑袋周围产生了一道金色的光环。他的头发软软地搭在脸旁，显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梦幻般神情。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男人。突然，一个愚蠢而不相干的念头掠过脑海，虽然我想将它压下去，但仍不停地冒上来，直到我无法克制住自己，神经质地大笑起来，此时就已料到客人会要我作出解释，因而脸都羞红了。实际上这种问询跟着就来了，语气容不得任何拐弯抹角。

"马上告诉我你为什么大笑。我警告你，要是你说谎，我立刻会知道的，因为我是个艺术品经销商兼扑克行家，我知道什么时候别人在向我说谎。快点，说吧！"

"我不知道你是否会明白。"

"试试我看，甜心。快点，告诉我，我想确切地知道是什么使你行为如此异常。"

"你得保证不恼火。"

客人翻了翻眼睛。

"行，"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有一次，我和母亲参加尼哈玛孙子小塔路什的成人仪式。是在特拉维夫的拉马达饭店。在那小小的宴会厅里。大厅里正在进行一场以色列人装扮各色各样名人的模仿秀比赛。我想是由某个美发用品公司赞助的。出场的有以色列的雪儿，以色列的迈克尔·杰克逊，以色列的汤姆·克鲁斯，甚至还有以色列的戴安娜王妃。"

我努力地克制住自己神经质的傻笑，这种傻笑堵得我无法继续讲故事。

"继续说下去，不要再这样歇斯底里了！"

"因此我想我们可能也已经进入了比赛。我和你。我是以色列的圣母玛利亚，你是以色列的珀西·比希·雪莱。"

还没等我把最后一句话说完，我就知道自己犯了个可怕的错误。我怎么能想象得出这般愚蠢的念头会有任何幽默之处呢，或者——更糟糕的是——这个念头难道值得从我的个人意识中拿出来公开示人吗？但这次，客人显示出了极好的幽默感，开怀大笑起来，把头猛地向后仰去，恢复了房间里原来的气氛。

"以色列的珀西·比希·雪莱！你笑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是个好心的姑娘呢。"

他满脸微笑地看着我，突然他跳下桌子，点燃了另一支烟，然后转过身来面对着我，露出一副沮丧的表情，好像三十秒钟之前他没和我高兴地开过玩笑似的。

我已经逐渐地知道了他这种情绪的快速变化。仅仅一分钟前他还一直在透出来的精神上的紧张不安已经消失殆尽，而且也离开了这个房间的氛围。我四下看看，想要从现在的沉寂中找寻庇护。找寻某种能够倚赖、能给我坚实的支持，并能在这种有点强迫性的亲密氛围里保护我的东西。

随后，我明白了。或者说至少我认为自己明白了。当然，他很悲伤。他怎么能不呢——他正在服丧期。仅仅一个星期前，他告诉我他继父死了，而我在此还跟他开轻佻的玩笑。要是母亲目睹我的缺心眼，会说：苏珊娜，你应该更善于了解别人些。这样的话是在我忽略了阿曼德，或我因为尼哈玛胡说八道而跟她争论时母亲说的。我总是将之归咎于阿曼德和尼哈玛这两个人都很容易得罪。要是他们能被像我这样的人冒犯的话，他们也只能被得罪了。在我看来，整件事就是一场闹剧。如今，我又冒犯了客人。或许我真是一个什么都没意识到的感觉迟钝的呆子。虽然心在流血，他还是在附和着我，可见他是多么的彬彬有礼呀。我真猪。我怎么会猪得这么冷漠无情呢？

我知道自己得做点什么——给人以温暖、积极的东西。但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从未接触过像他这样的人。像他这样的人以前都是在我的生活轨道之外的，像他这样的人都是电视上谈话节目中的主持人、女作家、信仰再生的滑稽演员。那类人像电影明星一样舔着下嘴



唇。那类人洒上香水，和其他电视节目主持人、作家及信仰再生的滑稽演员在丝绸被褥间甜蜜地翻来滚去，然后去喝床边昂贵的酒瓶里的残酒，并且抽起进口烟，而他们的眼睛凝视着天花板，在黑暗中熠熠生辉。这样的人生活在太空中，生活在我的行星——苏珊娜·拉宾行星那令人窒息的大气层之外。

要是我能走近客人就好了。即便是轻轻地碰碰他的肩膀，或只是坐在他的身旁都行。我尽管意识到了自己感觉迟钝得令人吃惊，尽管对客人感到怜悯，却无法克服自己的尴尬。我仍站在原处，平平淡淡地说了句："你在想你的继父？"

听到我的说话声，客人微微吓了一跳，他惊讶地看着我。

"什么？"他问，好像他一点都不知道我在谈什么。渐渐地，相关的记忆进入了他的意识。"啊，是的，我继父。我刚才一下子忘了曾经告诉过你他的事。抱歉，那时我是喝醉了，否则我是不会向你供认的。可是真的，我是在想我的继父。真奇怪，你居然猜到了。"

在那些糟糕的美国电影里（老实说我相当喜欢这样的电影，尤其主题是人类情感戏，就像电视连续剧《贝弗利山》那样的），这样的时刻总有个常规的场面。交谈到这个地步，角色一方会严肃地盯着另一方的眼睛说："你想谈谈这件事吗？"

我知道这是个很差劲的选择，但是在我所能作出的各种答复中搜找一番，我也无法想出能取代这句蠢话的其他说法。况且分分秒秒在飞快地逝去，我便鼓起勇气，迅速将话转译成了疙疙瘩瘩的希伯来语，也算是流畅的苏珊娜·拉宾语，冲口而出："你……那就是我……他……"直到这盘在我脑袋里的文字色拉奇迹般地自己组织成了"他是什么样的人？"

这是个残酷的问题。从家庭的传奇故事里我知道得很清楚，白艾蜜的美国丈夫脑子不太对劲。而此刻，我要客人给我叙述他继父的情况。

我垂下眼睛，羞怯地微笑着，无路可退。客人沉默了许久，然后清了清嗓子，以一种平静而严肃的声音说了起来。

"他是个很有道德的人。他有为了别人而自己受伤害的真正度量,他实实在在有道德。"

"你什么意思?"我紧接着问,我为自己问问题的成功而飘飘然了。我觉得自己几乎是敢作敢为,像个有权质问、想问什么就问什么的人。

"'你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他问道。

"我不懂。"我不让步。这回我想懂得他意思的需要使我不再生怕自己听上去显得愚蠢。但客人也很顽固。

"此处究竟有什么需要懂的?"

"什么是实实在在有道德?"

"问得好。"他沉吟了片刻。"来,我给你一个相当有基督精神的答案,可这是真的。实实在在地有道德就是承认别人对你的依赖。Kapish与之并行不悖的是接受为了独立而想要摆脱这种依赖的不可避免性,这本身就是个幻想,不可能的情况。换句话说,是一门明确包含着矛盾的学问。我认为做个实实在在有道德的人就是要开明,不会因害怕而拒事情于千里之外。然而我们通常是依据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来生活的。这是出于害怕而产生出来的道德。害怕会与别人不协调让我们做所做的事情。害怕,换句话说,就是道德上受阻碍的状态,而开明则是没有恐惧,这是深层次的道德状态。道德这个概念是和'为什么'这个问题无关的。就像爱。懂了吗?"

我点点头,尽管我知道如果他要我重复他刚才说过的话,我是办不到的。不过他的话中有些东西使我感动。真的很美。

"那么,他是什么样,赫伯?"我竭力想从不那么理论化的方面来弄清事情。

"赫伯?他是个简单的人。他相信每一件个人的事情都具有政治性。他做律师很忙,可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那些无法付费给他的人们的案子上——移民,二等公民。因为他,我会说阿拉伯语、西班牙语——有些委托人以教我语言的方式来抵付。有些时候他涉及了激进的左翼组织,可他好战的那一面并没因此高度发达。他有激情,但要是有,也是很温和的激情。还有什么?他爱母亲爱得发疯,尽管她



并不值得他爱。”

“你呢？你是个有道德的人吗？”

客人换上了讥讽逗趣的表情，就像每次谈话直接针对他时所做的那样。但此刻我知道，他的讥讽与其说显露了他的自我批评精神，不如说与我问的问题更为有关。

他想了很长时间，最后，微微笑了笑，露出了满口洁白的牙齿。

“我是个懦夫。但我会努力的。我一度更为努力。我那时想要做像赫伯那样的人。我不真懂这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自己渴求这种感觉。我想要加入左翼恐怖组织。在我完成了纽约的学业，开始上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之前，我去了利比亚的爱尔兰共和军训练营。”

“那怎么了，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我？我是个业余艺术爱好者。屁个无政府主义者。”他说道，并且很快就为这种自我诋毁感到后悔。“但，是的，我确实是。可就如你所见的那样，我并不为世界革命做任何事情，因此不太愿意给自己戴高帽。”

尽管他的话语中有逗乐的成分，客人说得很慢，不露一丝微笑。“我的一切都以自我开始，以自我结束。我是自我陶醉者。”他耸耸肩，摊开双手，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那么，你加入了恐怖组织？”

“我当然没有。这就是我正要跟你说的。我去了伦敦攻读硕士。但我得告诉你我已经体验过刚才所说的那种开明。因为那基本是直觉上的，是与生俱来的。有时，简直是以一种摒弃的感觉使你从内心感到振奋。”

“摒弃什么？”

“恐惧。对死亡的恐惧。”

“你有过那样的感觉？”

“是的。我想是有过。”

“什么时候？”

“在一次跳伞练习时。在恐怖主义训练营里。头一回，我站在门

里不敢往前，就是没法跳，尽管从塔上试跳时，我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从未害过恐高症或诸如此类的毛病。但突然，我充满了恐惧，全身僵硬，这比我所有的野心和耻辱都要来得强烈。我用全身的力气、用我僵硬的手指紧紧抓住门的边上，无法松开。接着，我听到一个声音在说话。我听得很清楚，尽管它是那样的平静，它的出现盖过了引擎声、风声和混乱的声音，它所说的就是：跳。就这个字，用坚定平静的声音说：跳。我跳了。它所给予我的快乐简直就像情欲上的那样。类似于狂喜。"

"那是你指导员的声音？"我不明白。

"你没有害想象过度，是吧？那是天上的声音。明白吗？那就是。上帝的声音。什么？你心中从没有过那种感觉？"

我想不起自己的经历中有任何事情与他所描述的相近。甚至更糟糕的是——我开始感到自己无意拆除的屏障正在被拆除，而作为交换，可能会要我提供关于我自己的情况。这个想法使我忧虑加剧。我想自父亲去世后我从没和男人有过这么长时间面对面的谈话。私人的谈话。我周围的防护圈已经破裂，我觉得客人的想法和他的存在正以烦人的、几乎是痛苦的方式渗入我心。这使我想逃开去躲起来，直到一切恢复正常，那时我又重新会为那点由自己支配的、虽可怜但却是唯一的防御所保护。

"我得走了。"

我向门口走去，很快抓住了门把手，为它那金属质地的冰凉所鼓舞，就此宣告了这场相遇的结束，并使我远离了那种他努力继续烦人的侵犯性谈话的可能。我等着他试图阻止我离开，可他只是说了声："晚安。"在我走了出去就要关上门时，他才叫住我，这一次，声音完全不同，轻松而愉快，是他平常的声音。

"等一下，我有个主意。"

我等着。

"你何不明天和我一块儿去看望卡秋莎？

"她是我跟你说起过的那个朋友。那个将会帮助我找到个修复家



的朋友。怎么样？既然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别忘了我们对你母亲、对我们自己都有责任。卡秋莎真的非常和蔼有趣。要是你和我一起去，她就不会像平时那样，而会变得一本正经，那样你母亲也会为你开展社交生活而高兴。简而言之，这个办法各方面看起来都妙极了。特别是有阿瑟的存在，这个小魔鬼是不会让我和她安安稳稳地谈的。或许你能吸引住他的注意力，你知道——疯子和疯子，心灵上的好伙伴。哎，你觉得怎么样？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他我们要去。"

虽然这一回我觉得自己真的被得罪了，我想问他这个魔鬼阿瑟是谁，然后告诉他我不习惯去不认识的人家里，但我听到自己说："行，好的。我愿意去。行。"

卡 秋 莎

即便只是为了在我们——客人和我——去他朋友公寓前沐浴打扮停当之后跟母亲告辞时看到她脸上的喜悦，参加这次探险也是值得的。

只有现在我才开始明白自从客人在我家安营扎寨以来母亲对我有多担忧，真的，我过去怎么认为？难道她不是一声不吭地亲手倒掉蓝花瓶中的尿？还有我手上的咬印怎么了（我已经不再包扎，而让伤口在空气中变得干燥）？这事也没被提及过，哪怕是随便提到。我当时并不知道是否该对客人与母亲在我背后搞阴谋的这种冒昧行为生气。我心中的某个声音在告诉我，由于某种不清楚的原因，在一个无法描述的程度上，他是我的盟友，要是这屋子里他有红粉知己的话，那就是我。这使他落入了我的手掌之中，受到我的控制。如果觉得他在背后把我当傻瓜，我会立马揭露出他黑暗的秘密——他继父去世的消息，还有，他如何使我喝醉，他如何一本正经地威胁说要是我再哭就要杀了我，他如何践踏我的感情，以及其他各种事情——这会使母亲有充分的理由把他赶出家门而不会感到良心上的愧疚。



坐出租车的这段旅程被客人用来使我对与卡秋莎的会面有所准备。正午时分，路上堵得很，因此他有足够的时间细致、深入地对这方面的内容详述了一番，结果当我们到达特拉维夫时，他已经把所有的情况介绍了个八九不离十。

老实说，我从客人那儿了解到不少卡秋莎的情况，她职业生涯中的波折，生活上的沧桑，但从这些话里，我了解更多的还是客人自己，这在我看来也不错。比如，卡秋莎最使他着迷的是她完全缺乏幽默



感。但与其他此类人形成对比的是，他解释道，就卡秋莎来说，她身上没有丝毫的愚蠢和无聊。相反，她以某种绝对严肃的态度对待天底下所有的事情，上至做重大的决定，下到在餐馆里点什么菜，这本身就很可爱有趣。

过去我可能曾怀疑过他愤世嫉俗，但此时他说起话来的那股热情消除了我的这种想法。我得出结论，他处世中轻易表现出来的那种无可忍受可能在他看来真的无可忍受，鉴于这种可能，他讲述卡秋莎的严肃认真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听上去很真诚，甚至合乎逻辑。

除了卡秋莎缺乏幽默感，根据客人的陈述，她可能有吸引人们的许多其他品质，使人们找她做朋友，出于自愿依赖她，仿佛这种依赖比任何靠不住的独立更令人满意。但当然，她的主要才能是充当中间人。

我问及关于她生意的确切性质以及她为谁充当中间人时，客人说他无法确切地回答我，因为任何想从她那儿摄取除她自愿提供以外情况的企图都被她看做是不得体、太轻率，并以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威胁，这又涉及了许多其他的问题，要深究的话，此时此地都不恰当。

然后，当然，还有小阿瑟。在此，客人叹了口气，摇了摇头，那一刻，他看上去就像是在看"探索"频道上的变性手术或氢弹试验节目时的尼哈玛。阿瑟是卡秋莎的儿子。在卡秋莎苦苦挣扎想在特拉维夫站稳脚跟的最初几年中，阿瑟大多数时间都待在海法的奶奶那儿。一俟母亲成了独立的女商人，男孩重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很快就可以明显地看出，生活的变迁使他成了心理失常的孩子。医生们诊断他活跃过度，患了一种罕见的病症——杜尔雷特综合征[1]，但似乎他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客人说这些的时候，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虽然正在谈论的这个小家伙服用镇静剂的药量足能杀死一匹马，六岁的他却不打紧，小阿瑟一天睡不到两小时，骂骂咧咧个不停，最不可思议的是，他染上了说起话来押韵的习惯。时不时地，卡秋莎会请

① 一种严重的神经紊乱症，特征为面部和身体其他部位的经常性抽搐，通常从童年或青春期开始病发，并常伴有咕噜声和强迫性话语，如感叹词和污言秽语。

客人给她寄些昂贵的天然药物，这一次，他也带了些从纽约一位风靡一时的土著美国人那儿购得的几种要命的药粉——客人拍了拍那个我们离开家时他塞到我手里的雅致的塑料袋。我的工作——这当儿客人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就是帮助他完成对卡秋莎的拜访，问些无关紧要的问题，让精神上患病的阿瑟尽可能处于最好最有礼貌的状态，充当人体减震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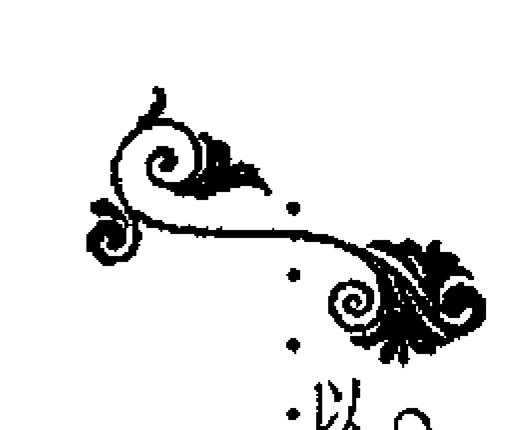
卡秋莎住在罗丝谢尔德(Rothschild)林荫大道旁边一条小街上的一幢富人住的新楼里。一位上了年纪身着制服的看门人为我们打开了门厅宽大的玻璃门，我们走过发亮的大理石地砖来到电梯口。

"她也绝对漂亮。不像个模特，是个真正的美人。"我们等电梯时客人这么说。他时间掐得真是准。电梯来了，在他继续更为详细地描述他朋友的斯拉夫美貌时，我不得不在大镜子里审视了一下自己，这三面环绕的大镜子使我那扁平微黄的面孔、凹陷的眼睛、不加修饰的嘴巴暴露无遗。

卡秋莎打开门，神情很不安，头发散乱，双颊绯红。她将两个响亮的吻印在了客人的脸上，朝我咕哝着打了个招呼，还没等得及正式介绍，就冲了进去，嘴里喊着"炸肉饼焦了"。

"别惊慌，"客人安慰我，"她只是紧张，因为她不知道怎么烧菜。对她来说，给你，这个家庭的代表，留个好印象是很重要的。"

我跟在客人后面走进去，让他把我领到厨房去，那儿，卡秋莎正忙于操纵那些锅碗瓢勺。我们从边上看着她，耐心地等着她做完手头的事情。她长着个土豆鼻，脸颊宽宽呈棕褐色，那倾斜的眼睛是她所来自的那个国家为蒙古人占领三百年的见证。与她那遗传的贵族气质完全不协调的是，她将头发在头顶上堆成了一个不整齐的结，用一把发亮的粉红色大梳子固定着。她脚穿高跟便鞋，突出的臀部裹着紧身的短裤。她很丰满，但双腿修长，大腿上部有着性感的微微隆起的脂肪团，她从忙碌中停下来，用手臂擦擦上嘴唇上的汗珠，以一种丝毫不带歉意的口气跟我们说："很抱歉。去客厅里和阿瑟坐坐吧。我这儿马上就做好了。所有东西都烧焦了。"



卡秋莎的声音很低，说起话来带着做作的拖音，完全掩盖掉了像她那样口音浓重的俄罗斯人说起话来通常所带的古怪颤音特征的痕迹。

客人示意我待在原处。

“等一下，转过来一秒钟。让我来向你介绍我的堂姐苏珊娜。”

卡秋莎以品评的眼光很快地扫了我一下，舞动手里的锅铲，示意她无法跟我握手。

“嗨。我是卡佳。很高兴见到你。我可以叫你苏西吗？”

虽然任何对我名字亲昵的歪曲都使我哆嗦，这一次我却很有礼貌地点点头，或许正因为这，她开始了以下的独白，向我诉说做母亲的难处。

“每一回我做炸肉饼都做得快疯了，真快疯了，但他别的什么也不肯吃，只吃炸肉饼，就像他在奶奶家，就这样。而我对他不能说不。我是个很强硬的女人，但对他，我不能说不。因此，我说——他受够了苦。但要是我对此一窍不通，我能做什么呢？哎，还行，不懂做菜，可我懂其他东西——教育、关爱和温暖、下棋、跳舞、礼物，所以这些也很重要。对吧，尼奥切克？哎，你干吗站在那里？带苏西到客厅去，和他一起坐坐，他喜欢伴儿。我得不受干扰地先把事情做完。”

我们穿过浓烟向客厅挺进。客人急速地向我低语：“现在你得帮我忙。我要靠你了。”

我们进了一个宽敞的房间，地上是浅色调的镶木地板，大型的法式窗展示了特拉维夫所有丑陋的景象。与这番景象形成比照的是，室内的陈设呈现出雅致和时尚：白色的斜靠背沙发；取代桌子的是一块菱形的无光厚玻璃，安放在用隐约闪光的不锈钢制成的类似于一个原子的复杂结构之上；矮脚的椅子带着由厚实的硬塑料制成的弧形靠背，颜色有绿、橙、蓝三种；落地灯看上去像长在火星上的一束紫色花朵，使得卡秋莎现代派风格的殿堂更为完美。

孩子坐在电视对面一张鼓鼓的红色皮椅子上观看少儿频道。他没穿什么，身上只套了条内裤，脚上蹬了双巨大的耐克新鞋，那种鞋，

街头粗野的说唱艺人常穿。他的肚皮在内裤的上方很有气派地挺着，一切都显示着主人所特有的威严。他对我们进来视而不见。

“阿瑟，过得好吧！”客人试图用一种友好但不热情的语调说。

“尼奥搞后面，不管哪一个屁股眼。”孩子冷冷淡淡地说道，连眼睛都没从屏幕上移开。

“我也爱你，阿瑟。很高兴你记得我的名字。对于你这样有问题的小孩，这可是个不能小瞧的成绩。”

孩子对于这番恶意中伤的奚落，并没说什么，只是飞快地按着遥控器，直到后来停在了土耳其频道上。

客人继续试探着。

“学土耳其语吗，阿瑟切克？打算到安塔利亚[1]度假？”

孩子嗤之以鼻，又调回到少儿频道主持人的面孔，朝屏幕露出傻呆呆的幸福微笑。我们仨默默地看了这位女主持人几分钟。我从任何可想象的角度都看不出自己能进入这场战役使得阿瑟平静。此时，客人召集他的后备部队了。

“你想见见我的堂姐苏珊娜吗？”他说道，把我推到前面，我差点绊倒，跌在孩子的椅子上。

“苏珊娜蜥蜴大阴户，吸精就像吸甘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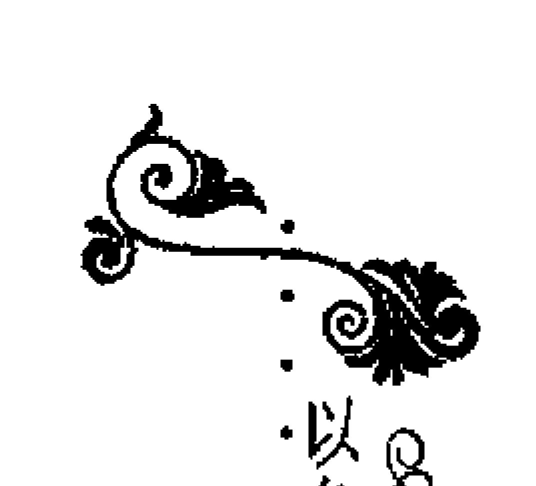
小家伙肯定不是个卑劣的打油诗人，但我开始感觉到了嘴唇那令我熟悉的颤抖，表示从这时起，自己掉不掉眼泪就由偶然性所控制了。

现在，我是亲眼看见客人无论是从深层或是浅层意义上确实都缺乏为别人受伤害的度量。显然，唯一使他烦恼的是有目击者在场的情况下遭到失败。他朝我眨眨眼睛，以温柔讨好的声音跟孩子说起来，要是我是阿瑟的话，从他说的头一个字起就会怀疑他的动机。

“那么，现在你和妈咪一直住在一起了，是吗？那一定很有趣。我认为你妈妈是个很好的人。我就是希望你不要用你的诗歌才能害得她发疯。”

---

① 土耳其西南部一城市，位于地中海入口处的安塔利亚湾岸边。该城市位于悬崖之上被旧城墙围绕，人口 173,501。



客人神经质地大笑，等了一会儿，以不太有说服力的语气补充道："和妈咪在一起最有趣，对吧？"

孩子回答得飞快，其速度甚至多诺万·贝利[1]可能都会眼红。

"你妈不穿内衣瞎搞，专和加沙地带阿拉伯人乱来。"

"行了，我看得出你不太友好，阿瑟，我并不想打扰你，我只是想做得有礼貌。别管我，但你在苏珊娜面前不感到难为情吗……"

孩子又把台调到ITV[2]。一帮戴着墨镜的说唱艺人像猫或者说像猿般跳跃着经过荧屏，在镜头前挥手。客人朝我瞥了一眼，意思是说：我马上就要停止这番胡说，准备最后的惨败。

"在我们进行这样迷人的小小谈心之时，我年纪轻轻的朋友阿瑟，"他把"年纪轻轻"这几个字说得很重，"我想指出，我母亲自从七十年代初或前后起就没有跟任何人发生过不正当的性关系。而你……"

此刻，阿瑟按着音量键，使声音大到了震耳欲聋的地步，暗示彼此间的交谈明确无误地已经结束了。客人看着我，毫不掩饰他的敌意——我没能完成他要我来完成的任务。而我则看着窗外，竭力地做着深呼吸。

只有卡秋莎戏剧性的入场才阻止了这场即将降临到客厅里的暴风雨。她端着个大浅盘，上面堆满了黑糊糊的炸肉饼，装点着肉厚多汁的腌黄瓜。

她将浅盘放在咖啡桌上，走向孩子，揉揉他的头发，跪下来，把他紧抱在胸前，在他那愠怒的脸上和小肚皮上印满了亲吻，并且捏捏他的胖大腿，然后把桌子拉向他的椅子，跑到沙发边，抓了几个垫子，最后站起身，带着母亲的自豪朝我们笑笑，关掉了电视。

"好了，我来了。"

她坐到沙发上，示意客人坐到她身边去。我很快地扫视了一下周围，把自己安顿到了大窗边的时髦皮扶手椅上。

---

① 加拿大短跑运动员。
② 英国独立电视台。

“你在那儿很舒服，苏西。”卡秋莎说的时候话语后面都没带问号，同时，她等着客人为她点上她从烟盒里抽出来的薄荷脑长烟卷。“你可以跟阿瑟切克玩，因为我明白尼奥在这儿要和我谈点事情。”她看着客人，不带一丝微笑，并且将烟吹到他脸上。

客人直奔主题，朝我瞥了一眼，仿佛这个请求发自我们俩。

“卡秋莎，我在找个修复家。非常急迫。或许你知道一个。”

卡秋莎回答时口气很是自然，令我们俩都很惊讶，问题就要如此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什么？修复家？我当然知道。”

客人很快地朝我看了一眼，仿佛在说：难道我没告诉过你她是号人物吗？

与此同时，卡秋莎想了会儿，补充道：“很多。我知道很多修复家。”

“许多？”客人看着她，露出吃惊得很夸张的表情。“你能给我介绍一个吗？”

“当然行。”

“卡秋莎！你真是个天使。我原先准备得麻烦好一阵，得满世界跑，而你来了，让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卡秋莎在即将满足他的请求时所表现出来的冷静沉着使他颇为动情，而她则舔舔一根手指，然后将唾液擦在她脖子上看不见的一个虫咬处，接着，将双腿拢在身子底下，又朝他的脸喷了一口烟。

“你知道，我为此从早到晚一直坐着绞尽脑汁。你问苏珊娜。就因为这我才没有一来就给你打电话。”

卡秋莎扬起眉毛，撅起嘴，一副不相信的表情，但客人假装没注意到。

“当然，我自己也知道几个修复家，一个是博物馆的，还有一个叫利普金，但我目前从事的项目相当精细，我当然不想让不合适的人去做。你……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你是这么，这么……简直令人惊讶。你是我的卡特琳娜大帝。”





卡秋莎毫无笑容地接受了这厚颜无耻的恭维。她无疑把自己看做是配得上最高敬意的女人，而且无疑她是对的。

"那么，你认为什么时候能给我介绍一个呢?"

"你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今天。明天。我只要打个电话。"

她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对于客人这显然很清楚，因为他从她手里拿过烟，微笑着深深地吸了一口。

"你认为我该先见哪一个？哪一个你认为最好?"

"那些都不错。每一个都有拿手的东西。"

这里面有点可疑的地方。这很清楚。我却说不出是什么。我努力地想捕捉一个记忆，一个隐隐约约的记忆，但它不断地突然冒上来又隐下去，使我不能确定是什么。这事跟我父亲有关，这点我是肯定的。但到底是什么呢？他的故事。他在敖德萨的童年。黑海边一个迷人的城市。他花了很多时间在海港的渔夫们那儿转悠。在他还是个年轻记者的时候，他访问过加波汀斯基[1]的屋子。不，不是那事。他和诺亚叔叔。对。可诺亚叔叔直到那时还过着好日子。他漫步在杰里巴斯[2]大街上，穿着定做的白色长裤坐在咖啡馆里。他为那个与黑手党有关联的著名歌舞表演家鲍里斯·希思金当跑腿。阿伯拉什卡和耐奥麦·拉宾尼安。诺亚叔叔。好日子。渔夫。将西瓜对着船上的座位一撞裂成两半，一个劲地猛吃，把整张脸都埋了进去——你的双颊，你的鼻子。微温的啤酒，黑面包，外面的硬皮上抹了一层蒜。用报纸卷成锥形盛放的咸小虾。不，不是那回事。

我继续快速地想着。此时，卡秋莎站了起来。

"那么，尼奥切克，你高兴吗，我的乖乖？现在，我想听听你对一些法律问题的建议。但，首先，我要去给大家弄点喝的东西。同时，你们也和阿瑟玩玩。你和他能相处对我很重要。葡萄酒，伏特加？苏西，

---

① 加波汀斯基(1880—1940)：记者，锡安修正主义联盟(Union of Zionest Revisionist)创始人，提出要建立犹太人自己的国家。

② 杰里巴斯(Deribasovskaya Str.)：敖德萨市中心唯一的步行街。街道两旁壮丽的建筑体系，将人文融入建筑。鹅卵石铺成的道路上一座座精美的小酒吧，透出浓郁的欧洲风情。

你要什么？或许喝点冷的？”

“没关系。喝什么都行。”

她庄严、缓慢地驶出房间，就像艘载满战利品的海盗船往地平线方向渐渐远去。

很快，客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一副扬扬自得的表情，对我咕哝道：“你怎么样？”声音压得很低，不让阿瑟听见，他正在不停地吃着，地毯上洒了许多的碎屑。在他母亲忙于和客人说话的当口，他放下了叉子，现在他的两只手都派上了用场，左一口右一口地啃着炸肉饼和腌黄瓜。突然，我记起来了。

“酒家”，就是那个词。父亲说过，他和海港里的渔夫相伴的那些日子里，耐奥麦——也就是诺亚叔叔——已经坐在“酒家”里吃饭了。但那有什么关系呢？也许卡秋莎口音中的什么东西使我想起了他温暖沙哑的声音。是她说起话来的慢条斯理？不是。酒家…… 修家……在我甚至还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之前（这是我和客人交谈时早已习惯了的情形），我发现自己在向他轻声地说：“问问她什么是‘修家’。”

“什么？”

他把我的话听得很清楚。我不做声。

“你想要我问她什么？”他盯着问。

我动了动嘴唇。阿瑟切克意识到在他背后正进行着某种秘密的活动，他眼睛盯着我，同时粗野地吮着手里的黄瓜。

“问——修家。问她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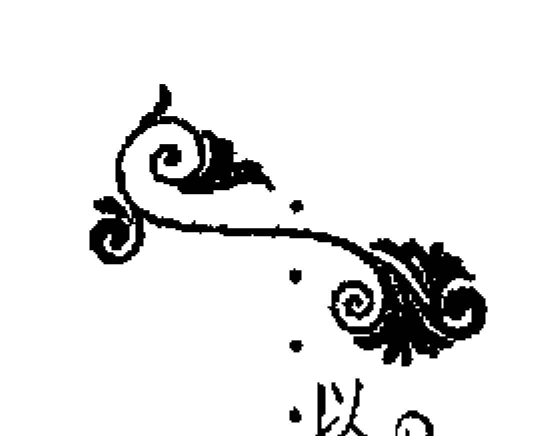
“什么？我不明白。”

真该死。我决定要是他再问，我就不答理他。他能自己解决好。就在那一刻，仿佛是为了认可我的决定，阿瑟从嘴里拿出腌黄瓜，唱起歌来。

“修修修家，他瞎弄一个机叫拖拉。修修修家，他瞎弄一个机叫拖拉。”

客人摇摇头，拿起沙发上的一本时装杂志，仿佛在说：你整个儿疯





了。卡秋莎进来了，盘子上有几个瓶子和杯子。客人好像觉得该把事情了结掉，同时指责我愚蠢的猜疑，他转向她，甜甜地问：

"卡秋莎，告诉我，乖乖，依你看，到底什么是修家？"

卡秋莎甚至并没去费神感受一下这种无礼或吃惊，她那宽大的脸上仍是一副蒙古人不可思议的茫然。

"哎，你是什么意思？修家[1]就是修家。就是别人开的餐馆。像是海边的'金苹果'、'阿哈鲁尼'。这算什么问题？"

客人僵了一会儿，身子向后倾斜，仔细看着卡秋莎，仿佛他是头一回看见她。她将托盘放到桌上，开始忙活起来，把威士忌和果汁倒到玻璃杯里，分发冰块，加苏打。只有在她抬起眼睛看了他几回并且意识到他还在盯着她之后，才用那缓慢、带拖音的女低音说："哎，什么呀，尼奥切克？怎么了？"

尼奥有一阵没做声。接着，他点了支烟，告诉她别人要他去搞圣像，而他对这方面又无知得令人吃惊，他是多么需要一位专长于拜占庭艺术的修复家的指点，来帮助他买到真货。卡秋莎对她所犯的错误一点儿也不显得尴尬。相反的，客人越解释，她脸上显出越加怀疑的表情。最后，她打住了他的话，一副全然不信的神情。

"等一下。干吗要各种圣像？你买来卖给美国佬去呀。恕我直言，你对圣像就像给猪吃橘子一样不识货。真见鬼，干吗会有亚美尼亚人信任你来为他买圣像，要是他是个很热衷的收藏家的话？"

卡秋莎的简单问题，甚至连我都能回答，而客人看上去要比这些问题所能引起的不安多得多。然而，卡秋莎显然掌握着情况，要求客人把个中就里作详细的解释，而他也确实在努力地作着说明，口气含着相当的歉意。

"他喜欢我。那个亚美尼亚人喜欢我。他说我是颓废者和革命者的结合体。而且，我来之前学了一点关于圣像的知识。你可以问问苏珊娜，我是怎么向她解释我从格鲁吉亚人夏尔瓦那儿买来的东西的。"

---

① 这儿，卡秋莎把 restorer（修复家）和 restaurant（酒家）混淆了，故出此言。

卡秋莎默默地盯着客人。她并不想从我这儿对他所说的话取得证明。他的苦恼越发明显了。

"他知道我在以色列做事。他说,自改革[1]以后,俄罗斯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中的宝物都被洗劫一空,其中有一些到了这儿。在他看来,要我在以色列为他效力似乎很符合逻辑。"

卡秋莎保持着沉默,她的神情变得更加专注而冷淡。

"他说,他认为这样的宝物落入不恰当的人之手是个耻辱。他说他拥有世界上拜占庭艺术最好最大的私人收藏。你知道吧。他是反犹分子。他仇视我们,因为我们由于大屠杀得到了所有的关注,却没人关心他们间的杀戮,还因为我们与土耳其有外交关系,还因为占领……"

卡秋莎把头往后仰去,手揉搓着前额,仿佛她正患着严重的偏头痛。客人马上不做声了。随之产生的沉默非常引人注意,连孩子都把盘子放到一边,好奇地盯着我们。

"行了,行了。"客人打破了难以忍受的沉默。他坚决的神情显示出他已经做出了决定,并且无论什么代价,他都会坚持下去。

"我欠他钱。行了吧?在几个朋友家玩的一场游戏里,我输给了他几千美元。"客人重重地叹了口气,仿佛卸掉了长期压在肩上的负担。

"多少?"卡秋莎简单明了地问。

"多少什么?"

"在那次游戏中你输给了他几千美元?"

客人沉默了,仿佛在决定是说谎还是继续他已经犹犹豫豫踏上的艰难的真理之路[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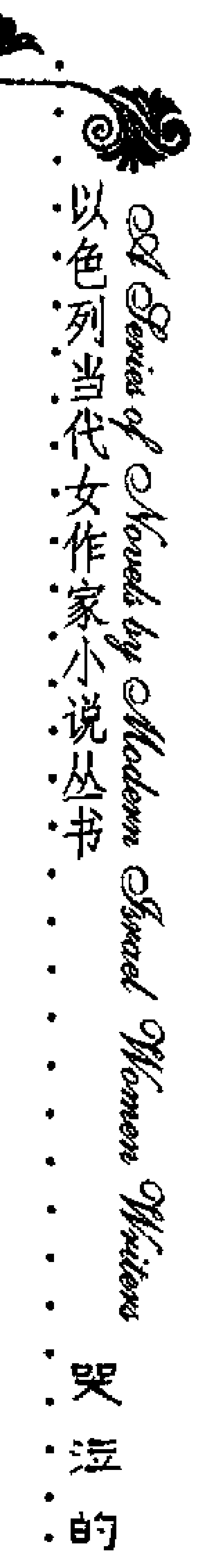
"这没什么……七万!行了吧?"引用这个他输掉的数目对客人的打击似乎比在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面前说出忌讳的上帝之名还要

---

① 调整改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前苏联经济和官僚政治进行重新组织。

② 原文中的 the Via Dolorosa,指的是《圣经》中耶稣从彼拉多审判大厅到髑髅地的悲哀艰难的路程。





可怕。

但他马上恢复了过来，迅速补充道："但我已经还了四万。是我从母亲那儿借的。"

"你母亲给你四万美元还赌博的债？"头一次，类似于微笑的某种表情掠过卡秋莎的面孔，"她真是太好了。太好了。总而言之，看到母子之间有这么好的关系真是太好了。好得难以置信，特别在你给她惹了那么多问题以后。真是了不起的女人。下回你和她说话时请转达我的问候。"那一刻，我无法明白客人怎么能说卡秋莎缺乏幽默感。她整个人显然憋着随时都会爆发的大笑。她继续冲着面色阴沉的客人微笑着，笑得直到他垂下了眼睛，然后，她以一种完全不同的、生硬而实际的口吻问道："剩下的三万怎么办？"

"我靠干活来偿付。为他买圣像。每一笔买卖我将得百分之十。"客人很高兴又能言归正传了。

"也就是说，你得为他买价值三十万元的圣像。"卡秋莎简单地计算了一下。"那真是要不少圣像。"

"要是你买罕见的古代作品，那就并不多。"

"即便你买最古老、最罕见的作品，还是要不少圣像。相信我。我懂。"

客人的眼睛冲着她，眼中冒着差不多可以说是很危险的怒火。

"那么，是我该死。行了吧？那时我又玩起来了。你现在要我做什么？杀了自己？很抱歉，我起初没把整个真相说出来，但你明白为什么的。我对自己并不觉得骄傲。行了吧？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助。那么，你认识不认识修复家？"

有一刻，我相信自己能听出她回答时语气里怀着恶意的满足。她说得很慢，重重地说着每一个字："这样的圣像修复家，我不认识。"

客人点点头，目光移开去，咬着大拇指。他似乎陷入了绝望。阿瑟走过来，站在我们旁边，忙不停地挖着鼻子，好奇地看着展现在他眼前的这一幕戏。

不知是出于她那看到客人失望就难过的俄罗斯好心肠，还是由于

像皮条客那样怕在客户眼里失去对自己的信赖而作了冷漠的算计，卡秋莎换上了一副同情的表情，在客人旁边坐下来，并用手臂挽着他。在她看来，他似乎已经得到了惩罚。现在该抚慰抚慰了。

“来，尼奥切克，不必绝望。我的确不认识修复家。但我认识许多别的人。多得很。这是我的工作——认识人们，介绍他们彼此相识。如果你需要个修复家，我们就找一个。我也认识卖东西的人，买东西的人。你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善于交际。我会四下打听。我会去调查的。这儿有这么多的俄罗斯人，在海法，在科法尔萨巴[1]。就算我不认识，别人也会认识的。我们最终会找到答案的。一切都将没问题的。”

“当然会这样，卡秋莎。我知道。只是这些事来得太多太快了，一下子接受不了，因此我有点紧张。别担心。”客人微笑着以显示他重新回来的信心，“你刚才有什么要问我的？”

卡秋莎朝阿瑟瞥了一眼，降低了声音：“有几份文件，你知道，我的希伯来语并没好到能读所有那些小字母和复杂词语的程度。我想让你看看海法律师写来的信。又是关于穆斯塔法遗嘱的问题。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他们又卡住了抚养费。”她又往孩子那边看了一眼，低声说道，“穆斯塔法是在坟墓里折腾，相信我。这个国家很原始。摩洛哥人和阿拉伯人。乱七八糟的一团。”接着，她用平常的声音补充道，“苏西，也许你能趁这个时候和阿瑟谈谈。他有时觉得很孤独。”然后，她站起身，离开房间，示意客人跟她去。

我看着窗外。在初夏苍白的天空映衬下，落日余晖使特拉维夫许多丑陋的屋顶开始变幻成鲜嫩的橘子色。无边无际的电视天线和太阳能热水器展现在我面前，仿佛这个城市是马尾藻海的一部分，成千上万的船只为这些颇具毁灭性的海藻缠绕而沉没。我努力去想一些具体点、集中点的事情，但我的脑袋空空如也，仿佛一切有意义的感觉都正被从这个城市和我身上抽出去。只有现实留存着，赤裸裸的，清



① 科法尔萨巴（Kfar Saba）：以色列城市名。



清楚楚的，满是细节却缺乏意义。

听到背后有窸窸窣窣的声音，我吃惊地转过身去。孩子正站在我旁边，身子晃来晃去，嘴里平静而有节奏地低声吟诵着什么，仿佛是在无休止地重复某段毫无意义的曼特罗①。他的右手胖乎乎的，吃过了饭变得很脏，攥着小拳头，这会儿正往我手掌里挨。我听得见卡秋莎和客人从另一间房里传出的不太清楚的声音。这客人，他认为他是谁？邀我陪他来看某个令人生疑的女性朋友。他供认自己跟我和母亲说的都是谎话。他打牌输了成千上万美元。而她也绝非天使——穆斯塔法，律师们。她认识人！没有幽默感！哎呀，她差点没当着他的面放声大笑起来！这母狗。现在他把我单独留在这儿，还跟这半疯子小家伙处在一起。他干吗还不从她那恶心的卧室里出来呢？这段时间我该干什么呢？

孩子断了想让我握住他手的念头，继续像个老犹太人在哭墙前那样摇晃着身子喃喃自语。

我以冷冷淡淡、毫不同情的目光瞄了他一眼，又把脸转回窗口。现在，他提高了嗓门，我能听见他的话了，是老一套的淫言秽语。

"瓦弟姆拉屎苹果派。瓦弟姆操蛋在天外。瓦弟姆拉屎苹果派。"

我继续看着窗外，但先前空洞的脑袋如今被站在我身后这个小孩的侵入性存在所充斥。

"瓦弟姆拉屎苹果派。瓦弟姆操蛋在天外。"

起码，他放弃了对我的人身攻击，那些关于苏珊娜大蜥蜴的冒犯性韵文。要是他胆敢重复那些话，我就肯定会哭起来，并且停都停不下来。苏珊娜大蜥蜴，他要来抓你，苏珊娜。我当时处境很无奈，只能坐在那里等客人，他正在隔壁房间就那些不明不白的法律事务帮助卡秋莎，谁知道他们同时又在那里做什么，想到这，我的双肩感到一阵战栗。真丢脸。或许我应该起身，打个的回家，让他自个儿去应付。但是因为我是和客人一起出来的，当时就没想起来跟母亲要钱。现在，

---

① 曼特罗：佛教、印度教中一种神圣的语言形式，在祈祷、冥思或咒语中重复，如呼唤神灵、神奇的咒语或有神秘内涵的经书上的一个音节或一部分。

现在该怎么办?

我又转过身,面向阿瑟,决定用目光使他安静下来。孩子站在我面前,看着我。他很像他母亲——宽脸颊,鼻子像个微型的小土豆,满目中是遭受了成吉思汗骑兵铁蹄践踏的俄罗斯城市的疮痍。现在,我也能看清那些细小的地方了:头发里有些不明物质的碎屑和枕头上粘来的细软羽毛,鼻子旁不对称的丛丛雀斑,略微的斜视赋予他情感冷漠的表情。我觉得有些人会称阿瑟是个“漂亮的孩子”。

“瓦弟姆拉屎苹果派。”他重复着。

“听着,小家伙,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我不知道怎么跟孩子打交道,听懂了吗?”

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别烦我。你在找修复家方面帮不了我们什么忙。所以,你给我走开,忙你自己的事去。”

我又转回到窗口,朝向已经在消退的马尾藻海的可怕魔境,以此来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我希望此刻他会让我静一会,但是我错了。他抓住我的裙边,捏紧拳头拽着,将脑袋朝我的大腿处猛撞,同时,嘴里溜出绝望的尖叫,夹杂着令人讨厌的同样内容。



“瓦弟姆拉屎苹果派! 拉屎苹果派!”

我努力想把他和我的裙子分开,但做不到。他就像只巨大的螃蟹抓得我很牢,边尖叫边摇摆着身子晃动着脑袋。卡秋莎和客人冲进房间,一起努力使孩子松了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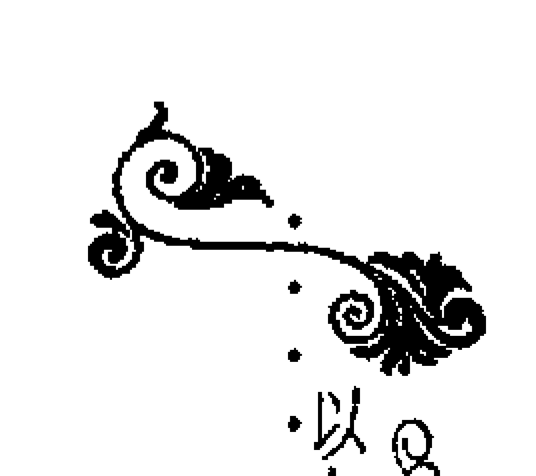
“他想打你?”客人带点关切地问。

“决不会! 很有可能他是想跟苏西讲话。他是个好孩子。很友好的,像我。”

卡秋莎抱起孩子,很快离开了房间,他搂着她的脖子,嘴里还在尖声说着粗俗的韵文。

客人一直等到阿瑟在另一个房间里经他母亲慈爱的照料最终安静下来。

“瞧,我很抱歉事情会是这样的。但你来了真的很帮忙。这小家



伙恨我,妒忌我。有你在,一切都比较平静,包括前面的相互问询。我只希望她能给我找到个修复家,否则我可有麻烦了。"

我什么也没说,等着告辞。

卡秋莎回到房间里,脸看上去红红的,一言不发地把冰凉的伏特加倒进三只大小不一的玻璃杯里,并邀我们坐下。

"我有个消息。"她说。

"什么消息?你对阿瑟做了什么?用枕头闷他了吗?"客人的话语中充满了恶意。

"我本该知道。他不应该听成年人谈话。这会使他紧张。现在他在自己房里玩。他从不厌倦。但我明白了他刚才说的话。"

"他什么时候说的什么呀,卡佳?他说的都是押韵的串在一起的淫秽话语。"

"真是胡说。他想什么说什么。只不过他有自己的风格。像个艺术家。你该明白这些,而不是阴着脸坐在那儿。"

"你说得对。"客人冷冷淡淡地表示同意。

"他跟苏西说的是我们认识修复家。你知道——我们认识一位。不是像他的笨娘所认为的那种酒家。他是个了不起的小孩。你认为他在发疯,但别介意。每个人都这么认为。人们不喜欢他,这给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但我知道真相。我们这儿有个修复家。你知道,他听见'圣像'、'艺术'、'修复家'这些词,他就把它们串了起来。显然,苏西对他有好的影响。"

"你在跟我说什么,卡秋莎?我不懂你说的话。"客人朝我看看,想得到我的首肯,但我一言不发。

"那么,请听着。瓦弟姆。瓦弟姆是他班上小女孩的爸爸。特殊教育班的。谢琳卡的爸爸。他们从列宁格勒来。谢琳卡和她妈妈塔玛拉住在一起,但有时瓦弟姆也来接她。和她玩。这个瓦弟姆老喝醉,是个酒鬼。讨厌的人。我老是可怜塔玛拉,她得把谢琳卡一周交给他两次。但孩子们喜欢他。这个瓦弟姆是个画家。狗屎画家。在俄罗斯,他称自己为画家,但是靠在博物馆里工作挣钱。我认为他甚

至还在埃尔米塔日博物馆[1]干过。塔玛拉告诉过我他是圣像专家。他喝醉了酒出现的时候她总这么说,以表示他一度还很有价值。现在,你明白阿瑟切克是天才儿童了吧?"

客人只得同意。

"好,那么,我给你搞搞清楚这位圣像专家瓦弟姆?也许他能帮上忙。要是他不行,还有别人,只是不要像刚才那样拉长着脸坐在那儿。对不,苏西?现在,走吧,明天我会打电话告诉你情况的。"

"行。我跟苏珊娜和她母亲住在一起,因此,不要搞糊涂了,别去希尔顿酒店找我。"

卡秋莎叹了口气,透出契诃夫式的悲哀。

"你玩牌得打住了,尼奥切克。否则,就不会有钱过你喜欢的好日子了。"

她陪我们到门口,直到此时,客人才记起他忘在客厅里给阿瑟做顺势疗法的塑料袋。

"这些是我从美国土郎中那儿买来的。虽然目前在我看来阿瑟最不需要的是药物。"

然而,在谈到她儿子健康方面的事时,卡秋莎丝毫不为恭维所左右。

"他需要,他需要。要是有什么东西能使他睡觉超过两小时就不错。整晚上,他都爬到我上面,到头来他会变成有俄狄浦斯情结的性欲狂。"

"管它情结不情结,爱他母亲就行。"客人复述了一个连我都知道的不滑稽的老笑话,现在,我看到卡秋莎大声笑了起来,这是自从我们到这儿以来头一回。这种大笑发自肺腑,带着沙哑,但如闪电般减退成了微笑,很快又为她惯常冷漠的表情所取代。

她将一个湿润的吻印在了客人的嘴上,带着贵族的柔弱握了握他的手,然后,在我们身后砰地关上了门。

---

① 埃尔米塔日博物馆(Hermitage):位于圣彼得堡,内有270万件展品,可与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相媲美,现今是国立历史博物馆。



“你要是跟你母亲就玩牌和债务说一个字，”我们沿着天色渐暗的林荫大道走的时候，客人说，“我就当场宰了你。”

男人们的神秘

我很快就明白了为什么客人如此敬佩卡秋莎，为什么顺着她是这般的重要。原因很简单：没有卡秋莎解决不了的难题。她承诺的事没有办不到的。我们去她寓所拜访两天之后，客人就与修复家瓦弟姆见了面，他回到家就告诉我们那人是个国际级的专家，他那一行的天才。客人——这个对拜占庭时期的东西一窍不通的人，将不必再在不明不白的艺术品经销商夏尔瓦骗他买为游客制作的东西面前出丑了。不光这，他继续说道，同时，把母亲抱了起来，不顾她的抗议，使她在空中转圈，仿佛她是个瘦条条的小姑娘，不光这，而且卡秋莎已经开始去打听并激活她广泛的关系网，明天早上，是的，是的，明天早上，他将去加内－耶胡达（Ganei-Yehuda）一个富裕的移民家里看许多的圣像。

接下来的几天，卡秋莎向客人提供了更多的地址，使他跟更多的人接触。他欣喜若狂。他的快活和魅力升到了新的高度。

我们一家人在家里过夜晚的时光，看电视、玩"微迹追踪"（Trivial Pursuit）或"大富翁"（Monopoly）游戏，或者就是谈天，那就是说，他和母亲就高深的话题进行热烈的讨论（别忘了，艾达，法西斯主义也是浪漫主义革命的结果），也同样喜欢讲那些十足的废话（我认为，正确的饮食应该由植物蛋白构成，艾达），我坐在凳子上听着，偶尔也简单地回几句。有时候，他会让母亲整晚上大笑个不停，甚至也从我脸上挤出羞怯的微笑。母亲开始每天做更为复杂的菜肴，这些菜通常她是留待特殊场合做的：鱼丸、三角馄饨汤、用发酵的面团加许多罂粟籽做成





哈曼的耳朵①。她修好了他裤子上坏掉的拉链,让他像个要进行成人仪式的男孩坐在房间中央给他修剪了长发。他则给她大声地念报纸上有趣的东西或诗歌片段,给她解释股票交易的运作,给我们诠释别人送给她的那副塔罗纸牌上的人物,这些以往没人能给我们解释过。这张牌代表你,艾达,是皇后,他说道,她喜悦得双颊泛红(那是博大而富饶的地球母亲,艾达)。代表他自己的这张牌,从傻瓜变成魔术师,取决他生命的不同阶段,尼哈玛——正义;阿曼德——战车;而我则由所有牌中最奇怪的那张牌(哪还有更糟糕的牌!)来代表——被绞死的人。这张牌的意思我无法仔细了解——或许表示献祭的受害者,或许表示一个潜伏状态,一个从灵魂的某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转变的状态。甚至连客人自己在曲里拐弯的解释里也搞不清了,最后,他说塔罗纸牌整个儿就是凭直觉感知的,解释只会限制牌的意义。

有些夜晚我们光是坐着看电视。客人说在纽约的家里他决不看电视,因为他会在数秒钟之内就着迷。我懂他的意思——他能整晚上坐在那里,眼睛盯着荧屏,中间只是中断几下,急急地奔向厨房,用果酱和母亲开始专门为他买的油腻的花生酱给自己做个三明治。当他不得不上厕所时,他会以什叶派自杀性炸弹人在执行最后任务之前的口气宣布事实,将火炬传递给活着的同志:我要去小便了,艾达,但看在上帝分上帮我个忙,密切注意监狱长会有什么事,否则,我们就不会知道那个姑娘和老黑人发生了什么事。

我知道尽管他和母亲之间存在友谊,我才是他真正的知己,对此,我很满意。我选择在家庭的庆祝会上充当最小的角色并不仅仅是因为自身的缄默或羞怯。我根本没想要和客人走得太近——使你自己依恋上别的人就意味着准备失去他们,若不是苏珊娜·拉宾,谁会将自己的生活圈得这么窄,将痛苦减到这么少。年轻些的时候,我遇到自己会觉得亲近和吸引的人们,像雕塑工作室里患神经性厌食症的娜爱玛,或者在我八年前住院观察时爱上我的那位再生的信徒——每次

① 哈曼:《圣经·以斯帖记》里下令要灭绝犹太人的大臣。

跟他们见过面后，我总会想象他们已经离去，从地面上消失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们。尽管当娜爱玛去意大利学习之时，当那位信徒在储藏室里切开了喉咙之后，我感到极度的悲痛哀伤，自己业已在想象中再现多次的关于他们消失的情景使我变得坚强克制。

客人对于我们这个已经失去昔日光彩的女性殿堂的身体侵入，已不再像起初时那样使我感到痛苦了。虽然我仍留心别把胸罩忘在洗澡间里，并且如厕后将玫瑰味的空气清新剂喷得多到令人窒息的程度，我最初时的惊恐几乎已完全消失。有一次，我甚至心不在焉地就像他来之前那样穿着父亲的旧衬衫光着腿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但我一感到他落在我小腿上那灼烧的目光，就又穿起了正式的服装——长袖衬衫和垂至脚踝的深蓝色裙子。

客人常常因生意上的事外出，有时会连续好几天不在家，留下母亲和我各自等他回来，等他精力充沛地进门，等他有趣的故事，等他洋溢着热情和乐观的出场将家充满节日的气氛。尽管我们的日常生活一如既往，仍由一切的琐事构成，一天天的日子满是新鲜特别的意义。甚至连每日的海滩之旅也有了度假的气氛，其目的已失去了以往医疗上例行的特征。

在一个这样崭新的早晨，尼哈玛突然闯进了厨房，挥舞着才从我们信箱里拿出来的报纸。《国土报》——那是母亲看的日报。这是我们生活稳定的外在标志，虽然各种革命在我们周围的外部世界里风起云涌。

母亲对读《国土报》很上瘾，自我记得的第一天起就着了迷。而我，则讨厌报纸。它们描述的是一个于我陌生而遥远的世界，一个其喜悦和问题我都没份的世界，一个生活着的人们的世界。只是有时母亲会在增刊里给我找篇有趣的文章，关于一个不寻常的自然现象，一个医学上新的突破，一个我永远不会去看的展览。

尼哈玛也喜欢看报纸，虽然方式截然不同。母亲作为一个局外的观察者想要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她尽管觉得沉醉于此并且严肃地作出自己的判断，却不想积极地参与到事件中去。就像母亲，尼哈玛也





极为沉醉。但和母亲不同的是，母亲的沉醉以我们的国界为限，而尼哈玛则醉心于任何事情，讨论的问题与她在政治上、老百姓生活中及个人方面的亲疏程度毫无关系，所及问题可以从医治太平洋岛屿火山爆发的受害者开始，到古巴政府在旅游纪念品上使用切·格瓦拉的像结束。问题是她的看法并不统一成全面的世界观。不同意识形态的碎片从四面八方附着到她身上，就像由成百上千片各种颜色各种材料缝制而成的老式百衲被。我必须承认尼哈玛这种意识形态的拼贴有时在创造力方面令人吃惊，但在她提交的每篇论文里，大多数地方都充满了逻辑上的矛盾。尼哈玛在某些话题上可能会好战而强硬，差不多是法西斯分子，在另一些话题上则是率直而宽容。当我和母亲向她指出这一点时，她说她是按每个问题本身的情况来处理，因为她是个独立思考、不躲在任何意识形态背后的真实可靠的人，况且不管怎么说，意识形态的时代在世界上已经过去了，现在重要的是个人。我是个后现代人，她这样说她自己。因此她的价值体系就是这样，虽然总体上是崇尚宽容，但显示了大量充满可疑的逻辑和无理性情感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

但是，通常吸引尼哈玛的话题更多地与她和我们日常生活相关。这次，她风风火火地冲进厨房，双颊绯红，嘴里嚷着："喏，这你们有什么话说？真不可思议。我告诉你们，简直是不可思议！"

她将已经弄得乱七八糟的报纸甩到桌子上，用正在剥落的橘红色指甲轻敲着后面的一个版面。母亲朝她挥挥厨房用的毛巾，试图使她安静下来，不要把客人吵醒，但尼哈玛太激动了，没注意到。"真是难以置信，简直难以置信，人们容许自己做这样的事！"

顺便说一下，"人们"这个词在尼哈玛的话语中充当着中心的角色，他们常常犯有或大或小的罪孽。我伸出手去拿报纸，可她飞快地把它抢走，我手上只拿到了报纸的一个碎片。

"等一下，"她叫道，"首先，我得告诉你们背景情况。"母亲将一杯雀巢咖啡放在尼哈玛面前，然后在她旁边坐了下来。

"事情是这样的。"尼哈玛吸了口气，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以便在

她谈到事情的重要之处时就能踩油门加速前进，而不用把精力耗在乏味的细节上。

“来这儿的路上，我沿着街走，突然，我看到吉第·伯查科出现了，在溜他的狗。好了。他们往前走着，我对自己说‘也许我能跟在他们后面几步远的地方，看看他是把狗屎铲进袋子里呢，还是想不去管它，因为时候很早，街上没有别的人’。顺便说一下，这个吉第，你知道他为什么离开正规军吗，艾达？你可曾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想想吧，那是个了不起的工作，工资高，福利好，还有养老金，样样都有。那么，你想，为什么有人会突然起身离开这样轻松又赚钱的工作呢？”

母亲耸了耸肩：“我怎么知道，尼哈玛？人们做起事来有各种原因。我能知道什么？”

这恰恰正是尼哈玛在期待的答复，因为她那鼓起的圆乎乎的脸颊，上面布满了乱七八糟的毛细血管网络——她的脸颊老使我想起小乔纳森苹果放在阳光下太久所变成的皱巴巴的样子——此时激动得发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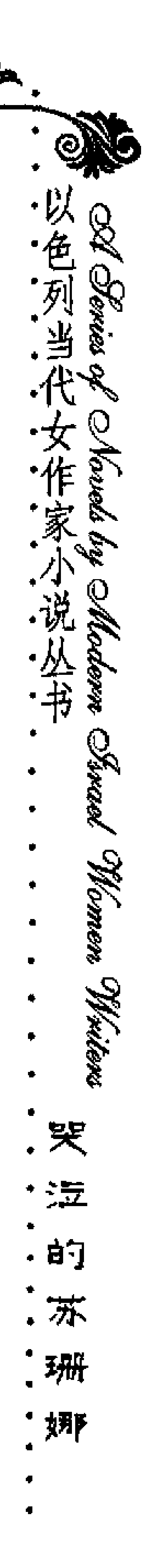
“那么，我来告诉你他离开部队的确切原因。”她的小眼睛闪现出黯淡的蓝色光泽，“因为他是个同性恋。这就是原因！”

母亲焦虑地看了我一眼。“你怎么说话的，尼哈玛！你真是患了同性恋恐惧症，你知道吗？不管怎么说，这跟他在不在部队有什么关系？他在那儿所做的无非就是电气工程师之类的活，要是我没弄错的话。”

“有什么关系？”尼哈玛很是得意扬扬，“有什么关系？我来告诉你有什么关系。但之前你得老实告诉我：你会想要这样的人在战争中为你保家卫国吗，艾达？”

她很快挡开了母亲的异议。

“我知道当今大家对这些事情都异常的宽容。我知道我说的东西不受欢迎，但我严肃地问你，艾达。你怎么能真的想象他带着乌兹冲锋枪、迫击炮、水壶、双筒望远镜和其他他们带的东西跑着越过山头，而满脑子都是内衣裤和须后水？要是他突然爱上个敌方的士兵怎么



办？你想过这些吗？和某个长着胡须的埃及人在一起？也许那正是吸引他的地方，异物相吸？他金发，埃及人黑发；他有教养，埃及人粗野；他聪明，埃及人乡巴佬。你怎么知道？相信我，不消那么多原因人们就已经变成了奸细、叛徒。一次，我看过他们的杂志，有画片的，你猜怎么着！他们就像那样——长着胡须，戴着纳粹帽。所以，你怎么能拿得稳像那样的人？还有你，你在笑什么，苏珊娜？像个傻子一样早晨头桩事就是嘴上戳支香烟。"尼哈玛气恼地闻了闻，呷了一小口咖啡。

"我想搞清楚，这就是你进门时想告诉我们的，还是你又跑题了？"

这是使得人们无法与尼哈玛说话的另一个特点。她说话跑题。在开始讲某个故事后，她会突然陷入某个不碍事的次要情节或关系很远的人物——几重远的表亲等等——从那时起，她会长篇大幅地展开这个人物的传记，他的变迁兴衰，随着叙述中每个新人物的出现，她一次次地那样做，直到完全脱离了原来的故事思路，只有在她的听众没完没了的提示帮助下，才能把故事讲完，这时的她，困乏苍白，筋疲力尽，原本想突出的异乎寻常的高潮和戏剧性之处也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温吞吞缺乏任何寓意的语句。

"我没在跑题，这些都是重要的细节。"尼哈玛似乎受了伤害，但没到阻止她继续讲故事的程度。"不管怎么着，我跟在这个吉第后面走，突然，他们停下了，那动物蹲下来做它的好事。好了。我躲在杜鹃花后面等着，顺便说一下，冒着某种中毒的危险，就像你知道的，艾达，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也注意听着，苏珊娜，这是你应该懂的普通知识点。杜鹃花是种有毒的植物，一次，我想那是在中世纪，一整个古罗马军团的士兵都因为用它的叶子做水瓶塞而中了毒，想象一下！我的阿米尔勒在读大学预科时告诉我的，艾达，你记得，当时我们还在想着他会去特拉维夫大学学历史和文学，但是他决定上海法技术大学，尽管只是因为那个俄罗斯姑娘，她非常的灵敏聪慧，她知道得很清楚抓住男人的心得靠露……别介意，你知道靠什么，我是心里在想……"

"尼哈玛!"

这次母亲就要被惹恼了——这个危险有经验的尼哈玛马上就认识到了,因而都没停下来喘口气,就又回到了原来的故事上。

"好,我讲到哪儿了?对了,所以我站在杜鹃花后面,看着那动物做好事,接着,他,这个吉第拍了拍它的背,仿佛它起码已经刚刚跳过了火圈,然后,转身就走。你明白,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让那整堆的狗屎留在人行道上,我不想说得很详细,但我们在这儿谈的像是马,简直不是狗,相信我,我没有夸张,有这么大一堆。"

尼哈玛展开双手,仿佛捧着个想象中的西瓜。

"行了,行了。"这是母亲具有双重标准的绝妙例子。她不能容忍别人谈论身体排泄物,尽管她自己一有这样的机会也会谈起来无拘无束、津津有味。

"好。因此我从树丛后面走出来,招呼他:对不起,先生。他转过身,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早安,利波太太,您真迷人。我跟他说:对不起,你该把你的狗……屎铲进袋子里,这是市政规定的。是的,我知道,他跟我说,但狗吵着要出来,烦得我没时间拿个袋子。我恰恰就要带它去公园,回来时我会找东西弄干净的。于是,我跟他说:很抱歉,先生,你这样是在违反市政规章。他并不让步:你说得对,但我眼下没有袋子,回来的路上我会在曼纳汉姆的售货亭买一个把这些都收拾进去的。好,我意识到他在撒弥天大谎,我给他说清楚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我即刻就给市政当局打电话,即使那时只不过早上七点钟,没人会在那儿,这我当然没跟他说,然后,听听这个厚脸皮,艾达,他跟我说:你干吗不管管自己的事。接着背过身去,牵着他的怪兽哥斯拉走开了,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我在那儿站了一分钟,相信我,我觉得受了侮辱,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了。然后,我就上楼时打开了这份报纸,我看到什么了?两条库茨维勒犬在基雅阿挪(Kiryat Ono)吃了个孩子。因此别竭力告诉我,说我是在无缘无故发怒担忧。这儿,你们自己看。"她将报纸推给母亲,把双手交叉手指放在膝上,仿佛在说:我已经说过了,现在你们来评判吧。



“你在说什么库茨维勒啊，尼哈玛？他死了好多年了。”母亲在口袋里找她的眼镜。

“库茨维勒。那条狗，像他的那条。这儿有张照片。一模一样。”

“洛特维勒，洛特维勒，尼哈玛，上帝保佑你。是什么使你把库茨维勒教授也扯进去了？”母亲在读那条消息时愉快地大笑。“噢，我的天，你是对的，它们凶猛地攻击了个孩子，多可怕。看，苏珊娜，这儿有张孩子在医院里的照片，脸上缠满了绷带。”

“行，就算是洛特维勒吧。”尼哈玛说，她的劲头大增。“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可是条危险的狗。杀手，野兽。而且，那个吉第带着它在这儿，在人们中间到处走，好像它是条小狮子狗。看看它老是让苏珊娜害怕的样子。要是有一天它挣断了牵狗的皮带，朝她扑过来怎么办？总而言之，想想吧，当你真正面对一条狗时，它是什么？说下去，苏珊娜，告诉我。”

我耸了耸肩。

“那么让我来告诉你们它是什么：狗是宠物。除了同性恋，谁会想把库茨维勒当宠物？不会！另一点：狗是驯化的动物。那条狗你们看上去是驯化了的吗？你难道不说这儿有问题吗？”

“喏，尼哈玛，赶快，把咖啡喝完，我们准备走了。”母亲把一个装着洗过的葡萄、杏子和那张烂报纸的塑料袋放进大沙滩袋里。但尼哈玛坚持要再等一小会儿。原因是她的防晒露上的说明强调必须要在暴露到太阳下半小时之前抹。由于到现在才看仔细了瓶上的小字，她为这个发现和在这方面一辈子的疏忽感到忧虑不安，尼哈玛，这个把什么事情都直接或间接地和自己的健康挂钩的人，很快放弃了她平常的逆反和怀疑，开始用力地把防晒露擦进她布满雀斑的手臂里，她那染过的头发随着抹擦的动作摇摆不停，就像干燥的风中一地的枯草，同时，她还责怪着我的不耐烦。

“别那样盯着我，自己也抹点，苏珊娜。你白得像只兔子，你最好当心点，别鼻子上长黑素瘤。这是我们都需要的。”

“早上好，姑娘们。”

客人出现在昏暗的客厅里，就像个透明的幽灵。他穿着牛仔裤和汗衫，这副装束不知什么原因使他看起来很放肆，几近色情的意味。

“是什么让你起得这么早？”尼哈玛嚷道。她认为他是个有犯罪倾向的可疑家伙，就她看来，客人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证实并增强了她的怀疑。

“坏良心，利波太太，还有什么？”他打着哈欠。“在我和黑手党的关系范围里还有险恶的阴谋。”他走向母亲，从沙滩袋里抽出报纸，将一个发响的吻印在她的脸颊上，以表示感谢。“哇……”

“你今天真的起得很早，尼奥。”母亲说，享受着这份表达出来的家庭亲情。

“我不得不早点起。我要开车和修复家瓦弟姆一起去趟海法。卡秋莎把她的车借给了我。那儿几个小子有很多的收藏。唯一的麻烦是车里的空调坏了。我真受不了它，相信我。”

最后几个字说得心不在焉，在去厨房的路上，他的鼻子埋到了报纸里面。

尼哈玛停止了抹擦，仍摇着头表示不赞成客人这种不考虑别人的行为：他征用了报纸，而且没有想要还回来的迹象。但母亲不肯再拖延一分钟，坚定地引领我们走向门口。

我喜欢清晨。尽管我天生的爱好是使自己沉浸在漫长而又温暖的睡眠当中，却从不愿错过这些清晨的时光。我惊异于空气中淡淡的空灵的气味。这种空灵，还未充斥那些黑色废气的味、熟悉的烹调味、糕饼店里糕点黏黏的味、沙拉三明治摊上熟油的烟气、笼罩着垃圾箱的陈腐臭气、匆匆去上班的打字员身上散发出来的廉价除臭剂味、律师抹的须后水的酸味、人类暖烘烘气息的臭味——一大群身份不明的人类被从想象中安稳的床上拽到了生存中另一天的日光里。这种外面的空灵和我内心的空灵相呼应。空灵是我遥远的爱人。唐璜[1]将他的爱传递给他的安妮塔。

---

① 唐璜：西班牙传说中的人物，为许多诗歌、戏剧和歌剧的男主角。



这一次，好像存在着一个扰人的东西，我抬起头，环顾四周。很快，我就发现这股异样能量的来源——客人正站在阳台上，倚着栏杆。他的存在是那样的生硬而清晰，以至于虽然隔了段距离，我还能辨得清他手里的玻璃杯里还剩多少咖啡。

在我看来，似乎不美丽所感到的痛苦要比美丽所带来的快乐强烈得多。其实，在我看来，似乎任何痛苦都要比任何快乐更为强烈。要是我没有意识到客人对于人体眼光敏锐观察入微，我的脑子就会轻松些。现在我只会边继续走路边内心发颤，想象着他的眼睛随意而无聊地审视我的身体。这么些年里，我使自己变得很中性，我觉得我周围已形成了盾牌保护我免受他人的注视。我沉溺于一种神奇的感觉：如果你停下来不想你自己的某样东西，别人也会这样做。这是个资质不高的孩子的幻想，相信其他所有人都高兴和她玩自欺欺人的游戏。有时能成功。其实，几乎总是很成功。大多数时候我不是个女人。我是个生物。但此时，这个龌龊的客人站在阳台上，他不知道游戏的规则，正在从背后审视着我。我记得打的去卡秋莎家的途中他是这样向我描述她的，仿佛那时我是个需要知道关于未来情妇情况的男性朋友。我自己也在她真的出现时据此仔细打量过她。我从来没想到过客人会看起我来好像我是女人中的女人，有屁股，有乳房，有步态。这儿，我正走下街去，暴露在他的注视之下，没有任何遮蔽的可能，而他，无聊而倦怠，继续用不善的眼光观察着我。

我僵硬地走着，弓着肩，背部的肌肉紧绷着。要是我能，我就会抓住客人，把手指头戳进他的眼睛里，把滑溜溜的小眼珠扯出来，砸到墙上去，到那时甚至还不罢休，还要再继续在他眼窝里掏呀掏，确保里面什么也没剩下，连一点他用来看的视觉组织碎片也不留下。对他的恨使我窒息。我是只丑陋的小蚂蚁，在什么都看得见的上帝注视之下，你无法逃避那种注视，它将你置于宇宙的显微镜下，把你放大数百万倍，不放过一个无意识的肌肉颤抖。

尼哈玛那硬邦邦的胳膊肘猛地一戳打断了我残酷的思绪。在几十米远的地方，在路的另一边，吉第·伯查科和他的狗出现了。我知

道狗的一点——它的眼睛总是很警惕的。如果我看见了它，那就意味着这种注意是相互的。当我们两大阵营在路的两边相对而行，距离缩短到可以进行目光接触时，我把渐渐模糊的客人的注视撂到一边，开始在内心里为即将临头的狗的攻击做准备。爆发前所剩的时间使空气中充满了一种密集的白光。这种光的透明使任何隐藏的东西、任何通常被我有选择性的眼力压制住的东西都暴露了出来。一个蓝眼睛的小个子老人弓着背站在附近一座楼的入口处，他那茫然的目光迷失在街上炫目的阳光里。他裤子前部的纽扣解开着，露出一根长管子连接着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面装了一半浑浊呈橙色的尿液，像个军用水壶挂在他的皮带上。离他几步远的地方站着个疲倦的菲律宾女佣，在她费力打开那位老人的轮椅时，肿起的脸上满是劳动时的专注。他等着她，试图将眼光投注在她身上——这种注视宛如一只没了翅膀的苍蝇，在龙卷风般无法控制的现实中令人眼花缭乱地旋转。吉第·伯查科和他的狗慢慢朝我们走来。我们向他们走过去。

两个年轻姑娘从我们旁边走过，显然，她们是去茨维氏表演学校。金发的那位长着张饮食过量的圆脸和柔弱的下巴。她一手提了个小箱子，另一胳肢窝里夹着像是一叠剧本的东西。另一位，个矮活泼，满头卷发，手里拿着个漂亮的皮耶罗①面具。我的眼睛紧盯着逼近的狗，耳朵却抓到了她们的几句对话。是那位卷发姑娘的声音。“每当人们说‘悲剧英雄的骄傲’，听上去就好像跟性交、阳具之类有关。”

她们走到我身后去时，金发姑娘爆发出了粗鄙的大笑。

除此之外，在我意识的后面空间的某个地方，是客人那红外线般的注视。

最后一道屏障，21 路公共汽车，遮住了狗及其主人片刻的工夫。在那布满灰尘的车窗后面，我瞥见了去伯尼－布莱克②的信女们的假发。一阵响亮的废气排放结束了这段隔开的时间，几乎在与发动机噪音远去的同一时刻，狗吠开始了。这些吠叫是故意的、有规则的。它

① 古法国哑剧中的白衣丑角。

② 伯尼－布莱克(Bnei-Brak)：以色列城市名。





总是在吠叫的变化中遵循着严格的规则，好像它在指挥交响乐团。小心不让自己的力量开始时就耗尽。母亲加快了脚步——她急切地希望这件事情能很快干脆地过去——而不打断她正在给尼哈玛讲的故事，一个奇迹般被忘却直到现在还没讲过的故事，讲的是她年轻的时候曾有机会去听著名的库茨维勒亲自作的关于阿格农[①]的讲座。她俩加快了步子，当然我就落在了后头，脸红红的，全身冒着当日的第一次汗。

但我却畏缩不前。我渐渐慢了下来，直到我和狗处于一条直线上。在路的两边面对着面。攻击者对着受害者。我将头转向我家那座楼。一棵大榕树挡住了客人，但不管怎么，他是在那儿的，就存在于我呼吸的空气中。一堆原子突然附着在空气分子之上，形成了新的混合物，这种客人的混合物，我除了吸进肺里，别无他法。

吉第·伯查科把牵狗的皮带绕在手上。他有意地一圈圈绕着，仿佛缩短皮带使他更能控制住事态。这对他也是常有的事。我恨恨地看着他。狗娘养的同性恋，让我们看看你追埃及人。我们是对手。我们是搏击场上的斗士，各自有着凶残的外表。如果我们能的话，我想我们会大声谩骂着走进搏击圈，向对手挑衅。

我停了下来，脸转向狗。它马上察觉了这个变化，开始把它的主人往我这边拉。吉第·伯查科又在手上绕了圈皮带。这现在已经比较难办了——狗在前面拽着。我看见伯查科手臂上的肌肉因用力而隆了起来。我内心中毫不怀疑他真的是想放开那动物，让我们在路当中相遇，就像两个大家已预先知道拼杀结果的角斗士那样。一方是英俊的罗马人——狗；另一方是皮包骨头、丑陋的塞西亚[②]人或埃及人——我。事先知道的死亡记事。我的死亡。

但是作为弱者、命运注定了的人，他的绝望会产生不为那些扬扬得意、自我满足的强者所知的力量。受压迫者这股仇恨的力量创造过

---

① 阿格农·希穆尔·约瑟夫(1888—1970)：波兰裔以色列作家。用希伯来文写作，其戏剧小说包括在《夜晚的客人》(1939年)。他于196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② 亚洲与欧洲东南部之间的地区。

历史，产生过革命。我满是仇恨。我开始朝他们迎过去。慢慢地，一步一步地。

狗叫得更响了。数秒钟内，声音就会增强至通常形成高潮的最高点，几近嚎叫，它会持续到嗓子疲乏为止，而我则会被母亲和尼哈玛一人牵一条胳膊转过拐角进入到一条友好的街上，那儿通行的是顾及像我这种情况的人们的其他规则。

我继续迎上去。

一辆过路车急躁地鸣着喇叭：这不是行人过马路的地方，女士。我知道。我又迈了一步。我盯着狗嘴那黑暗的里面。在那热乎乎、湿兮兮的黑暗深处，狗舌头因急切和愤怒而颤动，我又上前了一步。我的步子是精心考虑过的，既不慢也不快。如数学般准确，精确无误。每走一步，我变得更加平静。我不再去想吉第·伯查科那恶意的用心。他戴着小眼镜，时不时地将眼镜在鼻子上扶正，那样子差不多打动了我的心，好像他是这儿受到攻击惊吓无助的人。我继续前行。我们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一分钟。一分钟后就会发生。我将站得很近。几乎碰上。然后，它就会跳起来，用前腿和肌肉发达胸部的所有力气将我扑倒，并把我的脸，这张以色列版的弗拉基米尔市的圣母玛利亚脸，从头颅上撕下来。而我，在仍然活着的每一瞬间，都会跟它搏斗，直到最后一口气。我要双手抓住它的嘴巴，将它臭烘烘的胃扯开。我的失败将会比它平庸的胜利更加辉煌。

一步又一步。做最后的准备了。我目测了剩下的距离。我留意着向前的路，引领着自己。闭上眼睛。再走一步。我这时就像待在一个距目前状况遥远且不相干的玻璃罩里，听到了母亲和尼哈玛的声音。苏珊娜，你要去哪儿？你在干什么，孩子？到这边来。我来对付他们，这温暖的保证就像她们发出的誓言。我把她们从脑子里推了出去。只留下它的叫声。那才是唯一要紧的，我和它。我又走了一步。我感觉到了它近前来的热气。有一次，那是千儿八百年前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像这样站在开着的炉子前，闻甜饼的香味，让热气烘烤我的脸，一直到我受不了了才将脸转向房间里凉爽的地方。此时敌方的热



量传遍我的全身。透过我的胸部，我的臀部。有东西在我的两腿间收缩，就像个小动物。一个硬邦邦的吓怕了的小蜗牛。我想起客人的面孔。他那弯曲的上唇，他那湿润具有挑逗性的下唇。再走一步。又一步。最后一步。我内心有种来自上天的声音。上帝的声音。指挥官的声音。

那是客人的声音。

一个意思集中的短词，就像一颗从毛瑟枪射进我冒着汗的太阳穴里的子弹——行动！

我睁开眼睛。

我就像个贝多因人[①]那样蹲在狗面前。它仍在发着断断续续的嚎叫，用闪烁着好奇的黑眼睛盯着我。我想我是在哭。眼泪淌进我的嘴里，沿着脸颊淌到脖子里，与汗混在了一起。我们处得这么近，我都能闻到它的味。一股浓烈的狗味。模模糊糊地，我看到吉第·伯查科穿便鞋的脚。我看着狗那宽阔的方脸。它是黑色的，脖子到整个肚子这一段是块茶色的斑。它竖起一只短耳朵，向左肩一侧歪着脑袋。是个长得过大的笨狗娃。它喘着气。我就正对着它。没什么能改变的了。我又闭上了眼睛。我静静的气息碰上了它热烘烘蒸汽般的气息。那充满了肉味的气息。这厌恶的感觉差不多令我很愉快。很放松。给人以美的享受。什么潮湿而粗糙的东西在碰我的脸，滑过我的脸，用一个黏糊糊冒热气的物件湿润我的脸。我睁开了眼睛。它那紫粉色的舌头正在舔我的脸颊、我的眼睛、我的下巴。这将是《国土报》上的头条新闻：在拉马特甘，有妇人和库茨维勒生养的洛特维勒犬有性关系。再另外拘留48小时……

母亲和尼哈玛的声音更加清晰了。就在我后面很近的地方。我向吉第·伯查科抬起脸。他吓坏了，脸色绯红，他扶了扶鼻子上的方形小眼镜。他向母亲和尼哈玛说着多余的安慰话。牵狗的皮带仍像根弹簧般紧紧地缠在他手上，现在已是没有必要了。狗不舔我了，发

① 贝多因人：一个居无定所的阿拉伯游牧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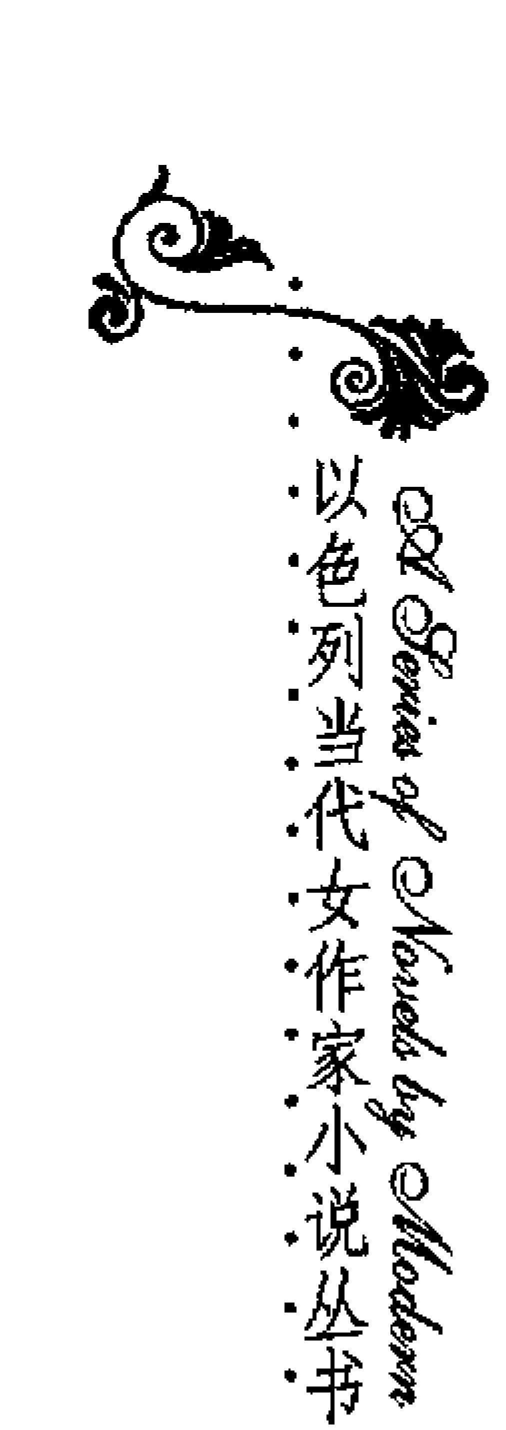
出一声无意义的小狗般的尖叫。它竖起了耳朵。

只有此时，只有此时，我才把头转向我们住的楼，准备这意义重大的会面。但阳台是空的。客人不在那儿。

就此落幕。

我们到海滩后很长时间，母亲和尼哈玛都不敢把我撂在一边，以防我再次卷到其他超出人类理解力的事情中去。她俩之间谈论着与狗的这次冒险经历，并不想从我这儿探出些有关我这种行为的隐匿动机——学术争论更使她们感兴趣。她俩甚至放弃了医疗球的游戏，坐在我脚旁色彩绚烂的凸纹布毯子上，吃着从湿乎乎的塑料袋里拿出来的温热的葡萄、杏子，时不时地递给我一个去了核的杏子或无籽的葡萄，尽管她俩非常熟悉我的饮食习惯——谁知道呢，也许这一次我会与自己苦行者般的做法脱轨。

在她俩陪着我的这段光景，我靠着茫然的凝视来消磨内心的时间——我对着海，海——我，我——海。这是苏珊娜·拉宾体验的对海洋的感情。我不耐烦地等着这两个女伴进到沙滩边的浅水中去，这样我才能真正进行思考。我知道只要她俩在近旁，她们就有可能读出我的思想。母亲这方面很有高招，有时候我喜欢要她凭意念弄弯一把叉子或者猜猜我哪只手里握着个钥匙或发夹。很显然，像我这样完全透明的人，别人非常容易看穿其思想。尤其是因为我天性如此的安安静静默不作声，这在于母亲，甚至在尼哈玛和阿曼德，已经成了一种不带竞争性的活动——来猜猜苏珊娜脑子里在想什么。“现在，她因为我杀死了只蚊子对我很生气，她很可怜动物。用来做你鞋子的牛怎么样呢，你干吗不可怜它？”（尼哈玛，这个公正的探索者）或者：“苏珊娜夏天觉得很悲伤，就像有些人冬天觉得很悲伤一样。”（阿曼德，这个苦恼的诗人）或者：“你认为如果人们看见我的胸罩，他们会在意？你错了，人们有自己的烦恼。”（我那心细的母亲，不用说）如今，甚至连客人也受到这个嗜好的感染，已经作过几个非常接近事实的猜想。所有这一切的最终结果就是使我在有别人陪伴的情况下尽可能不想任何有意义的事情。而是数羊、想数字、想颜色。



与此同时，我的贴身侍卫们已开始大量出汗，被迫缩短了愉快的讨论。她俩站起身，向大海走去。尼哈玛像小姑娘似的把泳装从屁股缝里往外扯了扯。母亲正热心地聊着。她很可能听库茨维勒教授的讲座时还多记了几个宝贝词语。现在，我终于自由了，可以投身到思考的乐趣中去了。

可能的话，我想问问客人，濒临死亡的感觉中是否有色情的成分。当我的身体在可能性极小的情况下被撕成碎片时，我两腿间熔化的岩浆般的热浪意味着什么？他这个人似乎知道如何回答我而又不会像阿曼德那样大侃性爱与死亡的关系，或者像尼哈玛那样听上去像闲扯淡似的大讲历史故事（法国贵族会在性交前缢住对方以增加快感，想象一下，艾达，人们无聊时做的事情）。

我看见母亲像个巨大的海豹弯下腰用双手往游泳衣上突起的胸罩部位泼水，这样甚至会使最年老、最耷拉的乳房也看上去像一对炮筒子。这同时我在想，跟客人谈这样敏感的话题合适吗？这些话题如此刺耳地涉及到了人体的要害部位，就像马拉[1]手拿夏洛蒂·科黛的信在血浴中扭动。一想到他显然没有目睹我与狗的那一幕，我感到一种奇怪的宽慰。我不知道是否该抢在母亲汇报之前就自己告诉他这件事，无疑母亲的汇报是不会迟缓的。我打算先不做决定，等晚上他外出回来见面时再作定夺。

海滩回来后，我们在“不骗你”超市待了很长时间。

我听着母亲和尼哈玛跟阿曼德讲我与狗的冒险经历。因为我们这位杂货商在内心深处相信自己在精神方面比两位女性朋友境界来得高，他不顾两位的抗议，盘问我这样做的理由。他温和的特点比平常更加集中在脸的中央，看上去就像只认真的树袋熊在努力地表演一个缓慢而复杂的马戏。

“可为什么呢，苏珊娜，”他充满感情地用几个手指头挤压着一袋葡萄干，“你为什么冒这样的险？要是结果不同，狗攻击了你，怎

① 马拉：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党领导人之一，为夏洛蒂·科黛所杀。

么办?”

我耸了耸肩。

“实际上她是条母狗。”尼哈玛说,这是事件结束时她从吉第·伯查科听来的情况。

“谁是母狗?”母亲嚷道。

“那条库茨维勒狗。动物不像人,雌性比雄性坏得多。她们很凶暴。这是因为她们得保护幼崽。”

“你在说什么幼崽,尼哈玛?你可见到幼崽在哪儿?有时候你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是尼哈玛表现出的肤浅学识令母亲气恼的一种情况。如此一门心思地想着现在已不再重要的这个方面——我差点被狗撕裂致死,而且是出于自愿——在母亲看来是毫无意义的,格外显示出了她朋友的自我主义。荒谬之极的是,这种自我主义的表达恰恰引起了那些成其话题的感情:雌性护卫其幼崽时的狂怒。

“这孩子仅仅是想了结与那只狗,就是那只母狗,之间没完没了的战争。这儿有什么要理解的呢?”

“那很显然。我在自问的是那母狗是否确属同性恋。”尼哈玛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改变话题的意思。“他是个同性恋,这是其一。其二,为什么她最后那么和善?”

“谁是同性恋?”阿曼德问。

“健康维护组织的诊所什么时间停止取尿样?”尼哈玛突然记了起来,问道。

“吉第·伯查科,狗的主人。”母亲说道。

“可我原以为他在正规军里待过。”阿曼德说。

“我想他们持续到十二点,不是吗,艾达?”尼哈玛说。

“什么持续到十二点?”阿曼德问。

“取尿样。”母亲和尼哈玛异口同声地回答。

“从吉第·伯查科那儿?”阿曼德问。

“干吗吉第·伯查科要尿检?”尼哈玛说,“你认为他们能治好他的同性恋?”



“尼哈玛！”母亲喊起来。

“实际上，我在等着做指压按摩疗法时，读到《妇女》杂志上一篇文章，说通过分析是有可能帮助他们不再害怕女性，甚至可以成立家庭。”阿曼德说。

“一派胡言。一朝同性恋，一辈子同性恋。而且这指压按摩疗法就跟蚂蟥吸死人血一样不管用。”尼哈玛一口气结束了一个话题，又扯开了另一个话题。

“我痔疮难过的时候还是管用的，你难道不记得了吗，尼哈玛？”母亲说。

“对于玛格利特的背也很有帮助。”阿曼德说。

“我的阿米尔勒做‘极极’。这解决了他过敏症的所有问题，虽然我认为这整个过敏症的事情就是他娶那个俄罗斯人、那个破烂知识分子时起的头。因此，要是当初他不娶她的话，也就不需要做‘极极’了。”

“你在说什么？”母亲说。

“她指的是‘太极’。”阿曼德说，“中国的健身术。”他朝我微笑。

“其实，她给我印象很好，那个俄罗斯人。”母亲说。

“你瞧，艾达，现在你都不知道自个儿在说什么了。这都是烟幕。听听她到现在做过的梦……”

我走了出去。我觉得累。很累。我这辈子到现在感觉最累的一次。我吸了两支烟。母亲最后出来想要我和她去银行，我说我得睡了，就回了家。我走进合上百叶窗的凉爽的公寓住宅，甚至没洗掉脚上的沙子就倒在了自己的床上，直睡到母亲来叫我吃晚饭。

水汽蒙蒙的夜晚进到了家里，就像个要求过分的新客人，全然不顾任何礼貌上的规矩，非让人注意不可。我趺坐在电视机前，又湿又黏，摆弄着遥控器，无精打采地决定不了看什么频道。

我们真正的客人还没回来，但我已经决定不在母亲自己说之前提到那件事。他通常是这个时间回家的。我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会谈及他这次的违反常规，可她也对这个话题顽固地保持着沉默。我知道

她和我一样等得心焦——她无法忍受任何对家庭常规的偏离——但这次她决定视而不见，表现得就仿佛一切都和往常没有两样。

客人不在家只是更强调了他的存在。我们默默地等着，出着汗，各忙各的事，我握着遥控器，她拿着晨报，这份报纸终于归她独有了，我们忍着不开始任何交谈，以防他突然中途出现打断我们。我们喝着些东西，穿上了外出时的衣服，虽然在客人来家之前，我们都习惯于在家穿随便的衣服：母亲穿宽松的睡衣，而我则穿父亲的旧衬衫。有时候，像今天这样炎热的夜晚，我们只穿短衬裤和胸罩——因为还有谁我们非得避开的呀。

母亲先说话了。当然这在她比我要容易得多。她总是有惯常的武器——担心。这个武器能使她挫败任何想瞒过她无所不见的眼睛的企图。这个武器像十字军战士的剑一样有理有力。

“我不知道尼奥今晚在哪儿。”她从报纸后面吐出这句话来。

“他在海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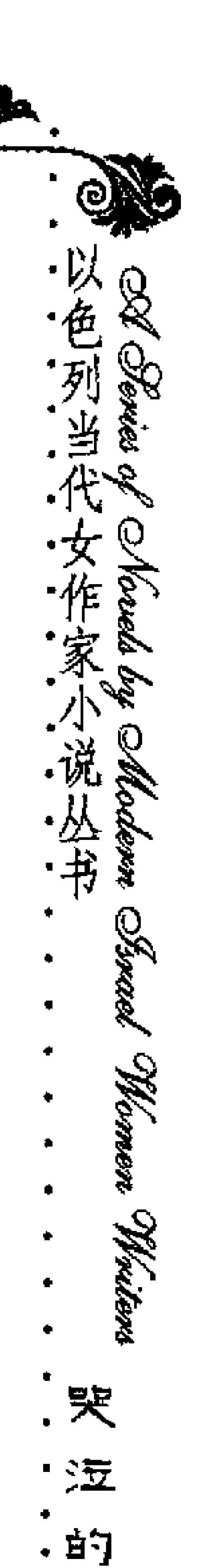
“我知道，但现在已经很晚了。”

我不说话了。我不想暴露自己。

“实际上我是开始有点担心了。”

我站起身，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杯牛奶，享受着从冰箱里吹出来的凉气。我在那儿站了几分钟，看着那明亮而凉爽的冰箱内部，仿佛它是张有白雪覆盖山峰的瑞士风景明信片。冰箱的确有点像小瑞士，干净整洁得纤尘不染，且有空气调节。要是母亲死了，我突然想，我就取出所有的东西，自己整晚上坐在里面，吸着烟，愉快地观察外面的炎热，就像天冷下雨时人们喜欢舒服地坐在家里，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享受来自于与那些楼下街上在水洼间跋涉的湿淋淋的可怜家伙相比他们所拥有的好运气。

但干吗她该死呢？我马上被恐惧所笼罩。是什么使我产生了这么个念头呢？对我来说幸运的是，我还没能为这邪恶的下意识念头折磨自己，母亲来拯救我了，她用最大的嗓门从客厅往这儿喊：“关上冰箱，苏珊娜，别站在冰箱前面祈祷了。这样伤马达，我得跟你说多少



遍啊?"

我走出去,在阳台上喝牛奶。街上空无一人,但所有楼房的窗户都亮着灯,散发出家庭生活的一波又一波——电视机的响声、孩子们的尖叫、模糊不清的几句对话、碟子的当啷声。空气中充斥着浓烈的烧菜味。我数到一百,等着看客人那瘦削的身影转过拐角。他没来。我记起他是开卡秋莎的车去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他的女朋友。要是,他干吗选择跟我们待在一起,而不是跟她,而且他干吗带我去那儿时尽量避免亲密的情形?但从另一方面说,我对这样的事情懂得很少。人们之间所发展的各种复杂关系,其意义我是无法理解的。关系有成千上万种的原因和潜在的意思。就像我自己的关系,尽管它们很少。客人实际上爱别人吗?像他这样可爱迷人的人,就他而言,爱的想法看来是不进入到这种关系里的。

而我呢?我爱任何人吗?当然,我爱母亲。爱父亲,在他活着时。或许,以某种奇怪的方式甚至也爱尼哈玛和阿曼德。但这是平静的、日复一日的爱,与生活本身密不可分,就像呼吸空气或消化食物。这跟选择无关。我是慢慢渗入这些爱的。它们完全缺乏不期而遇的成分,完全缺乏那种神秘时刻的成分,这时的一个陌生人会由于一个深不可知、出离任何逻辑系统之外的选择,突然间摇身一变,成了某个关系密切的人,某个我的人。一辆车的前灯打断了我的思绪。有一会儿,那车似乎在我们楼外慢下来,但又开走了。我回到了客厅。

我们默默地观看"探索"频道上关于灾难的节目。火山爆发、龙卷风、火车相撞。经验有素的救援队把那些行将淹死、身处火海之中、埋在瓦砾堆里的人们救出来。母亲沏了茶。她递给我杯子时,身上的一股汗酸味飘了过来。我想象着自己身上闻上去也不见得会好些,但一想到要冲个澡就感到战栗。屏幕上,一艘赛艇冲进了正在岸上悠闲地站着观看的一排人中,这时,我突然想"也许客人已经离去了。永远离去了",这个念头很清楚。冒出来的与其说是个一时的想法,不如说是个确凿的事情。他走了。消失了。自然,他是不会让我们预先知道的。这是像他这样的人出现和消失的唯一方式——意想不到。与先

前的事情毫无关联。就像个大坝由于一系列复杂的物理定律从内部的作用，在一个寻常的午后突然裂开，直到导致坍塌为止，预先没有任何迹象的显示。一种机遇的先兆笼罩着客人的存在。他本身就是机遇。在过去，当机遇撞击我的生活时，我拒绝像这样接受它。我得在思想的逻辑区域里查找它的位置。我相信在机遇的发生里我起了作用。事情发生是因为我好或是坏。奖赏和惩罚。真奇怪甚至像我这样的人身上，怎么也会有个不可思议的信念控制着生活。但其实，客人的出现跟我行为好不好并无关联。我既不是圣人也不是罪人。他就这么来了。而现在他就这么走了。

我看看母亲。她在吃小甜饼，碎屑粘在她的上唇和下巴上。我内心满是怅惘，并且还在扩展，其中心就是这个认识——像颗豌豆在一张巨大的嘴里滚动，敲击着四处，被弹到东弹到西，发出刺耳且持续的声音——他不回来了。

我走进客人的房间。想亲眼看看我心里已经知道的事情，而且只有到那时再去告诉母亲。电灯开关一打开，亡父小小的殿堂就展现在眼前，这个地方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已转化成了客人的私人领地。房间看上去似乎一会儿前才被离弃的。床没整，凌乱的桌上堆放着磁带、烟灰缸、报纸和硬币，旅行袋立在房间中央，里面的东西都散了出来。一件件的衣物到处都是，破烂的牛仔裤和用过的毛巾挂在壁橱门上。立体声音响系统的那些小方匣子从床底下露出来。虽然一切都有力地表明他的存在，我仍像个要淹死的人抓救命稻草一样坚持自己所相信的事。他不随身带走任何东西？那很符合逻辑。甚至是可料想到的。他不是那种将自己的东西从一地运往另一地的人。他没理由离去？我怎么会知道？也许当局已经发现了他的非法活动，也许尼哈玛是对的，他在干着偷窃或走私的勾当。或许，他和那对他去看收藏的兄妹间突然冒出了重大的关系，或许在我看来很突然的事实际上是预先计划好的事情发展之链上的最后一环。我向床铺走过去。那件他早晨穿过的汗衫躺在那儿，里朝外翻着，皱巴巴的，像个睡在主人床上的小动物。我拿起来，连自己都不知道在做什么，就把脸埋在了



里头。汗衫里满是他的味——这个味我已经很熟悉了但从没有如此近切地闻过。一种强烈的感情吞噬着我，几乎使我受不了。洗衣粉味，好闻的汗味，烟味，某种男用护肤液淡淡的味以及其他辨不出是什么动物的味。我得坐坐，使自己平静下来，恢复恢复理智。我继续将汗衫紧贴在脸上很长一段时间。他走了，走了，走了，我心中有个声音在欢呼，而这种喜悦之下有着一丝的惊恐。如今，我没什么可害怕的了。那种危险，其性质我并不真的懂得，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个家又是我的了。再没什么会挡在母亲和我之间。现在，我不用再帮别人在她面前保守秘密了，不用再担心他们在我背后谈论我。我多强大呀，除了她我不需要任何人。我的新朋友走了，我不在乎，我压根不在乎。甚至连一点出于礼貌的遗憾感觉都没触及我强健的心脏。要是我喜欢——我能整天光着身子在家里到处走。我能在电视机前吃东西。我能开着门小便，还和母亲继续着谈话。我能重新得到失去的隐私。

我站起来，关掉灯，轻轻地合上门，仿佛他在那儿，正在睡觉或者看书，我不想打扰他似的。

"他走了。"我用通知的口气宣布道。

"你说的'走了'是什么意思?"母亲将茶杯放到小茶几上。"去了哪儿? 他在海法。"

我摇摇头。

母亲皱起眉头看着我，好像我在说蠢话。"我看了下他的房间，一切都很正常，所有他的东西都在。究竟是什么把这个想法放进你脑袋的?"

"我也看了。一分钟之前。我现在告诉你:他走了。"

"可他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们捐给俄罗斯移民。明白吗? 他离开了。永远走了。"

我的话听上去一定毫不含糊，她便没再问我什么，我们俩一起去查看他的房间。

我们站在门口，小心地不去碰任何东西，好像这是个犯罪现象。

仔细地检查了我自己已经看过的一切后，我们回到了客厅。

“可他并没有说……”她开始说话，但我看了她一眼，她便沉默了。我为她感到难过。她看上去完全迷糊了。所发生的事太乱，与她生活和思想上的有条有理太不和谐，她坐在沙发沿上，茫然地盯着前方，一脸低能儿的呆滞表情。她时不时心烦意乱地喃喃几句，然后又陷入到困惑的沉默中去了。“很奇怪……也许我们应该打电话给阿曼德，他有兄弟在警察……可你为什么这么肯定，他说过什么吗？……他的东西……”我站在她对面，摇着头，非常肯定地表示“没有”，之后，我们俩默默地坐了几分钟。

“那么，我们现在做什么？”她最后用一种更有信心更有条理很不一样的口气问道。

“没什么。继续我们的生活。”我微笑了。

“你高兴吗？我原以为你们最近成了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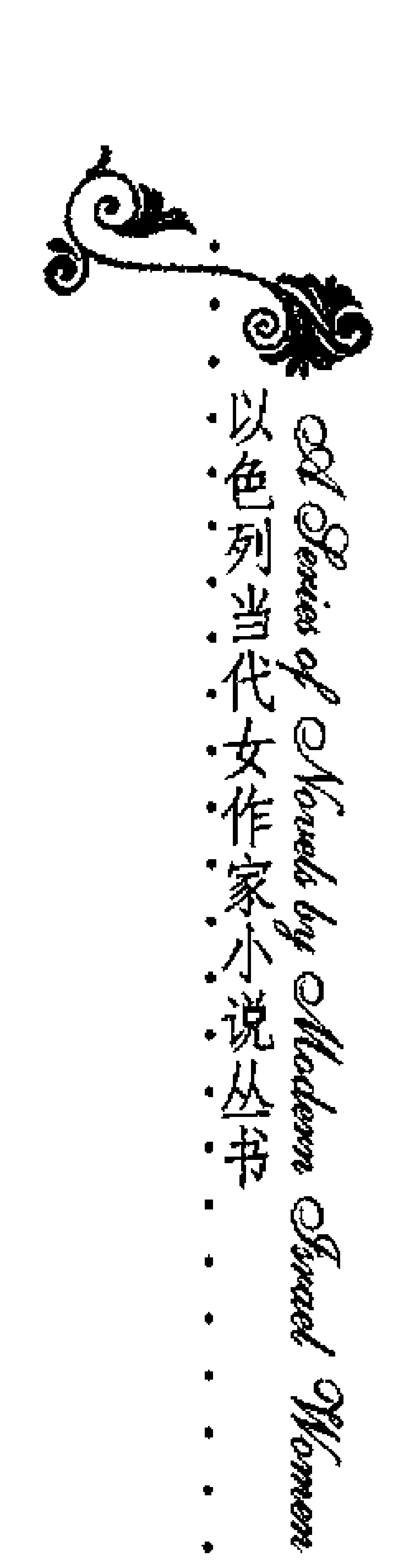
“那怎么了？我一点不在乎。看看他原来是什么样的人——甚至连招呼都不打就那么走了。”

“我不知道怎样考虑这样奇怪的行为。”母亲搓着额头说。

“别考虑了。他来了又去了。人们有各种奇特的行为。我也有。你也有。”

这番论述略微缓和了她脸上疑惑和抵触的表情，至少目前是这样。我提到的“人们”这个词，在尼哈玛的话中起着中心作用，真是万能的，能做出想象得到的最缺德的事。比方说，跟大屠杀相比，客人的不辞而别算什么呢？或者还有父亲的不忠？尽管文明靠着礼节和道德的各种原则护卫自身，这个世界无疑是人们行为最奇特的地方。

我们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深刻理解看着对方。我觉得自己很强大。我走过去拥抱母亲。我们并不确切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我们站在那儿好一会儿，彼此相拥着，就像母女团结和睦的典范。被一度在她们生活中的男人遗弃后的两个女人处在了一起。像个不会裂变的原子核最终还得一路向前。这更加惨淡地提醒我们：在路的终点等待着的是怅惘。



这个晚上再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那些继续下去似有点不自然，但同时我感到对于这个话题作任何进一步的谈论只会使我们在说不明道不白的叙述和推测中一圈圈地绕圈子。母亲建议我俩出去夜游一番。毫无疑问，她是想上尼哈玛或阿曼德那儿串一下门，跟他们仔细地讨论一下所发生的事，但显然她明白我们首先得在只包括我俩的家庭二人组里把这件事消受掉。

夜晚很热，但寂静和黑暗给了人爽快轻松接近清凉的错觉。我俩悠闲地走着，我的手钩着母亲的胳膊肘，时不时地说点无意义的话。客人的消失始终像个极大的禁忌摆在那儿谁也不提。

最后，母亲打破了这个禁忌，对她自己的思路作了一番总结。

"听着，苏珊娜，我认为他没离开。"我把手从她的臂弯里抽了出来。

她继续说，没理睬我不赞成的表示。

"你也许是对的，但眼下我不能相信。他的东西在这儿。他没说一句话。我们谈论的不是某个陌生人，是尼奥。他是家里人。而且出于某种理由，我印象中觉得他对我还是很诚实的。他告诉我许多关于他自己、他生活上的事。为什么他突然竟会做出这样奇怪的事？"

她的天真使我很恼火。"那么你该知道有些东西他没告诉你。比方说，你不知道他继父，他继父……"

一种难以解释的本能使我在最后一刻闭上了嘴。我内心的某个声音一定告诉了我，要是客人会回来，比方说在我们的来世，发现我告诉了母亲他的秘密，我们之间任何友谊的可能都将永远失去，虽说这对于我倒并不太重要。

"他怎么了，他的继父怎么了？"母亲把我逼到一个角落里，她的好奇心上来了，就像一个闻到血腥味的新闻记者渴望着消息。

"他……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谁，赫伯？你把这当做新闻？了不起的无政府主义者！开着个为非法移民作代理的破烂律师事务所，认为他在带来革命！白艾蜜告诉我有时候他们几乎挨饿，全因为他跟那些黑人和拉美人干的勾当。

他一文钱都拿不回家。你称那样的是无政府主义者!”

“母亲,无政府主义者可并不期望他拿钱回家。”我大笑起来,很高兴她吞下了诱饵。

“好了,那么他是无政府主义者。”

我们继续默默地走。

母亲说:“我该上床去睡了,可我还不累。你怎么样?”

我说:“我也不累。”

该走的路我俩已经走完了,但谁都没能想出个足够好的理由回家去,再面对这被遗弃的秘密。在我看来甚至连乐观的母亲似乎也不再完全相信我是错的。很清楚我们该等到天明,让自然给万物投上新的曙光,使即便对付最复杂的心理问题也能采取实用的办法。我俩继续在黑暗中走着,直到因想不出个解决的办法都绝望了,任由黏黏的空气和我们满身的汗水述说该回寓所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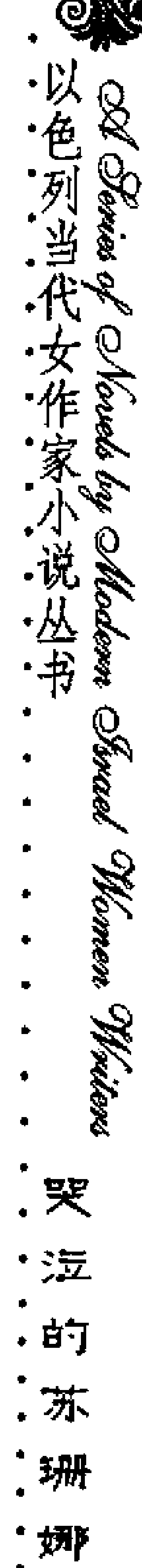
“你知道我想干什么,”母亲找到了援救方案,“你不会相信的。想泡个澡。差不多全用冷水。就坐在里面放松一下。你知道,自从他来以后,我没泡过一个澡。”

我注意到她避免称客人的名字,用这种爱的行为把他排除出去。这么看来,她在开始认同我的看法了。我想提醒她:她从来没在夏天泡过澡,但她需要的是回去体验一下家的滋味,恢复到平日的常态,而不是感受空虚的惆怅,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所以就我而言,解释是没有必要的。

我说:“主意好极了。我给你用丝瓜筋擦背。这对血液循环有好处。真开心——就你和我!”

我们手挽着手上了楼,尽管楼道很窄,我们坚持用这番身体上的行动表达我们之间的团结。

家里亮着的灯照出了内部的乱七八糟——我们出去时从不关灯。我去将浴缸放满水。用洗发水代替洗浴沫(我们认为这是件多余的东西,是从顾客手里诈钱的又一门道)。我从厨房拿了张椅子来坐下,看着洗发水的细流以其微薄的力量努力地使满缸的水起泡沫。时不时



地我把手伸进水里，将水拨来拨去，帮助这些泡泡形成像一层薄沫那样的东西。然后，我看着母亲脱衣服。我竭力不使自己感到厌恶，我担心自己会产生厌恶，这甚至会连我们今晚订立的盟约都给毁掉。我帮她进到浴缸去，让她搭着我的肩膀。她将全身的重量都倚靠在我肩上，生怕滑倒，而我则屏住呼吸，尽量不去吸进她那沉甸甸松塌塌的身体发出来的体味，仿佛这本身就是死亡之味。我看着她躺到浴缸里，她的胸部几乎完全藏在了水下，这水尽管我努力地搅弄了一番，却并没有堆起泡沫，在那些一个个小小的泡泡群之间，我能看到她水里胴体的轮廓。她让我用肥皂给她擦背，我仔细照办，毅然决然地用一块破旧的丝瓜筋擦着她的皮肤，她则引导着我或左或右，之后，她自己打肥皂，伸起手臂，在腋窝和乳房下慢慢地擦，只有在她擦拭完毕将肥皂放到浴缸沿上并闭上眼睛时，我才让过去两小时里积蓄起来的恐惧的急流从隐藏的深处喷涌出来，将我吞没，冲走那由新发现的夸大了的亲密所带来的喜悦，接着把我卷进去，就好像我自己是一小块溜滑的肥皂，可能塞子一拔掉就会在最后汩汩的流水中打转，然后消失在排水孔下面。

他走了。现在只剩下我和她了。一直到我们死的那一天。

我绝望地转向她，希望她还留有一点关于他回来的乐观看法。

“我想了想，也许他走了毕竟还是有点遗憾的。你觉得他可能回来吗？”

听到这番我破除禁忌的话，母亲平静而喜悦，仿佛她是盼着这一点似的。

“是的，我想他会很快露面或者打电话来的。”她沉默了片刻，专心地想着。“但即便你是对的，他真的走了，归根到底，我是不会觉得惊奇的。”

这可是新想法。

“解释一下。”我要求着。水里的泡沫消失得很快，我把手伸进水里想再多搅些出来。

“你知道，孩子，人们老是谈论男人们的愚蠢。可我不同意这样的

看法。我认为男人们很神秘。就像女人们一样。当然，神秘之处不同，但不管怎么说，是一种神秘。有时候我懂得多一点，有时候我压根不懂。也许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有。这家子里的男人有很多男性神秘的地方。你父亲、诺亚叔叔，现在发现尼奥也有。当然，他看上去真像诺亚，就像是一个豆荚里的两粒豆子，只是更瘦些更英俊些。再者就是他有些女性的温柔，我想是从白艾蜜那儿继承来的。无论如何，他们都想象丰富，意志力坚强，但心里都不知道怎样把事情做好。他们有着极其有害的冲动，同时也有着非常根深蒂固的某种无能。当然，不仅是在实际的问题上而且是在他们自己身上。没有艺术的艺术家性格。这是种迷失。因此，你可以这样或那样地试图对此作解释，部分解释甚至可能是对的，但我告诉你这不是'为什么'的问题，这是更为基本的东西。这里面就像爱一样，没有'为什么'。"

这席话，跟客人说过的一模一样，几乎使我欣喜若狂。我的心为渴望所炙烧着，好像谁把一个烧红的熨斗压在上面。

"那么，你怎么认为？他会回来吗？"

"当然会，你这个有意思的姑娘。自打你父亲去世以来，就老害怕人们消失。现在我了解你了。他当然会回来。我很高兴你们俩友好到了你在乎的程度。"

真感激母亲的智慧。恐惧的洪水退却了，重新沉到了我内心的深渊里。我想去拥抱她，藏在她软软的胸部下肚子上的褶皱里。她温和地看着我，不费劲地解读着我的思想。

"你干吗不进来？好好洗洗并不会对你有什么害处。这儿地方不大，但能容得下我俩。而且我可以给你洗头发。"

在她的注视下，我笨手笨脚地脱了衣服，竭力抵制着内心很不舒服的压力，然后小心翼翼地跨进浴缸，背对着她坐下来，把脑袋靠在她宽宽的胸口，感觉到她坚硬的锁骨在我脑袋上方，她的肚子和乳房紧顶着我的背。水漫出来，溅到了地上，但她说："没关系，我待会儿会擦掉的。"最后一道抵抗的防线倒塌了，我完全投入到了受她保护的美好之中去，就仿佛是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子宫，去除了最后一丝的迷惘和



痛苦。我心中的空虚变成了坚硬清澈的水晶,不会受任何的伤害。

她给我全身打了肥皂,就好像我还是个小女孩,之后,用洗发水给我洗了头发,非常小心地不把水溅到我的眼睛里去,我大笑着尖声喊叫:"哎,妈妈,住手。"她用湿手在我背上拍了几下,不让我再扭来扭去,接着,电话铃响了。

我听到客厅里母亲低声说着话,我听到她大笑,提高声音,口气中透出惊讶,然后又说话,又大笑,而我则坐着,盯着完全没了泡沫的冷水中身体的轮廓,之后,她回来了,我已经知道她要说什么了,她说呀说呀,责怪我的多疑,嘲弄她自己的轻信,笑话她自己居然差一点就相信了客人已不辞而别的样子,事实证明他只不过是给耽搁了,瞧,一切很简单:他得在海法和那对兄妹过一晚,因为他们的收藏今天不全在手头,他是个马马虎虎的人,没想到我们会着急,而我——苏珊娜——应该学会从正面多考虑一点,不要草率地作灾难性的推论,等等,等等。最后,她记起了我还坐在冷水里,便把我拉出来,用父亲褪色的旧浴袍裹住我,用毛巾擦干我的头发,然后继续毫无顾忌地滔滔不绝,等她谈完后,我回到自己房间坐到床上,看到我的手指头在水里泡得太久而皱了起来。我听到她在电话里跟尼哈玛讲整个事情的经过,然后是跟阿曼德讲,我一直坐到听见她关上了她卧室的门,我又等了一小会儿,直到我想她已经睡着了,才起身轻轻地走,踮着脚尖,谨慎得有点夸张,就像卡通片里老鼠偷偷溜进猫的家那样,我走进客人的房间,不打开灯,凭着记忆,找到了床上揉成一团的白色汗衫,拿着它又回到我的房间,关掉灯,脱掉又潮又重的浴袍,像胎儿般侧身躺下,然后把那件汗衫,犹如有着呼吸的小动物样的东西,推到我的大腿内侧,用两手尽可能用力地顶着,我把脸颊埋进凉凉的枕头里,就像头一回要念准一个词那样,我把每个音节都发得很准很慢,轻轻地说:尼——奥。接着,我又说了一遍,发"尼"这音的时候舌尖紧顶着上腭,然后收圆了嘴唇吐出"奥……"

并非情人

卡秋莎很恼火。她坐着，摆出模特儿在进行严肃的电视访谈时的姿势，时而呷一小口客人头一天来时晚上喝剩下的法国白兰地，说起话来带着俄罗斯式的悲怆，强调着一些意味深长的话，头脑简单的听者可能是听不出来的。客人把我们的好时光都破坏了。她也像我们一样，昨晚等着他。非常担心。可不是担心他！（卡秋莎的脸上流露出明显的不屑）对她来说，他跳悬崖她都不管。但因为有孩子阿瑟，应该和他一起回来。当然，她借给他那辆高尔夫敞篷车的主要原因是他答应把阿瑟带回来，他这些天跟海法的奶奶住在一起。他没在说好的时间回来，她简直要疯了。他没考虑到她的感情，就像没考虑到我们的一样，没及时打电话来说他会被耽搁。而那奶奶，打电话来要求卡秋莎遵守诺言，马上把孩子带走，因为她听到的淫言秽语多得难以忍受，而且精力也不如以前了。可这个尼奥，他在乎什么？他认为时间是虚构的，是人类的发明。幸亏她今早从格鲁吉亚人夏尔瓦（跟他做过交易的一位商人）那儿要来了我们的电话号码。

母亲、尼哈玛和阿曼德围桌子坐着，越来越着迷地听着，将盛放饼干和橄榄的碗、烟灰缸和水壶往她那边推。格鲁吉亚人夏尔瓦、卡秋莎、虚构的时间、阿瑟和他的淫言秽语——在他们看来就像是在慢慢地倒空客人的潘多拉盒子，一件件地倒出来。尼哈玛和阿曼德当然很久以前就得出结论：客人是个可疑的人物，但现在甚至连爱他信他的母亲都被迫认识到他的城府比看到的要深。感觉到质问的时候还未到，他们都耐心地听卡秋莎说完她的开场独白，之后便是有听众参加的自由讨论，这个潘多拉盒子将会大开，秘密和谎言将会大量飞出，就





像闪闪发亮的肥皂泡那样引人入胜。

此刻是正午，客人随时都会到来。卡秋莎的突然出现在这帮人中引起了相当的骚乱，也难怪——她冲进我们简陋的公寓房，上身穿件银色的紧身背心，露出犹如旋涡般的又深又带旋的肚脐眼，脚着松糕凉鞋，使她看上去甚至比阿曼德还高。她那惹人注目的外表，甚至在她还没说明自己是谁以及为什么来拉马特甘之前，就自然而然地引来了敬意。

虽然议程上的主题是客人不负责任的行为，但卡秋莎的话锋很快就转了向，谈起了小阿瑟和他的问题，她自己作为移民得在严酷的黎凡特①现实世界里做好单身母亲的问题，以及所有这些问题如何又交织在了一起。尽管大家心照不宣地同意不要在中途打扰她，狡猾的尼哈玛还是利用了说话人叙述中停顿的当口使她喝了一小口水，试图使故事又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因为有谁比她更能意识到跑题的危害？

"既然你从他奶奶那儿知道孩子一切都好，你干吗要这么担心呢？毕竟，尼奥是个成年人。"她亲切地从嘴里溜出这么个带陷阱的问题。

卡秋莎吞下了诱饵。"当然，是个成年人。可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们是他的家人。今天在这儿，明天就走了。他的事你们永远搞不明白。"

当她说"家人"时，以这个词所蕴涵的同情和理解环顾四周，朝我们所有人瞥了一眼。阿曼德的椅子发出听上去很不舒服的吱吱声。被视为客人的亲戚，即便是很偶然地，这种可能也使他战栗。尼哈玛则不同，她热切地点着头，准备为了更高层次真相的曝光牺牲掉对现有真相的忠诚。

"那么，告诉我，卡佳，他在这儿做的跟画像有关的活儿到底是什么？是符合犹太教规的②吗？"

"你什么意思？"卡秋莎迷惑不解地问，"干吗要符合犹太教规？他又不信教。"

---

① 地中海东部自土耳其至埃及地区诸国。

② 原词为 kosher，有两个意思：一、符合饮食教规的；二、合法的。故有以下之说。

“她的意思是是否合法？”阿曼德插进来说。他尽管装出一副高贵的样子，却并不反对能在一两个细节上控诉他那位男性对手的罪行。

“合法”这个词打开了卡秋莎的红色信号灯。她又严厉地仔细看了看我们的面孔，迟疑片刻，然后说：“这是什么问题！当然合法！他买卖画像。你什么意思？当然合法。”

尼哈玛的不耐烦使这番讯问比预期的提前结束。她担心卡秋莎贫乏的希伯来语知识会阻碍她的谋划，便直言发起了攻势。

“可我明白我们在谈的是偷来的画像。从俄罗斯偷来的画像。窃贼。黑手党。”

卡秋莎因为不满移民的清白受到损害而气得脸色绯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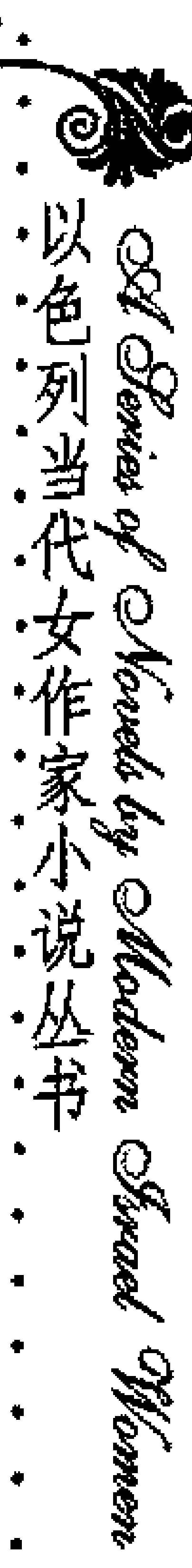
“什么黑手党？干吗一说就是黑手党？你们所有以色列人都认为凡俄罗斯人都是黑手党和妓女。这么说有多大的可能呢？为什么是黑手党？尼奥从俄罗斯人那儿买画像。他们随身带了些东西来。那怎么了？这违法么？他是个艺术品经销商。很好的职业。既有艺术性又能生活得好。干吗说是黑手党？在海法的那些人，那对兄妹，是我给他找的。一家子的古典音乐家，父亲，母亲。而且那收藏来自于他们的祖母，非常著名的歌剧演唱家。在欧洲也很有名。那么，这跟黑手党有什么相干？只有像以色列这儿的原始人，一帮从摩洛哥来的人，才会这么认为！”

“那是什么意思？”阿曼德叫起来，非常生气。他马上责怪尼哈玛把妖魔从瓶子里放了出来。“你瞧，尼哈玛，那样说话总是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听上去就像满是陈词滥调的俗闹剧——俄罗斯人是土匪、妓女和古典音乐家，摩洛哥人是……摩洛哥人！这不是文明人之间严肃的讨论，而是一套又一套的老调。香蕉共和国[①]是正确的。”

“我只是把事情直接说了出来。那些其他人认为的事情。而我得为我的诚实付出惨重的代价。”尼哈玛朝母亲恼怒地看了一眼。

“可那对父母是真正的古典音乐家。母亲和父亲。这可不是老一

① 香蕉共和国：指中南美洲发展中国家。



套!”卡秋莎辩解道。

“我不是指这个具体的例子。我是泛泛而谈。当然会有土匪、妓女和古典音乐家……”阿曼德急急地想平息她的不满。

“还有古典摩洛哥人。”尼哈玛插话道,为她的玩笑而咯咯地笑。

现在该轮到母亲来控制局势了,而她确实马上就这么做了,把双方的毛捋顺,往杯子里倒白兰地和水,把盛饼干的碗从这边挪到那边。这个关于不同社会和风俗的话题使她厌烦得想哭。她感兴趣的是客人,可为了保持在同伴眼里道德上的高尚地位,她还是喜欢把这脏活留给尼哈玛去做。可现在太迟了。开诚布公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可以看出,卡秋莎,就像尼哈玛,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既然她的信任感已经动摇,她便坐着一点一点地咬饼干,并不想出于自愿地再重新谈论客人。

“那么,告诉我,卡佳,”母亲向她转过身去,装出一副欧式的彬彬有礼,“你认识我们尼奥多久了?”

“许多年了。大概有七年了。也许少些。我记不确切了。”

“七年!”母亲对此没料到,“那可是很长时间了。”

“是的,很长时间。”卡秋莎回答道,用这个简洁的回答暗示正在谈到的这些岁月已经构成了我们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内容丰富的关系。

“那么,你们关系一定很密切?”母亲伸出了触角,急切地想了解得更详细些。

“很密切。是的。”卡秋莎仍保持着她那高深莫测的口气。

“这……这……不是很困难吗——他大多数时间不在国内,而你在这儿?”母亲隐隐地暗示她很清楚这种关系的亲密性质,语气中带着希望,希望更多的重要细节即将会以同样含蓄的方式披露出来。

“有时候很难。我习惯了。男人们来了,男人们又走了。这是他们的天性。”

母亲和尼哈玛用力地点头表示赞同。有谁能比这两个寡妇对卡秋莎如此精练总结出来的世界的样子了解得更清楚的呢?

“你瞧,那正是我讲的,过度概括。有些男人从不去任何地方。”阿

曼德辩解道。他的辩解很有道理，除了他，在证实男性忠诚的这个领域，还有谁能有这么辉煌的纪录呢？

“到头来他们都走了。”卡秋莎轻蔑地驳回了他的话，因为她对他与玛格利特生活的那段历史并不熟悉。“都走了。只有我能等。一个俄罗斯妇女的心。”她瞪圆眼睛撅起嘴巴斥责着阿曼德。

这种含沙射影的谴责极为不公，连急着想要打听客人情况的母亲和尼哈玛都受不了了。她们马上过来澄清事实。她们以一种在过去岁月中日益完善了的技巧讲述起阿曼德的婚姻及丧妻的经过。和平时一样，这两位妇人主讲着故事，阿曼德的角色则只限于纠正一些细节或对他的辉煌事迹作一番谦虚。他对这个故事的正式所有权很久以前就变得无关紧要了。他对玛格利特的爱情早已成为了他们三人集体共有的神话。支吾了一小会儿，他们的节奏和谐了，当这个或那个掌握发言权时，其他人摆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陷入沉默，然后，纠正一些琐碎的细节，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诠释。他们做起这番事来就像一个巡回讲演团那样专业，知道该如何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制造悬念，使人们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他们能有机会在素昧平生的观众面前表演，使整个房间充满了戏剧初次公演时的兴奋气氛。

而我呢？我坐在那儿一声不吭。还有什么？

几乎是偶然地，就像个小寄生虫在狗背上爬来爬去吸血之时，我得知了卡秋莎和客人间关系的真相。那么，她是他的情人。我还能认为是什么呢？为什么那样想呢？就因为他似乎对她缺乏热情和关心？就因为在打的去拜访她的路上他说起她来如此漠然？可他对待天底下的所有事物都很漠然。而且在他到我们家的第一个晚上，我自己就已发现，他往往把他自己、他的生活与更深厚的情感分隔开。当我不想看见什么东西时是多么的盲目呀！尽管我知道自欺的程度以及各种没完没了的诡计，我惊讶地发现，事实在我面前是如此的明白，只是我顽固地拒绝承认它罢了。这个事实多么清楚——一直到它开始威胁我的希望和幻想时都是如此，而我则囿于自己幼稚奇怪的愿望，想让现实屈从于我谎言魔杖的指挥。



真是个傻瓜。"'爱'这个词跟他无关。"我轻蔑地向自己引述着自己的话。而我对于爱又知道什么呢,它跟谁有关,又如何有关呢?爱的声音、滋味和色彩我又知道什么呢?那些无穷无尽的含义?而我怎么会知道呢?从书本上?从诗歌里?从希腊神话中?从与六十五岁的母亲同坐在浴缸的体验中?从阿曼德给我上的法语课里?从将汗衫推挤到我两腿之间?这跟别人的爱有什么相干?我与外面的世界及其无限风光又有什么相干?

当然,他是卡秋莎的情人。那种他试图制造的印象——她对他感兴趣,而他则竭力摆脱——只不过是表明生活并不真的触动他的又一方法,是他随意使用的诸多方法中的一种,以此来保持良好的形象:不与人同流合污。他就法律上的问题帮助她,从纽约给她的儿子带药。她把自己的车借给他,用昵称来叫他。一切都透出家庭、密切和亲热的味道。况且,为什么不呢?卡秋莎这么美丽。如果我能为他的英俊所躁动,他为什么就不该对美丽的女人有同样的感觉呢?是呀是呀!对卡秋莎,那充满了感伤、两腿修长而又诡计多端的卡秋莎。卡秋莎那经验丰富的身体上的每一根纤维都与生活紧密相连,浑身透出的女人味谁都不会视而不见。当然,他是她的情人。世界的这番景象,是我,苏珊娜,出于某种原因所不愿意看见的。

我走进自己房间,凝视着外面丑陋的街道。我试图从客人的角度看这熟悉的一切,就像他初来时我所做的那样,只有那时,我才把注意力限制在了家里那些似乎羞于暴露的东西上——洗澡间、屋子、母亲的腿。作为人我能勇敢地直面现实,但视野之窄并不能为我增添任何光彩。而其余地方又怎么样呢?那整个的拉特马甘怎么样?街道凋敝破旧、沉闷乏味,甚至连贫民窟的丰富多彩都没有。我又怎么样呢?——弓腰曲背、心灵扭曲、神经兮兮。还有我们那帮怪异的朋友以及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不错,我们归根结底都是在向死亡进发,被一只冷漠的手就像扔石头那样抛入生活的深渊,但有些人在行进过程中,起到了晶莹闪光的花岗岩碎片上阳光光束的作用,而对于另一些人,这深渊之壁是布满灰尘的黑色玄武岩。

要是他不是卡秋莎的情人？那又有什么不同呢？我干吗这么心烦意乱，好像我俩，她和我，在作为对手竞争同一个奖项，并且可能最优秀的女人会赢？又一个傻乎乎的设想。我有什么权利因为想到他属于另外一个女人而恐惧地退缩？仿佛，要不是她，他和我就会像特里斯坦和伊休尔特①那样热烈相爱，在各自汗津津的床上受折磨，都为赶不及即将到来的幽会而发疯。

还有一件事。那孩子。她说和他认识七年了。孩子六岁。他称孩子为魔鬼！欺骗加欺骗。他对所有人撒谎，我为什么该是个快活的例外呢？

我是个天真轻信的老小孩。又老又轻信。多么令人讨厌的结合体！我是百货公司里的售货员，浪漫小说看得太多，所以中了毒。多难为情！这是耻辱中最糟糕的耻辱——一个人受自己的辱。我那浪漫的希望从含糊不清中脱离出来，以一种令人可怜的廉价直露露地摆在了我的面前。

但我恨的不光是自己。我并没准备不战斗一场就去死。就像与那条狗的对峙一样。我觉得有必要把说谎者和他情人的脸面撕个粉碎。去羞辱他们一下，就像我遭到羞辱一样。而且即便这种羞辱只发生在我的脑袋里，我也要使它成为完全彻底、极具毁灭性的奇耻大辱。我要做给他们这些肮脏的说谎者看看。我要用可怕的念头想他们。用那些令人厌恶的念头。我要把他们在我脑海里当做垃圾，剥去他们的傲慢，将他们身体上的缺点、黑痣、毛发、牙齿里旧的填料、脚上的鸡眼通通暴露无遗。也许我和哈诺奇·列文②话剧（那是我和母亲及尼哈玛一起看的，他们哄然大笑时，我却在一旁号啕大哭，甚至在演员们鞠躬谢幕时也如此）中的女主人公一样丑陋可憎，也许我是女性痛苦的化身，可那也是我的武器。我要将我思想的锋利匕首深深地刺进他



① 特里斯坦是亚瑟王时代传奇中的人物，一名骑士，爱上了与他的叔叔康沃尔国王马克订了婚的爱尔兰公主伊休尔特。

② 哈诺奇·列文（1943—1999）：以色列最重要的剧作家、导演和诗人，一生共创作了50部戏剧作品。



们的肉体里。他们真讨厌，真讨厌。是的是的，他们也是一样的人。他们拉屎，他们拉尿。他们腋窝里长毛。他们穿上昂贵的裤子在世人的眼睛面前遮羞。他们出汗、打嗝。瞧，卡秋莎睡在黑缎子被褥里放臭屁；瞧，客人弯腰坐在马桶上，撕下一片卫生纸……

而他们在一起时怎么样呢？那是最为恶心的。他们像猪一样舔着彼此，闭上眼睛不去看那些脸上的粉刺、鼻子上的黑头、鼻孔里的黑毛、耳朵里的污垢。瞧，在接吻中他们闻到上一次吃饭时粘在牙缝中食物碎屑的味道，瞥见避开世人眼睛的长着毛的黑痣。这儿卡秋莎仰面躺着，她大腿上的脂肪晃动着，颤抖着。她那松垂着的乳房晃来晃去。此刻，她呻吟起来，用她那奇特的俄罗斯口音，噢——噢——噢，我受不了了，噢，卡秋莎受不了了！噢——噢——噢！

客人呢？那比较难。但他也令人恶心。他趴在她上面，就像实验室里剥了皮的动物一样摇摆，上去下来，上去下来……

卡秋莎是比较便于想象的人物，很容易被我欺负。可客人，那么优秀、英俊且讨人喜欢——我也成功地摧毁了他。我将他的灵性、他的智慧、他那时髦的孤傲撕了个粉碎。现在他只是具肉体。一具发臭了的人的肉体，一具死亡每天都要来挨一下使他离最终的腐烂更近一些的肉体。一个凡人。

尽管在这么想之后心中充满了厌恶，我倒开始平静下来。我觉得在我的肩头、鬓角和后背的上部有种从紧张中解脱出来的温暖感觉。我均匀地做着深呼吸。那么，我现在做什么？生活，我用当初想象客人自顾自离去后母亲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时我跟她说的同一个词回答自己。我从书桌抽屉里取出素描本和一盒炭笔，把蓝花瓶放在面前，开始作画。

傍晚的时候，客人才到家。这之前，母亲已经为在这儿的每个人临时准备了午饭，在大家动手清了桌子洗了碟子之后，我们这一小帮刚才又是要打动卡秋莎又是要讯问她的人，现在都变得倦怠了。有陌生人参加日常的活动所带来的新鲜感已经消失殆尽。客厅里又恢复了那种彼此认识的私人俱乐部里的宁静，我们都舒舒服服地安顿停

当，等待客人的到来。卡秋莎随着时间的逐渐流逝，一遍又一遍地驳斥着客人关于她缺乏幽默感的言论，她把松糕鞋脱掉，躺在沙发上用法语和阿曼德交谈，时而爆发出一阵狂笑。母亲和尼哈玛玩娱乐影视界方面的"微迹追踪"。而我，虽然暗怀着耻辱却决意要活下去，占据了我在小凳子上的位置，给同伴们画像。现在轮到尼哈玛了，她与众不同，对我做的事很在意，想要表现出真正模特的职业水准。她的脖子向一边僵硬地伸着，仿佛是个脑瘫患者。她不转过脑袋去看牌，却将牌拿到眼睛前面，面带贝拉·路高西①在一部恐怖电影中的表情，半眯着眼睛看，生怕做出多余的动作。这使得画她很困难。画像看上去很呆板，尼哈玛的脸扭曲着，不成比例。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自己画下去。我的目的是为了治疗，而不是艺术。

客人回来了，背着阿瑟，很是自负，蛮有把握会有人急切地等着他。我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我想要保存他在我恶心的幻想中出现的形象。冷淡、可憎的一个陌生人。他一进来，房间里悠闲自在的这份和谐被打破了，每个人马上都从待着的地方走过去说话。卡秋莎夺过阿瑟，急速地说着俄语，吻着他的脸，仿佛他是被从死亡线上救出来的。母亲连续问了几个有关他旅途的毫无意思的细节问题：海法出来路上有没有交通堵塞？到那儿多少时间？回来呢？天可热？之后，她便详细地描述起我们根据苏珊娜认为他不辞而别的极其可笑的推断而产生的想法和忧虑。尼哈玛富有感情地汇报了与母亲的忧虑相关的自身感受。阿曼德因被发现亲密地坐在卡秋莎旁边很是尴尬，他跟客人握了手，告诉他一些他们原先发现彼此都认识的某个熟人的事情。

我固执地仍不肯抬一下眼皮，继续忙活着已经画完了的速写，用指头擦着浓重的线条，给眼睛周围安上皱纹，给鼻子打上阴影，但是客人叫我名字了，当我向他露出冷冰冰的脸时，他朝我随意地眨了下眼

① 贝拉·路高西(1882—1956)：是历史上众多扮演吸血鬼德古拉伯爵的演员中最成功的一个，他主演的《吸血鬼》(1931年)被认为是以吸血鬼为题材的影片中最深入人心的一部。





睛，不经意间显露了我俩的关系。他疲倦的时候还是那么英俊，尽管头发乱糟糟的，衣服看上去和他经过旅行之后一样疲劳。我很快垂下了眼睛，继续盯着手上的画，与我的周围脱离开，让房间里的乱哄哄慢慢变成远方蜂窝处的嗡嗡声，我等着恰当的时机可以起身，不被人注意地退回到自己房间里去。客人瘫坐到沙发上，像个赤身裸体的玛雅人，同时回应着每个人——谢绝食物，同意要咖啡，考虑是否要小甜饼，要烟灰缸，汇报旅途和海法奶奶的情况，赞美尼哈玛的新发型，抱怨累得要命；还讲述旅行中的故事来逗乐听众，以嘲弄的口吻提及修复家瓦弟姆，描述那家有收藏的兄妹。母亲已经第 n 次准备了新的一轮茶和咖啡，晚上变成了临时准备的小型晚会，我当然不掺和其中。

我对被忘却很是感激。我可以像棵盆栽的植物一样继续坐在角落里直到夜晚的结束。我什么也不想要。我坐在昏暗角落里的凳子上是多么安全，在场又同时不在场。我很快又专心筹划起做一系列新的玩偶来——一个小动物园，尽是我最喜欢的书里那些虚构的生物。狼人、爱丽丝仙境中的动物、北欧神话中的洞窟巨人和小妖精、半人半马的怪物和人身牛头怪物、凤凰、海妖和吸血鬼。我不知道是该用巴黎黏土、石膏还是非莫软陶、石膏做，是要涂油彩还是保留其天然状态，是要做超过十厘米高的还是给自己以新的挑战——做微雕。我在这自由自在、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溪流上快活地飘荡，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内部世界里，直到客人的声音在我脑袋上方炸响，犹如晴天霹雳，粗鲁地将我唤醒。我的眼睛从素描本移到了地板上，看到他的光脚站在我旁边。

“苏珊娜，mon Dieu[1]，你这一个多小时到底在画什么？”他说道，还没等我抬起头与他的眼睛相遇，他就像小偷般灵巧地抢过我手里的本子，看我画的画。他停顿了一下，欣赏着所有眼睛一齐疑惑地转向他的状态，然后以滑稽好笑的吃惊样子看了我一眼。

“这是谁？尼哈玛？老天，她怎么了？得了皮肤病？”

---

① 法语，意思是：我的上帝。

他又仔细看了看画，摇摇头，然后，带着同情的微笑叹了口气，用法语说："Ce n'est pas facile la vie d'artiste[1]. 对吧，阿曼德？"并把本子还给了我。"不用担心，你会行的。"

自我们见面的那天起，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地恨他。我立刻成了注意的中心。每个人都想看那幅画。卡秋莎瞥了一眼，马上转过脸去了，生怕让她发表意见。尼哈玛开始大声抗议在审美方面对她的不公正。母亲提到了我更为成功的作品，阿曼德那树袋熊般的脸上露出了最温和的表情，同情地眨巴着眼睛，好像在说：别去理会。凭着困兽的本能，我去到厨房里，这是逃亡最近的路，嘴里含混不清地咕哝着，丢下那幅出丑的画，将其余的画紧抱在胸前，生怕我的心会冲破凹陷的胸口那薄薄的壁，撕破了流着血滚到房间的中央，暴露在每个人的眼前。

我在厨房的桌子旁坐下，整理那些画和炭笔，接着我听到了窸窸窣窣的声音，阿瑟正站在冰箱和绿色塑料蔬菜架之间的角落里，背靠着墙。我们的眼睛相遇了。孩子不自在地扭动着，将他的重心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我很快明白了他的问题。现在轮到我指点他蜥蜴大阴户是什么意思了。

"你急着要尿尿，是吧？"

孩子不做声。

"你当然急着要尿尿。但你难为情，不敢穿过客厅到厕所去。"

他越来越不舒服地改变着重心，然后不动了。

"我完全明白你的问题。其实，我甚至还能帮助你，如果你保证乖一些，不骂人，不押着韵说话。你是什么，一个傻瓜？不是，因此表现得有礼貌点。并且作为报答，我要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我，行吗？"

孩子微微点点头，生怕多做不必要的动作，节省着他最后的一点力气。

我向他走过去，抓住他的肩头，他在前我在后地领着他。我们穿

---

① 法语，意思是"艺术家的生活可不容易"。



过客厅,那帮人正忙于讨论总理的人品(否定,否定,否定)。我乘机从凳子上捡走了那幅画。

"我带阿瑟到我房里去,那儿有纸和蜡笔。他觉得无聊。"我宣布道。

卡秋莎高兴地挥挥手。

进了房间,我关上门,扬扬得意地向孩子看了一眼。他好奇地仔细察看这个房间,这使得他暂时忘记了难受,我把蓝花瓶从架子上拿下来。

"现在,我背过身去,你做你不得不做的事。"

我背对着他站着,听着他在费劲地解裤子时气喘得像只小动物,然后,小便喷射进花瓶里。啊,这是家里亲切的声音。是祖先土地上的音乐。

他完事以后,我让他把花瓶放到角落里,然后说:"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我指指床,邀他坐下,他的双腿垂下来就像穿着凉鞋的两根香肠。我拉过书桌边的椅子,面对着他坐下。

"那么,告诉我,阿瑟,你好吗?"我想听他说一个不押韵的句子,然后再继续,但他只是愉快地点点头,仿佛在说:"我很好。"

"行。这时候你不想回答,我理解。"

他又点点头,这次好像对我的理解很高兴。显然,由于他的问题,他已想出了一整套点头的办法用在他不想折磨和辱骂对话者的情况之下。

"告诉我,阿瑟,你爱母亲吗?"

点头。

"是的,她很不错。我也这么认为。"

对于这一致给他母亲的信任投票,他快活地点头。

"可是,告诉我,有时就光你们俩不是很难受吗?"孩子不解地看着我。

"我是说没有父亲。这对于你母亲来说有时一定很艰难。"

点头,可以确定,卡秋莎平时并没有在儿子面前掩饰自己的牢骚。

“你父亲在哪儿？你母亲告诉你了吗？”

严肃地点头。

“他遗弃你们了吗？”

用力地摇头。

“那么出了什么事？他死了吗？”

悲哀地深深点了三下头。

这正是我想知道的。

“来吧，阿瑟，我有消息告诉你。很好的消息。”

他那蒙古人的眼睛好奇地睁圆了。

“你父亲没死。他活着。他住在国外，但他也花很多时间在以色列。你母亲不告诉你是为了不把你搞糊涂，因为你还小。”

默默地圆睁着双眼表示疑问。

“是的，你母亲跟你说了谎。成年人会这样做的。她说了谎，因为实际上你认识他。你的父亲。”

皱眉。轻微的斜视变得明显起来。

“想要我告诉你他是谁吗？”

愣了一下，紧接着连连点头。

我抽了会儿空，点了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用长长的一口气把烟吐出来，向孩子俯过身去，眼光锐利地盯着他的眼睛，用平静而准确的声音说：“尼奥，尼奥是你父亲。”

孩子保持着沉默，他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的眼睛。

“是的，是的。尼奥。你难道不高兴吗？”

他的下巴开始几乎不易察觉地往下降，他的眼睛变得更加斜视，他的嘴巴撅圆了，张开着，就像头上即将要挨上一击的小鲤鱼。消息他是听进去了，但为了尽可能长地延续这份快乐，尽可能多地汲取这份快乐，我将脸凑到他的面前，几乎无声地翕动着嘴唇。

“尼奥。”接着，带着一种自己都不知道身上具备但现在却完全自然地迸发出来的邪恶，我冷酷地更进一步，“有个爸不差。嗨？这个押韵押得怎么样？有个爸不差。”



长时间的沉默,好像是被充了电,构成了一定的形式和方向。接着孩子从床上滑溜下来,手指张开着伸出双手,一眨眼,他就死死地抓住了我的裙子,他的重量可能会使我坐在椅子上失去平衡。我跳起来,将椅子踢到一边,而此时,孩子开始荡来荡去,脑袋转来转去,手抓得更紧,最后嘴里发出了绝望的假嗓子号叫,这号叫包含着原始穴居人对抗猛犸象时发出的可怕尖叫,包含着阿帕契人①在投掷印第安战斧前那片刻的叫喊,包含着朱利斯·恺撒在元老院台阶上的呻吟。所有从古至今对于我们这个物种男性阉割的不安,都从这个六岁的阿瑟喉咙里迸发了出来。

"贱货!贱——货!"紧接着,说出了一个与前个诨名完美互补粗鲁有力的韵词,"妖婆!妖——婆!"

不到百分之一秒,孩子已做好了心理准备,恢复了神志。此刻,他开始大声有节奏地叫喊起来,晃着他自己也使我随着他两边摇摆。

"贱货——妖婆!贱货——妖婆!贱货——妖——婆!"

马上,他们都涌到我门口,很快,不同的身体挤满了房间,卡秋莎和母亲竭力想把阿瑟拉离我的裙子,而阿曼德和尼哈玛则站在她们身后吃惊地旁观,还有客人,他甚至还不厌其烦地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关心,他们交谈着,走来走去,问着各种问题。之后,阿瑟被他母亲抱到客厅去,他仍在发狂地尖叫,其余人则殿后,像一群无所事事好奇的旁观者,母亲马上采取行动:我能怎么帮忙?要不要我拿点什么,或许拿杯水来?也许,我该叫个医生来。卡秋莎努力想使儿子安静下来,指点客人在她的包里找那瓶镇定剂,客人匆忙间把她那雅致的手提包掉到了地板上,昂贵的化妆品、文件资料、手机、太阳镜洒了一地,之后,卡秋莎和儿子坐在沙发上,将一调羹深色的液体灌到他喋喋不休的喉咙口,温柔地跟他说话并抚摸他,他的叫喊开始逐渐消失,后来只留下含混不清的咕哝,他将头枕在母亲的膝上,大家坐下来,逐渐又回到了

---

① 阿帕契人:居住在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北部的一支美国土著民族。在19世纪后半期,各个阿帕契族部落强烈抵制对他们领土的入侵。现在的阿帕契族人居住于亚利桑纳州、新墨西哥州和俄克拉荷马州。

原先松弛的状态，这时，突然，卡秋莎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并且把孩子推开，这伙人又一次惊慌地跳起来：什么，什么，发生什么了？她捂着右膝吃惊地抬起头看着我们："他咬我，他咬我的腿！"

"你什么意思，咬？"母亲问。

"咬！他咬我。"她这时是专门在向客人表述她的吃惊。很自然嘛。这个快乐的父亲。

"这孩子很凶暴！"尼哈玛说。

"也许我们真该叫个医生来。"阿曼德说。

"要我抓着他吗？"客人问。

"或许，你该把裤子脱下来，我们可以看看是不是咬破了。"母亲说。

"她需要马上打破伤风针。"尼哈玛说。

"要是咬破了，裤子也会破的。"阿曼德说，出于某种原因，他脸红了。

但卡秋莎摇摇头，消除了各种猜测，拒绝了各种建议。

"不，我什么都不需要。但我不明白这儿发生了什么。苏西，发生了什么事？你跟他谈了什么？"

"我给了他蜡笔和纸让他画画。仅此而已。我们没谈什么呀。"

卡秋莎又仔细地看了一下咬痛的地方，用手指头揉搓着，时不时眼睫毛颤动着看看我们，显得无奈而吃惊。

就我而言，这场喜剧已经结束。

"要是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他放我房里睡。"我说。

卡秋莎又颤动了一下眼睫毛，这次装出一副羞怯的神情。

"我不知道。真是太丢人了。我想我们该回家了。"

母亲大声地反对他们走，所有的人都随声附和，全然是前面那阵混乱略有改动的再版。我走进房间，关上了门。我靠着门站了很长时间。显然，我真是疯了。上帝。我都没有力量来思考我自己、理解我自己了。





我取出英国诗选，随意地翻到T. S. 艾略特[①]写的一首我不知道的诗。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却理解不了它的意思，只有四行诗句迷人而清晰地在我心中回响。

我得找到
一种方法，无比轻捷巧妙，
一种方法，我俩都能理解，
简单，不确定，像握手，像微笑。

一阵对客人的渴望占据了我。感觉之强使得我用手捂住了脸。我倾听着内心发生的一切，偶尔会意识到眼睑的颤动、嘴巴周围的紧张以及触摸额角时手的冰凉。

卡秋莎静静地走进来，后面跟着阿曼德，他手里抱着阿瑟。她用调羹喂进去的糖浆看来正在起效，阿瑟看上去很迷糊，大睁的眼睛呆呆的很是严肃。他们把他放到床上，同时轻声指导着对方。卡秋莎温和而歉疚地朝我笑笑，这是女性对女性的微笑。我向他们点点头，装着在看书，坐在桌边，背对着孩子，他们一离开房间，我就又用手捂住了脸，脑袋里空空如也。

我转过身来，看到阿瑟在熟睡。他趴在那里，手脚伸开着，只有右膝贴到了肚子边，眼睛闭着，整个脑袋侧着陷在枕头里。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一种莫名其妙的需要使我触摸起他那长着如丝般头发的脑袋，然后是手臂，他身体的轮廓仍显露着婴孩般胖嘟嘟的模样。他微微动了动，眼睛都没睁就抓住了我的手。我竭力想挣脱，但他抓得太紧，我无法不弄醒他而把手抽出来，于是，我就让自己那瘦骨伶仃的手安歇在他那如棉花糖般柔软的手掌肉垫里。又一次营救我的手的努力失败之后，我以非同一般杂技技巧的努力脱去鞋子，取下发夹，紧挨着他在床沿上躺了下来，小心地在这个剩下的狭窄地方安置好自

① T. S. 艾略特(1888—1965)：美国诗人，文学评论家。

己。他又动了，抬起头，比睡眼惺忪更蒙眬地看了我一眼，又倒回枕头上，脸朝向另一边。我把脸埋进他乱蓬蓬的头发里，在这稚气而多灰的头发散发的气味里有某种可爱、舒适、一点都不令人害怕的东西，这使我很快就睡着了。

我睡得很不踏实，满是一段一段奇怪的梦，差不多就像是梦的一部分，我听见有人进了房间，之后，我觉得有人在笨手笨脚地想把孩子抱起来而不把我弄醒，我紧闭眼睛，这样我就真的醒不过来，我感到孩子的手柔软无力但很不情愿地与我的手分开，之后，我听见低语声、吱吱响声和脚步声，我知道他们已经关了灯，便睁开了眼睛。我在黑暗中放松地躺着，睁着眼睛，听着许多声音所汇成的乏味的共鸣声，这些声音包括客厅里的说话声、外面电线杆的嗡嗡声和被没完没了的夏天所激起的蟋蟀鸣叫声，还有我呼吸的声音——吸进去又弱又干，呼出来的满是犹太人的痛苦，一切都融入了这缓慢、空洞而且不可避免的生活。

几小时后我也醒了，这时客人进来，摸索着走到我床边的柜子旁，试图想找到床头灯的开关，却把我的发夹弄散了。我容他开亮了灯发现我睁着眼。他很尴尬。

“你没睡着？那干吗像死尸似的躺在这儿？真吓人。我来看看你。起来。”

我坐起来，拉过薄薄的夏天用的毯子裹住自己，特别留意盖住脚。我机械地抬起手想整整松散的头发，但马上改变了主意，以免他错认为我是为了他的缘故想把自己整得漂亮点。客人在床上坐下。他的举止使我很生气。

“你想干什么？我在睡觉。”

“好了。你生气了。瞧，你是对的。我想道歉，我当时做得很傻，就是那桩在大家面前说你画画的事。我本来早该来了，但阿瑟又引出了那么多的大惊小怪，之后，大家呆呀呆地，等他们都走后，我和你母亲聊了会儿。而现在我在这儿了。”

他认为是他伤害了我，这使我更加窘迫。现在他大概相信自那以



后过去的所有时间里，我都一直忙着想他。

“我一点都没烦心。我知道画得很糟糕。”

“不糟糕。只不过，我该怎么跟你解释呢，就是僵硬点，不流畅。有点不自然。”

现在，我愤怒了。

“你没见到她坐的样子。全都是扭曲的。因为她知道我在画她。”

但是客人显然不会在侮辱别人时歇一歇。这是种需要，正如阿瑟那些押韵的词和淫言秽语。现在，我知道这也是遗传的。客人那种综合征。

“那不是问题所在，你知道。要画好某个坐姿扭曲的人也是可能的。画在哪？拿到这儿来。我来指给你看我的意思。”

没等我有机会提出异议，他站起来开始在我桌上的那堆纸里翻找。

“就让它去，我告诉你我不在乎。”我几乎是在喊。他如此接近我的画，他触摸它们，这比他要是摸我的胸部都更令我震惊。但客人已经一屁股坐在了我旁边，手里拿着那幅该死的画。

“你瞧，你过分注意小细节而失去了整体感。这就产生了扭曲、笨拙。还有毫无生气——你瞧，你又过分注重技法，那些机械的东西，而没有用内心去理解你所看到的东西。一种印象，一种感悟。一个表现人性的独一无二的时刻。”

我并不想在半夜里听关于我的绘画质量的讲座。即便是他讲的都不想听。

“你知道，我这辈子有画得比这好的。在我遇见你之前。”

“别老是像受了侮辱似的。够了。”

“而且，不管怎么说，你自己也不完全是个艺术家。”

“别拿我开刀，你会后悔的。”他大笑起来，但他的眼睛并无光泽。这促使我继续说下去。

“让我们看看你画的尼哈玛。”

“你会难过的，我告诉你。”

“为什么?”

客人沉默了片刻,以微笑面对我茫然的凝视。

“因为自我十岁起,这是尽我所能做得好的一件事。因为这给人们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这个比赛是不公平的。”

“谁跟你比?”

“每个人。每个人跟别人比。在这个具体的情况下,是你正在和我比,尽管我是亲戚甚至是朋友,我也不得不重击你一下。哪有没画过的纸?”

他站起身,又把我的书桌翻了个底朝天,直到找到一个全新的素描本,我想叫他用我已经开始用的那本,但我住了嘴,以免他认为我小气。他在椅子上坐下,两腿交叉,我又仔细地观察起他那长长的脚板,跷在地板上的脚指头马上开始动开了,盘起来舒展开,就像是某种奇怪的海洋生物的触角,他说:“尼哈玛,对吧?”他闭上眼睛,全神贯注地微微皱着眉,然后他张开眼睛,马上用明朗流畅的笔触开始画起来,时不时地停一下,但只是停上秒把钟,然后继续用炭笔在纸上过分慷慨地横扫,偶尔动作幅度变小些是为了用自然的阴影勾画细部,随后又朝各个方向舒展开去。最后,他把炭笔甩到书桌上,伸了个懒腰,站起来,把纸扔到床上,向下朝我这儿瞥了一眼以庆祝他的胜利。

我拿起那张画纸。尼哈玛的脸正对着看不见的对话者怒目而视,她的眼睛挑衅地闪着光,眼睛周围的皱纹加深了,眉毛快速地扬了起来,嘴巴半张着,这是她射出下一句话前的一刹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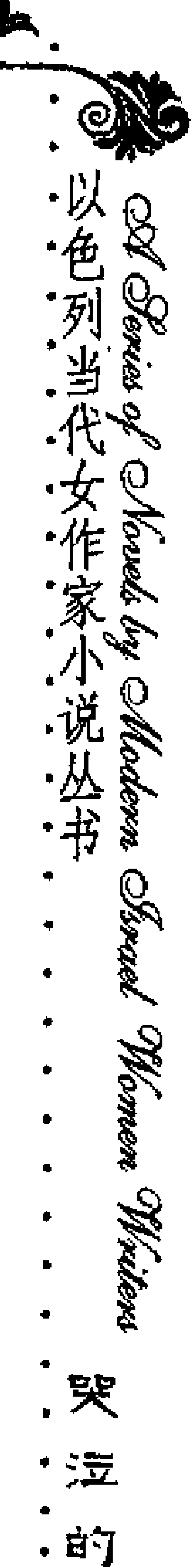
我向客人抬起眼睛,什么都没说。

“我告诉过你,是吧? 你不该拿我开刀。”他倒到床上,懒散地摆出半仰卧的姿势,就像《我,克劳多斯》中的一位罗马贵族,令我缩成一团把膝盖抱到了胸口。

“你沮丧吗? 想要我也教你吗?”

我耸了耸肩。

“好极了。明天我在特拉维夫,所以我会给你买点像样的炭笔。还有你用的纸,你是什么人,女学生? 你应该知道我是个呱呱叫的老



师。我具有认识人们问题的才能。另一番光辉的事业只能等我下辈子成就了。给我支烟,但先得把它点着。"

我从柜子里拿了一包烟,抽出一支。先点着?那意味着我得把烟先放在我的嘴里然后他再放到他嘴里。他在要我做近乎色情的动作。我用僵硬的嘴唇衔着香烟,尽可能离我嘴巴湿润部位远远的,同时拿起了打火机。我能感觉到藏在我手指里的颤动就要爆发出来。半点着的烟掉到了围着我膝盖的毯子上,四处都撒了烟灰。我迅速拿住了烟,递给客人,烟已经熄灭并且略微有点烧焦。

"你不同一般,可知道?"

他从我手里拿过打火机,将那支蒙羞的烟点着。

"现在告诉我,和那狗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没事。"我耸了耸肩。

"你母亲告诉我的可不是那样。"

我不做声。

"你是想逗它?"

我冷冷地看着他。有时候他真是什么都不懂。

"我想要杀了它。我和它都要杀死对方。"

他懒洋洋优哉乐哉地抽着烟,一会儿喷出一股烟柱,一会儿准确地吐出烟圈,很快就化作了软绵绵的烟云。

"只是我和它都要杀死对方。"意识到他不准备回应时我又重复了一遍。

"我明白。"他严肃地点点头,继续吞云吐雾。

我们俩都沉默了。

"这很有意思,"他说,示意我把烟灰缸拿过去,然后把烟头捻灭。"我想念你们大家。我真的想念。在海法。这真奇怪。"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由于没有料到的快乐而感到脸红,耳朵也暖烘烘的。他坐起身。"听着,你难道不想吃点东西?我饿坏了。"

想到他可能离开,谈话就此结束,我那不假思索的拒绝没有出口。我从毯子里溜出来,同时把头发在脖子后面盘了个圆髻,弯下腰摸索

着散在地板上的发夹，同时尽可能把脚藏在裙子底下。能解决我的这些问题，我本该是霍迪尼①。另一番得等着我来生成就的事业。

在厨房里，客人展示了原不为我所知的本领。在我眼里，他的存在与诸如准备食物这样乏味的粗活是不相关的。现在，他向我显露了这不为人知的另一种可能。他开始以他平日的优雅举止做起饭来，动作轻松迅捷、准确无误。首先，他打开了冰箱，站在那里沉思，他那张诗人的脸就好像面对着河里的倒影凝视，接着，进行完了长久而隐秘的一连串思考，他做出了决定，开始飞快地把东西往外拿，并放到大理石台面上——奶酪、蔬菜、鸡蛋、黄油、橄榄、一束发黄的香菜。然后，他把注意力移到了厨房的橱柜上，在架子前流连，不停地在醋瓶、油瓶、调料瓶前上下舞动着手指，随后就把它们从架子上攫了过来，这当儿还调皮地向我做鬼脸，好像我们是一对不怀好意的小淘气。他收集齐了各种配料，该是征求我意见的时候了。

“煎蛋和色拉?”

“不要给我做。我真的不饿。”

“你在开玩笑！你肯定吗?”

“绝对肯定。”

那是在说谎。我自早饭后没吃过一点东西。由于这伙人在，我无法吃母亲做的午饭，也无法吃些小点心——咖啡、小甜饼和水果——填填肚子。这倒并不使我烦恼。可现在？我能感觉到，饥饿为我白天所抽的那些烟所刺激，此刻正在抱怨我的肚子。我用舌头品味着尼古丁，又苦涩又讨厌，很想用什么吃的东西把这股味去掉，却压根不想要牙膏里那股薄荷脑的冲味。看到大理石台面上的食物，那奶酪、面包和蔬菜新鲜而平常，使我馋得恨不得把看到的一切都吞到肚子里去。

“不要吃？随你的便。要是你改变主意，就告诉我，不管怎么，我会做得足够我俩吃，万一你想吃，也有。”

客人开始忙活起来。这是一番迷人的景象，真令人倾倒。他丝毫

① 哈丽·霍迪尼(1874—1926)：美国魔术师，以其能从锁链、手铐、紧身衣及用挂锁锁住的箱子中逃脱而闻名。



没有男人下厨时惯有的笨拙。比方说，我父亲就可怜透了——他切的面包片像台阶那么厚，他烤的鸡伸着没完全斩断的腿，上面抹着油和辣椒粉还残留着些羽毛。我记得在阿曼德那儿吃晚饭，他自认为是优秀的厨师。他在黄瓜上方斜着刀子，去掉厚厚的一条条皮。那些皮湿漉漉地都掉进了水槽里。

客人也在忙着削黄瓜。连他的手指头在我的注视下动作时看上去似乎都能意识到自己的美丽。他拿在手里的黄瓜皮卷呀卷，呈连续不断的薄长条子，只有当黄瓜完全削光，它的浅绿色给人以凉爽和美感时，客人才最后切了一刀，这如脐带般的条子脱离开，掉了下来，带着古典芭蕾舞演员独舞终了向观众行鞠躬礼时的感伤。

剩下的蔬菜，他已经洗过，诱人地堆在台面上，仿佛是准备好了为广告片拍照似的。我看着客人用母亲切肉的那把吓人的刀将它们切成了香喷喷且颜色丰富的小方块。然后，他往几乎空了的芥末罐子里看了看，把醋和橄榄油倒了进去，加了点盐和胡椒粉，捣碎了一瓣饱满的大蒜，随后便盖上了罐子的盖子，在空中摇呀摇，那份认真就像是炼金术士炼了一辈子的活到了最后的阶段——黄色的混合物马上就要变成黄金了。完事后，他把液体倒在了色拉上。

之后，他把平底锅架到火上，将一大块黄油放了进去，使厨房里充满了香味，害得我别过头去咽那涌到我嘴里来的口水。在黄油自行消亡之际，他在碗里打了三个鸡蛋，用叉子搅打着，加了一点牛奶和盐，然后，他边起劲地搅打，边将这混合物倒进了锅里。我又得咽口水了，此时，他把母亲从一家专门商店里买来的乡村面包切了片，然后站在炉子前面，背对着我，轻轻地晃动平底锅。我看着他那瘦削的后背，忙碌时微微地弓着，他的头发在肩上就像液态的黑巧克力在流动。想象着面包和煎鸡蛋的好吃、色拉和奶酪拌在一起的美味，我饿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嘴里淌着口水。有件事很清楚——我正在体验缓慢而残酷的东方式折磨。

“你肯定不和我一块吃？”客人摆好餐具后问。这个问题在过去的二十分钟已经是第五次问了。我摇摇头，拉开嘴巴本想笑一笑却凝成

了一个僵硬的鬼脸。不，谢谢。我用手里的叉子在面前的空盘子上潦草地画一些谁都看不见的东西，仿佛是在觉得无聊。

“你在哪儿学的烹饪？”

客人听到我的问话看上去很高兴。

“宝贝，我是个了不起的厨师。这又是一番得等到我下辈子干的事业。这还没什么。我知道怎么做让人惊叹的菜肴，填鸽子、通心面、海鲜，我做的汤简直是艺术品。我真得抽一天时间为你和你母亲做些特别的东西。”他叉了一叉子食物放进嘴里。

我盯着自己的空盘子，偶尔偷偷地向他那边瞥一眼。即便是在饥饿状态，他吃起来还是有种超然、不贪食的样子。他脑子里想着别的事情。如果我是他，那该多好。我做出决定，明天早上，当他还在熟睡时，我就叫母亲给我做一顿跟这一模一样的饭。用三个鸡蛋而不是通常的两个来做份煎鸡蛋。用许多黄油而不是葵花油来煎。我会告诉她色拉调料里放芥末，把面包切得能多薄就多薄，然后我就要补偿眼下的饥饿，把所有东西都扫光，一点碎屑都不剩。也许要吃两餐像这样的，早饭和午饭，后天也是如此，一直等到我饱得使这可怕的欲念，这大量口水噎得我透不过气来的欲念消失殆尽。

“别这样，这要害得我发疯了。”客人说。他指的是我用叉子在盘子上发出的刺耳的吱吱声。我甚至都没注意自己在干什么。我听话地把叉子放下。他咬了一口黄油面包，突然有兴趣地研究起我来。

“那么，在你房里，你和阿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已经说过了。没事。我给了他纸和蜡笔。接下来就出事了。我们在他们家时，他也无缘无故地发疯。”

“他总是有缘由的。他大叫是因为他找不到别的办法来说清楚。那时是跟修复家有关。他明白这个问题，想要帮忙。这可不是无缘无故。”

“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我又用叉子刮起盘子来。

“别这样。你怎么了？”他提高了嗓子。

“没什么。”





我把叉子放下，盯着自己的盘子。客人继续在吃。我知道他在看着我。

“那么，你不准备告诉我。”

“没什么可告诉的。”

“随你的便。”

接下来的那一刻，就像以前我和客人在一起时所发生过的那样，某个在我内心生活得充实而独立的自我控制了事态，甚至连我都不知道在干什么的时候我就讲了起来。

“我告诉了他真相。他有权知道。仅此而已。”

“什么真相？”

客人很好奇，他停止了咀嚼。

“你知道得很清楚。”

“我一点都不清楚你在说什么。”

他把刀叉放在盘子上，推到一边。

“我告诉了他谁是他的父亲。”我说。

“是什么使你认定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事实。”

“那你干吗不也告诉我呢？”他甜甜地微笑着。

“是你。”

我想这表情像是《尼诺奇卡》[①]中的葛丽泰·嘉宝，这是一部我在经典电影频道看过的电影，剧中的她同样吃惊地睁大了她那眉毛弯弯的眼睛，接着，沉默了同样长的几秒钟，随后，露出漂亮的牙齿，爆发出极其上镜的长时间大笑，直到她慢慢平静下来，擦去眼角的泪花，就像客人现在做的这样。

“很有意思。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我可以问一问吗？”他说道，此时，那令人恼怒的大笑的最后痕迹还没有从他撒谎的脸上消失。

他装出来的清白无辜激起了我的愤怒。这种愤怒倒是纯洁的，没

① 《尼诺奇卡》：也译作《俄宫艳史》，是葛丽泰·嘉宝在好莱坞的唯一一部喜剧片。

掺杂任何其他感情。

“非常简单。卡秋莎说她认识你七年，阿瑟六岁，你是她的男朋友。她今天下午这么说的，在我们等你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

客人靠在椅子里，重重地叹了口气，将双手叠放在他扁平的肚子上，仿佛在说：我吃得太多了。

“她说我是她男朋友，确实是这么说的？”

“并不完全是，可她暗示了这一点。你知道，根据她的表情和所有情况。而且母亲和尼哈玛也问了关于你的各种问题，关于你的工作及所有情况。你知道尼哈玛有多怀疑。然后她就说了，暗示了这一点。我不知道。这很明显。”

客人愉快地伸了个懒腰，非常的到位。他看上去那么开心、那么满足让我都想哭。接着，他点了支烟，得意地吞云吐雾起来。

“亲爱的苏珊娜。请允许我来开导你。这全是一派胡言。我不知道卡秋莎说了什么，你或者你母亲或者尼哈玛明白了什么，但我高兴地想告诉每个有关的人，我不是阿瑟的父亲。我认识他父亲。一个了不起的家伙。他是个阿拉伯人，来自海法的医生。穆斯塔法·艾尔哈里兹。非常富有的家族。楼房、土地。他在去圣彼得堡的旅行中认识了卡秋莎，之后便结了婚。”



“他现在在哪，这位医生？”

“他死了。阿瑟出生一年半以后。他去游泳，淹死在海里了。死得真是没意思。卡秋莎垮了，但她并不想和那家人一起待，还有那乱糟糟的一切。她现在仍在就他的遗嘱问题跟他们抗争。于是，她带阿瑟搬到了特拉维夫。在海法与他待在一起的奶奶是穆斯塔法的母亲。”

“我原以为那是卡秋莎的母亲。”

“卡秋莎这儿没有任何家人。她是个俄罗斯基督徒，那儿他们都是狂热的教徒，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黑衫党党员[1]。”

---

① 法西斯党派组织成员，以黑色衬衫作为其制服的部分。



“你呢?”

“我怎么了?”

“你不是她的男朋友?”

客人看了我一眼,眼神中带着几分怜悯。

“你怎么认为像我这样的叫花子会是卡秋莎的男朋友?卡秋莎喜欢奢侈享乐。她需要的是安稳和安全的生活。那一切跟我有什么相干?卡秋莎是个对待自己的生活很认真的人。她只是个好朋友。仅此而已。”

他把烟在吃剩的煎鸡蛋里捻灭,也把这番关于他与卡秋莎的关系、她儿子的父亲的情况的谈话结束掉,开始清理起桌子来。我跳起来帮他忙,将东西放回冰箱,他洗碟子,我擦大理石台面。然后,他问我是否要咖啡。我点了点头。他煮好咖啡,叫我拿上香烟和烟灰缸,带着路走到夜色笼罩的阳台上。我们在塑料椅子上坐下。客人将脚架在栏杆上。我们默默地坐着。天空呈靛青色,表明黎明已经不远了,尽管这儿还黑糊糊的看不清楚,但群星看上去已黯淡无光,高高地躲藏在城市烟云的上空。

“老天,我倦了。”

他有气无力、平平淡淡地说出这句话。虽然说起来没有抱怨的口气,但我感到诚惶诚恐,觉得是我在留他,就像条水蛭在粘着他。

“那么去睡觉吧,已过半夜了。”

不,这是另一种倦。极度的倦。睡觉没用。客人看出了我的惊慌,急忙安慰我。“我起床的时候倦,工作的时候倦,吃饭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思考的时候都倦,甚至连我睡觉的时候也倦。”

“但总该有什么办法休息。”

“对于那些把游手好闲当做生活方式的人来说是很难休息的。通常被看做休息的事情对于懒虫来说只不过是平常地打发日子而已。”

“我相信即便是懒虫也能找到休息的办法。”

“像什么样?”

“我不知道。某种使人平静的办法。也许倒立,像本・古里安。

依我之见，你现在不在纽约，不需要那样慌张和匆忙，你应该利用好这一点。”

我马上为这愚蠢的押韵和对纽约更为愚蠢的描述而感到难为情。而客人倒似乎很开心。

“我会考虑你的建议。我是指，关于本·古里安的那一个。”

在我看来，他似乎含情脉脉地看着我。

“我小的时候，倦了也休息不了。有时，我倦得连续几天都睡不着。我常常躺着，哼着一种声音：‘mm……’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使我难过，但这只不过是倦了。”

“我对这种感觉知道得很清楚。但我现在已经厌倦生活了。这很悲哀但却是真的。”

我想告诉他，他的生活，尽管我知之甚少，在我眼里却是那么的激动人心，那么的丰富多彩，难以想象会有人厌倦这样的生活。但出于某种原因，我决定还是保持沉默。

“我觉得精疲力竭了。有些事情毫无进展。我做同样的事情，每件事都给困住了。我开车开呀开，一丝一毫都没往前挪。这真使人丧气极了。但没什么。总会产生什么结果。像这样的一段时光总是以变化而告终，那就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

“那么，你打算做什么？”

“我一无所知。我希望我知道。我想首先我会愿意休息一下。去倒立。你呢？你难道不想过另一种生活？”

我说不清他是真的感兴趣还是只想不再谈论他自己。

“你什么意思？”我装着不懂 。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在谈什么。别装了。看看你自己——被困在拉马特甘，跟这帮老疯子待在一起。”

这番侮辱加上这样的夜色使我变得令人吃惊的无拘无束。

“你为什么说他们疯？你知道什么？你只是从表面来看。就拿尼哈玛来说，你认为她只不过是个爱管闲事的老人外加种族主义者，但那只是在言辞上。她老是攻击阿曼德，但在他开‘不骗你’超市资金出



现各种问题,差点破产时,她取出了养老的钱,借给他,当他告诉她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她钱时,她说:没关系的,你那么能干,不管做什么都会成功的,因此我不担心。她经历了大屠杀。你可能会说:那怎么了?所有老人都经历了大屠杀。但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有时候很可怕。她的村庄位于克拉科夫①附近,那里所有的犹太人都被一班子射手杀死了。他们都掉进了一个深坑里,全身赤裸着,她的父亲,她的姐妹,每个人。她活着,躺在那些尸体下好多天,直到她设法从这些已在腐烂着的尸体中像蠕虫般爬了出来。那之后,她根本就不说话,一直到她十六岁。她就是不声不响。因此她有妄想狂。再说阿曼德。他是个朴实的人,没受过教育,但热爱音乐、诗歌,真的热爱。他一点都不矫揉造作。他对于我们是真正的朋友,我们一起经过了各种事情,我们总是可以依靠他。至于母亲,我不知道你怎么可能说她疯。她是那么……那么坚强,她是了不起……这样看来你也许认为这一切都是老一套……"

我并不习惯于发表这样长篇的独白,但我需要向客人说明白他的错误,这使我勇往直前。我不时地停下来喘口气。我希望他会道歉,说他并没有任何令人不快的意思。可他什么也没说。尽管他保持沉默,不对我的演说作出反应,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是站在我这边的。我想继续跟他谈。惹他说话。

"总之,我也疯了。"

他不屑地叹了口气。

"宝贝,求你了。即便这是真的——那又怎么样呢?我认为归根到底大多数我认识的人都能对号入座。他们都不快活,都发疯。我在这儿谈的不是某种难解的神经症,我指的是疯狂的大时代。你知道,妄想狂、奸尸犯、那些认为自己通过电视获取了信息的人们、没有是非之心的精神病患者、忧郁的艺术家、自我陶醉者、性变态者、有盗窃癖的人、忧郁症患者。这些人用各种各样的化学药品、镇静剂、麻醉药、

① 波兰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华沙东南偏南部,维斯杜拉河沿岸。它建于公元8世纪,在1305年到1595年期间为该国的首都。

抗忧郁药，各种各样顺势疗法的垃圾。其中一些人知道他们是疯子，另一些人觉得他们的朋友知道他们是疯子就够了。但他们都活跃着、折腾着——在伦敦，在纽约，在特拉维夫。挣钱花钱，与人竞争，培养野心有时也能达到其目的，为原则问题抗争，会热爱，会妒忌，会仇恨。简而言之，就是生活着。他们出去，与这世界面对面，无论这个世界有多么的自私、讨厌，多么的令人失望。"

我说："有各种各样的疯狂。"接着，我又补充道，"也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我们之间缺乏理解使我觉得孤独，这种感觉几乎波及到肉体。任何企图用他们自己的观点诠释我个人体验的人（是的，是的，就是尼哈玛总是谈论的那些同样有罪的人），对此并不知道一二，这总是令我极度气愤。

客人从侧面仔细地看着我。他把脚从栏杆上挪了下来，将椅子转向我，手臂支到大腿上，向我倾过身来。

"别气愤。我想让你知道我理解你。你不情愿走出去。我知道那种不情愿。在某种程度上，在你们家里跟你们待在一起也显示了我自己不情愿走出去进入我正常的生活。总之，当我非得跟世界面对面时，我就根据自己的主张办事。"

"你什么个意思？"

"我用某种面具保护自己。这样，在我软弱无力的时候，也能走出去。你的问题是你缺乏这个选择。"

"但我不知道怎样成为别的什么。我只知道怎样做我自己。你描述的像是装假。"

"我说的完全相反。我谈的是选择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可能性。我相信你在你母亲面前和在我面前表现不一样吧。"

"我在每个人面前表现都一样。"

"是这样吗？你在你母亲面前也不吃东西？你是干什么的呀，瑜伽修行者？靠信念过活？"

我无力地翕动嘴唇，想吸些空气到肺里。

"但如果这就是你的选择——那么就算了。你要明白我谈的不是



关于虚假的自我，而是关于在特定的时候你选择什么来展现自己。瞧，你内在具有各种角色，各种的苏珊娜，你可以选择让哪个出来。哪个最管用。这有助于发展一些至关重要的特性，把活力注入性格中受压制未表达过的方面。我在跟你谈充分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就拿和狗的那件事为例——你没做任何的假，只是表露了你通常不展现的特性。但那有点失控了，仿佛是自行发生的。我说得不错吧？"

我点点头。

"所以我相信你能学会那样去做，明确地按照意愿行事，那是清醒地做决定的结果。不要依赖你内心所认定的命运。"

"那恐惧呢？对于恐惧我能做什么？它使我无法动弹。"

"我明白。当然也有激励人的恐惧，促使人们行动的恐惧。也许这两者实际上同名但却不同感觉。但我相信，归根到底，一切恐惧，无论是使你行动还是使你无法动弹的感觉，都是多余的。"

"可你怎么能摆脱呢？"客人大笑。

"那可是个大问题。我不知道。也许就是要把它释放出来。我没有这样的手册。这是全凭直觉的事。一种开放的状态。"

"有像那样生活的人吗？"

客人又大笑起来，开心地将脑袋向后仰。

"当然没有。我讲的是乌托邦。这不是能持久的东西。但你可学点以对抗另一种选择，那种封闭的状态，那种得时刻援引意义、理由和明确的形式来护卫自己的状态。我的意思是面对巨大的恐惧开放你自己。准备着体验没有意义的痛苦。这样的开放也会使你接触到绝妙的东西。"

"我总是寻求意义。"

"当然。我们大多数时间都那样做。否则，生活就会无法忍受。但在试图赋予事物意义时要节俭。"

"节俭，你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向你解释呢？精打细算，像个书记员。就拿发生的事举个例，比方某件糟糕可怕的事，我说：我要确定它的意义、价值——好的、坏

的——然后它就会值得我去体验。这就将体验变成了有利可图的事。”

“但我们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特别是当糟糕的事情无缘无故地发生，而你实在不明白，问着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种时候真是难以忍受，毫无意义。”

“那正是我在谈的，承受痛苦而不把它转化为受苦受难的本领。认识到痛苦的没有意义。大多数具有随意性。意义这整档子事情都是虚构的，是杜撰出来的。”

“那该做什么呢？”

“我不知道。渴望到达一个意义虚无的境界。不要试探着赋予事物一个安全、封闭、受保护的形态。在其还未有客观意义、还未层次分明的状态下就与之面对面。”

“你做得到吗？”

“当然做不到。那就是我为什么放弃做艺术家的原因之一。我是个很成问题的人。问题比我看上去的要多得多，或者也许一模一样。但我要继续努力。”

我们俩都沉默了。

“为什么会首先存在痛苦？”

“也许是因为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没有活着或者去死的理由。”

他站起身来。

在破晓前渐渐泛白的天色里，他的脸看上去疲倦而丑陋，就像那晚带我出去在酒吧里感受美好时光时我所看到的那样。

“行了。该睡觉了。听着，我本来并不想给你上课。有时，我会这样做的。别往心里去。我什么都不知道，那是真的。我比你认识的任何人对生活认识得都要少。”

“甚至包括尼哈玛？”

客人严厉地看着我。

“特别是尼哈玛。”

过了好长一阵子，他才让我知道他只是在开玩笑，他的脸突然绽开灿烂的微笑，来面对我这羞怯扭曲的面孔。



滴　血

母亲说全国沉浸在一片忧伤之中。消沉的气氛笼罩在每个人的身上。在她看来，甚至利库德党选民都在默默地为工党联盟的竞选失败而感到悲伤。就连巴布亚新几内亚快要绝迹的部落也为这令人忧郁的转折而感到悲伤。

我对全国的忧伤没有什么感觉，因为那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尽管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那样我名叫苏珊娜·拉宾。我对推动世界和平或中东和平无能为力。我是一个逃避者，一个渺小的人。就我而言，全国的忧伤就是母亲的忧伤。当母亲情绪低落时，苏珊娜·拉宾就会精神振奋。

而母亲和尼哈玛却在不知疲倦地推动中东和平。要没有她们，我们都会背上被捅着刀子在海里沉浮[①]，或者每天早晨五点就开始研读希伯来圣经，或者透过床单的窟窿进行性交[②]。她们使我相信，世界之所以还没有被最终毁灭，正是因为有像我母亲和尼哈玛一样有责任感的公民和那些看报纸并且有主张的人们的存在。像我这样的寄生虫是幸运的，因为有人在为我们做艰苦的工作。

母亲和尼哈玛一连好几个小时地讨论工党在竞选中的失败。她们批评电视上的竞选宣传，研究自杀炸弹的时机，分析西蒙·佩雷斯的个性。她俩都很喜欢西蒙·佩雷斯，却都在不停地骂他，就像是在

① 由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矛盾，阿拉伯人很想把犹太人赶出这块土地，把他们都赶到海里去。

② 正统的犹太教徒认为性交只是繁衍后代的必经途径，而非行乐之事，他们行房事时不见对方面，以一条挖了个窟窿的床单相隔。

批评一个考试不及格的孩子一样。有时候，我觉得母亲、尼哈玛和竞选所构成的三角是一种永动装置，一台永远不会停止的机器。就算不断变暖的地球和不断扩张的宇宙终结了，在那永恒的空间里还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在批判比比·内塔尼亚胡的美国式打扮，在谴责那些拒绝在审判日①投票的不负责任的极左派成员。

阿曼德听着他们的谈论暗自发笑。政治远不如收藏诗集和古典音乐更能引起他的兴趣。同我一样，阿曼德也是一个逃避者。也许他只是没有力量和我母亲、尤其是和尼哈玛争论，因为她们对他的观点根本充耳不闻。他说，他认为在各个政治派别之间没有什么好选择的，除非是在西班牙系犹太资产阶级出现、西班牙系犹太人当上总理的时候。母亲和尼哈玛冲着他叫嚷，指责他不愿意参与她们关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争论。但有的时候，她们让他参加讨论，他就会用温柔的诗篇来描绘他记忆中的移民过渡营生活。于是尼哈玛就会夸张地连打几个哈欠。母亲则点点头，然后很快地转换话题，并又咕哝说她还是不理解所发生过的一切。



"所发生过的一切"，指的当然是总理遇刺事件。

我仍很清楚地记得那段时期，不仅仅因为降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那种普遍的沮丧感，还因为在那些日子里我终于得出了"苏珊娜母女连通器原理"。接下来我将解释这个原理。

很久以前我就注意到像我们母女之间的这种亲密而且特殊的关系产生了一个现象的独立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一个基本的原理，一切都围绕着它运转。这个原理很复杂，充满着微妙之处。但原理本身很简单：当母亲强壮而自信的时候，我则软弱而胆怯。这是通常的情况，但还有一种很少发生的情况。也许正是因为它很少发生，所以才花了我这么多年的时间搞清楚这个物理定律：只要母亲一变软弱，胆

① 审判日：即犹太新年，在公历9月。在《圣经》中，它被规定为新的一年的开始。这一天不是个欢快的日子，人们只是默默地休息，并吹羊角号以示纪念。后来，经师(Rabbi)在《米市纳》中又称之为"审判日"和"纪念日"，认为在这一天所有的人都要在上帝面前经过，并接受圣地的审判。



小如鼠、依赖性强的苏珊娜就会变成一只充满着威力和能量的小老虎。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并不是出于意愿的行为所造成的，就如因为指挥官在战场上受伤流血倒下，下士就站出指挥一样。也不是根据存在判断的规则做出有意识的选择的结果。不是的。它只是很自然地发生了。我无意中羞愧地发现，母亲的弱化非但没有使我悲哀和关注，反而让我感到了一种隐藏的、无法名状的喜悦。由于这种转变并不经常发生，并且母亲也不可能放弃她在营中首当其冲的坚强女性身份，我从未被迫面对过这种强烈得令人困窘的感觉——直至我们的总理遇刺。

总理遭暗杀使母亲完全崩溃了，仿佛总理的死亡明确表明了母亲死亡的可能。当她听到电视的官方公告后，发出了一声令我血液冰冷的尖叫，接着就开始哭泣。尼哈玛已经冲进了我们的房子，表情呆滞。阿曼德也很快赶来，同样处于一种震惊的状态。我们试图让母亲平静下来。可是无论我们怎么努力，她就是没办法不哭。她哭了整整一个礼拜，不知疲倦，无法安抚。另一方面，我感到自己体内有一股不断上升的力量，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把房子收拾得井井有条，尽我所能安慰母亲，耐心地哄她吃饭。我甚至允许自己生气并责备母亲。例如，我说她对父亲的死也没有这样悲痛，她则像个孩子一样顺从地回答说："但我们几乎就是一家人啊。他和我们同样姓拉宾。"那一刻，我确信她已经开始不正常了。我第一次考虑她死后我将会怎样。毕竟，她比我老。她终将死得比我早。到时候，我要怎么生存？我吃什么？我会爱谁？我无法和母亲谈论这一切，她不想与任何人交谈。一连好几天，她与尼哈玛和阿曼德一起看老照片，读报纸上的每一条新闻，看电视里的每一个节目。她不停地哭。刺杀事件过了三个星期，她依然点着追悼蜡烛，我终于忍不住冲她喊道："别点了，已经点得够久了！"她服从了。从那一刻开始，一切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苏珊娜母女连通器原理"得到了它的最终定义。

就这样，全国陷入了一片哀伤之中，母亲也是其中的一分子。至

于我，当然是感觉不错。很幸运，客人也一样感觉很好。母亲被我们的无动于衷所震惊。由于客人已经和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母亲也敢批评他了。

“我不理解这种冷漠。尼奥，难道你不关心发生的事情?”

“我非常关心，艾达。”客人回答道。他正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脸藏在报纸背后。“可我能做些什么呢？你们都得到了你们想要的。所有的国家都有一个它应有的政府。”

尼哈玛对这个话题也有意见要发表，“你这也叫关心？你甚至连票也懒得投！”

“利波太太，你想让我投谁的票呢？那些所谓左翼梅雷兹党(Meretz)的法西斯分子吗?”说完，他往嘴里扔了一颗葡萄。他旁边有一个装着大串葡萄的盘子，这令他身上散发出一种颓废的享乐主义者的气息。

“我同意尼哈玛的看法，”母亲说，“你不喜欢梅雷兹党，你不投他们的票。那就投共产党的票啊，投阿拉伯人的票啊，你倒是投票呀。我不知道赫伯怎么会有一个你这样的儿子，对身边发生的一切这么无动于衷。”



“作为赫伯的儿子，我不认可国家这个机制。更不用说去认可这个自称以色列国的人为的帝国主义实体了。”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去当一个恐怖分子呢?”尼哈玛冷言相讥。

“利波太太，你可真是感觉敏锐啊。我不但参加了，而且我现在正承担着谢赫·亚辛[1]分配的一项特殊任务，要去炸掉‘不骗你’超市。A'lan ana bi-muhimme khassa min qibel el Sheikh Yasin Bi-tafjir el Super Duper.”客人还炫耀地用流利的阿拉伯语说了一遍。

“你继续笑吧。看得出你有点左派。我也是一个左派。的确有一些人不投票，他们以有精神病为名而退出军队住在国外。可也许你不相信，他们也发表自己的看法。”

---

① 谢赫·艾哈迈德·亚辛：是哈马斯的缔造者和精神领袖。



“尼哈玛，那是出于和平主义，不是无动于衷。你知道那些关心环境、关心动物的年轻人。”母亲插进来护着客人，虽然她内心深处觉得尼哈玛的看法也不完全错误。

“他们当然关心动物。他们还会把他们的家人早早送进坟墓。但要是有人对哪个库茨维勒发出嘘声，就会被他们送上法庭。他们不屑于投票！他们那么忙于嗅闻鲜花和亲吻阿拉伯人，以至于我们在竞选中输给了那些法西斯分子和宗教信徒！”

“你们为什么就该在竞选中获胜呢？来，告诉我为什么。”客人越说越来劲，“你凭什么反对宗教信徒？至少，他们的行动是有合理的局部利益作为基础的。你们呢？你们接管了这个国家。你们讲希伯来语。可你们甚至不理解，除了犹太救世主信仰，这根本就没有什么正当理由。所谓的世俗犹太复国主义到底是在胡说些什么？这根本就是个逻辑矛盾！”

客人还不知道尼哈玛和逻辑矛盾就像《圣经》中的大卫和乔纳森一样关系亲密。

“自作聪明先生，我是以色列人，我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于这个事实我感觉很好！”尼哈玛边说边摆动她举起的食指。

“你当然自我感觉良好，因为你隐瞒了那些令你有权定居在这里、讲着希伯来语而不会有犯罪感的深层原因。要不然，你有什么权利使阿拉伯人不停地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我对阿拉伯人做什么了？我只是到我祖先的土地来定居。他们过去在这里拥有什么？什么也没有！除了两只山羊和一头骆驼。当他们见到我们的时候，才突然觉醒并意识到这是一个适合文明人居住的地方。”带着被控告的无辜者的正义表情，尼哈玛在邀请我和母亲加入高尚的改变现状的先驱联盟。

“我亲爱的利波太太，你真的以为犹太历史或者犹太人有可能从犹太宗教里脱离出来吗？这太荒谬了！犹太宗教就是犹太历史本身！所有这些世俗犹太复国主义都是肤浅的，建立在镇压和自我欺骗的基础之上的。你是一个世俗论者，一个世界主义者吗？那就请去住在乌

干达，讲世界语吧，之后我们再来讨论。至少利库德党人和宗教主义者还是理性而且作风一贯的。”

尼哈玛对这强烈的言论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厌恶。

“唉，这是多么有趣的观点啊！但你知道，全国宗教党（National Religious Party）也会要求你去投票的。”

“我是不会投票的，除非巴勒斯坦国被宣告成立。”说完这句，客人就回头继续看他的报纸去了。他已经厌倦了这场争论，今天他已经说得够多的了。

被这样一个让步的迹象所鼓舞，尼哈玛重新开始抨击客人：“我想你还没有认清这个国家的制度，破烂的巴枯宁①先生……”

我一句话也没说，因为我投过票了。

母亲说：“你们真是奇怪的一代。”同往常一样，她再次剥夺了我的个人体验，甚至像漠不关心这样私人的东西。我由此被划入了冷漠的一代。我不仅被我的私事和杂务所占据，还被整个一代人给淹没了。但是这一次，我并不介意。因为客人和我是一代人。我们两个都属于一个症候群。我们是一样的。至少在母亲的眼里。



尼哈玛看不得肚子肿胀的非洲儿童。新开发城镇里受屈辱的失业者们忧郁的眼神使阿曼德的心都碎了。一想到那些打骂甚至谋杀自己妻子的丈夫，母亲就热血沸腾。而我，苏珊娜·拉宾，从自己被保护的洞穴里凝视外部的世界。一个秘密地崇拜上帝力量的世界。一个充满着为了征服太阳下的土地而不惜相互践踏的人类的世界。我对此有什么感觉并不重要。不采取行动的感觉是毫无价值的。就像一次流产，一个死胎，一个不会降临人世的生命。

最好是闭嘴，或者同客人交谈。

我们夜谈后的第二天，客人遵守自己的诺言，当晚带回了几盒昂贵的炭画笔和一沓优质的画纸。我们首先为蓝色花瓶画素描。对我而言，作为经过几周交涉而签订的协议的象征，这个蓝花瓶是我们所

① 巴枯宁（Mikhail A Bakunin，1814—1876）：俄罗斯无政府主义先驱。



有画里最突出的。苏珊娜·拉宾和尼奥·阿拉法特。客人当然不知道蓝花瓶的象征意义和选择它的原因。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相互为对方画素描。我们画侧面、四分之三侧面和正面的肖像素描。画半身的、全身的、坐着的、躺在沙发上手支着下巴的。我们既画速写，也作慢而细致的画。毫无疑问，客人是个作画行家，我甚至不会去想跟他比试。他的画有时候像丢勒一样重于细节和精确，有时候带有达·芬奇式的那种惹目的肉欲，有时又如科克托①一般粗犷简约。

他外出的时候，我就画一些他留给我画的物件——一个胡桃、一块从碗里悬垂下来的起皱的天鹅绒布、一把扇子、一件阿曼德从塞浦路斯带回来的阿芙罗狄蒂女神小雕像，或一堆放在闹钟旁边的书籍。

后来，我们开始画母亲，画她的各种姿态。比如她严肃而略带着笑意坐在厨房的炉子边专心读报的样子。我们在公园里碰到了吉第·伯查科和他的狗，于是我们也画他们。我们画卡秋莎，画到我家收有线电视费的那个人，画修理淋浴水压的管子工乌兹。我们给画得比较好的作品喷上定色剂以防被弄脏，并将其放在一个特别的纸板夹里。客人给这个夹子贴了一个大大的标签，上面用金墨写着："尼奥与苏珊娜，1996 年 7 月。"那些画得比较糟糕的则被扔掉。两个星期后，客人看着我最新的作品，毫不掩饰自己的满意，夸奖我有进步，笔法变得娴熟了，画面的线条也灵活了。

"为了祝贺你的进步，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他手舞足蹈地宣称。我以为他肯定是要送我一盒特别的颜料或类似的礼物。之前，我就已经注意到，他总是通过赠送昂贵的礼物来表达他情感。但是，他却从沙发上站起，把头发用橡皮筋扎起来，一点也没有要离开房间去拿奖品来给我的意思。接着，他走到墙边，把那株喜林芋和放杂志的篮子挪到一边，迅速退后一步，转过身来，做了个倒立。他的头发垂到涨红的脸上，平平的肚子向前拱着，两只脚拼命地附着在墙上以保持平衡。

---

① 科克托(Jean Cocteau，1889—1963)：法国诗人，擅长绘画，素描尤为出色。他有许多作品都用自己的素描作插图，作为业余画家与著名画家毕加索友好。多才多艺的科克托被誉为"巴黎才子"。1955 年入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过了几秒钟，他大概觉得他的新技能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便咚的一声重重地摔到地上，手脚乱七八糟地摊落下来，仿佛已经脱离了它们主人的身体而成为了一摊互不关联的东西。听到这一声巨响，母亲握着切肉刀一下子冲进了客厅，就像电影《精神病患者》[1]里的安东尼·帕金斯打扮成患者母亲的样子。还没等她有机会发出惊叫，那散落的四肢已经完好无损地回到客人身上。他双颊通红，两眼发光，披散着头发坐在地上，一边揉着被碰青的膝盖，一边得意扬扬地看着我们。

"你以为如何，苏珊娜？这个近乎完美的倒立可是我秘密地进行了累人的练习后的成果啊。正如你所见到的，我还没有达到能够倒立着休息并清楚思考的阶段，但将来我一定做得到。"

他从地上站了起来，揉着被摔痛的部位，走到母亲跟前想亲一下她的脸颊。"艾达，你想要杀谁呀？"他指着那把刀说。

母亲摸摸他的头发，用手指把它们理顺，摸摸他的头说："也不小心一点，你这孩子。我听到响声还以为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我的心跳都快停了。"



听了这话，我的心不禁缩了一下。我突然为自己的开心感到一丝内疚。最近这几个星期，客人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以至于我完全忘记了母亲的存在。急于在即兴画学习上取得成绩，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和母亲一起每天外出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看，为处理我们的生活问题，母亲每天都要拖着她年老的身躯走在大太阳底下，去和邮局、所得税以及国民保险的各方官员打交道，好使她的苏珊娜公主能够背对着风扇画盆栽的植物和胡桃。

母亲继续茫然地摸着客人的头发。他的脸做出各种夸张的疼痛表情，手揉着身上摔疼的地方。母亲的脸充满柔情，她母性的表情和手里的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此奇怪而生动的一幕令我突然觉得自己并不认识她。她一定有什么秘密没有告诉我。不是指具体的细

---

① 希区柯克1960年拍摄的恐怖惊悚片，也称《惊魂记》。



节，比如她做过什么，去过哪里，而是思想。她的不与人知的思想。可事实上，为什么她不可以对我有秘密？难道我自己就没有不与人知的思想吗？我也有一些想法是做梦也不会告诉母亲的，更不用说被逼着说出来了。比如，我对客人的想法，更甚之者，当她引起我的反感或当我同情她时，我对她产生的那些不好的想法。

母亲有秘密生活的可能让我十分惊骇。这使我回想起十岁时的那个令人恐惧的夜晚。当时我经过父母的卧室，里面发出的一些窸窸窣窣的声音引得我好奇地偷窥。我看到他们俩一致地运动着，盖在他们身上的毯子勾勒出的身体形状产生了一种神话中多肢的双头怪物。我至今记得我是如何拼命地跑回自己的房间，恶心得呼吸都觉得困难，为自己看到他们不像父母的举动而感到羞耻，就好像一个肮脏的秘密被揭穿了一样，不光如此，还有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存在。

父母是没有秘密的人。父母是没有性生活的人。父母只能有主要集中在我们——他们的子女身上的有限愿望和小小希冀。从我们见到世上的第一缕光线的那一分钟起，父母的所有愿望就局限到了一个。尽管略有差异，这个愿望就是：希望子女幸福。对此，我们深信不疑。任何搅乱这种安排的事情都会吓坏我们。现在，正如那次偶然偷窥到父母做爱一样，我嗅到了一阵危险的混乱气息，感到自然的秩序正濒临崩溃，因为它正面对着现实的无数面目中的某一面。但是，我眼前这家庭的一幕，其不和谐感的来源是什么？是母亲手中的刀？还是她对抚摸客人头部的不断抚摸？还是两者兼而有之？他住进我们房子里的第一个晚上，母亲就和他一起喝法国白兰地，像一些巴黎的交际花一样聊天嬉笑，完全忘记了她朴实的以色列作风，她的男式发型，她脚上的勃肯①拖鞋和身上的朴素蓬裙。从他到家的那一刻起，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之间那令人愉快而且直接的友谊。多年前的那个夜晚，我付出代价知道了一个事实：父母不仅仅为他们的子女活着。那是什么阻止他们继续日复一日地拥有秘密的生活，忽略子女的兴趣

---

① 勃肯鞋由德国具有230年历史的Biekenstock公司制造。

和需要以追求他们自己的自私欲望呢?

但另外一方面,她是我的母亲。一个爱我胜于一切的人。没有人像她一样爱过我,或会像她一样爱我。她对我的爱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投入、最无私的爱。可她为什么要抚摩他的头发?难道她已经忘记了,她早就不再当自己是女人了吗?在我们买我那有两只小唐老鸭的第一只胸罩的时候,她已经把女性之火传递给了我。是的,就是的。那天,我把她喊到厕所,低着头指给她看我针织内裤上的第一摊血迹时,她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而她自己的女性气质也就此终结了。她不厌其烦地传授我有关如何清洗、卫生巾、情绪变化和经痛等知识。老实说,我必须承认这一切的最终结果也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女人。我苏珊娜·拉宾甚至不能算是一个两性人,而是一个天生的阉人,就像小时候玩过的布娃娃一样。那些娃娃留着长发并穿着裙子,我怀着不明不白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拉下它们的小裤子,却总是失望地发现她们两腿间只有一块无缝的粉红塑料。

那又怎样。不管我算不算真正的女人,这座房子里的女性气息都是属于我的。这是一种隐晦的气息,就像生活本身。母亲没有权利拥有自己的生活。这就是规则,是双方签字同意了的。作为回报,我是永远属于她的。这是一份庄重的回报,一份可观的回报。她有权抚摩他的头发,只因为他对我有好处。因为他和我做朋友,对我的社交能力和自信心有正面的影响。因为我已经不再小便在那个蓝花瓶里。因为他,我差点去咬一条狗。因为有个家是件好事。但是,她没有权利,绝对没有任何权利去抚摩他,因为他是男人,一个英俊的男人。

别胡思乱想了,好嫉妒的苏珊娜,她可是你的母亲。

我是在胡思乱想吗?尼哈玛说过,你是一个妄想狂并不代表你没有敌人。

"妈妈,你为什么不去泡茶?"我对自己自然而平常的声音感到惊讶。

"噢,当然。我马上去泡。我为什么不顺便把晚饭也给做了?"

她的最后一句话是特地说给客人听的。至于我,她知道,等客人





回自己房间看书后,再给我做饭也不迟。

“好主意,艾达。我都快饿死了。除了早上吃过一个羊角面包,我一直忘了吃东西。”客人讨好地说。他从来不说有点饿或有点累。他总是说“饿死了”,“完蛋了”,“垮了”。可是他的语调里从来没有人们期望中的那种歇斯底里的夸张,而是带着一种悲伤的克制。似乎他的感觉要比常人强烈好多倍,以至于任何与别人交流感觉的尝试都注定要受到挫折。

“艾达,你看过苏珊娜最近画的那些画没有?”当母亲把一碗色拉放在厨房餐桌上,并坐在他对面时,他问道。我和客人都坐在餐桌旁,手已经洗过,就像两个有教养的孩子,看着母亲把越来越多的家常菜摆在我俩面前。为了装点门面,她也在我面前放了一个盘子。虽然客人早就知道了我节食的原因,我们还是样子做得好像我肚子不饿、只是乐于跟大家做伴似的。

“我当然看过了。”母亲把一片厚厚的法式面包放在客人的盘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这么显著的成果,真是不可思议啊。”母亲老套的恭维方式令我感到羞愧。客人对自己的教学成果十分自豪,所以他并没有注意母亲的用词。

“你还没有看到更好的。她只要继续努力画。哦,苏珊娜,你真是了不起。成功的百分之三十取决于决心和毅力。”

“那剩下的百分之七十呢?”母亲问。

客人打开一罐酸奶油,舔了舔盖子。

“这还用问吗,艾达?当然是天赋。当然还包括一些别的才能,像创造力、文化视野、表达能力等等这些不太重要的东西。”

“那么,作为专家,你认为她是个天才吗?”

母亲毫无疑问是个天才。至于为什么,我也说不准。但是她用短短一句话就能成功地既恭维了客人又使我万分难堪,表明了她相当的聪明才智。我双手捧着杯子,两眼盯着杯里的琥珀色液体,恨不得里面能有个缝让我钻进去。

“我算个屁专家。但认真来讲,现在做判断还为时过早。我真的

还不太理解这些东西。什么过程、开端、萌芽、闪现。我只知道，真正的好东西根本不需要吹嘘。”

“你可真是太谦虚了。”母亲把色拉碗推到他面前。“不过这倒使我想起来，苏珊娜，莉维基今天打电话来了。我们得过去看看她。她在电话里说，她已经为你准备了一张市政课程和活动清单，这样你就可以从里面选一些你感兴趣的。”

“好的，”我咕哝着说，“下个星期吧。”

“我不明白你上那些无聊的课有什么用。”虽然客人早就知道有些话是不应当说的，可我们的共同成功令客人的兴致高涨，话也不禁说得有点过火了。“还不如去申请上一所正规的学校，比如拉马夏沙隆①的那所大学。”

他端起碗，拨了一大份色拉到自己的盘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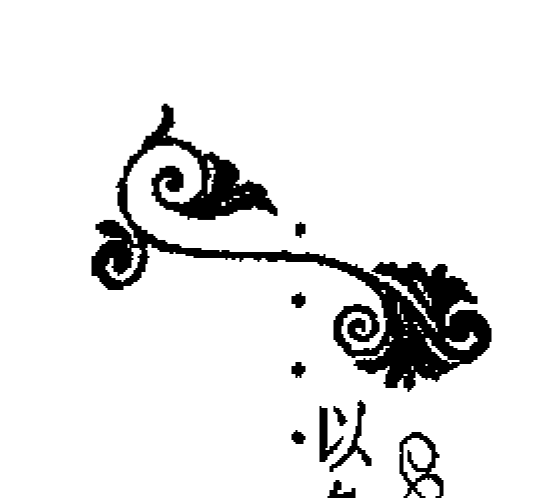
那是我第一次想知道，关于我，母亲私下里都告诉了他些什么？肯定不少。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停止过想这件事。他是从哪里知道我的事的？当然不会是我自己告诉他的。母亲有没有告诉他我上课呕吐的那件事？那是我在视觉艺术学校的时候，作为能够继续在那里上课的条件，我必须当着全体师生的面谈谈我的作品，可是我讲到一半的时候就吐了，吐得到处都是。母亲有没有详细告诉过他我在私人诊所和政府医疗机构接受过的那些治疗？那些治疗是为了让我走出自闭，为了使我能够适应有陌生人的场合、能够正常地表达自己、正常地学习，比如向陌生人问时间或者借个火。她有没有累加过他们瞒着我——她的多疑的宝贝女儿——一起亲密度过的时间？他们的友谊是不是部分地建立在对我的嘲弄之上？毫无疑问，一定是的。

我抬眼看了看客人。他左手端着色拉碗，嘴巴舔着右手手指头上不小心沾到的色拉汁。

“来点色拉吗？苏姗娜。”他把脸转向我，这张脸比以往更轻松更美丽。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那么随意，就像他在餐馆里和约会对象热

① 拉马夏沙隆(Ramat Hasharon)：以色列城市名。





烈交谈到一半时一样。我不用将目光从他脸上移开，我的左耳耳尖和左半边脸庞就感觉到了母亲即刻的警觉，感觉到她正在调动能量保护我，想要快速而且有效地支起一面保护伞。她眼里似乎发出红色的危险信号，"火，火，火。"太迟了，你这个叛徒。

"好的，谢谢。"我说，并从他手里接过色拉碗。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的手竟然没有发抖。我慢慢地把碗端到面前，舀了满满两勺色拉到自己的盘子里。然后，我又以同样缓慢的速度把碗还给客人，好让他把碗放回桌上。我拿起盘子边上的刀叉，在餐刀的帮助下叉起一小撮色拉，送到嘴里。我闭着嘴巴，像温莎公爵夫人一样不紧不慢地嚼动。嚼完吞了一下，把食物送到喉咙，我喝了一口茶，说："那么，莉维基具体说了什么？我希望今年他们最终能把高级陶艺课开出来。我已经听够了他们的承诺。"

要给牡蛎多加点柠檬汁吗，查尔斯爵士？

一个性变态者躺在公园里，等待小女孩们芭蕾舞下课回家。他的感觉是多么微妙！他从远处望着那些小女孩。她们相互交谈着，背包里放着小芭蕾舞鞋（黑色的是初学者穿的，粉红缎子的脚尖鞋是熟练者穿的）和汗湿了的紧身衣，散发着青春期特有的香甜味。她们越走越近，发育中的乳房在T恤衫下跳动——在普通成年人的眼里只是未发育的乳腺，但在我们主人公的眼里却充满了生机和意义。在她们只差一步就和他处于一条直线上的时候，他迅速地从一片土灰色的杜鹃花丛里站起并跳出来——敞开黑色的雨衣，把勃起的性器官展现在小芭蕾舞演员们的眼前——她们愣了一下，接着拔腿就逃，一边跑一边回头看那个坏蛋有没有追上来，细腿在小路上扬起一片尘土。是的，那一瞬间，就是从她们呆站着到她们觉醒过来并飞跑开之间的那几秒钟，就是那个下体裸露癖者所等待的。受害者脸上出现的惊恐是他愉悦的源泉。

如同那个性变态者，那一刻，母亲的脸上震惊慌乱的表情令我欣喜。与那些步履轻盈的小女生不同，她不能站起跑开，所以我的愉悦能持续得更久，并且越来越强烈。当可怜的性变态者终于敢用他唯一

能做到的行动来表达爱意,他还需要什么?那些睁大的、被惊呆的眼睛,那些如同喷泉雕塑般僵硬的小小身躯——他完全沉浸在巨大的喜悦和胜利之中。

我倒要看看这次是谁抚摩谁的头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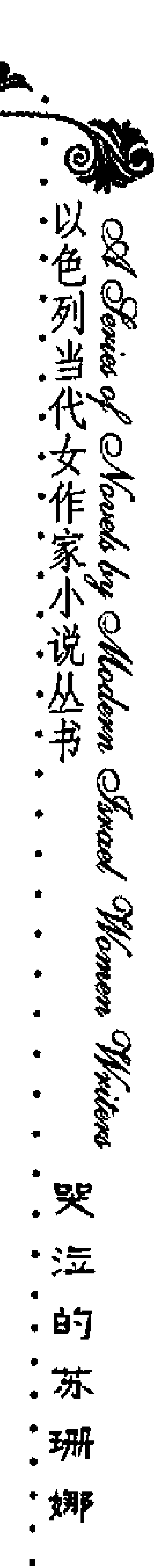
我失望地看到,当母亲一意识到我的行为并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她马上对自己刚才的举动后悔了,脸上的震惊也变成了难以抑制的兴奋。饭还没吃完。我吃了一片法式面包和两块加工好的三角形干酪,又吃了一片法式面包,这次是就着糖和奶油。我们都尽量表现得像平时一样,但只有客人能够完全做到这点。他闲聊着,说起那对兄妹的故事,那套他想买的圣像是从他们祖母那里继承来的。我尽量和他配合,一边慢慢吃一边提出问题。当得知那对兄妹的父母五年前死于一场车祸,我为他们家经历的悲剧而感叹,点头表示理解他们面临的两难处境:一方面希望能保住这套珍贵的收藏品,另一方面又急切需要一笔钱,搬到特拉维夫去上大学。

只有母亲没能装得像样一些。噢,芭蕾舞者。噢,天鹅。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用舌头发出啧、啧、啧的声音,就像母亲和尼哈玛看到电影里的男主人公欺骗妻子,或者看到CNN[①]电视台播出以色列士兵殴打巴勒斯坦小孩时所发出的声音。她直挺挺地坐着,漠然地拨着盘子里的食物,她的脑子完全被她眼前发生的事情引发的思考和感觉所占据。她的眼睛和鼻子发红。就连为了掩饰情绪而吃东西的时候,喉咙都在发抖。她不停地给我们的盘子加菜,直到桌上的东西几乎都被吃光了——客人坚持要把事情引向痛苦的结局,好像把我当众吃东西这一行为留在象征领域里会削弱我成功的意义一样。

直到我们吃完饭坐到客厅里,母亲端来咖啡和饼干,然后坐在我们对面的深陷的扶手椅里时,她坦白直率的谈话能力才恢复了过来。客人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带着一副精疲力竭的表情,那姿态似乎是在告诉大家:“我饱了”,或者像他通常说的:“我要爆炸了”。我坐在



① CNN:美国有线电视网络,以提供即时电视新闻报道而闻名。



他旁边，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饼干，使之成为一项不会停止的活动，以便能有足够的时间捕捉到事件里那些难以捉摸的东西。

母亲审视着我俩，目光在我俩身上来回游动。她一会看看嚼饼干的苏珊娜，一会看看撑饱了肚子的尼奥。脸上带着无限兴奋和激动的表情。

"我不知道该对你们说些什么，孩子们。尼奥，我都激动得快说不出话来了。你要知道，老实说，当我收到你母亲的来信时有多么担心。家里要来一个陌生人，谁知道会发生什么？虽然是一家人，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相处过。现在我看到发生了什么，我真是没话说。你们之间、我们之间的友谊真是太奇妙了，太令我高兴了。你知道，我早就习惯了在这世上只有我和苏珊娜相依为命的想法。感谢上帝，我们还有尼哈玛和阿曼德这样的朋友，和我们就像一家子似的。可是你来了，让我突然明白了一家人的真正含义。虽然你只是表亲，但我还是看到了你是如何成为苏珊娜真正的兄弟。就像找到了一个失散多年的和她年龄相近的兄弟。俗话说得好：血浓于水。真是一点也不假。我希望你知道，我待你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我也许是个多愁善感的老太婆，但我……"

她清了清嗓子，从围裙兜里拿出一块大大的皱成一团的男式手帕，擤了擤鼻子之后又紧接着擦掉快要流到脸颊上的眼泪。

我偷偷地望了客人一眼，想观察他对这场眼泪汪汪的演说有何感想。但他的脸黯淡而毫无表情，正在等母亲接着往下说。

"无论如何，尼奥，我想对你说声谢谢……为友谊……谢谢你……"

这下她真的哭了起来，大声地抽着鼻子，不停地用手帕来回地擤鼻子擦眼睛。

客人从沙发上滑下来，坐到母亲的椅子扶手上，一条手臂搭在她的双肩上。

"你都在说些什么啊，艾达？谢我干吗？我和你的感觉完全一样。别哭了，算我求你了。"

我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幕喜剧,感觉同他们十分疏远。

兄弟?我听到心里面有个声音发出了一声冷笑。如果我觉得他是我兄弟的话,或许我也就加入了这家人团聚的感人一幕,坐在另一边扶手上,流下感伤的泪水。可我不想要什么兄弟。我喜欢我现在这个样子。感谢,我才不感谢他呢。

那你想要什么?心里的那个歹毒的声音停止了嘲笑,试图让我进行冷静的思考。你想要什么?你希望客人成为什么?你的丈夫?你的情人?嗯?你这个愚蠢丑陋的乡下痴呆!

那个声音又开始冷笑了,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回响,而且越来越大声,大到令人无法忍受。我用双手紧紧地压住耳朵,直到声音消失,只剩下脑子里的嗡嗡声。我听到数十亿个不知疲惫的细胞一刻不停地把无数神经递质释放给突触,不断地传递信息,传递各种逻辑的、本能的、自动的、主动的和被动的反应。所有的声音,包括沙沙声和嗡嗡声,都合在一起汇成了一个宽广而低沉的绝妙声音——就像压在耳边的贝壳发出的无休止的海浪声。

在这低沉的咆哮声中,我听到洛尔卡[①]写的一部话剧中女主角说的一句话——我一时想不起那个女主角的名字或那部话剧的名字。

"我要喝掉他的血。慢慢地、一滴一滴地喝。这就是我想要的。"



① 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Federico Garcia Lorca,1898—1936):是20世纪西班牙最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



肚脐

炎热控制了所有街道。它缓慢而巧妙地增加着强度，入侵那些目前仍被欺骗性的遮蔽物所保护的角角落落。我们买了一个吊扇，是客人装上的。他的热情弥补了技术上的欠缺。他把天花板钻了个洞，使整座房子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白色粉末。客厅变成了冰雪女王宫殿里的房间。在母亲用抹布和清洁剂让魔法消失之前，客厅里所有家具和物件都是白色的。

母亲拒绝为天气而改变她的生活方式，对此我觉得既赞赏又内疚。她面临的炎热就像大卫对抗歌利亚巨人一样，怀着人类意志的力量是无穷的信念，她相信人的身体能够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凉爽。她每天都为易腐的肉体在持久的毒辣阳光下所获得的片刻胜利而高兴。即使晚间新闻报道农场里热死了成百上千只鸡，工地上的工人们和忘了喝水的普通市民遭受脱水，母亲仍然坚持每天早上外出忙她的杂务。

我则躲在家里，不到非不得已的时候决不出门。

我们不再去海边散步。表面上是因为天气炎热，但实际原因是尼哈玛病了。从初春开始，她就一直在抱怨身体虚弱、容易疲惫。我们一直以为她只是像往常一样无病呻吟，直到她宣布没有力气坐公车去特拉维夫。母亲很快相信了尼哈玛认为自己生病的看法，并取消了我们夏天的例行活动。从那之后，尼哈玛就把她的行动范围限制在她生存所必需的几项活动之内，比如去“不骗你”超市，当然还有来我家。

几天前电话铃响，也许是因为铃声在墙壁间不祥地回响着发出刺耳的噪音的缘故，我们都从中听出了有麻烦发生。母亲接听了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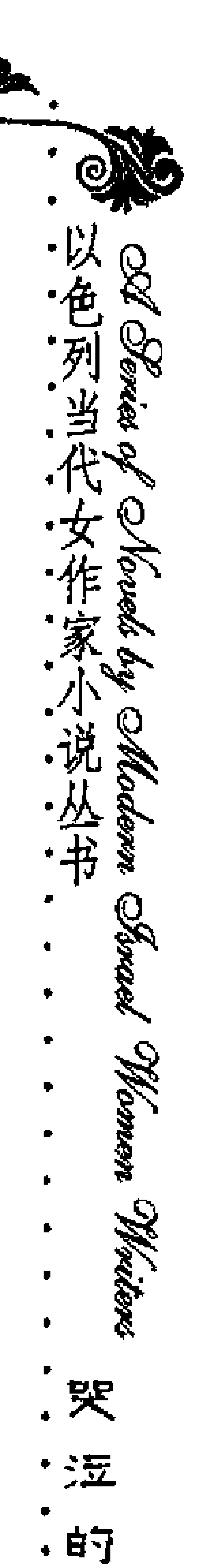
脸上带着严肃的神情，说了一声“喂”之后，她就不住地点头，偶尔“哎、哎”两声表示听懂。挂掉电话后，她神色凝重地告诉我，尼哈玛从楼上摔下来被送进了医院。我们不太清楚尼哈玛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只知道她已经从急诊室转到了内科。因为客人忘了带钥匙就出门了，我只好在家等他。母亲则赶去医院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并照料尼哈玛。晚上阿曼德陪着母亲回家时，我看得出情况不妙。她关掉电视，责怪我们在屋里抽了太多烟，令她感到呼吸困难。然后，她和阿曼德就像两个老练的旅行故事员一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详细告诉我们事情的整个经过。虽然从楼梯上摔下来并没有给尼哈玛造成什么大碍，只是有些淤伤和一根肋骨骨裂（尽管她滚下了半截楼梯），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最初的检查发现了神经衰退的迹象。虽然医生认为就此做最后的诊断还有点为时过早，但很明显这是一种严重的病症，有可能是多发性硬化症。他们决定让尼哈玛住院观察几天，出院后继续到诊所做定期检查。

虽然这整个事件的叙述方式是严肃而客观的，但我生平第一次在母亲和阿曼德的脸上看到了一种真正的失落。所有这些肯定尼哈玛病症的医学事实，不仅表明了她并不是一个容易大惊小怪而且多疑的人，也将人年老生病时的精神紧张转化成了不可避免的现实。这个现实不仅尼哈玛无法回避，我们也无法回避。与此同时，死亡不再是一个虚幻的灾祸，默默守候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而是变成了夜晚漆黑的街道上，谋杀者跟在我们身后发出的沉闷的脚步声。

即使是与此事不相关的客人也发出了“哇”、“天啊”之类的感叹。

在母亲看来，尼哈玛的病不过是整个国家正在遭遇不幸而产生的自然结果。既然她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来改善国家的状况，她便如同一个在封锁线上受挫的战士一样，满怀热情地把自己投入到照顾生病的朋友的事业中。尼哈玛出院后，母亲每天都陪她好几个小时，为她买日常用品和做家务，把她的近况通报给她儿子埃米尔和他的俄罗斯老婆。母亲咒骂尼哈玛的儿子和媳妇都应该下地狱，他们忙得连亲自来探望妈妈的时间都没有，而是从海法市远距离操控照顾的





事宜。

母亲之所以能够把那么多时间投入到对尼哈玛的悉心照料中去，是因为客人在照顾她那如同花朵般纤弱、小鹿般害羞的女儿。

我说不清楚是什么改变了我和客人之间关系的性质，使得我们密不可分，犹如心腹之交。或者如母亲所说的，形同兄妹。是因为那控制了万物的炎热吗？它将其强硬的法则强加于任何比它弱小的系统。还是因为客人感到孤独了？他的社交活动开始出现困难了。还是因为我对他的渴望？虽然我又开始变得胆怯，但我对他的渴望却在不断加强，突破防守我秘密的围墙，像有毒的废气一样伴随着每一阵微风扩散，所过之处无一不被它污染，无一不被它控制。但不管是因为什么，除了客人工作或睡觉的时候，我和他是形影不离。

我们的绘画课已经不如以前那么令人着迷了。随着我的绘画达到了一个令人满意的水平，我最初惊人的进步速率开始下降。但即便如此，我也不再像从前一样对画家这个职业感兴趣了。每隔几天，我才仔细地画一两幅画，那也只是为了享受客人俯身靠近我肩膀时的那种肌肤相亲的感觉。看他的指头被碳墨渐渐染黑，在纸上留下印迹；看他修改那些淡弱的线条，指出我的马虎和懒散；感觉他的呼吸伴着零碎的解说，轻拂过我的脖子和耳垂。

有时候，当他做乳蛋饼或修理房子里的东西时（母亲的精力充沛甚至成功地感染了他），我就在一旁注视着他。我在客厅里发现了一个地方，我喜欢从那个角度注视他，看他坐在设在厨房的临时办公室里，通过电话用希伯来语或英语安排会议和澄清问题。我好像一个偷听大人讲话的小女孩一样，那些本身无聊而模糊的话，却有着令人兴奋的神秘感。他说他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什么生意都能插一手的卡秋莎，不断地为他找到一些想卖艺术品的人。他和艺术品修复家瓦弟姆（他个头矮小、肩膀宽阔，除了害羞地跟我打个简短的招呼，从来不跟我说话）则不辞劳苦地拜访这些卖家，出价、照相、上保险、取得许可证和进行实验室检测。

有时候，我们就像两个早已把什么话都说尽了的老朋友一样，一

连几个小时静静地坐在一起看电视或者读一份报纸的不同版面。有时候，我在看书，客人则研究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行[1]的作品目录，或者读他买的那些美国杂志，如《时代》、《新闻周刊》、《细节》和《名利场》。他总是不断地购买这些杂志并且丢得屋里到处都是，甚至连卫生间里也有。我每次在卫生间看到这些杂志都觉得很尴尬，因为它们不由得令我想象客人屁股坐在马桶上，裤子褪到他细脚踝处，一边全神贯注地读一篇有关东亚经济形势的文章，一边拉屎的样子——哦，天啊！那种恶心的景象、声音、味道和想法。

如同那些宗教主义者解手的时候设法避免想到上帝一样，我学会了压制这些令人作呕的想法。我变成了一个违背自己意愿的偷窥者，被迫面对客人的低级生理活动，再次感到客人刚到我家时给所带来的那种恐惧。但是，令我惊奇的是，事实并不像我预料的那样——面对客人的这部分活动并没有使我感到恶心，而是有一种异样的、不自然的感觉。一开始，我闭上双眼，面向墙壁，为的是不看到那些色彩鲜艳的杂志躺在马桶和墙的窄缝间，这些杂志荒诞地证实了客人大便的频率。几天之后，我小心地捡起其中的一本，过了几分钟便急切地读起了一篇有关苏珊·萨兰登[2]的饮食习惯和政治观点的文章。从此，我和客人之间又多了一个不为他所知的共同点。这一次，是关系到了我们两人的排泄物。如果客人知道了，肯定会说：每个人都有其应有的共同点。

当然，我们之间也交谈。更准确地说是他讲、我听。

从他讲的故事里我永远无从了解他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满意。但知不知道又有什么区别呢？故事本身十分引人入胜，充满了对人类本质的微妙洞察，时而残酷，时而轻松有趣。有些故事带有一些自夸，对此客人会刻意加些自我批评来平衡。他是个讲逸事趣闻的高手。他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新奇事，这些事也只可能在他身上发



---

① 当今世界最有名的两家拍卖行，分别于1741年和1766年在伦敦成立。

② 苏珊·萨兰登：好莱坞女演员。1995年，49岁的苏珊·萨兰登凭《死囚漫步》（*Dead Man Walking*）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生。他在纽约和伦敦上大学时,不仅有成功的经历,也穿插一些违纪的事件和恶作剧。像他这么爱跟人唱反调并且无法无天的人,能够顺利地通过考试并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完全是靠他过人的艺术和学习天分。他的朋友和熟人既迷人又荒唐,并且个个都独一无二、与众不同。他们不得不屈尊于逸事趣闻的短小篇幅,事实上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经历都足够写一部长篇小说。

除了讲故事的才能,客人还展示了他的表演才能。他的表演天分早在到我家不久就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但此时,看到我这么喜欢听和不断想听他讲的故事,加上再也不必受可信度的限制,他的表演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并且达到了顶点。在他的演绎下,故事里的主人公们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带着他们所有的举止神情、他们的与众不同和荒诞不经。

我由此认识了他的许多朋友。如住在伦敦的安德烈·特罗伊卡洛夫。他出生于一个俄国贵族家庭,这个家族在十月革命期间移民到了英国。安德烈是个古董商,在新国王大街上拥有三家规模颇大的店面。他块头很大,总穿着合身的天鹅绒、丝绸或织锦做的特制西服。当他俩在皇家艺术学院上学的时候,他还曾经疯狂地爱上了客人。

我认识了桑德拉和尼奇,她俩在纽约开了一家画廊。她们是客人最要好的朋友。尼奇非常活泼好动,她甚至连脚和膝盖都被晒出了密密麻麻的雀斑。而桑德拉,是个荷兰裔苏里南人,在孤儿院里长大,以前当过模特儿。她得了一种叫做强迫性迟钝的精神疾病,需要催眠和药物治疗。

我认识了一个从以色列移居国外、名叫尼森姆·巴伯加尼的金发小伙子。他是个玩股票的金融怪才。他二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积累了三亿美元的身家,从此过起了每天钓鱼和读《大英百科全书》的退休生活。

我还认识了一个在本·耶胡达街开当铺的,名叫夏尔瓦的格鲁吉亚人。他老想卖赝品给客人。夏尔瓦特别恨艺术品修复家瓦弟姆,认为被他破坏了生意,并称瓦弟姆是那个取代克格勃的间谍组织的成

员。他奉劝客人尽早和瓦弟姆摆脱干系，否则会被国际刑警一起抓走。

一长串有趣的人物在我眼前晃过。客人的戏剧表演和叙述才能激发起我的想象力，把我的好奇和仰慕引向了极限。就像威尼斯狂欢节上狂欢游行者带着一群形形色色的情人，每个人都把脸藏在面具后面，所有一切显得如此不真实，脆弱得如同溢出酒杯的香槟泡沫一样。

我们有时候也一起下棋，我总是赢，除非是我怕客人下不了台才故意输一两局。每次我下到最后一步棋，并怯怯地说"将军"时，他就开始挠额头，抱怨说太累了，暗示他是因为精神头不好才输的，同时还一遍遍地审视棋盘看是不是真的被将死了。他会带着敌意注视我，觉得我肯定是用什么欺诈的手段把他给赢了，想要揭穿我似的。然后他就坐到电视机前，叽叽咕咕地抱怨说我故意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认为我这样闭门不出，每天有用不完的时间练习下棋，当然会棋艺大进，要是论下棋的天分，我肯定是比不上他的。

我们还一起去"不骗你"超市购物。我走过货架挑选要买的东西时，他则用流利的阿拉伯语跟阿齐兹聊天，严肃的脸上甚至带上了一抹微笑。有时候他也跟我一起去探望尼哈玛。她坐在一辆崭新的轮椅上，似乎还很虚弱，不怎么说话。在情况有所好转之前她得一直坐轮椅。

考虑到我们之间近乎单纯的关系，由客人代替母亲陪我去跟莉维基见面也就理所当然了。那天早上，太阳白晃晃的，客人戴着他那副漂亮的太阳眼镜，我则一路眯着眼睛走到公共汽车站，一起出发去拉马特陈①。

莉维基坐在办公桌前，桌上的电话本、黄页查号簿和病人们的材料被临时垒成了一摞，上面放着一盒打开的粉饼，她侧着脸对着粉盒里的小镜子，正在集中精力对付下巴上一颗顽固的痘疱。

客人走进办公室的那一刻所造成的戏剧性后果甚至令我都感到

① 拉马特陈：是拉马特甘的一个区。





惊奇。转瞬间，粉盒掉到地上，镜子被摔成了碎片，边上是一块块粉红色的碎粉饼。病人的材料在桌上到处散落着。莉维基眼睛盯着封面朝下掉到地上的电话簿，表情就像一个正在做心内直视手术的外科医生。

"你好，莉维基，"我试图用平淡的语气来缓和一下我们的突然出现所引起的小小骚动，"他是我们家的一个美国亲戚。我妈今天有点忙，不能过来。我们的一个朋友，尼哈玛，就是那个经常和我们一起去海边散步的朋友，她生病了。我妈要照料她，所以今天由他代替我妈来。尼奥，这是莉维基。莉维基，这是尼奥。"

"很高兴认识你。我叫莉维卡·芬瓦赛尔，社会工作者。"莉维基站起来一边自我介绍，一边把地上的碎粉盒踢到办公桌旁的文件柜底下。

"我是尼奥。"客人亮出他标准的自我介绍式微笑。

"很高兴你能来，"莉维基开始恢复常态。出于某种原因，她小心地把目光只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两个星期前，我给艾达打过电话。我已经为你把材料都备齐了，包括所有的课程和活动的介绍。今年有许多很好的机会。凡是市政局支助的活动都是免费的，由我们来付账。至于其他活动的费用，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得到减免。但是，首先你要看一下活动和课程的安排，然后决定你想要参加哪些。"莉维基迅速地在桌上的纸堆里翻找所要的文件。

"有没有开高级陶艺课？"客人插了一句。

这时，莉维基终于敢看他了，并且从这一刻起到会面结束，她的目光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我知道你了解了一些情况。你是她们的近亲，对吗？"

"我们是堂亲，"客人慢吞吞地答道，紧接着眼睛一眯，撒了个谎，"我从艾达和苏珊娜那里听到过许多关于你的好话。"

听了这句恭维话，莉维基开始软化了。"有亲戚在国外真是不错。我在罗马尼亚有一个姐姐。她到那边学牙科，还嫁了一个罗马尼亚人。"

客人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一副被打动的神情。

“那个人比我姐姐年纪大多了,”莉维基急着直接表明她的看法,“但我认为,如果他是个受人尊敬的体面人,年纪大小并没有什么关系。虽然我是一个热诚的女权主义者,我相信伴侣关系的重要性。现在是90年代,我们的方针不是互斥而是互补。这和70年代的情况不同,那会儿你必须要保留腋毛。现在,女人气不再是骂人的话。我认为:女人就是女人,男人就是男人。我们女人喷香水,你们男人给下身挠痒。关键在于机会的平等。我的看法对吗?给,苏珊娜,你现在不妨看看课程和活动表,然后我就可以帮你报名,把这件事给了结了。”她把一沓订在一起的课程纲要和其他相关资料一把推到我面前。

我随意地翻了翻这些材料。我只想尽快离开这里。整个会面突然变得毫无意义。莉维基正一个劲地跟客人调情,期待他的回应。我还指望能发生什么呢?把一个英俊的男人带到莉维基面前,无异于把一块还滴着血的新鲜生牛排扔给一只孟加拉虎。我诅咒自己犯下的错误,但已经太迟了。

“请原谅我冒昧地问一句,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莉维基一句话打破了冷场。

“做生意的,”客人微笑着回答,“但是你为什么要道歉呢?这个问题很正常啊。”

“请不要笑话我,我只是一时觉得,你不就是那个阿曼尼的广告模特吗?就是新出的须后水广告里的那个模特。实在是太像了。”说完,莉维基把嘴唇撅成爱神丘比特之弓的形状。我第一次注意到她的嘴唇和内阁部长戴维·利维的有多么相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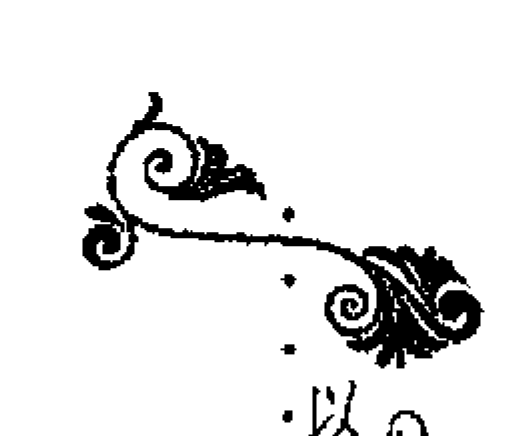
“我,阿曼尼的广告模特?”客人不禁大笑起来,他的腿轻轻地碰了碰我的椅子。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怎么了?”莉维基叫道,“我说了什么你们觉得这么好笑?”

“不是,不是,”客人赶紧安慰她,“只是私下里的一个家庭玩笑。”

这么说,我和客人之间有一些私下的玩笑喽。一阵欣喜直达我的脊椎。也许,他终究会保持对我的忠诚,不会把这次会面变成令人疲





愈的、使他可怜的堂姐不断感到尴尬的场面。我手中材料上的文字变得混乱无章。一门课接着一门课，就是没有高级陶艺课。

“那么，你是做什么生意的呢？”莉维基接着问。

“我是个艺术品经销商。现代艺术。准确地说，是后现代艺术。”

“真难以置信，”莉维基尖声说，“这一定是遗传！你们家的人都对艺术感兴趣。太令人惊奇了。”

“是的，”客人表示同意，“事实上，我今天和苏珊娜一起来，就是想跟你谈谈与这个话题有关的一些具体事情。不是说我不乐于跟你聊天，只是……”

可是，在她把注意力转移到她的工作和客户身上之前，她还有几件事情要说。

“我得告诉你，我自己对艺术也十分着迷。我总是被艺术所深深地吸引。我所有的男朋友都或多或少地跟艺术有点关系。”

莉维基眼睛上翻，做出一副缅怀往事的样子，用右手手指将她的男友们一一数过。

“他们中有的是电视播音员，有的是演员，还有的是音乐家。有一次我还差点交上一个导演男朋友，不过没有成。我太独立了，这点吓跑了不少男人。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待在家里的小女人，一个进得厅堂、入得厨房的女人。”说到这里，莉维基意味深长地打探了客人一眼。出于某种原因，她也用同样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仿佛我是一个在渴望权力的大男子主义者军队里服役的第五纵队成员。

客人刚要张嘴说话，马上就被莉维基打断了。她仿佛正被一股抑制不住的思绪推动着，一说就停不下来了。

“当然，一个女人拥有一个有声望的男人是不够的。女人同样要实现她们自己。”

“这是毫无疑问的。”客人说。

“就拿我来说吧，我修过一门研究柏拉图的函授课程。那真是一次令人充实的经历。我还学过钢琴、平版印刷、民族舞蹈、瑜伽、内观静坐、核物理、装饰结编织、痤疮摆体治疗、编剧，以及保持系统直肠收

缩。但我不觉得我已经实现了自我。要达到这一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莉维基谦虚地笑了笑。

尽管客人很快地插了一句"那正是我想……"还是被她打断了。

"我对自己想做的事有一些想法。我很乐意把这些想法告诉你，因为我觉得你肯定感兴趣。"

这一次，客人也懒得插嘴了。根据他的交际经验，他认为在能够与莉维基进行理性的谈话之前，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让她把想说的话一次说个够。莉维基却误以为是她说错了什么话，客人才沉默的。所以她马上把话锋一转，试图澄清她刚才的话可能造成的任何误解。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她又撅了撅嘴（像极了戴维·利维威胁要辞职时的样子），"社会工作者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职业。帮助他人会令自己感到莫大的充实。我以施为得。你能够体会由他人的快乐给自己带来的那种满足感吗？"

"我听说过。"本性自私的客人漫不经心地答道。

"但是，你知道的，有时候，你也得为自己做些事。因为，如果你一直不断地给予，难免会把自己给掏空的。有时候一个人也得为自己做点打算。"

"那是当然。"客人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培养自己的艺术才能。虽然我从来没有受过艺术培训，但坦率地说，我不认为艺术是可以学会的。"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客人说。

"艺术是发自内心的。"

"你说得对。"客人说。

"艺术来源于感受和直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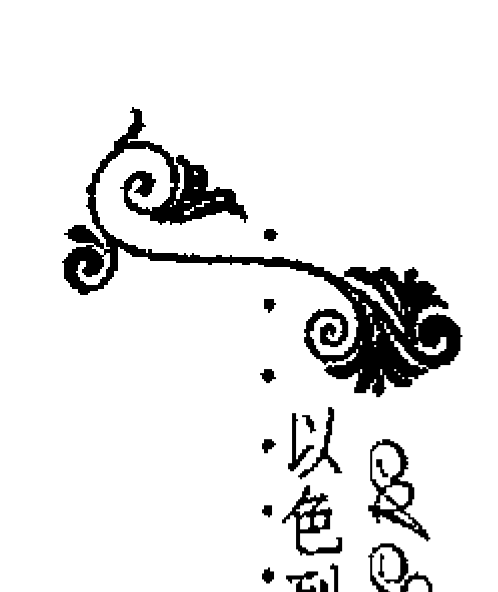
"没错。"客人说。

"所以，我的想法是，当我决定从事艺术事业的时候，我会直接办展览。我可不相信什么循序渐进。"

"未尝不可。"客人说。

"肚脐。"莉维基说完这个词就停住了，双眼发出犹如孤儿观看日





落时的那种目光。整个房间陷入了一片寂静。

“我想我没太听懂。”客人终于忍不住冒了一句。

“一个关于肚脐的展览。”莉维基脸上明显写着失望两个字。在跟客人达成一个近乎是心灵感应的理解之后，她还得用语言来表述。“给肚脐照相。各种人的肚脐，胖的、瘦的、老的、丑的。然后办一个摄影展。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我肯定这样做是对的。”

“这真令我震惊。”

“我就知道你是明白的。你知道，在以色列，什么都很小，土得很。这里的人对于稍微特别一点的事物就理解不了。不过我也听说在纽约有很多垃圾艺术。”

“毫无疑问。”客人说。

“可是，我现在被困在了这个门诊所，”莉维基伤感地总结了一句，“摆脱不了现实的掌控。跟卡夫卡说的几乎一模一样。”

“我肯定这不会很久的。”客人把座椅拉近办公桌，“莉维卡，我真高兴在政府部门里能够有你这样感性的人。相信我下面要讲的话，你一定能够理解并愿意帮忙。”

莉维基双手支着下巴。

客人接着说：“你看，这些课都挺不错的，但我认为苏珊娜需要更严格更全面的课程计划。我觉得她浪费在那些狗屎课程上的时间已经够多的了。”

他将我手里的课程说明一把拿走，扔到桌上。

“你为什么不为她看看长期的学习计划？那将会是真正的帮助和康复。”

客人严肃的样子使莉维基大吃一惊，她似乎突然意识到她刚才一直在闲扯，脸上露出一丝隐藏的怒意。刚才客人一直在误导她，并使她相信他对她本人和她的想法感兴趣，现在他却突然用一种干巴巴的、谈生意的方式跟她讲话。这令她十分的恼火。很清楚，她觉得自己被背叛了。他狡黠地使自己显得独特、重要而且迷人，令她将自己暴露在一个冷漠的陌生人面前。现在她明白了，那种两个心灵碰撞的

兴奋只是她单方面的感觉。

还有谁能比我更了解莉维基？我的心被怜悯刺痛了一下。但莉维基并不打算默默承受痛苦。客人背叛了她，则必须受到惩罚。

“考虑到各个相关的方面，我认为你所提出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她靠回椅背，点了支烟。

“为什么？”客人问。

莉维基吐了口烟，瞧了眼扔在桌上的材料，说：“作为她的家人，你必须明白苏珊娜有很多问题。非常多。”莉维基强调“问题”这个词，仿佛暗示这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说法。“事实是，前不久我们为她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机会，却被她拒绝了。确切地说，是被艾达拒绝了，而她是苏珊娜的法定监护人。所以，我们只好放弃了那个想法。”

“那个想法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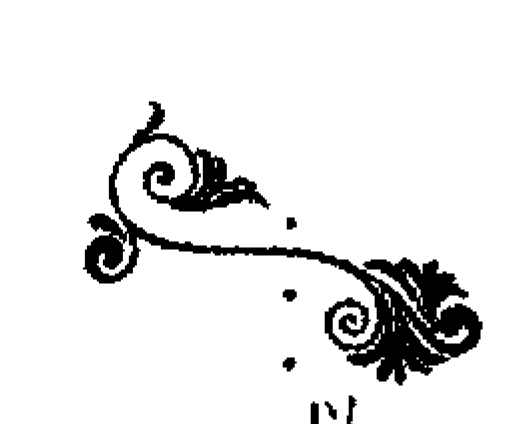
“送她去罗西皮那的艺术学院学习，这样的项目整个中东只有一个。”莉维基撅了一下嘴（样子就像利维部长有了新的预算方案）。“该项目百分之九十的资金都是由一个有亿万家产的慈善家提供的，还包括一栋重新装修过的土耳其建筑，个人公寓，工作室和免费的绘画材料等等。国内外顶尖的艺术家将会在那里授课。这个亿万富翁的交游甚广，他将请来各种国际名人。杰夫·库恩斯[1]将在那开办暑假研习班。相信我，他去教课可不是为了钱。全国只有二十四个申请者被接收，苏珊娜是其中一个。对于这样一个为天才而专门设立的项目，你还觉得不够严肃吗？但母女俩却拒绝了，她的名额就给别人了。”她用下巴指了指我。

“听着，”客人坚定地说，“我要你跟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再查一下这个事情。”

“没有什么好查的了。”莉维基有点扬扬得意地说。现在她要让客人明白，勾引一个无辜的女孩然后把她扔给狼群意味着什么。沉睡在每个女人心里的亚马孙族女战士都会在被冒牌王子亲吻时醒来，并把



① 杰夫·库恩斯（Jeff Koons）：出生于1955年，是美国现代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



他杀死。“名单已经定下来了。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争这个机会。两个月前艾达拒绝了，我便通知了学院。”

客人把身体往前倾，双手放在桌上，紧挨着莉维基的手。她的指甲有被嘴啃过的痕迹。她用指头敲着桌上的一份私人文件，文件上的标签写着“曼拉罕姆·史瑞奇，拉马特陈，378”。自从那晚他迷住母亲之后，这是他第二次施展他的魅力。他咬住下唇，仿佛在思考接下来该说什么。我能看到他那少女般的睫毛轻轻扇动，挡住他的眼睛，他的鼻子线条紧绷着，那蜥蜴般灵活的舌头伸出来舔了舔嘴唇又缩了回去。他的目光如此温柔，仿佛能把人给融化了似的。不，莉维基把她灵魂的艺术性袒露在他面前并不是徒劳无用的。他匍匐在她的脚下，像一只被驯服的幼狮，一个心甘情愿的奴隶，同时，又像是一个强悍、威严的家长。

“听我说，莉维基。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我碰到过许多坚强、聪明的人。他们懂得如何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像你这样能够将艺术感性与职业决断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人，却十分少见。所以，我知道，”他轻轻地、意味深长地把手放在莉维基的手上，“你一定能够帮苏珊娜安排好的。”

“但艾达不会同意的。你跟她打过招呼了吗?”莉维基可不想那么轻易妥协。

“这就交给我来办吧。我会说服艾达的。你要做的只是查出这个学习项目进展得如何了，以及怎样把苏珊娜安插回去。”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我的错觉，我看到他紧紧地握住了莉维基的手，深情地望着她的双眼。如同老太太不去健康维护组织看病一样顽固，莉维基做出最后的努力，试图阻止脸上的微笑。

“我可以试试。但在九月份之前，我什么也做不了，得等到快开学时。”

“慢慢来。”客人把手从莉维基的手上拿开。

我站了起来。虽然我知道，即便是更微妙的信息，也已经被莉维基的护身甲吞没，她凭借这密不透风的护身甲使自己不被残酷的现实

伤害。但是,客人赤裸裸的恭维之辞里仍有一些无礼的成分。他凭什么代表我?他怎么知道我要什么?什么对我最好?他有什么权利对我的命运负责?谁给他推翻我母亲决定的权利?

我想对他发火。但我的情绪被脑子里的各种念头给赶走了,仿佛它们是不带感情色彩的事实一样。我不能承认我感激客人所做的事,虽然他那样做十分粗鲁和冒昧。可是他的动机是那么的纯洁,我的任何猜疑和骄傲都不能将其抹杀。也许我也对违抗母亲的意愿而感到高兴——不用我自己说一句话,我的在场就促成了这次颠覆行动。

客人也站了起来。

"保持联系。"莉维基对我们摆了摆手,她看起来很疲惫,仿佛刚经历了一场外人看不到的内心折磨。

我和客人一起走到空无一人的公共汽车站。他似乎已经忘了刚才的会面,自个儿嘴里哼着一支英国小曲。显然,他不想跟我谈论刚刚发生过的事情。

"这里没有出租车。"我说。我们已经在公车站等了十分钟。客人已经厌倦了这种无产阶级的出行方式。他站着,像鹅一样把脖子伸得老长,看看街的这头,再看看街的那头,寻求解救。似乎只要他更使劲地看,就会得到回报,即出现一辆渴望的出租车。我的声音里一定是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因为客人马上停止了他徒劳的努力,在公车站的长凳上坐下来,拍拍旁边的塑料位子,示意我跟他坐在一起。

"你生我的气了?"

"我觉得你该问问我的意见。你为什么这么清楚我想要什么?连我自己都不太清楚?"

他想了想,说:"你说得对。但这个事可以这样看:我真的什么也没有做。没有发生什么革命性的改变。我只是重新给了你选择的机会。不管你选还是不选,都取决于你。"

一辆布满灰尘的公共汽车停在我们旁边。

"我们去特拉维夫吧,去喝杯咖啡。"客人突然决定。我们周围的景观——单调的公寓外墙、破旧的购物中心、一间杂货铺、一家蔬菜水





果店、一家文具店以及一个空荡荡的停车场——令他如此沮丧，以至于他愿意接受平民的交通方式，好离开这个令人不快的地方。可能，他还希望坐公共汽车能够限制我进一步的抱怨。

我们上了车。

我注视着前面的座椅后背。那上面满是划痕，皮往外翻着，中间被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心，两支箭从心的一边穿出，像两根硬化了的动脉。那两位渴望永恒的情人的名字是奥佛和扎哈维特。我试图在我的脑海里想象他们两人的样子。这很简单。奥佛是戈兰旅的一名士兵，剃着平头，眼睛闪闪发光，脸上长着青春痘。他有一把参军时哥哥送给他的瑞士小军刀。扎哈维特是个大屁股姑娘，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甜香。她认识所有的星座并懂得占星术。那晚他们也许去特拉维夫看了一场电影，也许去跳了一夜的舞，然后坐这辆车回来。一路上她时不时地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他们没有喝醉，却过于大声地说笑着。当奥佛把心形和他俩的名字刻在前面的座椅后背上时，扎哈维特不停地用她那手指甲上涂了颜色的手拍打他的手臂，调情地假装责备他。

客人坐在车窗旁默不作声。他当然不会想象奥佛和扎哈维特的故事来自娱自乐。他珍贵的思想可不会浪费在推测公物破坏者上。一个身材高大的妇女挎着一个篮子站在我身边的走道上。一捆像扫帚一样大的香菜从篮子里探出头来。她一手抓着扶手，身上的体臭不停地攻击我的鼻子。我想起了一部电影里女主角说的话：如果你的男朋友坐在靠窗的位子，你坐在靠走道的位子，他没有提出跟你换座位的话，那说明他并不爱你。想到这里，我的内心突然充满了深切的感伤。虽然我和客人之间的关系与这个说法没有丝毫的联系，尽管愚蠢，我还是相信。我开始觉得喉咙哽咽，鼻子发烫。我尽量控制自己，想一些符合逻辑的事情，或什么也不想，可我还是不够坚强。在到达特拉维夫前，我设法忍住了眼泪。但是车一拐进迪曾戈夫大街，我就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

我为着许多事情而哭，但我只能认出其中的一部分。其余的原因

不过是在我脑海中断断续续闪现出的一个个令人心碎的场景。以至于最后我竟然无法分出哪件事先发生，哪件事后发生。我为所有的事哭，毫无时间顺序，也毫无类别之分。剩下的只有沮丧、痛苦、伤心和无限的渴望。这些感觉连同所有的事情转化为一幅马赛克拼画，成为一个整体，使我的意识免于被撕成疯狂的碎片。

我哭泣，因为我永远都不可能跟客人一起坐飞机，更不用说我俩谁坐在靠窗的位子，谁坐在靠走道的位子了。

我哭泣，因为我肤色苍白、弯腰驼背，整个人被套在宽大的衣服里面，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人夸过我漂亮了，甚至连母亲也没有夸过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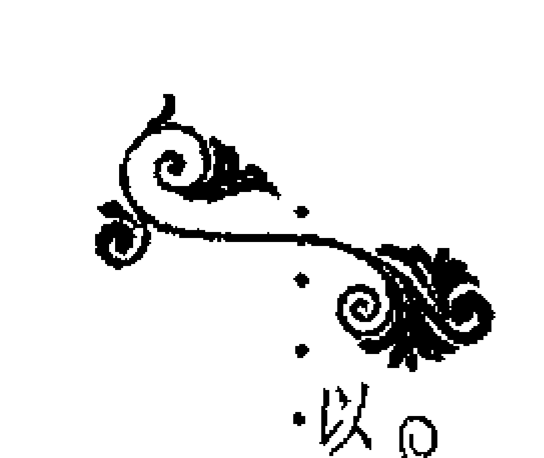
我哭泣，因为过去父亲常带着我一起冲澡，直到我八岁，长成一个大女孩。我们边洗澡，边又笑又唱。这时，母亲就会冲着父亲嚷嚷，“这可不行，阿弗兰穆，她现在是个大女孩了，再这样下去，她会有恋父情结的。”父亲一边用洗发水在我头上造出一大朵白云，一边回答母亲，“管她情结不情结，只要她爱她爸爸我就成。”



我哭泣，因为六年级的时候，我和蒂缇·瓦尔迪蒙抽烟时被她父母发现了，他们从此再也不让她和我做朋友了。当时，我始终相信我们是被迫分开的，有点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我常常在操场上向她招手，打暗号。直到有一天，我忍不住想见她，便躲在垃圾箱后面避开她父母。等她上完钢琴课回家，我跳出来站在她面前，对她说：“蒂缇，我们跑，找个地方谈谈。”但是，她却回答说她不想去。她说她正在学民族舞，还参加了青年运动。她觉得以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她是个小骗子，还偷抽烟等等。现在她是个诚实的孩子，她不再跟我交朋友并不是她父母逼的，是她自己愿意的。

我哭泣，因为父亲病危的时候，小流氓麦克尔（据说他后来成了瘾君子）常常站在离我们家几栋楼远的地方，等我路过的时候手淫。那个时候，我甚至不知道应该把这件事告诉谁。父亲是那么虚弱，我不想让他担心。

我哭泣，因为有一次父母把我送到一个集体农庄过暑假，我每次一走进食堂，就会引来农庄成员的目光，他们嘲笑我穿的银色网眼凉



鞋，那是母亲在特拉维夫中心车站旁买给我的。

我哭泣，因为很久以前，那还是在那场反以暴动[①]发生以前，我们全家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在大马士革门旁看到几个士兵正在逮捕一个阿拉伯小伙子。他双手背在脑后，被士兵押进车里。路过的人们依旧谈笑风生，只是随意地瞥他一眼，仿佛他是个卖杏汁或别的什么无聊东西的小贩。我试图捕捉他的目光，向他表明我与别的人不一样，我是个好人，我站在他这一边。但他充满仇恨的眼神划过我的脸庞，令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羞愧。

我哭泣，因为那一次我跟母亲、尼哈玛以及一群路人在特尔维夫的街头听一对年轻的外国男女吉他弹唱。一个男人从店铺里冲出来，要把这对街头流浪艺人赶走。我挺身而出想替那两个艺人说话，他却对我说："闭嘴，婊子。"在场的人没有一个站出来说一句话。

我哭泣，因为无论是我上课说话还是不做作业，父亲总是帮我抵制母亲甚至是老师的责备；如果我和朋友吵架了，即使是我错了，他也永远站在我的一边，不像母亲，她总想两边讨好。

我哭泣，因为过去我们一家三口每个周六都会去一家咖啡馆吃冰淇淋。在我变得这么糟之前，我们曾经是多么美满的一家子。

我哭泣，因为我没能成功地保留住哪怕一丁点儿父亲在世时的那股力量，那种受到保护的感觉，以及敢于面对世界的勇气。

我哭泣，因为一滴冰淇淋顺着母亲起了皱的两个乳房之间流下。

我哭泣，因为我像个白痴一样哭个不停，客人看到我陷于痛苦。可悲的是，我的痛苦不是源于贫穷或哀悼，而是源于自怜自哀。前者是高尚的，后者是可耻的。

我一哭不可收拾，疲于抵抗，索性把自己投入情感的旋涡中去，随波逐流，消极而乏力。眼泪淋淋，浑身发软。

至于客人，呵，他对这种场面已经有经验了，至少他自以为如此。

---

① Intifada 这个词是出自于阿拉伯文"起义"一词的谐音。1987 年 12 月 9 日，一辆犹太人的卡车闯入加沙地区"加伯利亚难民营"，轧死 4 名巴勒斯坦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怒火中烧，走上街头，展开与以色列当局持续 6 年的对抗。

最初，他神色自然，对我的哭泣完全置之不理，领着我顺着那发出恶臭的湿热的街道往下走，穿行于街上的人流。这些人尽管住在大城市里，却看上去令人不快。他们被辛苦的工作折磨得疲惫不堪、汗流浃背，行走于轰鸣的汽车、商店和咖啡馆之间。

“我们进去吗？”客人问。可是还没等我回答，他就把我推向了一股冷空气，那是从带空调的“迪曾戈夫中心”的入口处吹出来的。他紧紧抓住我的胳膊肘，带着我走过弯曲的走廊，时不时在看起来比较有趣的商店橱窗前停下，他显然想借着逛商场来分散我的注意力。我们在一家摆着古旧的地球仪、办公用品、打火机和昂贵钢笔的男士礼品店前停下。还在一家卖毛巾和浴袍的商店外面停下，这家店可以把你的名字绣在你买的每一件东西上。除此之外，我们还看了一家卖波斯地毯和中国花瓶的店，一家戏剧化妆品店，一家拉美登山用品专卖店，一家婚纱店，以及一家性用品店。这家店的展示橱窗藏在一块深色帘子后面，帘子上面贴了一张很小的海报，上面印的是各种各样玩具似的色彩鲜艳的避孕套，透漏出这家店的经营范围。



这期间，我仍然一直在哭。客人对我的眼泪毫不在意，除了偶尔对橱窗里的商品发表一点评价，多数时间都保持沉默。他把我当做正常人对待的努力感动了我，使我哭得更厉害了。就这样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他实在是受够了，便拽着我进了一家并不诱人的小咖啡馆，玻璃柜台里放着一些巨大的裹着保鲜膜的三明治。过道的正当中有两张小桌子，使往来的行人都能看到。他给自己点了一杯咖啡，为我点了一杯矿泉水，然后转向我，放弃了对我置之不理的勇敢尝试。尽管他说的话很难听，他的痛苦却是真实的。这使得我内心所涌出的受辱感渐渐被对客人的怜悯所取代，可怜他得跟我这样一个毫无条理的怪物打交道。

“听着，我是认真的：别哭了……我最讨厌女人哭了……我真不明白，你有什么好哭的？看电影你要哭，看到街上的乞丐你要哭，一个字说错了你也哭。做爱之后你会哭，得到礼物你会哭，看到有关饥饿儿童的新闻你会哭，吃饱了蛋糕你也会哭。这一次，连跟你的社工会面



之后也要哭……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这太可怕了……就算帮我个忙好不好？别哭了。否则这次我真要把你给杀了。”

我点了点头，抿着无力的嘴唇用吸管喝了口冰水。然而，越想克制，伤痛就越加剧，以至于我的嘴里又发出了呜咽声，而且大有转变成号啕大哭之势。

“好吧，好吧，”客人说，“我有个好主意。我们先去给你买副太阳眼镜，然后到楼下的电影院看看有什么电影在放，挑一部进去看。你说怎么样？”

不幸的苏珊娜·拉宾当然想参加这些吸引人的活动。特别是，有这么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能够容忍她不合宜的行为，向她发出邀请。行，可以，我点头答应，听起来非常不错。而且，这个主意确实不错。我走在客人身旁，从一侧观察他，想象着在所有过路人的眼里，他是个什么样子。所有女人眼里的他是什么样子的。长着一头乌黑的头发，完美的鼻子线条，还有那清澈的灰色眼睛透着一股子机灵劲。他可真帅！像他这般俊朗的人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啊？

美貌可以使最冷酷、最无情的人停止呼吸。美貌可以令人们相互杀戮、自我折磨、创作诗篇、征服国家。美貌可以让人发疯，引起爱、嫉妒和羡慕。美貌能给人以无限的快乐。美貌能挖掘出你自己从未认识到的品质，那些只有在你最疯狂的梦里才会有的才能。美貌既有疗伤的功效，也有邪恶的能量。美貌是花蜜、是毒药、是光明。美貌是无序的对立。每一天，美貌都在证明上帝的存在。

这都是有史以来众所周知的事实。不知道莉维基在她的柏拉图函授课中是否学到过。

男子的美貌比女子的更稀有——我继续遐想——男人羞于展现自己的美，他们把自己的美藏着掖着，轻视它、贬低它。在男性的优点排行榜上，美貌被排挤到一边，根本排不上号。

但男子的美貌依然存在。尽管被蔑视的乌云所遮挡，它仍然像雨天里的太阳一样，坚定地放出自己的光辉。它要求回到其本该在的位置，那个位置是古人们毫不犹豫地赋予它的。它要求公正。有时候，

公正会被实现，因为公正也想站出来面对现实的阴暗面。虽然我曾经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报道说有研究表明，受基因影响，男性比女性更公正，而女性则被善变的情绪所支配。但我确信，女性对待美貌要比男性公正得多。

这种公正在我们去的眼镜店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三个女售货员争相为客人服务。她们一个是中年妇女，另外两个是年轻人。面对这么英俊的顾客，三个女人显示出了多大的耐心和同情心啊！客人像是一个讨人厌的挑剔鬼——要她们拿出越来越多的太阳镜，要求看橱窗里的样品，打乱人家精心设计的展示布局，决定再看看那副已经被放回原位的太阳镜，诸如此类。我大概试了有三十副眼镜，我的脸被不停流出的眼泪沾湿。直到最后，客人把一副小巧的银边椭圆形太阳镜架在我红肿的鼻梁上，后退了两步，若有所思地咬咬大拇指，皱皱鼻子，叹了口气，顿了一会儿，终于说："就是它了。"

他把信用卡丢到柜台上。当他在账单上草草签字的时候，我设法瞥了一眼上面的数字。就这么普通的一件东西，那价钱着实令我吃了一惊。付过账，他又把我看了看，有点夸张地在我湿湿的脸蛋上捏了一把，叫道："真像个电影明星。"



电影院的售票处开着，但没人买票。客人让我站在明信片架旁等他。从那里，我一看到他脸上的神情，就明白电影已经开始了。他招手让我过去赶紧入场，两个人踉跄地上了台阶，跌跌撞撞地在充满了爆米花味的黑暗中摸索。我差点跌倒把他的脚指头给压碎，之后我们终于挤到了前排（跟银幕离得有点太近了），坐了下来。

"我非常想看这部电影有两年了。"客人低声说，"看的时候小声点哭。这是部很棒的电影。"说完，他把瘦长的侧面对着我，任我在黑暗里哭泣。我手里拿着装太阳镜的光面黑色眼镜盒，用手指头感觉盒盖上的文字，"Dolce & Gabbana"，试图摸出上面的每一个字母，好像我是在学盲文。我的泪水，在买太阳镜的过程中曾一度变得平缓，现在又开始寻找新的宣泄方式。这并不难。来吧，让我看看生活，我会找到哭泣的理由的。



银幕上，两个男的坐在出租车里正进行着关于汉堡包的无聊对话。其中那个黑人演员我不太认识，但他的拍档老影星约翰·特拉沃尔塔[①]着实把我吓了一跳，他变得又老又胖，头发油腻腻的。我记得蒂缇·瓦尔迪蒙的卧室里贴有一张他的大海报。海报上，他身穿雪白的西装，两腿分开双手举起，做出跳舞的样子。我还记得我们曾经一起把《周末狂热》这部电影看了大概七遍。我们十分崇拜约翰·特拉沃尔塔。不同的是，蒂缇是公开地喜爱，而我是悄悄地喜爱，甚至连蒂缇也没有告诉。我不指望会从她那里得到安慰。因为我知道，古怪、瘦削的苏珊娜·拉宾根本没有机会得到特拉沃尔塔的眷顾。相比之下，蒂缇个子高挑，一头耀眼的红发披到背上，七年级的时候就戴上黑色的胸罩了。我们俩都很清楚，假如她有机会碰到约翰·特拉沃尔塔，他一定会立马爱上她。因此，她有权利对他产生遐想，而我没有。我们不厌其烦地议论那个在电影中跟他演对手戏的女演员，说她的坏话。和特拉沃尔塔相比，她的表演是那么乏味那么普通。蒂缇会在家连续几个小时地模仿他在影片里的舞步，扭臀摆臂，指着天花板高唱"午夜狂欢，午夜狂欢，我们知道如何进行；午夜狂欢，午夜狂欢，我们知道如何表现"。每当电影放到他所扮演的明星对刚在汽车后座上跟他做过爱的影迷说"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都会引起我们的一阵爆笑。表面上我笑得很大声，但我内心知道，假如我遇见他，而他又屈尊注意到我的存在的话，他肯定也会对我说："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他也不会问我跟谁是不是有亲戚关系，因为他才不关心以色列、拉宾和六日战争呢。

在眼前的这部电影中，特拉沃尔塔带着一个举止傲慢的黑发女子去餐馆吃饭。他被要求和她到舞池里参加一场舞蹈比赛。于是，我再一次看到他跳舞。著名的约翰·特拉沃尔塔如今年老体胖，双脚穿着长筒袜，跨着流行的旋转舞步，懒惰地摆动他笨重的臀部。客人双眼注视着银幕，脸上一副陶醉的神情终于使我失去了控制。我在黑暗中

① 约翰·特拉沃尔塔：1954年2月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是当今好莱坞最重要的大明星兼演技派演员之一。

深深的孤独感被特拉沃尔塔的新面孔所触动，引发了一场暴风雨般泪水的爆发，并伴随着阵阵的咳嗽和大声的抽泣。客人不等周围的人对我们发出“嘘”声，就推着我顺着两排座位间的窄道，趺趺撞撞地往外走。当我们走到街上的时候，发现天已经黑了，但街上还是又热又臭。他把一支点着的香烟硬塞到我嘴里，然后给自己也点了一支，然后把我带到街对面叫出租车回家。他终于对我感到绝望，近乎冷淡地喃喃道：“我跟你完了。我特别想看这部电影，塔伦蒂诺①的最新作品。当它在纽约公映的时候，因为工作和一些个倒霉事，我错过了。这一次，则是因为你。我发誓，你完蛋了。”

家里散发出着一股令人愉快的温暖气息。母亲在厨房桌上留了张字条，说她今晚要晚点回家，晚饭已经帮我们准备好放在冰箱里了。我喝了杯水，走进客厅，坐在沙发上。我犹豫着是否应该回到自己的房间，在极度隔绝中独自度过这个丢脸的夜晚；还是应该待在原处，继续感到羞愧，但有客人的陪伴作为补偿。我听到厨房里盘子格格作响，冰箱开了又关……那是家的声音。我蜷缩在沙发的一角，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我长时间的轻声哭泣毫无意义和内容。所有的那些记忆、想法和一环套一环的伤感早就消失了，我只是毫无缘由地哭着，时不时地打嗝，用袖子擦鼻涕，眼睛又红又肿。

灯一下子亮了，把我吓得坐直了。客人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拿着一盘三明治。他一个箭步走到我面前，“砰”的一声猛地把盘子放在我们之间的咖啡桌上。他粗暴的动作把我给吓住了。我吸着鼻子，尽量不发出声音，但这已足以令客人失去耐心。无论如何，他的耐心已经保持得比我预计的时间要长得多了。

“别哭了！你听到没有？你在为自己伤心吗？生活就是这么残酷。你能又把它怎么样？生活原本就是可怕的。我们早就被赶出伊甸园了。得学会面对现实地生活。是的，生活是可怕的，但人类要追求光明。你明白吗？追求光明！你以为我的生活就很愉快吗？我的



---

① 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小说中苏珊娜和尼奥看的电影《低俗小说》（*Pulp Fiction*）的导演。



生活也很糟糕。但我绝不会因此而影响别人看他们想看的电影。”

他的突然出现把我吓了一大跳，他的一番话也让我吃了一惊，以至于我脱口就问：“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你的生活很糟糕？”

“原因有上百万个。”客人不耐烦地叹了口气，往边上看了看，仿佛在示意一个看不见的观众注意我的愚蠢。“因为在我的生活里没有一件事能够如我所愿。因为我做的所有选择总是依据了错误的理由。因为我被困在拉马特甘，身无一文。因为我欠了一大笔债。因为我总是欠一大笔债。我被一个亚美尼亚骗子给缠住了，为了还钱，我不得不像条狗一样拼命地工作。因为我的身体被可卡因和香烟给毁了，身上压力一刻也不减轻。因为我是个赌棍。因为我不守诺言。因为我从来没有为赫伯做过一件事。因为我恨自己的工作。还要我接着说吗？原因还有的是。”

他说得十分激动，非同寻常，当他说他被困在拉马特甘的时候，我甚至没有觉得受到了侮辱。他的话令我大为惊讶。

“我还以为你热爱你的工作。所有那些令人着迷、不同寻常的人和地方，显得那么令人神往。”

自我们认识以来，我第一次听到他提高嗓门。原本不易察觉的美国口音随即流露出来，使他的话更加让人感到陌生。

“我讨厌我的工作。明白吗？我讨——厌——它！我觉得自己和这份工作没有任何联系。每一天，我都在对牛弹琴，把伟大的艺术品卖给一些粗俗的家伙。不同寻常的人！天晓得！埃尔帕索城[1]的莫希。牛仔裤大亨迈耶。愚蠢的暴发户！乡巴佬！我还要跟他们喝酒、开玩笑，巴结他们。”

“为什么说他们粗俗？他们不也买艺术品吗。”

“买了又怎样？他们对艺术根本是一窍不通。你知道他们是怎么

---

① 埃尔帕索城：美国得克萨斯州最西端一城市。

说的吗？你要是听了，耳朵非得掉下来不可。可我还得拍他们的马屁，因为我还要靠他们吃饭呢。”

自由和独立的宣扬者、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被宠坏的孩子，不高兴的时候连“早安”都不愿意说的客人，现在却说出这样的话，真有点让人沮丧。

“你不必跟他们交谈。你可以把画卖了就走。”我说。

“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得跟客户搞好关系。这是交易的一部分。你要让他们觉得跟高雅文化沾上了边。否则，他们为什么要买？就拿迈耶来说，他是个白手起家的牛仔服装业老大。我卖给他两幅很美的大卫·沙利的作品。但他买下之后就想跟我聊聊。我是他的一部分社交生活。明白吗？”

“那他都跟你谈些什么？”

“没有什么让人受得了的。”

“举个例子吧。”

“你想要例子？我就给你讲一个。”



客人想了一会儿。然后，往背后一靠，把腿张开，打了个长长的、令人反感的嗝。他把声音降了一个八度，脸上松懈的表情近乎白痴。

“上帝！尼奥，我跟你说，小子，你把沙利介绍给我可真是件好事。我跟很多人谈过，他们都说他的画是抢手货。要是你手上有他的其他系列，你得第一个告诉我。连克莱尔都跟我讲，要把那幅小一点的、带屁股的挂到卧室里。她对那幅画爱得要命。相信我，要讨她欢心可是很不容易的。”

客人顿了一下，仔细观察我无意露出的满脸笑容。

“现在你知道跟我打交道的是什么样的人了吧？”

“我想知道多一些。”我恳求道，并咯咯地笑着。客人又打了个嗝，把痰直接吐到烟灰缸里。然后继续他的独角戏，边讲边用一个从桌上捡起的发夹剔牙。他的表演才能把前以色列牛仔大亨迈耶表现得活灵活现。我好像就坐在迈耶对面，在他位于长岛的游泳池边，看他把防晒指数 15 的防晒油抹在自己身上，那枚 24 克拉钻石的金质大卫王



之星[①]奖章藏在他浓密的胸毛里，犹如一只躲在稻草堆里的老鼠一样。

“但事实是，”客人挠挠他的下体，“你知道谁对我的影响最大吗？是科斯达毕。好家伙！他是个真正的人物。一位伟大的金融天才。我告诉你，他是那种真正值得我脱帽致敬的人。想当初他刚来的时候，不过是个浑身发臭、穷得连屁股也罩不住的希腊小子，但看看人家现在住的地方。”他吸了吸牙齿，对我做了一个夸张的羡慕表情。

渐渐地，我的笑声不再呆板，而是尽情地流露出来。偶尔为了不影响他的表演而收敛一些。在我的鼓励下，客人的热情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做出更多恶心的动作，比如抠鼻子、挖耳朵，还有挠头。演员达到最佳状态时的那种欢欣，以及与角色的成功结合，把他的表演推上了艺术的巅峰。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这帮人。他们买画冲的是名气。换句话说，是冲着科斯达毕而买的。——那些画不就是他画的吗？这怎么可能赚到钱呢？让我来告诉你实情。所谓的造型艺术这一门子买卖根本就吸引不了我。你跟我讲沙利——那好，我就买沙利的画。即使那个家伙显然是个变态。他脑子里除了他老婆的屁股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吗？加上些许鲜花，配上一点风景，我懂吗？我不懂。但我肯定那家伙是个神经病。我才不会喜欢他的东西呢。算了吧，还不如让我看一部罗伯特·德尼罗[②]演的电影，哈维·凯特尔[③]，那才是有灵性的人，是我最喜欢的演员。或者让我听帕瓦罗蒂的演唱会，在那儿你可以听到属于自己的声音，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我十分困惑，为什么人们对那些画家的画这么狂热，他们连正规地画个女人都不行？”客人停了一下，看看乐呵呵的听众我，说，“除了这些之外，他还要我跟他的女儿结婚。还要我接着说吗？”我使劲地点头，哼哼着把鼻息喷到手上，像个丰收时节的乡下姑娘。

---

① 犹太教和以色列的标志，由一正一倒的两个等边三角形套在一起组成。

② 罗伯·德尼罗：美国演员，1943 年 8 月 17 日出生于美国纽约。主演过影片《出租汽车司机》、《教父 II》等影片，第 49 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得主。

③ 哈维·凯特尔：美国演员，于 1939 年出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主要影片有《出租汽车司机》、《钢琴课》、《基督最后的诱惑》等。

客人在我身旁坐下，手搭着我的肩膀，一会儿拍拍我弓着的后背，一会儿拍拍我的大腿。

“尼奥，你觉得伊琳娜如何？看她长得多快。她真是漂亮极了，不是吗？上个周末，我们为她的十八岁生日办了个晚会。办了一百多个人的菜，还有寿司，都是真材实料。时间过得确实快，你还没来得及放声屁，鸟儿都飞回巢里去了。仿佛都还是在昨天，她只知道减肥、逛街，因为没被选上拉拉队队长而哭鼻子。现在却突然一下子想做个女实业家。你知道前几天她跟我说什么吗？她说，爸爸，我想把生日收到的礼金全部用来买股票！相信我，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孩！”

客人从面前的盘子里拿了一块三明治，张口大吃起来，发出猪一样的声音，大片的面包屑和奶酪块掉到他的膝盖和我的膝盖上。

“伊琳娜，你过来一下，让尼奥看看你的文身！起初她跟我说‘爸爸，我想文身’，我大发脾气，坚决不同意。但是她不是这么简单能打发的。一旦她下定决心做什么事，谁也别想拦住。她又哭又叫，求着对我说：‘爸爸，就文一个，很小的一个，只是在我的胸部文一朵非常小的玫瑰花。’看她这么想文身，我只好答应她。你觉得怎么样？你为什么不跟她约会呢？你是个帅小伙，说不定她最后会嫁给你呢。”

客人把手从我身上挪开，坐到沙发的一边。我笑得浑身摇晃，两眼流泪，肚子发痛，气都喘不过来。我双手捂住肚子，徒劳地想要稳住笑得直晃的肚子和乳房。我深深地感到了少有的令人兴奋的快乐。

“你这会儿笑了。我早就说过你笨，不是吗？要是当时你能把那部电影给看完，现在就更有的笑了。”





海的女儿，大地的女儿

在把收购来的圣像发运给那个亚美尼亚人之前，客人通常会把它们寄放在卡秋莎家。因为她住的公寓楼装有内部对讲系统，她住在八楼，装的是防盗铁门，还有专门的保安对整幢楼进行监视。他说，只有这样卡秋莎才觉得安全。但有时候，当她心情沮丧或烦躁时，他这位朋友的俄罗斯性情不免会令他担心，于是就把画放到我们家。

客人说自己越来越热衷于拜占庭风格的艺术品。因为他终于开始理解自己收购的艺术品，这要归功于瓦弟姆教给他的专业知识。他常常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斯拉夫圣像画，我也随之对这些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刚开始时，对于那些表面剥落，保存状况十分糟糕的圣像，我只觉得它们很粗陋。但是，我逐渐积累了足够的知识，能够猜测客人带回来的画的创作时间和地点，并且很享受这种过程。尽管他买的画大多数都是在拜占庭时期以后创作的，可它们还是被称作拜占庭艺术，因为它们严格地遵从了这一绘画传统。主要的区别在于颜色。比如，绿色圣像是莫斯科学派的风格。淡淡的透明绿色阴影主要被应用于公元 1525 到 1550 年期间；在那之后，即十六世纪的下半叶，随着莫斯科学派的绘画手法流传到各个地方中心，如诺夫哥罗德市①和普斯科夫市②，绿色阴影渐渐加深，变得晦暗和浓烈。另一方面，从十五世纪末开始，雅罗斯拉夫尔市③的圣母画像带有柔和的粉红色、浅蓝色和混着金粉的淡橘黄色。小耶稣和圣母脸贴着脸，伸出一只小手触摸圣

① 诺夫哥罗德市：欧洲西北前苏联内的城市，在列宁格勒的东南偏南。
② 普斯科夫市：前苏联欧洲部分西北地区一城市，在列宁格勒西南偏南方。
③ 雅罗斯拉夫尔市：前苏联东欧部分一城市，位于伏尔加河畔、莫斯科东北。

母的下颌。站在他们身边的是圣佐西马和萨瓦迪①,头顶上是圣父、圣子和圣灵。这幅画十分精美并且充满了感情。我真想把它挂在我的床头,我对客人说。他扬扬得意,吹嘘说他买这幅画只花了多少钱,而如果是在苏富比拍卖行拍卖的话,它又会值多少钱。

我和客人都对画像形成了自己的品位。我更喜欢十六世纪以后的圣母像,他则钟情于那些更古怪更古老的东西。他最喜欢的一幅画是《圣尼古拉》,用古式风格画的一个秃顶老头——他的脑袋就像一个巨大的电灯泡,显得很刻薄的样子,鲜红色的背景营造出慑人的威胁气氛。

不过,过了几天这批画就被托运走了,我们便喜欢上了别的画。我们见过的画像有施洗约翰、圣凯瑟琳、圣乔治、圣路加、圣安德烈、圣里昂、目光悲伤的圣母,当然还有救世主耶稣基督面容、受难耶稣、婴儿以马利②、大能者基督像等一系列或愤怒或慈悲的主。

客人说,拜占庭时期的绘画理想就是保持已有的东西。这源于中世纪的信仰,人们认为从基督耶稣降临开始,世界就在不断恶化。所以,艺术家要尽量画得跟他们前人一模一样。他们试图洞悉前人所应用的颜色,严格保持画像人物的形体和姿势与前人画的一致。他们所做的添加和改动如此细微,以至于除了通过实验室检测鉴定画像的历史年代,还需要像瓦弟姆这样的专家来识别变化的细节,才能区分出不同时代的圣像画家。

我的理想也是维持现状,稍作改进。在我看来,家里的客人、夏天、我俩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有围绕着这三者的细枝末节,这样的生活是永恒的。一个每天都自我更新的永久模式,其细微的差别是肉眼难以察觉的,就像弗拉基米尔的圣母像或者是佩剑的圣约翰,他们平直的凝视、僵硬的姿势和他们千百年来的永恒意义。

① St. Zosima 和 St. Savvatei 分别于15、17世纪任过白海的索洛维基群岛上修道院的主教,后被尊为圣徒。

② 以马利:基督教《圣经》中先知 Isaiah 及圣徒 Matthew 等对耶稣基督的别称,意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但是事物的本质是运动，是变化。古希腊哲学家就说过：万物川流不息。有时候，变动很轻微模糊，躲得过人们的眼睛；有时候则十分宏大并且充满了戏剧性。但无论以什么方式，它总会发生。

卡秋莎和阿瑟去布拉格附近的一个温泉度假，把她的白色"高尔夫"轿车托给客人，他可以自由地使用这辆车，但必须要万分小心！在他开车到海法市两个来回，以及去了特拉维夫几趟之后，就开始不顾母亲的反对，坚持开车送她去超市和健康维护组织的诊所。为了用这辆车，他无疑得找些新的借口，所以他决定开车出城，就他和我，去一个不知名的海滩，说那是他的专有海滩。

这辆"高尔夫"内有一股新车所特有的令人兴奋的化学合成物的气味。我们下午才出发，因为那个时候天气不会太热，而且能够赶上看日落。母亲为我们准备了厚厚的三明治和洗干净的水果，放在一个塑料盒里。不过，当我们一离开拥挤的市区，驶上高速公路，客人就叫我打开车后座上的袋子。我照着他的吩咐打开袋子，不禁欢呼起来——那几个袋子里装了三瓶法国葡萄酒，其中一瓶是开过的，还有一大块乡村面包，几个新鲜的法国棍子面包卷，品种丰富的各式进口奶酪以及包装纸上贴着一家熟食专卖店标签的冷餐肉。

"今天我们要好好地款待自己，但也不能伤了你母亲的感情。"客人解释这份惊喜，得意地笑了。我把这些食物从袋子里一样一样地拿出来并大声念出标签上的字。

尽管阳光强烈，客人还是打开车顶的天窗，阵阵热风吹进车里。他蓬松的头发被风吹起，样子就像一个向着地平线疾跑的印第安勇士。我的头发被紧紧地扎在脑后，结成一个小发髻，在脖子后面晃来晃去。客人把车里那套昂贵的立体音响音量调高，声音大得连开过我们身旁的车辆都能听见。他随着音乐放声高唱："他们的大半辈子，在暴徒的天堂里度过。"我俩都戴着墨镜，就像歌里唱的黑社会成员。空气里充满了人类经历中最强烈的刺激感之一——高速行驶的刺激。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车子下了高速公路，在一条狭窄的土路上行驶，扬起一阵阵尘土，颠簸地碾过路上的小石块，道路两旁是被太阳晒

焦的枯草和灌木丛。一辆载满了士兵的吉普车从我们身边驶过，我们和士兵互相招手，就像一群春游的孩子。最后，终于在一排高高低低、布满沙尘的桉树后面，一片大海映入了眼帘。

我们来之前，客人对这里的描述一点也不夸张。这个地方真是棒极了！宽阔的海滩上没有任何防波堤阻挡视线。我们把车一路开进沙滩，直到轮子深深地陷进沙里，发出低沉的轰鸣声表示抗议，把沙子喷到各个方向，再也不能前进一步，客人才关闭了引擎。

大海在我们前方一百米开外的地方延展开，闪烁着蓝色的耀眼光芒，美得有点不真实，美得有点夸张，看起来像印刷精美的旅游手册上的图片。离我们不远处，停着一辆车，车旁是一家子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两个小孩拎着颜色鲜艳的小塑料桶在沙滩上到处跑。还有别的几辆车沿着沙滩零星地停放着。海迹线边上的一辆吉普车里有三个年轻人。除此之外，整个沙滩显得空荡荡的，延绵起伏地展现在眼前，令人相信它是一片经过挑选的、私人的专用海滩。这是我们的海滩。



与此同时，客人已经急不可耐地脱掉鞋子朝海里跑去。海滩上的沙子热得烫脚，他好像只蚱蜢一样跳得老高，还时不时回头向我猛招手，然后又继续他那古怪滑稽的跑跑跳跳。

我下了车，深深地吸进一大口空气，沉溺在醉人的自由感之中。这是大自然赐予像我这样的城里人的，我们的肺部已经被城市的空气所污染。我即刻产生了一种渴望，想永远留在这里，和这片闪亮的蓝色海洋素面相对，像一个富有的地主满意地视察自己的土地一样，透过太阳眼镜审视这片海，呼吸淡淡的海草气味，观察客人。他已经站在海水里，一边跟四轮驱动车里的小伙子们聊天，一边冲着我招手。

我举步艰难地朝他走去，沙子的热量穿透我的脚底板，在他的注视下笨拙地前行令我十分尴尬。沙子又厚又干，总是把我绊倒，仿佛我是在穿越一片沼泽地。我感到一滴滴汗水顺着肩胛骨之间流下，我的深色上衣贴在后背上，我又失去了平衡。客人在远处不解地看着我，随即向我走来，他的步态比上次正常多了——很明显他的脚已经



适应了沙子的高温——我听不清他在喊什么。最后，他几个箭步走到我身边，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一把把我举起来，扛在肩膀上走。负担着我的重量，客人一下失去了重心，他夸张地发出呻吟，说我是一个“迟钝的外太空人”。他不理会我不安的反对和紧张的咯咯笑声，一直把我扛到沙子潮湿的海迹线边。

“好了，你可以站在这儿。”他宣布道。他把我放到地上，一副解脱了的样子。“看在上帝的面上，还不快把你那该死的鞋子给脱了。”

四轮驱动吉普车里的小伙子们跟我打招呼，我点头回应。随后，他们像老熟人一样跟客人道别，说他们一会儿回来，就沿着沙滩把车开走了。他们的身体被晒成古铜色，头发和肩膀都被海浪打湿了，举止间透出平静的自信。

“你觉得如何？很不错吧？”他刚问完，还没等我回答就跑回车里，回来的时候拿了一大堆东西——母亲给的那块大凸纹毯子、几袋子食物、杂志、香烟、防晒油和一瓶矿泉水。他把所有这些东西放在我身边的湿沙地上，然后摊开毯子，把东西压在毯子的角上，以防被海风吹走。

“快点，抓住另外那只角，然后放点东西在上面。你干吗站在那一动不动像个木乃伊似的？”看到我站在一边，表现出以前跟尼哈玛和母亲去海边时的那种习惯性被动，丝毫没有要动手帮忙的样子，他责骂我道。

我内疚地跑到毯子边上，笨手笨脚地随意捡起一些东西递给他，直到他不耐烦地拒绝了我的努力，自己动手把一切都收拾好。然后，他站起身来，自豪地审视自己的劳动成果，像个国王一样做了个手势，示意我可以坐在毯子上了。我坐了下来，双手抱膝，想尽量节省地方。客人看起来比平时更随意，坐在我旁边，平静地凝视着海面，然后不慌不忙地脱下T恤衫，把苍白的躯干暴露在地中海的阳光下，他挺起胸膛，举起双臂放在两侧。

虽然戴着墨镜，我还是垂下双眼，避免从余光里瞥见如此大胆的、毫无顾忌的赤身裸体。尽管如此，我还是能感觉到在靠近我左脸的地

方，客人拉下裤子拉链，一只脚在沙滩上单脚跳，另一只脚努力地从硬邦邦的裤腿里挣脱出来，并且听到面料粗糙的牛仔裤被脱下时的声音。他轻轻地在我身边躺下——放松的身体把毯子四分之三的面积都给占去了。

"给我点支烟，这真是棒极了。"他命令我，同时从我身下抽出最近一期的《新闻周刊》，一边翻阅一边皱鼻子。我照他说的为他点了支烟，递给他之后，便开始观察他裸露的后背，一开始还小心翼翼地，慢慢地胆子就大了，就像在显微镜下观察犯罪证据似的。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对自己的下流行为感到羞耻但又迫于比道德规范更强烈的生理冲动无法自拔的偷窥癖患者。那些由于家中昏暗的灯光躲过我眼睛的每一个细节，在无情的阳光下，小到每一个毛孔，都被我看得一清二楚。客人的皮肤犹如女人一般细腻，透出淡淡的紫红色。与细腻的皮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后背上发达的肌肉，也因为他瘦长的身材而特别明显。在他的右肩膀下我发现三个粉红小疙瘩，后背上还有好几颗的斑痣。沿着脊背长着毛茸茸的黑色汗毛，直到泳裤的松紧带处才看不见。

我继续观察客人的背部，他对此毫不知情。我审视他的每一寸肌肤，仿佛能在里面找到我渴求的答案。从有缺陷的人体的恐怖怪异的外形里，我也许能得到拯救——我也许会因为恶心而退缩，从而克服我偷窥他的嗜好。如果别人做得到，我也能做到。但是，对每一个瑕疵检查的时间越久，我的渴望就越强烈，渴望的对象也越不对。每一个抓痕、蚊虫咬痕，或一根长错地方的毛发，都使我的内心充满了怜悯，伴随着浓浓的柔情和奇怪的心痛感觉，最后，我不得不闭上眼睛，把脸埋到蜷起的膝盖之间，尽管那个空隙很硌人。

甚至在他站起来跑向大海，展现他运动中的赤裸身体时，我还是没能得到拯救，从而停止我的观察。虽然没有了衣服的保护和遮掩，他显得有些过于苍白和瘦削，并且露出了粗野的雄性特征，如腿毛和胸毛，他的美还是穿透海水的气息发出大声的呼唤。

突然，太阳开始下山了，就像台下的观众开始等得不耐烦，把糖果





纸揉得沙沙作响，把节目单读了三遍之后，舞台终于拉开帷幕，演员登台表演一样。落日渐渐膨胀、变成橘黄色，使沙滩和沙滩上的人们沉浸在一种令人敬畏的气氛里。附近的那对夫妇把他们的孩子们叫回了身边。那些分散在远处沙滩的人们也迅速聚集在一起。他们都服从于古老的宇宙规律，其中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人们会对夕阳的光辉产生敬畏。

客人把《新闻周刊》丢到一旁——那本杂志早被他头发滴下的海水给湿透了，坐了起来。我们打开背包，开了瓶红酒。作为礼貌的象征性表示，每次客人把酒递给我之前都会用手掌把瓶口擦一下，以抹掉他的口水。我不好意思跟着他一样做。我们并肩坐在一起，安静而庄严地望着前方。太阳缓缓地下沉，不愿意就此消失在水中。我们又开了一瓶酒。带着孩子的那对夫妇开始收拾准备离开。海水把一些海藻冲上了沙滩，发亮的颜色绿得有点不自然的。八月的空气依然沉闷，没有一丝风意，只有变得黑暗的海洋预示出一点清凉。

最后，除了我俩，海滩上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下地平线上的一抹橙蓝色。我们不停地抽烟和喝酒，保留这最后一点都市人的症候，仿佛，一旦我们停下来，就会被融进这无垠的海洋田园诗中，变成几粒毫无特点和意义的沙子。

客人站了起来，对我说："我要在沙滩上散散步。说不定会找到那几个坐吉普车的家伙。"他远去的背影逐渐变小、变暗。我心中纳闷：他为什么这么不高兴？即便是我，一个活得这么可怜的人，也能在夕阳下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而他，似乎并不觉得自己属于这个世界，尽管他被认为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又接着想：他为什么要待我这么好，跟我交谈，对我和蔼可亲，推动我、使我清醒，仿佛我是一个跟他平等的画廊老板或者模特儿？为什么我能不能表现得像正常人一样，有做事的力量，对他来说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他要我这么做有什么用？他能从我这样一个长相一般、可怜和古怪的人身上得到什么？

我也自问：那你呢？你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这次的答案还是跟

以前一样明确：我要一滴滴地喝掉他的血。用我的胳膊和腿缠绕住他，紧紧地贴住他的胸膛，直到他的心跳得跟我的一样，再把牙齿扎进他的脖子，感到皮肤的绷紧和抵抗，便更用力地咬下去，咬破他的脖子。一尝到嘴唇上甜润的液体，立刻使出全力攻击，用舌头探索被撕咬开的皮肉，嘴巴紧紧地含住整个伤口，堵住从破裂的血管里喷射出来的血液，不停地吮吸和吞咽，直到我解了渴。

我喝光了剩下的红酒。

在上帝安排的夕阳下，像喝水一样喝下去的酒开始发作。我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醉得厉害，两脚差点踩进海里。海面一片黑糊糊的，只有低闷的海浪声和上涌的白色浪花才使大海显露出它的面目。

我想我现在明白自己是什么了：我是一个吸血鬼。我想做的就是吸血。我甚至想过咬死吉第·伯查科的狗。我是一个邪恶、恐怖的怪物，一个不要真正生活的怪物。我不要做爱，不要结婚，不要事业，不穿剪裁讲究的套装，不要经济独立，不吃健康食物，也不锻炼身体。我不愿为世界和平作贡献，不向恐怖分子说“不”，也不为士兵福利基金会或残疾儿童基金会捐款。我是一只吸血的蝙蝠。拉马特甘的蝙蝠女。一幕上演得太久的与政治无关的独角喜剧。



“老天啊。”我又是喊又是笑，朝前走了几步，感到海水渗进鞋子，微热的水温十分舒服。连绵的海浪充满了活力，向人们发出邀请。我弯下腰，把一只手伸进水里，然后放到嘴里舔了舔。我隐隐地尝到些许腐烂的味道，证实了面前这片无边无际的汪洋里充满了数十亿有机生物，包括分子生物、单细胞生物、双细胞生物、海胆、水母、鱼和海豚。在海洋这个巨大子宫里孕育着各种生命，它们有的生自单性生殖细胞，有的生自珊瑚礁里的受精卵，有的生自蜷缩在大型哺乳动物肚子里的胚胎，还有的生自像海马一样自体受精的奇异生物。无数的各类生命形式以它们不变的方式一刻不停地繁殖着。

我往前又多走了几步，海水盖过脚踝，拽着我的裙边。我的鞋又湿又沉，陷进了满是碎贝壳的沙子里。

那么海上女妖们呢？她们是一群放荡的美人鱼，其美妙的歌声甚



至迷惑住了狡猾的奥德修斯[1]。她们是如何繁殖的？她们有操穴吗？对不起，应该叫私处、外生殖器或阴道。对不起，还是应该叫女性生殖器官好些。天啊！为什么就找不到一个既能够形容这个部位，又不会令我脸红的词语？我每次提到那些词，都会为不同的原因而感到不好意思——"操穴"太粗野庸俗了，"私处"太古板可笑了，"阴道"又太一本正经了。不过，干吗要为此烦恼呢？我从来没有机会讨论这个问题。跟母亲说的时候，我称之为"小屁屁"——妈妈，帮我跟妇科医生预约一下吧，我的小屁屁又发炎了。毫无疑问，我们真称得上是一对可爱的母女。

我又往前走。这次，我已经需要设法抵挡海浪的冲击了，双手划水、挺着肚子推进。我的裙子涨了起来，有点像湿气球，又像是长在女海妖苏珊娜·拉宾身上的表皮似的。我用双手把膨起的裙子往下挤压直到它瘪下去，吸进海水，沉到水里。我既没有阴道也没有小屁屁，我只有一个长着银鳞的鱼尾巴——我就只有这个，医生，要我把它抬起来吗？把它打开？我是不是让你不禁联想到了周五晚上的那份苏式鱼品冷盘？对不起，既然您选择了妇科医生这个职业，就得面对这个，每天都要看操穴，对不起，应该称阴道或女性生殖器。想听个笑话吗，医生？说有一个瞎子路过一家鱼店，他便说：嗨，小妞们！您看，不像您想的，这并不是一个关于那种气味的大男子主义笑话。不是的，这只是一个关于我们女海妖的笑话。

我听到自己在海浪中无所顾忌地大笑。

海水差一点就要够到我的下巴，我不得不随着海浪向上跳起，避免呛到海水。有一次，我跳起后轻轻下落，两脚竟一时探不到底。过了一会儿，脚才触到地，踩着沉重的鞋子慢慢往前摸索。但这一次为了能够感觉到脚底的地，我只好屏住呼吸让脸浸到咸咸的水里。在这个深度，海水就凉多了，水深处的冷流滑过我的身体。

那之后，所有一切都变成了一涡海水和泡沫，一股刺喉的苦咸味，

---

① 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人公；伊塞卡国王，曾指挥特洛伊战争，献木马计，使希腊获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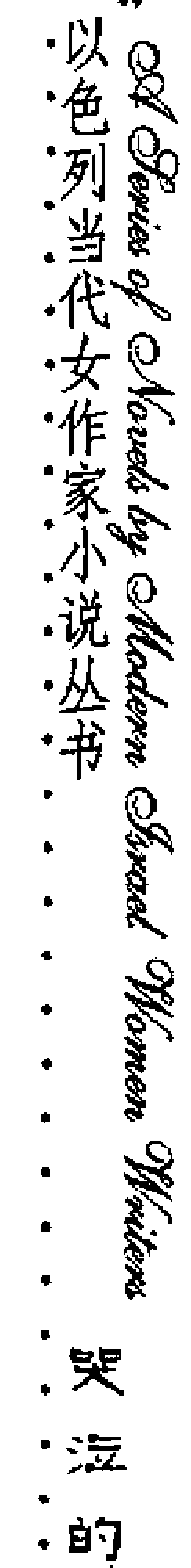
湿透了的身体，沉重的衣服，我不再受控，不再傲慢地面对海浪。我听到客人的声音，很遥远很小声，先是在我的左边，然后是在我的右边，断开音节地叫着“苏——珊——娜”，时近时远，没有回音，被大海狂暴的呼吸所吞没。与此同时，我脑子里老有一个声音在唠叨：女海妖们呢，她们在哪？那些臭婊子们，不负责的贱人们跑哪去了？她们为什么还不赶紧来把我带走，给所有的这些不愉快一个了断呢？

后来，我被客人从水里捞出来带上黑暗的岸边，他从后面抱住我，使劲压我的肚子，我吐出了很多水。噢，我亲爱的奥德修斯，在我的身体停止痉挛后，继续紧紧地抱住我，抚摸我的前额，从我头顶上那团乱糟糟的卷成擦地布一样的湿漉漉的头发里取下多余的发夹。我可以像这样永远一直站着，要不是他突然大叫一声——“毯子！”我们一起跑到上涨的潮水里去抢救那条毯子和我们的东西。客人坚持要自己拿着那一大捆东西，时不时回头看我是不是还跟在他后面，并问我说“你还好吧？”好让我走得离他近一些。我们把毯子铺在汽车旁的干地上，那里的沙子还发着热。客人进车把前车灯打开，下车的时候借着那毫无生气的灯光打量我，那样子好像是在同一天里第十次审视一个被一只纯种小狗挖的小坑。他让我坐在毯子上，点了一支香烟给我（这是他和其他女人交往时养成的表示亲密的习惯动作，他错误地把这带到了我俩关系中来），躺在我的身边，凝望着星空，到了这时，他才用一种疲惫的、梦呓般的声音说：“这次我真的要杀了你。什么也别想让我改主意。”然后又叹道，“天啊。”

我说：“我十六岁以后再也没有在海里游过泳。”

虽然感觉上好像是已经过了大半个晚上，我瞥了一眼车里的钟，上面显示才刚到八点钟。我一声不响地坐着，客人相当简短地征求了他自己的意见之后，决定我们还是多待一会儿，为的是把刚才所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忘掉，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做两个在沙滩上享受美妙夜晚的文明人。我们打开那些没有被海水完全湿透的袋子，取出食物吃了起来，安静地用手指把法国棍子面包掰成一小块一小块，把各种奶酪递给对方。我们肯定是饿坏了，因为连母亲做的厚三明治也得





到了我的青睐。夏日夜晚的香甜气息使我的四肢得到了放松，连同食物和酒精，夏夜发挥了它抚慰人心的魔力。我很惊奇客人不顾刚才痛苦的经验教训，愿意和我一同分享那第三瓶酒。吃完东西之后，他把车灯关了，留下我们在深紫蓝色的夜晚里。

我们相对无语。我们经常发生这种情况，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只是坐在那里，望着眼前的黑暗，各自沉浸在自己习惯的孤独当中。

客人首先打破了沉默。

“如果你以为我会让你有机会用你那身该死的湿衣服把卡秋莎车里的豪华内饰给糟蹋了的话，你就大错特错了。”他宣称。

我知道他说这话是认真的。尽管空气带有一定的热度，我的衣服还没有开始干，邋邋遢遢地贴在我身上，好像裹在溺水的船员身上的海草。我依旧保持沉默。

“你就帮咱们自己一个忙，把衣服给脱了吧。把它们晾在车盖上。我会转过身去的。好吗？没人会看见的。”他夸张地转过身去，取笑我的羞怯。

我的一身湿衣服似乎感觉到了即将袭击我的恐惧，不情愿被脱掉，粘着缠着我的头、肩膀和膝盖。我默默地和它们斗争，尽量不因为费劲而喘气。

意识到客人离我很近，我的心跳得厉害，好像马戏团里即将上演危险的杂技动作时的鼓点一样，咚咚咚，怦怦怦。留着胡子、穿着丝绒裤子的驯兽师把头放到狮子的嘴里。我光着身子，心绪很乱，我躺在毯子上试图使自己平静下来，任凭夜晚炎热的空气接触我的皮肤。我双手交叉放在骨盆上，这两块骨头像鲨鱼翅一样突出。

“知道你我两个人本应该生活在什么地方吗？”客人一点也不在意我没有穿衣服，谈起话来就像在继续一段先前被打断的思路似的。

“在什么地方？”

“亚历山大城[1]。像《世纪之交》里描述的。我读过这书，写得非常好。我们应该是一对在东方游历的兄妹俩。我们可能是英国人，很有钱，但也不是特别有钱的那种。太有钱就俗气了。我们住在一家豪华的公寓式饭店，带着几个不说话的苏丹仆人，他们穿着一式的白色土耳其长衫。你画画，我写旅游日志。晚上，我们在城里闲逛，抽印度大麻，经常光顾那些幽暗的不良夜总会，那是专为我们这样颓废堕落的欧洲人开的。我们参加当地富豪们举办的聚会。搞搞风流韵事。白天，我们在天台上喝茶。你说怎样？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时代，那个时候会更适合你这种破坏性的个性。”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想起探索频道重播过的一辑关于宇宙历史的节目。

“我想生活在产生人类的史前沼泽。”

客人转过身来，躺在我旁边，双眼凝望着天空。

“听起来挺有意思的，虽然那种地方有点臭。”

他面对我的赤身裸体无动于衷，这对我来说，起码算是种侮辱。但我为什么要对此感到惊讶呢？我期望他做什么呢？像一个热情的拉丁情人一样急切地扑到我身上？像一个富有经验的法国男人一样对我做一些讨人喜欢的异常举动？还是像一个没有性经验的男学生一样对我的每一次亲近都颤抖不已？我是多么的令人讨厌啊！根据所有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报告，男人无法抗拒一个裸体的女人，不管她长得有多丑。都是一派谎言！

我转过身，头靠在胳膊肘上。盯着躺在一旁的客人那张平静的脸。我不再对自己的裸体感到难堪。它中性如纸板盒一般，一样的空无一物。一个巨大的扭曲的塑料娃娃的裸体。

“尼奥。”

“什么事，亲爱的？”他的声音低沉、放松，耳语一般。他没有转身看我。

---

① 亚历山大城：埃及北部的城市，位于尼罗河三角洲西端的地中海沿岸。



"我想问你件事。"

他点了点头，闭上眼睛。

"你觉得会有人被我所吸引吗？那样的人正常吗？"

"这是哪一门子问题？"

他声音里透出的恼怒可不是好兆头。他转身跟我面对面，躺成跟我一样的姿势。此刻，我们俩面向对方躺着，就像两个古希腊哲学家正在进行一场愉快的不为人知的对话。除了其中一个哲学家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使另外一个十分生气。

"我……"我很想跳过这支支吾吾的阶段，一口气说出我要说的话，不管有多难。"那就是我想知道的。我想我是个讨厌鬼，我一定很让人厌烦。你经验丰富，你明白这种事。所以我以为你会告诉我。"就这样。话一说出来，我感到松了一口气。

"你想我对你说什么？恭维你？安慰你？还是反驳你？啊？"

我感到脸一阵子红。正如我所担心的，他对我生气了，确实生气了。我的问题听起来有多么虚伪。我不知道该如何使他相信我的真诚。

"我不要你安慰我。我只要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我的温柔没有丝毫帮助。客人的语气中仍然充满了挑衅。

"你以为只有有魅力的人才可以性交，才可以坠入爱河，才可以生小孩？你的才智都到哪里去了？你知道那都是胡说八道。我甚至不想浪费我的精力来回答这么明显的问题。"

我默默地点头，对自己感到害臊。这当然很明显，但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看在上帝的面上，我要怎样才能说清楚自己的意思呢？我只能寄希望于某个有超级理解力的高人能够了解。想要被理解是多么的费力和不定。比爱情和快乐更诱人，也比客人柔软美妙的身体更吸引人。但是，这一需求的命运总是不尽如人意。尽管使出所有的技巧和富于勇气的努力来进行交流，都以与开始完全相同的渴望结束。我知道这点。

那么，为什么要我接受我永远都不被人所理解这个事实就这么难

呢？任何人都认为，我过去曾沉迷于此，而且我很难适应周围环境的恶化。其实，我和母亲之间的默契也不过是个虚构的故事。那多少成了一种习惯，一种由变化极少的生活节奏促成的习惯。在按部就班的生活里维持相互理解的假象并不难。

我明白，比起我来，人类的命运在这个方面通常也好不到哪里去。我知道，甚至在两个最亲密的朋友之间也存在着理解上的鸿沟。有时候，在很稀有的宝贵瞬间，这个深渊会缩小成一道裂缝，但又随即扩大开来，剩下人们独自留在荒凉的悬崖上。

然而，我还是热切地渴望能够得到客人的理解。

客人又开口说话了，用一种抚慰人的柔和声音——也许他害怕我再大声号叫或者又跑到深水里去找海妖。或许他仅仅是可怜我而已。

“如果你想知道我的真实想法，那我告诉你：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是绝对令人讨厌或者绝对令人着迷的。某样东西，或者就我们现在讨论的议题，某个人，他想吸引人就势必也有招人讨厌的东西。反感暗示着某种危险的存在，如果你感觉到了某些置你于危险之中的东西，你就已经被吸引了，不是吗？”



“但是，只有一些人引人注目。”我说。

“谁？举个例子？”客人厉声道，好像我说了什么违背绝对真理同时还冒犯了他本人的话。

我想说“你”，但我不能这么说。接着，我又想说“卡秋莎”，可我还是不能说。似乎要是把别人牵扯近来，就会把这场争论排除在仅属于我和他的私人范畴之外。

“快，给我举个例子。”他坚决要求。

“我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我含糊地回答，“可是，是有那样的人。这个事实众所皆知。比如各种模特儿和电视节目主持人。”

“谁跟你说只有他们才有魅力？”客人的声音表现出极度的轻蔑。他的强烈反应刺激了我，好像里面包含了某种不容置疑的证据，证明他是真的关心我，而不仅仅是以他一贯的激情跟我进行一次理论性的争论。“谁告诉你他们从一开始就有吸引力？想想过去那些吸引过



你，激起过你兴奋的东西。难道你没有被某些令人讨厌的东西所吸引过吗？"

当然，我可以告诉他有关我被那条狗咬的事情。在我几乎要被撕成碎片的时候，我感到的那种不合时宜的兴奋。但这事太恶心、太不正常了。尽管我们的讨论越来越尖锐和危险，我猜得到，客人只是期望我承认曾经被某个丑陋的男孩或者什么人性本质吸引过。

"也许。有的时候。可是我觉得那样有些不正常。"

"那正是我要告诉你的——没有什么是'不正常'的。这有点荒谬。事物具有多面性、模糊性。这你真的不知道吗？没有什么同质的东西，甚至是美，能够强大如那个集所有矛盾——可憎与迷人，美丽与丑陋——于一体的地方。没有什么是不美的。然而我们找到了自己的缺点——丑陋。这个缺陷具有巨大的力量。为了它，我们相爱，我们发狂。它是最色情的东西。他妈的，谁想要什么见鬼的完美？不仅外貌，而且一切都不是完美的。即使完全也不是完美。"

他不说话，等着我的回答。可我没有开口。我同意他说的每一个字。但那还根本不足以阻止我做出反应。噢，不。使我保持沉默的是羞耻感。我感到羞耻，因为我意识到客人从一开始就是对的，他的愤怒诊断是对的，我拐弯抹角地真正想要他说的是，我，苏珊娜·拉宾，还不错，还可以接受，还没有绝对地讨人厌。想要他说我有双动人的眼睛，有一头美丽的头发，个子高挑，或者一些别的类似的废话——他总能夸我点什么，就像母亲和尼哈玛碰到这种情况时做的那样。有无数的恭维话专门用于其貌不扬的女人。我知道不少这种话。在现在这个情况下，说我"特别"，我能将就，说我"有趣"，那也行。我已经准备好接受他施舍的任何称赞。他却把智慧白白地浪费在我的身上。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愿望的卑贱本质。

"那么，你怎么想？"他等着我对他那番热烈的独白做出反应。

我能说什么？

"这都很理论化。"

"理论化？"客人在我旁边腾地坐了起来，在黑暗中审视着我的面

孔。“你真正想跟我说的是什么？你想要什么，你这个疯姑娘？告诉我。要我俩开始瞎搞？来段风流韵事？那样是不是够实际了？你不是彻底疯了吧？我们是血亲。你是我的姐姐！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走了。你想要发生什么？嗨？天哪，她说太理论化了！”

我背对他，像胎儿一样蜷缩着。我感觉到他站了起来，然后听见他抖掉衣服上的沙子，迅速地穿上，以拉链突然嘶的一声拉上作为结束。

我觉得如此空虚和绝望，我都不知道自己从哪找的那些无礼的话来顶撞他。

“你大可以跟你的姐姐在亚历山大的天台上喝茶。我只不过是你的远房堂姐，仅此而已，我一点不想从你那得到什么东西。”

在从未真正静止的寂静夜晚里，一切都很安静。客人站在我后面，穿上衣服，再次把身体遮护起来，玉树临风。我们俩之间隔着一段时空，尽管美丽却不是为我们而设。我想起尼哈玛常说的一句话：“我将会入土为安。”



突然，想起家、母亲、尼哈玛和阿曼德似乎能使我感到安慰。比起眼前这壮观的海景、漆黑的夜晚和布满星星的天空，我无疑更喜欢他们。我蜷缩着躺在沙滩上，就像父亲给我讲的《茶花女》戏剧故事中那个喝醉酒的引座员睡倒在台上的样子。

一只温暖干燥的手伸过来触摸我，让我翻身仰卧。噢！可怜的受惊吓的苏珊娜·萨姆沙①。客人双手扣住我的腋窝把我架起来站着，接着带着我往停车的地方后退了几步，直到我光着的屁股碰到汽车的金属外壳。然后，他再次把我架起，让我坐在车盖上，把晾在那上面我的湿衣服甩到地上。之后，他用手背轻轻地摩挲我的脸颊，仿佛是我俩之间新对话的开场白，一段完全不同于先前那场讨论的对话。

我面对着他坐着，双膝分开，两脚踩在汽车保险杠上。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大腿根处，像波斯猫一样轻柔地抚摸着。在月光下，虽然

① 葛雷格·萨姆沙：卡夫卡小说《变形记》里的人物，在一个噩梦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



看不清楚他的脸，但我能感到他对我的关注。

我微微地往后靠，尽量保持上身挺直，不往下滑，双手撑在温暖的车盖上，任由他抚摩我的大腿内侧，慢慢挑逗我的情欲。我的海妖姐妹们，你们相信吗？"特别的"苏珊娜·拉宾竟然引诱了英俊的客人。我想大笑，但更想哭。多么矛盾复杂的胜利啊！成功带来的喜悦立刻被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恐惧所稀释。无论多么虚无，时间有它自己的定律。它从不满足现状，而是努力使自己充满事件，引发行动，要我们像奴隶一样顺从于它。它不随我们的意志转移。它就那样发生了。

客人的手从我的膝盖游移到我的胯部，逼近我，封锁最后的秘密逃跑路径。像有人打开了我的胸膛，直接触摸我的心脏、肺叶和血管。

那陌生的触摸使我哆嗦了一下，就像突然被什么声音吓了一跳似的。

我首先的冲动是制止他的侵犯，去踢他一脚，然后快速地溜到沙地上，找到衣服把自己包起来。装做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鼓起勇气，发动所有的自律机制，尽最大的努力克制住自己。别动！别动，苏珊娜。坐着别动，你这个傻姑娘，胆小鬼。就让它发生吧，不管有多糟糕，让生活展示它的本来面目吧。这不就是你最想得到的吗？就跟当年上那个愚蠢的七年级英语电视教学课一样，我命令自己说"看着，听着"，任凭客人抚摸我的身体。我留意到他的手指已经越过了警戒线，向着连我自己也不敢触摸的地方前进。他的抚摸不可思议的细腻温柔，好像盲人的手抚过漂亮女人的脸蛋一样。他的手指估摸着所在的部位，渐渐地就开始自信地发挥技巧，散发出我之前的上百个女人的难闻气味。

我看着客人的脸，试图在黑暗中从他目光里辨认出他的表情。但我所能确定感觉到的只有他急促的呼吸。我想知道他有什么感觉，他在想什么。尽管他有过多年的性爱经验，抚摸我并且接触到我分泌的女性潮湿会不会使他感到恶心。我力图记起它的样子和感觉，但那份回忆离我是那么的遥远。只记得大概是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在蒂缇·瓦尔迪蒙父母卧室里大双人床上，记忆中有她父亲的小剃须镜子，以

及一张模糊的照片，上面是一种奇怪的异国海洋生物或者是热带食人花。之后记起的是戴着橡胶手套的妇科专家阿里卡医生，他手指的触摸只会让我想起我强迫自己一动不动，为了不让自己起床逃跑。

我的思绪回到了现在。我发现自己紧绷的身体坐在车盖上，两腿叉开，而客人的妙手正无拘无束地游弋于我的两腿之间。我觉得自己的脸僵硬而不自然地扭曲着。我不得不用前额顶着他的肩膀，就像要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从自己眼前藏起来似的。我无法确切地理解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这跟我在电影里看的和书里读的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我的肚子难过得好像里面有一台热蒸汽压路机，双腿和背部的肌肉也变得十分僵硬。只有这些能使我相信这事跟人还有点关系。我甚至不知道它是件令人愉快的事，还是件糟糕的事。因为这之中涉及的元素太多了，我无法分离出它的纯粹核心元素。我的手越来越紧地缠住他的脖子，额头越来越用力地顶住他的肩膀，好像我的生命依赖于此似的。最后，一股冲击波穿破我的皮肤，紧绷的身体慢慢地松弛下来，像一个刚死的人，热气渐渐散去。



我弯腰坐着，身体不住地发抖。客人站在我身旁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仿佛我是一个被护士抽血时表现得很勇敢的小孩。直到我不再发抖，他才停下来，然后他说了一句实实在在很甜蜜的话，把我的尴尬一扫而光，使得我敢于抬起头来对他说："来吧。我们在沙滩上散会儿步吧。"我说："不过，我得先把衣服穿上。"他说："别麻烦了，你的衣服还湿着呢。"说完他把我的衣服从地上捡起来，扔回到我们的多功能车盖上晾着。

我们相拥着一起走到了水边，客人穿着衣服，我则裸着。一个光着身子的女人和一个穿着衣服的男人。一开始，我们只是静静地走着。后来，客人先说了话，他总是第一个打破沉默。他向我述说跟那个亚美尼亚人打交道时的各种困难，以及那个人又如何把三幅圣像退了回来，因为它们比寄去的幻灯片上看到的情况要糟糕。我问："你现在还担心吗？"他说："我一直在担心。"我想，我是多么的希望他快活呀，可我又是如此地无法令他的生活更加快乐，因为我是——我。



我们继续走着。我问他是否跟许多女人有过关系。“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别跟我来什么性事后的对话。”他说。

“可我不知道你完事之后想谈些什么？”我说。

“对不起，对不起，”他抱歉道，“我有过关系的女人比你想象的要少。但仔细算起来，我只跟一个女人在一起比较长时间。”

“你爱过她吗？”我问。

“我想是的，”他笑了笑，“可以肯定的是她爱我，非常爱我。”

我问：“她是不是长得很美？”他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似的，过了一分钟才给了一个很含糊的回答：“她比我大很多，几乎是我年龄的两倍。”

“她叫什么名字？”

“你为什么问这个？”他说，“米利亚姆，她的名字叫米利亚姆。”

说完他又重复了一遍：“米利亚姆·沙利文。”好像他喜欢听到她名字读出来的声音似的。

他放开我，用光脚把水溅到我身上。“住手，笨蛋。”我喊道。他就跑开去了。我忽然想起他是那么的年轻，比我年轻，只有二十八岁，还是个大小孩。也许是因为这，当我们一起朝停车的地方往回走的时候，我鼓起勇气问他：“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哪来那么大的耐心来对待我的问题？毕竟，你自己的麻烦就已经够多的了。”他用力地抱了我一下，劲使得太大了点，感觉他像刚上完一堂海军军官训练课一样，他说道：“你傻不傻呀？你是我的拜占庭·苏珊娜，我的魔咒。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

我们走回到放毯子的地方。时间过得特别慢，我们停留在一种被迫的平静中，就像是逃跑的人们终于到了一个藏身处，享受暂时的、虚假的自由，一会儿说话一会儿安静。

我们开车回家，敞着车篷，没有放音乐。客人非常专心地驾着车，把他瘦长的侧面对着我，偶尔深深地看我一眼。我紧盯着前面的路，努力想摆脱脑中一首可笑的儿歌，那是孩子们用来嘲笑我的歌曲之一。这支歌不断地在我的脑子里重现，嗡嗡作响，拒绝给其他适宜的

思想活动腾地方。歌词与发生的事实之间的巧合使得这首愚蠢的歌曲更加具有讽刺意味。

如果你爱她
就不要羞羞答答
带她去海滩
让她看看你都有什么
告诉她噢苏珊娜
你别哭
我爱你那么深
这就是为什么
我想跟你结婚
……

只不过,"跟你结婚"有时会被换成当时被看做更具侮辱性的"跟你做爱"。今天,可不比从前了。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客人是不是想过要跟我做爱呢?我不知道。噢,苏珊娜。



我们住的楼那黑暗的入口处有一股很浓的猫尿味。我们上了楼,在门前停下。我突然感到很害怕。天色已经很晚了。我浑身湿透,衣冠不整,还做过不要脸的事情,而我马上要面对母亲。我求助地望了客人一眼。他得站出来面对母亲的权威,做出解释,给个合理的说法。但他只是靠着楼梯栏杆站着,丝毫没有要担当起这个责任的意思。楼梯灯灭了。他按了一下红色开关把灯打开,又恢复原来的姿势。我站在门前,一想到马上要在母亲的利目下无所遁形,心里越来越急。我又哀求地看了客人一眼,求他救救我。然而,他却眯了眯眼,命令式地下巴一抬,说:"去!"

我按了门铃。



母亲看起来就像发疯的美狄亚①一样，宽大的白色睡袍外面松垮垮地套了件晨衣。借着过道里昏暗的灯光，我瞥见阿曼德就站在母亲的身后。这说明母亲的恐慌程度比我想象的要厉害得多。因为根据我以往的观察，只有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阿曼德才会被召唤来。母亲劈头就是一句："你们是不是精神失常了？"这不只是个开头，里面还暗示了后面要讲的话。我们跟着母亲进了客厅，这样好让她把自下午以来的所有想法告诉我们，以卸掉身上的怒火。

"我真不知道要想些什么。这么晚了才回来。我把所有的人都给吵醒了。我们差点就要给阿曼德在警察局工作的哥哥打电话。不过，只有失踪二十四小时以上，警察才会出动找人。阿曼德的哥哥是警长。尼哈玛也十分焦急，我们一直在通电话。"

说完，她就去给尼哈玛打电话报平安。我们被晾在一边，窘迫地静静站在阿曼德跟前。他会怎么想我们？我的衣服又脏又皱，头发蓬乱。我感到被揭发了似的，满心羞愧。而客人却站在一旁嚼着大拇指，等待机会回自己的房间，离这场家庭骚乱远远的。对他来说，这场家庭风暴所能引起的兴趣就跟去年的雪差不多。

直到打完电话使尼哈玛安下心来后，母亲才有机会好好地对我进行检查。她先从头到脚把我估量了一遍，然后走到面前摸了摸我身上的湿衣服。她严厉地看了看客人，不再被他惯用的讨好表情所迷惑。这次不比从前他犯的那些小错误，如把她还没读完的报纸给扔了或是忘了买牛奶等。母亲来回地看看我，又看看他，像一个考古学家正在研究一面古壁，上面写有她读得懂的象形文字。

"那么这段时间你们都在哪里？"

"在海边。"客人的回答犯了错误，还笑嘻嘻的。

"一直待到现在？那你为什么浑身湿透了，苏珊娜？你的头发怎

① 希腊神话，美狄亚是科尔喀斯城邦国王埃厄忒斯的女儿，曾帮助伊俄尔科斯城邦国王埃宋的儿子伊阿宋取得金羊毛，并成了他的妻子。但丈夫抛弃她和两个儿子，去和科任托斯城国王克瑞翁的女儿格劳刻成亲。美狄亚满腔愤怒，悲痛欲绝，疯狂地复仇，毒死了公主并杀死了自己亲生的两个儿子。

么了？你下了水吗？什么时候下的？怎么不穿泳衣呢？你们晚上在沙滩上待这么多个钟头都干了些什么？还有毯子呢？我刚才都快急疯了。你们怎么能做出这么没心肝的事呢？”

她并不期待我们的回答，一个劲地冲着我歇斯底里地发问，发泄她的怒火，毫无顾忌我们平时的伦理规范。根据这个规范，重要事情应该在私底下解释，在只有我和她的时候解释。她不停地说啊说，却不把事情挑明了讲。因为一旦她停下，就得被迫面对可怕而且难以接受的事实。与其如此，她更愿意把重点放在责备我们的不负责任以及不考虑她的感受，责备我们这么晚才回到家，责备我还糟蹋了一身衣服。什么都责备，就是不往已经发生了的最糟的事情那方面想。骂过我之后，她转而骂客人。她神色严峻，丝毫没有以往对待他的那种溺爱之情。

“尼奥，我不得不要求你从今以后对自己的行为更负责一些。这个家里并没有很多规矩，但我还是希望你遵从我们仅有的那几条。”

“我非常抱歉，艾达。只不过今天晚上特别温暖，特别迷人。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我们真的把时间给忘了。让您这么担心，实在是对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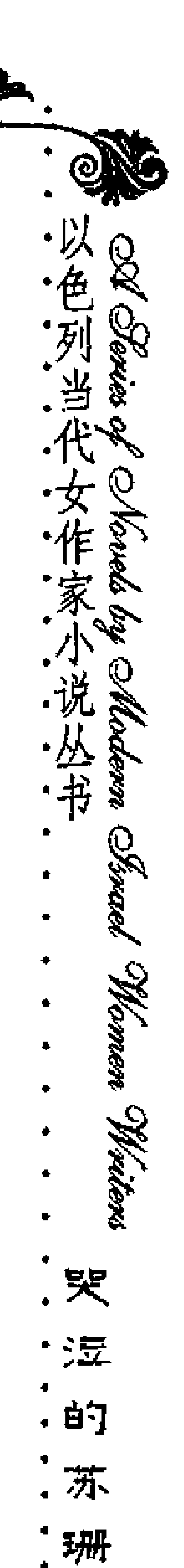
母亲万万没有想到会听到有关我们如何尽情享受的解释。我们开心快活的时候她却在苦苦地为我们担心，这个事实所激起的怒火比起回家晚了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她把该骂的话都已经骂过了。再说下去也只能是重复她所责骂过的话。她瘫坐在扶手椅子上，一副她的痛苦永远也无人会完全了解的样子。她阴郁地对我俩说：“去吧，去睡觉吧。”

我湿漉漉地躺在床上，灯也不开。

客人是怎么想我的？

他从我这想得到什么？我得给他什么？





八月的热浪

我试图回想，我是什么时候学会对别人眼中的称心生活说“不”的，我又是什么时候做出决定，像关上地窖的铁门似的把自己与外界彻底隔绝开来，然后透过潜望镜来观察外面的世界。我没有答案。我只能依稀记起我在这儿、在我们这个罪孽的星球上所度过的日子中的某些时刻，我做出过的诸多决定，我能识别自己的几个转折点和对认识的加深。但我不知道具体的日期。

我在不断逝去的童年的某个时候，就了解到这个世界是可怕的。这并不是因为我曾经受过什么虐待或折磨，动摇了构建余生的乐观基础。我的自传枯燥平常，全然没有那些充满邪恶的戏剧性事件的个人经历，从而使自己变得铁石心肠。我从未挨过打，或是被欺压和折磨过，也没有受过什么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父母对我都非常好，他们知道该如何对我好。我找不到他们作为养育者和教育者的任何失败之处。

那么，放弃生活的想法是什么时候开始在我的内心里萌芽的呢？是谁置我于现在走的这条路上，让我如此轻视生活，视它为一幅展出的画卷的呢？

也许是源于第一只被我胖乎乎的小手给拍死的蚊子。我凑近审视那只被拍扁在墙上的昆虫，连着断掉的腿一起粘在一点红棕色的血迹上。得知那是我被蚊子吸的血，并不能缓解涌上我嗓子眼像要吐出来似的恐惧感。

也许是因为农场朋友的儿子爱维阿塔，他当着我的面，将活生生的小鸡喂给他的驯鹰吃。看到那只长着漂亮羽毛的大鸟咬下小鸡的

脑袋，剩下一团毛茸茸的黄色身体在死亡的剧痛中蹦跶了好几秒钟，当时我的心都停了。

也许是因为在我家门前被车子碾死的虎斑猫。也许是我看到它的内脏湿乎乎地溅了一摊？也许是看到它的肠子从破碎的皮毛里钻了出来？还有那裂开的脑袋？那乳白色玻璃珠似的眼睛？

也许是发生在要升三年级时的夏令营，我因为食物中毒被送到急诊室的时候，没有帘子的遮挡，我看到隔壁病床上一个四岁的小孩低头坐在高高的病床上，他孱弱的肩胛骨就像一对还没有长成的翅膀，肩胛骨之间有一块明显的被熨斗烫伤的深红色印记。

也许是发生在父亲临终的前几天，我和母亲去探望他的时候，看到他因放射治疗而秃顶的头歪倒在干瘪的脖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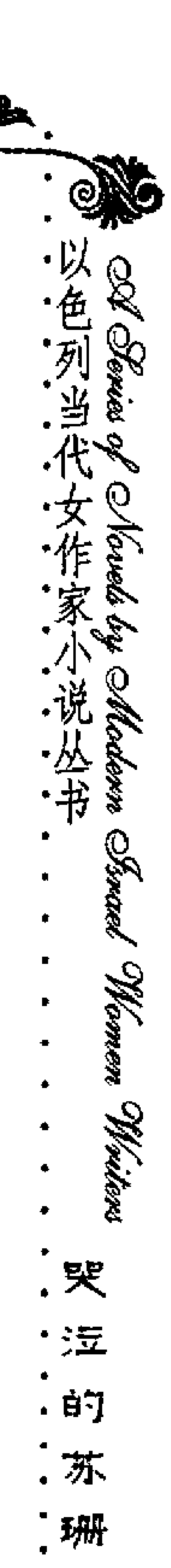
或者，也许是那些不断传来的关于大大小小的不公正的、人压迫人的邪恶行动，关于战争、医院和监狱，关于整个国家陷入了水深火热当中的坏消息积累的结果。到哪儿，人们的哭喊声都充斥在空气里，就算我捂住耳朵也不管用。

我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一点一点地，一个接一个地关掉我所有的意志力装置。我很开心这么做。我从不做计算，我只依靠直觉引领我穿过迷宫的曲径。我知道这样做是对的。别的我无法做，也不想做。

但还有爱。我的心中有爱，比如我对母亲的爱。但在内心深处，我却鄙视这份爱，厌恶这份爱——它不过是令人恶心的贪婪意愿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已。作为一种生存的行为方式，它评价每件事物都是根据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我服务，满足我的需求。当然，母亲也爱我。不过，我有时也会怀疑，她的爱是否也被这种不受她控制的出于实用的考虑所玷污了——她也是人，不是吗？

只有沉思和好奇才是纯粹的。那是很久以前我对客人曾经有过的感觉。当时，我完全为他俊美的外形、迷人的风度和优雅的谈吐而神魂颠倒。现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结束了。我不再好奇，只有渴望——一种我敢于表达，并使我的意志力屈服于它的可怕的渴望。我



就像一只被捕金枪鱼的渔网逮住的海豚，被扔在受污染的欲望之岸上，恐惧地、痛苦地大口喘气呼吸。

我并不想从他那得到什么，只要他一直在这世上便好。除了希望我也一直在这世上，他还想从我这得到什么吗？

我必须回到从前与客人之间的那种纯粹关系。但要怎样才能回得去呢？

这是一场投降之战。投降是我唯一的应战之道。它同样具有威力，而且一直以来都忠诚地为我效劳。为什么现在就不行了呢？我可以向我的欲望投降，让它击垮我，使我承受痛苦的结局。之后，我会渐渐痊愈。小时候我就是用这个策略摆脱了对蜂蜜蛋糕的渴望的。我要求母亲每天为我烤一个蜂蜜蛋糕。她说："怎么了，孩子？每天吃一个蜂蜜蛋糕，到最后你会一见到它就犯恶心的。"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往嘴里塞满了黏糊糊的棕黄色蛋糕。直到有一天，我甚至受不了早餐桌上的蜂蜜罐散发出的味道。

当然，这样的决定是很可笑的，它能被称为一个"决定"本身就很荒谬，听起来像是我还有别的选择似的。

我别无他途。

我什么也不在乎了，没有什么可以克制我对客人的渴求。我甚至懒得去掩饰这一渴望。从现在开始，我和投降就合二为一了。投降即我，我即投降。

从海边回来之后的日子里，只要客人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我的目光就一刻也离不开他。他的心情十分糟糕，一副沮丧和无趣的样子。一开始我还担心这跟在沙滩上发生的事情有关，但第二天晚上，他就消除了我的担心。从洗澡间出来的他和我在过道里不期而遇，他一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身上散发着一股温暖浓郁的香味，问道："你还好吗？"虽然我使劲地点头，他还是继续注视我的脸，寻找被隐藏的忧伤的蛛丝马迹，最后说："如果你有什么想不通的，不管什么事情，要马上告诉我。"

我希望他的忧愁会像以前那样过不了多久就烟消云散。但是这

次比以往的任何一次时间都要长。一天晚上我们散步的时候,他告诉我亚美尼亚那边又退回了两幅画像,他觉得自己的辛劳永远也不会有尽头,仿佛跟魔鬼签了协议似的,就像那个他妈的浮士德。他每天早上冲过澡之后,还没等头发干,就穿着整齐地到城里去办事。晚上我们一起看电视或下棋。我总是小心地尽可能让他赢。但即便如此也没能使他高兴起来。我们的对话内容转向他生意上的进展或是停滞。在接触过所有卡秋莎介绍给他的人后,他再也找不到其他足够稀有和珍贵的圣像货源来满足那个亚美尼亚人的要求了。我很想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是什么变化让他如此神不守舍、毫无生气。最后我得出了结论,只要他的问题在客观上的严重程度一有所增加,他都会表现出来,从不掩饰。而我也是个很厌烦掩饰自己忧虑的人。既然我们都互相如此了解了,就可以取下面具休息一下。

至少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解脱。我忠实于自己的决定,抛开所有的顾虑,放任自己沉浸于客人的气质风度之中,试图让他的音颦笑貌完全渗透到自己的体内,像中毒一样,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充满他的气息。为此,我几乎是无时无刻地陪伴在他左右。面对我的意图,客人丝毫不回避。有天下午,他甚至带我去特拉维夫,逛本·耶胡达街上那个格鲁吉亚人夏尔瓦开的布满灰尘的店。我们还一起去"不骗你"超市,在阿曼德的眼皮底下往手推车里装满母亲购物单上列的东西。阿曼德最近变得十分沉默寡言、一本正经,已经很久不用法语跟我打招呼了。平时,我和客人一般也就是在他房间里画画或读读英文诗选。为了逗我笑,客人会把我不理解的词句故意解释得荒诞粗俗。

至于母亲,哦,我的母亲。在我们从海边回来的第二天,我就发现,有些时候,要想重构案件的整个发生过程,机智的侦探只需侧身倾听凶手紧张的喃喃自语就可以了。因为在凶手灵魂深处某个地方,总是希望自己能被抓住,以消除或者减轻他内心沉重的负疚感。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说,爱情在本质上跟犯罪没有什么两样。纵然一旦暴露就会被扼杀,不被允许的地下恋情也总是渴望自己会被发现——也许是因为在好管闲事的邻居身边一次不经意的拥抱,也许是忘在恋人裤兜



里的两张电影票，也有可能是家中烟灰缸里一截牌子不同的烟头——总之，是被它好炫耀的、渴望被目击的本性所暴露的。当爱情造访这对幸福的人儿时，他们的生活便成了艺术，成为渴望人们注意的一出戏，一首诗。尽管意识到创作本身的奇迹，他们仍热切地希望宣布结果。若不是如此，最伟大的作品也会在它们谦逊的创作者的抽屉里腐烂掉。

我的爱也遵从于这一残酷的法则。除了母亲——我最亲近的人，还有谁更了解该如何当我的听众呢？她一个问题也不用问，我自己就会滔滔不绝地谈论那趟海滨之旅，并且添加各种细节，拐弯抹角地描绘沙滩的美景和吉普车上的男孩们，引述一些无伤大雅的对话，还要小心翼翼地排除任何可能引起怀疑的细枝末节。结果却适得其反，我越是克制自己谈论客人的冲动，就越无法停止，即使明知我的话里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我已经对谈论客人所产生的愉悦感上了瘾。因为缺少知心密友作为倾诉的对象，我想谈论爱人的需求远远得不到满足。这一需求一旦爆发出来，我的聪明才智也会在倾吐的愉悦中变得麻木。

母亲一边竖着半只耳朵，一边忙她的日常家务，让我以为她已经相信了我讲的纯洁故事，就像以前我告诉她一个叫“少女引导者”的宗教团体的例行短途旅行一样。但是，接下来的日子表明被母亲接收的信息已经完全被分类、整理和分析过了，而且得出了一个真实的结论，以及一个专为任性的苏珊娜·拉宾准备的行动方案。母亲假装专注于别的事情而心情烦躁，不管我愿不愿意，坚持要我陪她做日常家务。她不停地抱怨这里疼那里痛，甚至逼我陪她一起去牙科诊所，看马鲁勒医生切开她的牙床脓肿。在很大程度上，她对于我做一些间接使自己分心的事还是挺满意的。除了有一次，她明显地表现出了特别紧张的情绪。那是当见到我拿着绘图本和彩色粉蜡笔往客人房间走时，她用身体挡住我，喝令道：“别烦尼奥了，忙你自己的事情去！”她的态度十分坚决，直到我做出让步，回到客厅里去。

另一方面，尼哈玛的身体在一天天地好转。她已经不需要坐轮

椅，但还得有个人看着免得她又从楼梯上摔下来，所以母亲每天都要花上好几个钟头陪她，抱怨没有人帮她忙。母亲一定要我陪她们在公园里散步。我虽然心里不情愿，也不得不服从于这个事实（这毕竟是更大的更彻底的事实的一部分）。尼哈玛用她干瘪的手挽住母亲的胳膊，在同样的十来米的路上来来回回地溜达。我跟在她俩的身后，被八月的酷日晒得昏昏沉沉的。

在此我要指出，所有这一切带给我的烦恼要远远小于其原来预计的结果。更不用说母亲的情绪对我的影响了。由于我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客人的身上，这种影响力已经大大降低了。我的眼睛里和耳朵中已容不下其他人。曾经纠缠我的内心，使我对周围人的感觉感同身受的敏感几乎消逝殆尽。我的心里只有客人一个。

他不在家的时候，我会偷偷溜进他的房间，看他丢在四处的东西，触摸他的枕头和依旧潮湿的毛巾，还有那些放在桌上的没有用的美国硬币。我仔细望着窗外的风景，想象自己就是他，直到与他看到的每一个细节都完全一致。

他在家的时候，我会一直注视着他，无论他是在看电视，在把某个东西放到架子上我母亲拿不到的地方，在读书，还是在打电话。有时，他遇到我的目光，就会笑着摇摇头，或者把食指在喉咙上一划，暗示如果我不停止的话会有什么后果。他准备好了承担我对他的欲望之重，我对此的感激大于对他为我做的其他事情。

夜晚，我裹在汗淋淋的被单中辗转反侧——犹如一只被困在蜘蛛网中的大蚱蜢，被沙滩那夜的回忆反复侵扰。那回忆就像电影似的，把那夜发生的事件从不同的角度拍了数十遍，然后在我眼前放映，而且我的视线根本无法移开。我模仿他触摸我自己，但却是干巴巴的，丝毫没有他摸我时所产生的那种附加感觉。我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厌恶自己的身体。我讨厌它的需求，讨厌它像一座群蚁涌动的蚂蚁窝般活跃的状态。但却无法忽略这个骚动的存在。洗澡的时候，我站在喷头底下，揉搓自己的小腹和乳房，一洗就是好几个小时。有几次，母亲装做不经意地推开门，我们的目光交汇像是利剑相击，缺乏相互



的理解。我的心里已经没有空间去思考这意味着什么，她会怎么想，她有什么感觉？我早已把她抛在脑后，就像夏天的时候我把毛衣收在衣柜的最上层一样。我安慰自己，这样做不过是暂时的。

既痛苦又快乐，这种陌生的感觉使我茫然，我发觉泛滥的情绪模糊了每个具体的希望和目的，我像一条被遗弃的小船，在现象的表面上浮动。我的境况所强迫的自我吸收跟身体的原始需求一样让我反感。关于"我被如何如何"的无尽沉思早已令我疲惫不堪，就好像在逼我看一本无聊的影集一样（你看这张是我们在比萨斜塔旁照的，这张是我们在卢浮宫，还有这张是我们在他妈的乞力马扎罗山①顶上照的）。

可是，最让我担忧的还是客人的不快乐。我对他的不快乐是如此了解，无论是当他表现出其优雅、老练的一面时，或是当他画诗人雪莱、雪莱的妻子玛莉以及拜伦男爵无礼的讽刺漫画时，还是当他对晚间新闻发表评论，反对自鸣得意的左派，反驳母亲的论点，或者是在他赞赏维维恩·韦斯特伍特②和亚历山大·麦克奎恩③秋冬时装系列时，我都能感觉到他的悲伤。还有从他无数的叹息和神情中透露出来的悲伤，都令我心碎，使我为自己的无助和被动所折磨。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觉得无助和被动是一种真正的无能。

我的心思一会儿在客人身上，一会儿在自己身上，又从自己身上转到客人身上，这样来来往往令我头晕。但不懂世故的我，苏姗娜·拉宾，海上女妖，美人鱼，海的女儿，大地的女儿，能做什么？你已经向现实低头，把自己抛向空中，然后又重重地摔在地上，躺在那里仰望天空，目眩于闪烁的星光。

---

① 乞力马扎罗山：非洲最高山，位于坦桑尼亚东北部，靠近肯尼亚边境。

② 维恩·韦斯特伍特：一位受到全世界推崇的英国时装设计师。她被誉为20世纪全世界最顶尖的五位设计师之一，并且在1990年和1991年连续两年被评为英国年度设计师。她的作品包括了男女式服装、佩件和香水。

③ 亚历山大·麦克奎恩：英国时装设计师，有英格兰"坏男孩"之称，最著名的设计即是性感又晦暗的流浪主义服装，像是刻意对过分精致、华丽的高级订制服宣战。获2003莱卡英国风尚大典"2003英国年度设计师"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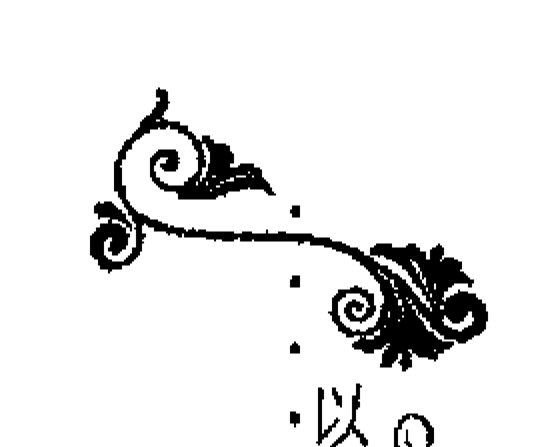
一个星期后，或是一年后，或许是一段永久以后，客人去海法市找那对兄妹，劝他们卖给他更多的画像。他告诉我，这是他最后的希望。否则，他只得一辈子当那个亚美尼亚人的奴隶了。哦，浮士德！

当我从一个很糟糕的晨睡（它丝毫不能弥补昨夜的失眠）中醒来的时候，客人已经走了。迎接我的是一座完全沉浸在寂静和炎热中的房子。屋子里到处都是八月。透过紧闭的百叶窗射进屋来的阳光中有它，角落里沉重的晦暗中有它，熟悉的居家气味经过高温变成的令人窒息的浓烈瘴气中也有它。躲藏在墙间的八月早已暴露了自己，就像楼梯间里的死老鼠暴露了瘟疫的存在一样。

母亲也不在家。既然客人不在，就没有必要硬拽着我一起出去，她便放下心来让我多睡一会，自己出门办事去了。我从一间屋子溜达到另一间屋子，尽情享受光着脚丫子走在瓷砖上的感觉。很高兴整座房子都是我一个人的了。我记不起上次自己一个人在家是什么时候的事了，自从客人到了我家，这个永恒的避难所就变成了一个暴露在全世界眼中的透明玻璃箱子。我偷偷地瞄了一眼他那乱糟糟的房间，不放过散落在四处的东西的每一个细微之处：烟灰缸里东倒西歪的烟头，以及像瀑布般从床上垂到地上的皱巴巴的被单。我试图在它们的帮助下想象出昨晚客人熟睡时的身体动作。一幅不用画笔的静物写生。我在门前踌躇了一阵子，最后还是决定先不进去。我知道客人要到第二天晚上才会回来，在那之前我有的是时间来满足自己的拜物癖。

母亲的房间同往常一样井井有条，与客人房间的混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双人床已经被铺好，带有花朵图案的床罩扯得十分平整，两只枕头对称地放在床头，那张简单的老式梳妆台上只放了一瓶香水——这使我联想到独居在西藏高原上的和尚——和一个雕刻了装饰花纹的木头盒子（它是尼哈玛为她从罗马尼亚带回来的纪念品）。

我检查了床头柜上的各种药瓶，把那半杯水端起又放回原处，又瞟了一眼放在旁边的报纸的周末增刊。稍微迟疑了一下，我还是决定打开抽屉瞧瞧。抽屉装了一些女性气息不是很浓的东西——一包针



线，几双曾经很不错的丝袜（以备需要的时候要穿），一些别的药，一条珐琅项链（父亲送给她的礼物），一块坏了的金表，一些大小各异的扣子（以备需要的时候可以用），一把剪刀，一本旧通讯录，某种用来治疗背痛的难闻的中药，还有一个带刺绣的丝绒手袋（阿曼德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小时候我对这些东西是那么的向往，当时它们是禁止乱动的宝贝，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比如我生病或者是表现特别好的时候，才能有幸去摸一下。唉，已经完全长大了的苏姗娜不再对它们着迷了。

父亲的床头柜则像是一个干瘪的寡妇，以拥有一个巨大光亮的玻璃切割烟灰缸而自夸，烟灰缸下带花边的垫布反而强调出用它的人已经不在了。我真想躺在这张大床上打滚儿，重温儿时的快乐。但是考虑到之后还要拉平被单——这可是一项需要耐心和协调性的复杂任务——我还是克制住了。母亲的房间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提供关于她的不为我所知的信息。我把衣橱的门一扇一扇地打开，检查挂在里面的衣服以及整齐地叠放在架子上的亚麻床单和毛巾。衣架上挂着一溜的印花裙子、几件节日时穿的浅色衬衫，还有几件冬天的大衣发出淡淡的樟脑球味，犹如母亲的剪影一般在我的眼前晃过。母亲有一个抽屉专门用来存放用不着的礼物，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再送给别人。我打开这个抽屉，一眼就认出了放在最上面的那个华丽的购物袋。袋子里装的是客人当初来的时候给我们带的礼物——一件灰色的裙子和一瓶女性身体造型的香水。我拿出这两件异国的物品轻轻地摩挲着，仿佛在触摸他本人似的。我喷了点香水在耳后，把裙子展开，提着裙子比在身上照着衣柜门上的镜子。这件轻薄的吊带裙子看起来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啊，仿佛是一片人造的烟雾。

我不禁想起在特拉维夫的大街上看到过的那个捡破烂的疯女人。她推着一辆陈旧的、堆满了东西的婴儿车，到处翻垃圾箱。看不出她有多大年纪，嘴里的牙都快掉光了，身上套着一层又一层褪色变形的破旧衣服。唯一特别的是她头上的那顶棒球帽。那是一顶全新的、橘黄色的帽子，上面印着一家著名的石油公司的标志。显然，它是某个

富有同情心的游客的馈赠。虽然我知道老盯着一个有残疾的精神病人看不是什么友善的行为,我还是无法克制自己不去注意那顶让人很不舒服的棒球帽在乞妇的头上宣扬中产阶级的健全心智。当时,我真想过去把那顶帽子一把摘掉,然后跑开,好让老妇人不再在路人的眼里失去她已经所剩无几的尊严。但自然,我并没有那样做。我是苏姗娜·拉宾,不是吗?那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我都无法忘记那顶帽子。现在,它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令我想起未来派设计中出现的那些家庭烧烤聚会和拥有电脑和溜冰鞋的健康的孩子们。我迅速地把衣服和香水放回袋子里,关上衣橱。

我继续在房子里到处游荡,为了充分地行使我对这所房子的独有权,我甚至观察起了卫生间,马桶里的水被消毒剂染成了蓝色。马桶刷旁不卫生地放着一本杂志,我用脚指翻开它,看到美国总统那张友善的农夫脸。我走进客厅,摸了摸那对巴伐利亚男女的硬脑壳,跟他们打招呼说了声"Sieg Heil"①。我打开电视,迅速地换台,换到探索频道的时候才停下来。你猜,那上面正播放什么节目?某种小鱼在繁殖的时候,会从雄性变为雌性。那么反过来有可能吗?雌性小鱼能不能变成雄性的?要是我能变成有点厚脸皮的、屁股可爱的罗伦·拉宾或尼姆罗德·拉宾那该多好啊!我一定要趾高气扬地走遍世界各地,让所有眼镜店的女店员们为我疯狂。我会采纳一个充满感性的世界观,比如新马克思主义,或者更不错一点的,虚无主义。但换个角度讲,谁又能够保证我不会变成像阿曼德那种每天早上五点就要起床开店的男人呢?我们不可能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认识,我用尼哈玛的话告诉自己。每当关于某个邻居或者某个公共人物的真相(不外乎是有情妇、做过整形手术或有犯罪记录)与她之前的看法不一致的时候,她总是习惯说这句话。我关掉电视,凝视空间。是的,对于这个混乱的世界,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更多的认识。

我漫步走进厨房,检查放满了东西的冰箱,取出一个特别大的桃

① 德语,意思是"胜利万岁"。



子，几口就把它给吃了。之后，我在餐桌旁坐下，随意地翻阅零散的报纸，思绪却飘到客人耐心的双手、报纸、我的双腿内侧、还有狂跳的心脏——不要胡思乱想了，恶心的苏姗娜！接着，我开始浏览母亲已经拆开的一些邮件——各种账单和银行结单，一张专修手指甲和脚趾甲的美容师的广告传单。另外一封银行来的信，收信人写的是我，里面是储蓄金的年报表。一份社区中心九月和十月份的活动通讯，一张颜色鲜艳的 24 小时营业的比萨店新开张的推销广告，还有一封市自来水公司来的信，确认给公寓装独立水表的通知。

我的生活本质就这样展现在我面前的桌子上，用非凡的艺术家才有的最简约的方式，准确地刻画出了它的单调乏味。

客人说：生活是可怕的。每个人的生活，包括他的和我的，都是可怕的。但是，人们有光明的指引，而我甚至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看，好找到那该死的光明。我和客人之间的不同在于他拥有自我。他的问题不在于他自身，而只是钱的问题。只要问题解决了，他就能够继续前行，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而我的问题就是我自己。我能够解决自己吗？我真生气，客人竟敢把他暂时的、几乎是偶然的痛苦与我的长期痛苦相提并论。他要想重新组织自己的生活，不需要别的，只要有钱就行了。不过是钱而已。只要还了那个亚美尼亚人的债，他所有的麻烦也就结束了。

在内心深处，我清楚地明白，我是瞧不起他的性格的。客人的财务问题在后面拖着他，像戴安娜王妃的婚纱一样长得没有尽头，不过是他爱惹麻烦的个性的一个自然的衍生物，就像是一只畸形的手，一只有六个指头的脚，或者更稀奇的，就像是一条尾巴。但是这种想法对我完全没有帮助，我暂且把它放在一边，先集中精力解决眼前的问题。

钱，他所有的问题都是因钱而生的，也都会因为钱而结束。为了钱，他被困在拉马特甘，被迫跟在各种阴险的俄国人后头跑，却发现他们卖给他的圣像不过是些糟糕的赝品或是二十年前的货色。为了钱，他一天要抽掉两盒香烟，整个人沮丧而消沉。

我翻检桌上的信件，挑出那封储蓄金报表。十二万一千谢尔克[1]。更准确地说是十一万三千谢尔克，假如我现在就把钱取出来的话。

这个账户是母亲很多年前给我开的，我记不清楚具体是哪一年开的了。一开始存的时候钱并不多，那是德国政府给她的赔偿金，但钱在银行随年增长。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取出这笔钱。以前曾经有几次，我们想过要怎么花它，但那时还存有希望说我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融入主流生活，所以需要钱来上大学或者将来自己买一套小公寓的时候可以用来付首期。但随着这样的机会渐渐渺茫，我们也就很少再考虑这份储蓄金的用场了。最后，它便成为家里的另外一项例行事务，每两年会自动续存一次，拥有跟我们平行的独立生活，就像住在远方的亲戚们每年都会寄新年贺卡，提醒我们记得他们，之后他们又会很快被遗忘，直到下一年过节的时候。

与我们其他那些微不足道的财物所不同的是，这个账户上的名字是我的。父亲当年十分坚持要这么做。出于某个原因，父亲十分强调这对他的重要性。尽管这样做的象征意义重于实际意义，但这笔钱毕竟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当时，它似乎只是父亲的一个可爱的怪念头，是他性格的一个体现。在财务管理方面，母亲要比我和父亲强一些，主要因为她具备跟现实世界打交道的能力，而那正是我和父亲最不擅长的。然而，我们从来没有认为哪部分财产是只属于我们中某个人的。

我快速地翻开报纸，找到有汇率的那一版，心算了一下，大概合三万美元。完完全全属于我的三万美元。与我们去卡秋莎家时客人提到的数目刚好一致。他欠那个亚美尼亚人的钱大概就是这个数。过去三个月中他通过卖画像应该已经还掉了一部分。太好了！还债后，我们还能剩下一点，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还有喘气的空隙。

我兴奋得站起来走了几圈，一会坐下，一会又站起来。我的心就像猛地被关上的门一样怦怦地跳得厉害。在为想到一个这么好的点

[1] 谢尔克：以色列的一种基本货币单位。



子而欣喜的同时，又要焦急地等待预期的结果。

三万美元，多么便宜的赎金啊！我点了支烟，在屋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刚刚还充满了整个屋子的沉重气氛一眨眼就不见了，代之的是沸腾的、呼之欲出的活力，房子里连一个能让人停下来冷静思考的角落也没有。

那到时我会怎么样？如果他把欠那个亚美尼亚人的账还清了，也就没有必要继续跟我们在这里待下去了。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算是够久的了，比当初预期的要长。当然，我知道他总有一天是要走的。但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俩的接触越多，我就越难想象将来那个不可避免的离别。即使我往最坏的方向想，还是完全无法在心理上做好分开的准备。我们关系的稳定发展把想象中的分手场景改了又改。到了最后，我再也想象不出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也就干脆不想了。

然而，考虑到目前这个新情况，我再也不能逃避现实了。

他要是走了，我该怎么办？上帝啊，到时候我会怎么样？

我走进他房里，脱掉衣服，躺到他的床上，用身体撑开卷成一团的被单，闭上双眼，试着让自己平静下来。

毫无疑问，我完全可以打消帮他还钱的念头。谁说我一定就要帮他摆脱经济困境？凭什么要我这个穷亲戚帮他？我可以把这个念头忘掉，就当没有这么回事。

我在脑子里把这些想法过了好几遍，鼓动自己不要站在他那边，给自己找理由，为自己辩解。即便如此，我明白那也都是白费心机。一切都太迟了。在知道自己有能力去做的情况下，我怎么可能克制自己不去帮他。对我来说，那无异于是一种犯罪，因为那样做违反了我内心中与他相处的道德规范。我不是那种做什么事都计算得失的人，那样的人太可怕了，我对他们向来是避之不及的。尽管我有不帮他的理由，还是要做出正确的决断。我必须把那笔钱给他。这样做与我对客人的爱没有丝毫的关系。

那我自己该怎么办？我无数次地问自己。

我或许可以跟他一起走，一起到纽约去。为什么不呢？把债还清了之后，我们还能剩下一些钱，足够让我去纽约了。他不是也提到过我们可以在亚历山大像兄妹一样一起生活吗？当然，那不过是他的一个幻想，但为什么就不能认真考虑一下这个想法呢？

不，我丝毫没有要把自己强加于他的意思。虽然我们的关系已经超出了任何我所知道的定义，就算我们退回到兄妹关系，我也会很满足。我绝不会妨碍他。他完全可以像从前一样过他自己的生活，而我只是默默地在他身边。的确，要是那样的话，我就得跟母亲远隔重洋了。但我相信只要我写信跟她解释清楚，她会理解的。虽然偶尔她会因为担心而一时想不开，其实她还是十分通情达理和开放的。还有谁比她更理解短暂的人生有无数种活法呢？她自己不就经常说，只要不伤害他人，所有的生活方式都是正当的吗？

那到了纽约之后呢？我在那里能做什么？对我来说，融入外界是那么的艰难。我曾经努力过，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么强的动力。相反的，那时候为了给自己参与外界激烈无情的活动找到正当理由，我不得不把自己置于无休止的心理挣扎中。到了纽约，我不会再对什么都瞧不起。我也许可以在尼奇和桑德拉的画廊里找份办公室的工作，甚至是当清洁工也行。或许，他们还会愿意教我如何穿衣打扮，如何做头发。我甚至可能去剪一个流行的短发。

我可以开始认真地作画和雕刻。献身于某项我以往不敢从事的事业。也许在那，远离这个家，远离目前这种烦闷乏味的生活，就能找到我需要的勇气。业余的时候，我可以跟某个画家或雕塑家学习。我会做任何可以让客人为我骄傲的事。我将是对他最忠诚、最无所求的朋友，而他会很乐意我待在他身边，因为尽管有人围绕在他周围，到了最后，他一定还是会觉得孤独的。我们还可以一起去拜访他的好朋友们，那样我就能够亲自认识他们，像尼森姆·巴伯加尼、安德烈·特罗伊卡洛夫，还有牛仔大王迈耶和他那个乳头上文玫瑰花的女儿伊琳娜，以及来自埃尔帕索的莫希。



当然还要去拜访米里亚姆,米里亚姆·沙利文。她给我们开门,只见她身材高挑、举止优雅,有着跟利芙·乌尔曼①一样的宽下巴和丰满的嘴唇,身穿黑色长裤和紧身的高领毛衣,细心梳理的头发里夹杂着几根银发。我会对她说:很高兴认识你,米里亚姆,我听过很多关于你的事。也许他们会旧情复燃,但我不会吃醋,因为那不同于跟我和客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三个人相亲相爱,米里亚姆说不定还能充当一点我母亲的角色。到时我一定会十分思念母亲。

我的思绪漂浮,做起了白日梦。一个接一个的幻想,犹如风暴中的潮水,冲到最高点,然后跌落在岩石上,撞得粉碎。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母亲已经站在我旁边,手里拿着我盖的被单。看到我光着身子,她脸上的悲伤多过吃惊。她问我话的时候,声音里也透着类似的异样伤感:"苏姗娜,你在干吗?"我嘟哝说我只是想在凉快的地方歇歇。她说:"你胡说什么呢? 这是房子里最热的一间屋子。快把衣服穿上。"说完,便走出房间,没有把房门带上。我很感激她没有继续待在这里,看着我穿上衣服,令我丢丑,那原本是她的典型作风。

当我走进客厅和母亲会面时,已经准备好用沉默来应对她的一切责备。把自己视为无辜的受害者。这是我刚才穿全棉高腰内裤时想的点子(哦,宁芙②,哦,迪娃③)。这个策略并不复杂,只需要让母亲蒙在鼓里就行了,因为现在还不是痛苦地坦白交代的时候。是的,我知道我最近跟客人走得有些太近,但别忘了当初是她自己特别希望我们成为朋友的。我们怀着对艺术的共同兴趣,喜欢相互做伴。再说了,他毕竟是唯一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亲戚。多亏有了他,我的画技才大有长进,心情愉快。总的来说,在我看来,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过是美妙的家庭关系的一部分,母亲也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分子。

---

① 利芙·乌尔曼:女演员,挪威人,出生于1939年12月,曾演过《性格》、《面对面》等。
② 宁芙:该女神以美丽女子形象出现,有时化身为树、水和山等自然之物的小女神。
③ 迪娃:歌剧中的女主角。

母亲，母亲，我和客人之间的相互爱恋不过是戈耳迪之结[①]，很快就会被我的背叛之斧斩断。我冷静而自信地深入虎穴，犹如一个训练有素的间谍，他真正的身份就连最先进的讯问技术也休想揭穿。

然而，母亲丝毫没有要谈论客人，或是我和客人的意思。她非但没有对我进行解释和说教，反而把我拥在怀里亲吻，像是几个星期没见面似的。她说，因为尼哈玛和其他一些事情，最近把我忽视了，她会好好地补偿我，多花些时间陪我，她真的很想我。母亲从来没有这么多愁善感过。而我，刚刚还排演过要跟母亲离别的情景，便很自然地以叛徒的身份全心全意地回应她。我们一起到厨房提前开始做晚饭，两个人合作得十分融洽。她先把逾越节饼干[②]泡到鸡蛋里，然后放进锅里煎。我把肉桂拌进奶油干酪，加上糖，又放进一些葡萄干。母亲一边做饭，一边骄傲地告诉我她今天在市自来水公司取得的胜利，讲她如何成功地让他们取消向我们多收的费。虽然她已经退休，但在以前工作过的地方还是有些影响的，对此她感到很自豪。我表现出对每个细节都很感兴趣的样子，问她很多问题。每当她讲到如何跟自来水公司的职员据理力争时，我就报以笑声。一切就像回到了从前，我们边吃边聊，预言这个国家由于新政权的出现而注定要发生的将来。吃完饭，我们一起洗碗——我负责用洗洁精刷洗盘子，母亲负责把它们冲洗干净和抹干。她问我想不想去特拉维夫看电影，就我和她两个人，还问我想看哪一部。我说：好啊，干吗不去？那就去看新版的《隔离》吧，尼奥推荐过。母亲翻报纸看影讯，说，这上头没有这部电影，也许是还没在这上映吧。我说，那没关系，就挑一部你喜欢的吧。她说，要不就看部丹麦电影，叫《破浪》，这上头说这部电影挺棒的。我回答说，你看着办吧，我无所谓。她说，这部电影开场很早，我叫辆出租车吧，我们今天庆贺一下。我说：太好了，真酷，跟客人一样。

---

① 戈耳迪之结：弗利吉亚王国的戈德斯国王打的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有个预言说谁能打开这个结，谁就是亚洲的下一个国王，亚历山大听到了这个预言后用剑把这个结砍开了。

② 逾越节饼干：逾越节期间犹太人所吃的一种不发酵的硬面饼。



我们乘车到特拉维夫实验电影院看了那部电影。电影讲述了一个住在偏远的苏格兰山村里的低能女孩对瘫痪丈夫的深切爱意。当电影结束,灯亮的时候,有些人还坐在原位不动,仿佛担心打破魔咒后就得回到琐碎的日常痛苦当中似的。影院四处坐着恋人们,我的左右两边尽是女人们的哭声和抽泣起伏的肩膀,那悲痛的样子就像是寡妇在战场上认出了死去的丈夫,悲叹自己的命苦。看来她们的女性本质要比一千多年的文明教化强烈得多,这一本质曾有过其辉煌的时候,但渐渐地失去尊严而沦为软弱最突出的特征。她们的伴侣在一旁安慰,无语,把她们像无助的小孩一样拥在怀里,看着他们的女人伤心得这么厉害,不知所措。

母亲也哭得十分厉害,号啕大哭,就跟拉宾被刺后的反应一模一样。我轻轻拍她的后背,等她稍微平静一点后才慢慢地陪她走出影院。我们站在电影院外面等车的时候碰到了莉维基和一个戴着一只耳环的小眼镜卷发青年在一起。莉维基向我们介绍说:“这是伊斗,他在贝特雁[①]有线电视台播天气预报。”说完她注意到母亲哭肿的眼睛,叫道:“哎哟,艾达,你怎么哭了,可别告诉我说是看电影看的!我刚才还在跟伊斗说,无论是为了什么样的爱,女人都不该那样在男人面前贬低自己。”

顾不上眼里的泪水还没干,母亲被这些话给激怒了,她生气地对莉维基说:“是吗?莉维基,拜托,这跟女人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有什么关系?有时候事情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你以为是在看 WIZO[②] 组织的宣传片吗?”莉维基不悦地说:“我不知道,艾达,我的话可能说得不够准确,不过,我是个狂热的女权主义者,所以不要以为别的人都跟我一样。”然后,她搭着我的肩膀小声说:“嘿,你觉得伊斗怎么样?很可爱是吧?你瞧,亲爱的,只有艺术家才配我。”她接着说,“不过,我可没忘记你去罗西皮那学习那件事,但要等到十月份我才能做进一步的安排。”这时候,那个卷头发的伊斗打断了我们,“莉维基,走吧,我的车

---

① 贝特雁(Bat Yam):以色列城市名。

② WIZO:国际犹太复国妇女组织(Women's International Zionist Organization)的简称。

还停在人行道上呢。”于是，我们便分手了。

到家后，我们取出那瓶喝剩下的科涅克白兰地，那还是客人刚到我们家时带来的。我们坐到阳台上一边抽烟，一边就着葡萄和咸面包圈喝酒。虽然已经讲过不下百万次了，母亲又跟我谈起当初她是怎样遇上父亲，父亲当时是多么英俊和疯狂。但这次，他们的恋爱故事别有风味，增添了许多新的含义。我和母亲一起回忆他们两个人，我们三个人，还有我的事情——比如我小学四年级时夺得了国际儿童绘画竞赛的一等奖，还有小时候从父亲的公文包里翻出室内剧院的所得税申报表，把整本报表画满了树胶水彩。母亲回忆说，有一次，尼哈玛听说耶路撒冷博物馆正在举办一个很有意思的私人收藏展，提议大家一起坐阿曼德刚修好的车去看展览，结果车在路上抛了锚。我向母亲吐露了要把传说中的怪兽做成一个微型雕塑系列的想法；也不知道是什么激发了我的热情，我还跟她谈到了杰克逊·波洛克[①]的悲剧命运，关于他是如何开始从装饰绘画起家的，他的装饰画虽然很出色，但缺乏独创性，直到他发展出一套独一无二的个人风格，才使他成为最伟大的美国画家。

我们一直聊到了深夜。我上床后，母亲走进来坐在我身旁，没有开灯，摸着我的头说：“我的天才女儿，你能有自己的艺术，真好。”其实我很想告诉她，我并没有什么艺术，从来也没有过，我只不过是在消磨时间和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而已。我不敢想自己能够画一幅或雕塑一件什么真正的作品，我从没有过认真的创作意图，因为那只有高贵的人才做得到，像我这样迷糊的小可怜虫，连对一张桌子或一根香烟都没有看法的人，更谈不上对生活的感受了。没有自己的观点又怎么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呢？不过，我可不想把自己卷入与母亲的争论当中，听她强调我特别的素质。我很感激她整晚都没有提到客人，虽然这样显得很不自然，我也避免谈论客人。最后，我假装睡着，听她轻轻地把门关上。我知道，很快，这一切都将不存在了，家、儿时的回忆以

① 杰克逊·波洛克：美国画家，抽象表现主义的主要代表。1912年1月生于美国怀俄明州的科迪城，1956年因车祸去世。



及母亲的爱，都即将被我置于身后。我嘴唇干涩，向自己道别，再见、再见、再见。

第二天，我被打发到“不骗你”超市去。这很奇怪，因为前一天母亲才刚刚把一整个星期所需要的东西都买齐了，但她借口说是忘了买发酵粉和火柴。我从货架上挑了需要买的东西，想赶紧付钱走人。我裙子口袋里装着从母亲钱包里偷来的电话卡，想给银行打个电话询问储蓄金账户的事以及怎么才能把钱取出来。这么大一笔钱从银行提取出来该经过什么程序，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我是可以随时到银行把钱直接取出来呢？还是需要事先通知银行把钱准备好呢？我担心我们这种小地方银行平时没有这么多现金，行动之前我得做好准备。

但是，阿曼德一点也没有要放我走的意思。在我前面付账的是个样子邋遢的女顾客，黄色卷发盘成的发髻下露出黑色的发根。等她付完钱，阿曼德让阿齐兹把几箱罐装食品搬到后头去，顺便把店门关上，免得还有顾客进来。他让我等一下，等店里的顾客都走了，他有事要跟我谈。我便坐在柜台上等，这是我从小的习惯，因为我被认为是个孩子，所以可以坐到柜台上晃悠两只腿。阿曼德的收银机吸引了我的视线，我盯着黑色塑料格中的钞票和硬币。我想象着把阿曼德的脑袋使劲往墙上撞，直到他失去知觉，然后把这些钱全都拿走——对于我的新计划来说每一毛钱都很重要。我和客人也许可以成为新版的《邦妮与克莱德》①，漫游全国，不放过一个贪婪的资本家，把他们全给抢劫了。但抢劫阿曼德的主意实在是太幼稚了，太卑鄙了，我才不会干呢。我有钱，不缺零售店老板那么可怜的一点钱。

“苏珊娜，谢谢你留下来。”阿曼德对我说。他刚把两个唠叨的老妇人送出店门，把门锁上。

“我走得了吗？”我指着锁了的门调皮地说。但阿曼德没有开玩笑的心情。他站到我旁边，用手抹掉柜台上一些看不见的小碎屑。他那张考拉熊似的脸严肃而悲伤。

---

① 《邦妮与克莱德》：电影，又名《亡命鸳鸯》，华纳1967年出品。

"我想跟你讲个故事。"

"Alors[1]。"看他半天不说话,我便帮他开个头。

阿曼德说话的声音很低,每说一句话都要想一下。认识他这么久以来,我第一次发现他故意夸张出来的那点法语口音是这么的做作和令人不快。

"有一次,教皇让米开朗琪罗为将要在城里举行的一个重要的盛大宗教游行做件展品。他希望这是一件无人见过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别作品。米开朗琪罗回家后想啊想啊,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男孩,那是他认识的一个寡妇的孩子,从头到脚全身都漆成金色,效果绝妙。游行的时候,小男孩被放在一辆用彩带和鲜花装饰而成的豪华礼车上,人们看了不禁叹为观止,都在猜它到底是一尊雕像还是一个真人。对小男孩来说,那真是激动人心的一天,得到了那么多人的注意,他开心极了。但是,当天晚上他一回到家就病倒了,发起了高烧,并且伴随着呕吐和全身痉挛。金漆中的毒素通过毛孔渗透进了小男孩的血液。医生的抢救也没能保住他的性命。两天后,他在极度的痛苦中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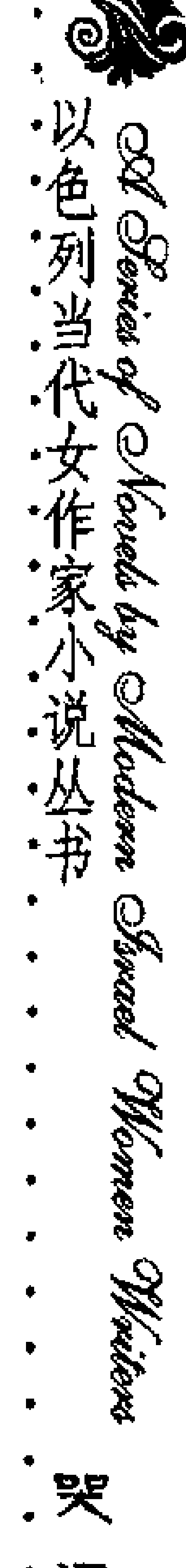
我安静地听着,思考这个故事的含义。我发现故事的寓意不但荒唐而且有羞辱人的意思,用意十分恶毒。我气得一下子从柜台上跳到地上。

"这是个不错的故事,阿曼德,"我说,"不过,很可惜你没有机会问问那个小男孩他自己的想法。也许他认为那一天的快乐和声望完全抵得上他生前的日子和他的余生。"我笑着,尽量忍住自己的怒火,然后用法语说:"我要走了,麻烦你把门打开。"

"等一下,"阿曼德用身体挡住我的去路,他离我这么近,我的背只好贴着柜台边,"让我把话说完。"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目光低垂,免得眼里的仇恨会把他劈成两半,使他当场毙命。

[1] 法语,意思是"那么"。



"我认识你和艾达有些年头了。我爱你们,尊重你们。听我说,作为朋友,我很为你担心。你母亲也很担心你。但有时她在你面前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她害怕会伤害到你,使你痛苦,她不知道你会有什么反应。我现在跟你说,你得自己照顾自己,为自己多着想。你是这么纤弱而特别。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人们可能会伤害到你,并不是说他们安了什么坏心眼,不过是因为他们的粗心大意。你需要得到像照顾花朵似的对待,温柔而细致。我一直对你都非常在意……我,我非常的关心你,相信我……你不知道……但我一直都很在意……我……"

当我意识到阿曼德,即使他只是偷偷地想过,竟敢把我当做一个可能的爱慕对象时,我心里产生的恐惧感不亚于如同被几十只肮脏的手触摸似的。他的冒犯和犹豫的表白,使我无法再保持礼貌,温顺地低头站在柜台边上。我用双手把他推开,喊道:"快把门打开,不然我要叫了。"在他顺从地用颤抖的手开门锁时,我站在他旁边,像匹发火的马驹一样,一刻不停地跺着左脚。然后拔腿就跑,飞快地直奔街角处的公共电话亭。

八月覆盖了整个宇宙。到处都是八月,甚至在银河系的遥远星球上。八月像有毒的废气一样笼罩着拉马特甘。人类自己造成了无法消除的废气,犹如叛变的妖魔反抗它的主人。八月不过是老天爷许多可怕的面目之一。

当天晚上,等母亲门缝里透出的光熄灭了后,我踮着赤脚溜进客人的房间。他今晚回来后,我们就没说过几句话。在告诉他新消息之前,我跟他什么也没说。我决定一步一步地把我的计划告诉他,而不是突然一下子告诉他,把他吓着。我先告诉他我愿意帮他还钱,等他接受了,我再向他提出要跟他一起住,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在亚历山大或加德满都郊区都可以,随便他挑哪都行。

他正和衣躺在床上听音乐。还是那张他刚来的时候就一直在听的一个女高音唱的伤感音乐专辑。

“什么事,美女?”他躺在床上跟我点了点头。我拉了把椅子到床边坐下,然后平静地详细告诉他我有一笔钱,这笔钱是怎么来的,总共有多少,还有我想尽快把这笔钱给他。

客人侧过身来,眯着眼睛认真地瞅了瞅我。我觉得他好像笑嘻嘻的样子。

“我说了什么让你觉得好笑的事吗?”我问,做好了受伤的准备。

“这一点都不可笑。亲爱的,你不要给我钱。如果这不是世上唯一的一个,也是少数几个令我难以拒绝的帮助之一。”

“我提出来是希望你能接受它。我是认真的。绝不是为了讨你欢心。”他也许在怀疑他的接受可能会伤害到我,这让我觉得受到了侮辱。

客人又恢复原来的姿势,注视着香烟冒出的白烟。

“你真是太好了,真的。但我不可以拿你的钱,宝贝。”

我原来也觉得这事不容易,做好了多次争论和说服的准备,但是他的语气却惊人的坚定。

“为什么不呢?”

“原因很多,很复杂,我没办法解释。”

“告诉我一个原因就可以。”

他默默地把烟抽完,仔细地把烟掐灭在手边的烟灰缸里。

“我的个性里有某种东西,使得人们总是要给我东西。我很清楚这点。从生存的角度看,我一度认为这是个非常便利的优点,是源于智慧或美貌的正面结果。但是今天,总的来说,我觉得它有点……该怎么讲……有点堕落。说这些太无聊了。来,坐到我旁边来。”

我溜下椅子坐到床沿上。他拉近我,让我躺在他身边。我躺得直挺挺的,就像棺材里的尸体似的。他俯身靠着我,两个人对视了很久。他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却又立刻改变主意,只是用我已熟悉的手背轻轻抚过我的脸颊。我说:“关灯吧。”

我们互相抚摸,过了一会,他说:“让我们把衣服脱了。”我们就在床上把衣服脱了,然后继续长时间地抚摸对方的身体。但这突然的亲





昵有点奇怪，当我的手触摸他上下全身的时候，犹如上解剖学一般细致。即使是在黑暗当中，仅仅通过触摸，我还是能感觉到他是多么的俊美，就像是一件艺术品。我急切地用双手去探寻那未知的、敏感的人体部位，以满足我这个拜物教徒的崇拜需求。我的手继续寻找，最后把双手放在他的腋窝下，像是放进一个装满瞎眼小猫的盒子里似的。突然，障碍物倒下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我是这么的爱他，内心已不够装下我那狂热澎湃的情感。我缠绕着他，吻着舔着他的脸他的脖子。你疯了，他说，你确定吗？我说，是的，是的，我确定。我把他往自己这边拉近，直到我能感觉到他身体的反抗在慢慢松懈。突然，他一下子压到我身上，抱住我，进入了我。我又开始想，我怎么像动物一样。但这想法是脱离在我身外的，就像是有另外一个人在为我思考，我把它抛之脑后，免得把时光都浪费在思考上，我想多留一点时间用来亲热，越长越好，仿佛我是在为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在为和堂弟的非法做爱争取时间似的。

我想叫出声来，却不能叫。我觉得自己快要死掉了，就像阿曼德讲的故事里的那个小男孩一样。一阵激情过后，我急促地喘着气，手指滑过他冰凉的头发，直到我在海边感受过的那阵冲击波又回来了，我不得不把手放进嘴里，防止自己叫出声来吵醒了母亲。我真想把他吸进我的身体使他永久地待在那里。接着，他的动作越来越紧张和集中，几乎要脱离开来，最后，他停住了一会儿，像是森林里的动物在听动静似的，之后，他把脸靠在我脖子边上。我想抚摸他，但还是忍住了。我担心过度的情感表露会破坏了这一时刻的单纯，此刻我们就跟住在山洞里的祖先一样，除了做爱，没有别的念头。

过了一会儿，我们抽起了烟。他说很想为我写一首诗，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写，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会画幅画送给我，虽然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画，谁知道呢？我们笑了起来。他的承诺暗示了一个共同的未来，尽管很不明确，还是令我充满了喜悦。我问他是否能背几首他读过的诗。他说：当然，看你喜欢哪一首。我逗他：那么你没有读过的

诗，你能背出来吗？他说：没有的事。我说：那好，就来首格雷夫斯①的《穿过噩梦》吧。我估摸着他背不出来这么一首不为人所知的小诗，但出乎意料的是，他说：没问题。然后就开始用他那冷静、毫无表现力的声音背了起来。他的美国口音给诗文增添了些许新奇的生命力，照亮晦暗的地方，扫除了陈腐和感伤。我听着他对我念出熟悉的词句，仿佛出自他自己的肺腑之言，感动得几乎要哭了。

从你困倦的眼睛里我读出了你无法说清的旅程
它激起了我深深的羡慕
你将穿过噩梦去一个湮没无闻与世隔绝的地方
天生胆小的人啊

念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轻轻地刮了一下我的鼻子。为了冲淡一点过于厚重的感伤气氛，使之重新充满活力，我问道：那么你喜欢格雷夫斯吗？他笑着说：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我只是偶然在你的诗集里读到过这首诗，我是个过目不忘的人。我趴在床上，他用手指轻轻地拂着我的后背，顺着脊椎一直滑到尾骨，然后，把我朝他拉近，将腹部和胸部压在我背上，我们又做了一次。这一次跟刚才完全不一样，缓慢而专心，虽然我们的运动一致，但都全神贯注于自己内在的感觉。我又感到他的身体停住并松弛了下来，但他还是接着在我里面抽动，一面抚摸着我。就跟上次在沙滩一样，他的技巧像变魔法似的，使我的眼前出现了无数个不知名的女人。

我们静静地躺了很久，又抽起了烟，还是什么话也都不说，直到天色开始泛白。

我起床穿上衣服，坐在床边，自信地说："那么你是接受那笔钱了。"

他说："我会考虑的，我保证。你赶紧走吧。"

---

① 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1895—1985）：英国诗人。





说完他闭着嘴用力地亲了亲我的嘴唇，就像电影《教父》里的麦克尔去杀他的哥哥费雷多之前的样子。我挣脱了他的手，轻轻地跑回我的房间。我知道所有事情都会完全跟我所希望和梦想的一样。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都完全如我所愿。

气　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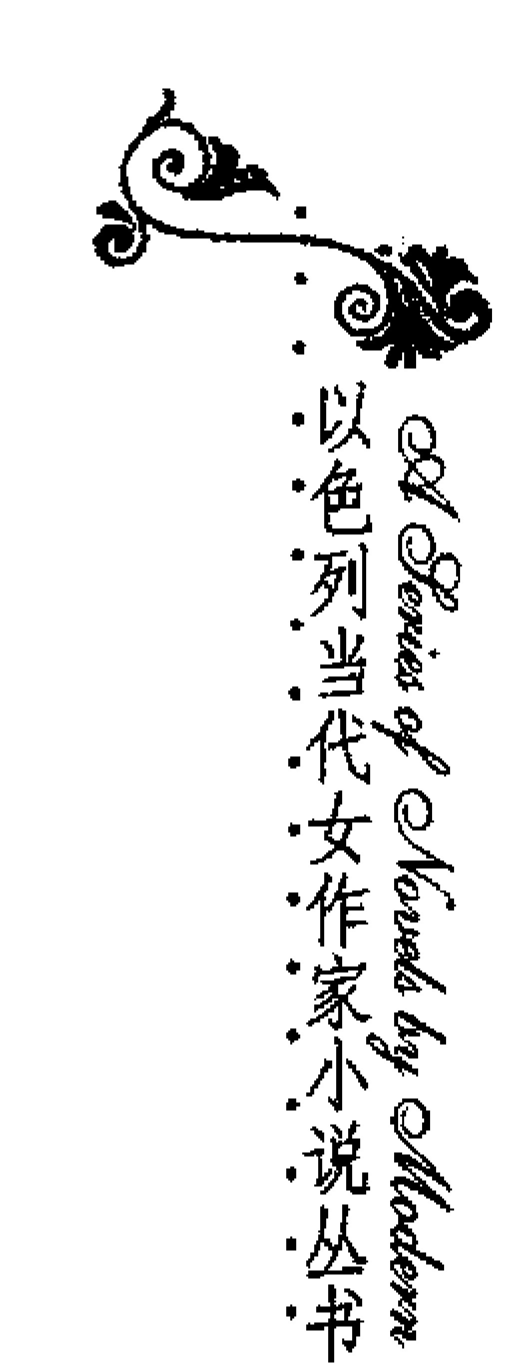
一个负罪的单身女人会引发人们成千上万的想象。

在过去的两天中，似乎每个人都想和我谈论生活：前天是阿曼德的那些愚蠢的暗喻和表白，而现在轮到了尼哈玛。尽管她对可怜的苏珊娜不存在什么压抑的欲望，但却热衷于用她个人经历中的例子来说明一些处世之道，从中，天真的处女们可以对她们的生活和她们随时都有可能遇到的危险领会一二。

我是怎么沦为一个非自愿的听众，让尼哈玛有机会讲述她的那些可怕经历的？尼哈玛身体特别虚弱的时候，就经常会在洗澡间里滑倒，碰碎花瓶，撞上门柱等，置她自己的生命、身体和财物于危险当中，她的好友们一致认为有必要在事故之后的二十四小时内给予其全天候的陪护。因此，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母亲已经在她这个朋友家的沙发上度过了好几个夜晚。而当母亲要我在尼哈玛的公寓住一夜的时候，我也只能答应。

那还是在昨晚早些时候，在用一杯草莓奶昔贿赂我之后，母亲对我说："苏珊娜，帮我个忙，今晚替我去照看一下尼哈玛。她今天把书架碰倒了，而我实在是不能再睡在她的沙发上了，那样的话，我的腰会疼死的。"

因为我自己也想出门待上几个小时，就爽快地答应了，这倒让母亲吃了一惊。昨天早上，客人很早就出门了，说要去卡秋莎家过一天，她刚从温泉疗养院回来，据她说水疗法对阿瑟很管用——他现在不再骂人带押韵了。我拿了牙刷和睡衣便径直去了尼哈玛家。自那夜的



缠绵之后我就再没和客人说过话。我不想让他犹豫是否要接受我提出的帮助。时间不等人,光说是不够的,我必须尽快行动,让他亲眼看到现金。我决定到银行把钱取出来,然后摆在他面前,就像一个印第安科曼奇族[①]武士在未婚妻的帐篷前扔下一把刚割下来的头皮战利品一样。到了尼哈玛家,我就可以摆脱母亲的亲情攻势,有时间实施自己计划。

很幸运的是,我设法避免了和尼哈玛的夜谈。在我们把第二频道的所有节目一个接一个地看完后,我便宣称自己累了,在沙发上打铺睡觉。这个沙发确实非常糟糕,硬邦邦的,中间的地方还塌陷下去。但是,让我无法入睡的不是这个沙发,也不是我在一个新环境下的习惯性失眠,而是一种淡淡的却刺鼻并且持久不散的气味。我不知道这股味道是哪来的,也许是卫生球的味道,或是某些老旧的东西发出的臭味,或者是尼哈玛煮完饭菜后残留的气味。不管它是什么,那气味扰得我根本睡不着,只好躺在沙发上胡思乱想。一直到了拂晓,我才筋疲力尽地进入了沉沉的无梦的睡眠。

到了早上,由于我昨晚没能好好地和她交流而耿耿于怀的尼哈玛,决心在跟我进行一场推心置腹的女性谈话之前不放我走。虽然我急着要去银行提款,好换取我和客人的快乐和幸福,我还是被迫坐下来听她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当她一边讲,一边一次次给我倒她那颜色发淡而且没什么味道的茶水时,我又一次闻到了昨晚那令人不安的气味。

下面是她说给我听的故事。

1967 年那场战争之后,当时他们还住在耶路撒冷,已故的利波先生为了开办天然气工厂去了东欧。丈夫不在身边的妻子遇到了一位从东耶路撒冷来的年轻的阿拉伯人,并和他坠入了爱河。尼哈玛说他长得非常英俊。至于她为什么没有丝毫的愧疚感,尼哈玛曾不止一次

---

① 美国土著居民,先前居住在大平原南部从堪萨斯西到得克萨斯北部地区,现在居住在俄克拉荷马州。科曼奇人在 18 世纪从怀俄明州南移时,成为游牧的野牛捕猎者。

地提到过，利波先生（愿他安息）有点性无能，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完全阳痿了。他们还能够设法生下阿米尔勒简直就是个奇迹——他是个非常可爱的男孩，只是那个俄国老婆把他变成了地上的破烂（愿上帝保佑他），因为无论谁听到这种事情都……眼看着她又要把话题扯远，我像母亲一样大叫一声“尼哈玛！！！”于是她立刻回到了一开始讲的故事。那个阿拉伯男孩的家庭背景非常好，不是那种浑身散发出橄榄油和山羊奶怪味的一般的阿拉伯人，他家是一个珠宝商世家。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的尼哈玛十分抢眼，保守一点说，她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地方，无论是身材和长相，还是她的也门刺绣衬衫，剪裁考究的套装以及索菲亚·罗兰的发型。利波先生虽然阳痿，但却懂得怎么样让一个女人感觉良好。长话短说，——尼哈玛叹了口气，一个“短”字包含了艺术家遇到无知的赞助人的种种限制时的那种哀伤——简而言之，她和那个阿拉伯人发生了一件又一件事情，直到有一天他对她说：娜西玛（那是他对她的昵称），亲爱的，你是我的眼睛，我的小鸽子，我的灵魂，ana bahibk[1]. 总之，他很爱她，想娶她。尼哈玛说：那怎么可能，我是犹太人，你是阿拉伯人，我有孩子，还有丈夫，他虽然是性无能，却是个大好人。而他说：我不在乎，ana bahibk，我爱你，一切都是真主阿拉的旨意，一切都会顺利的。受到情人宿命论的感染，尼哈玛给正在塞尔维亚的利波先生打了个电话，向他说明了情况。他马上在电话里说：我就回来。不管是否阳痿，他的确算是个真正的男人。于是利波先生回到家，接着就是，愤怒、争吵，还有反复的诘问，什么时候开始的，多长时间了，怎么开始的等等。但尼哈玛立场坚定：她要离婚。利波先生开始哭求：我的爱，我心爱的女孩，我的女神，我的美女，我不要离婚。尼哈玛还是坚决不动摇。如果那个阿拉伯人 bahibk，她也 bahibk，总之是没的商量了。最后利波先生只好问那个男人到底是谁。尼哈玛告诉他，不像他们那些光会吃皮塔饼却没有头脑的穆斯林表兄弟们，她的情人是个庄重而富有的人。她以为这么说可以使利波



① 阿拉伯语：我爱你。“ana” 意思是“我”。



先生平息下来,但当他听到某个敏感的词语后差点当场倒毙。

尼哈玛,他说,你到底在想什么?你正在背叛你的祖国!但尼哈玛并没有因为他的蛊惑而退缩,她回答说:我相信和平,相信民族间的兄弟情谊。而且我和这个阿拉伯人的性生活是你从没有给过我的。从这以后,利波先生开始变得狂暴起来,等等,等等。突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一个叫阿耶的朋友开始经常在周围出现。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个人还是让尼哈玛无法忍受,因为他经常跑来用她家卫生间……怎么说……在她家的卫生间上二号,好像他是个无家可归的人一样。人们总是以为可以随便到别人的家里……(尼哈玛!!!)嗯,长话短说,这个阿耶是安全局里的一个什么大人物,安全局是干什么的,尼哈玛不是很清楚,因为她对这些肮脏的活动根本没有兴趣,所以脑子里也就没留下什么印象。那么,突然间,这个阿耶开始每隔几天就出现一次,像狗一样到处闻闻,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在找什么。与此同时,尼哈玛继续和那个阿拉伯人约会,但是他的口气突然全变了,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借口,说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啊什么的。什么问题?尼哈玛问,我认为我们已经说过 bahibk 和所有一切了,我已经和利波摊牌了,阿米尔勒也已经知道了,虽然他现在只有十岁,但他是个早熟懂事的孩子。不行,阿拉伯人说,我不能这么做,我家里人都反对,我周围的人是不可能接受这件事的,我们的下半辈子都会被排斥的。总之,他现在说的话跟当初他求婚时对尼哈玛说的那些话完全不一样。她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吧。没有,阿拉伯人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这都是我自己的决定。但是我们是相爱的。是的,阿拉伯人说,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向现实生活低头。都是因为阿耶,对不对?尼哈玛问。我不认识什么叫阿耶的,阿拉伯人说。好吧,尼哈玛不想为了任何男人让自己受屈辱。哭泣和卑躬不是她的风格。既然他说“不”,那么就“不”好了。最后她又回到了利波身边,当然,利波也没有让她好过,生闷气,沉默,板脸,但是最后慢慢地,事情也就过去了——且不论他是不是还阳痿。总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了什么道理?有几点,首先,某些人是背信弃义的。长期的被占领使他们全变疯了,不过那

是另外一回事了。最重要的是，所有的男人都是背信弃义的。如果他们对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无论是体重、身高、国籍，还是脚的大小，那么你能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就除了 bahibk 还是 bahibk，尽管你已经把丈夫丢弃到一边。最终的结果就是，你被人耍了。

我把茶喝完，站起身来。

“这真是个奇妙的故事，尼哈玛，有机会我一定会告诉我母亲，她肯定会听得入迷的。”

“等一下，你要去哪？”

“我还要赶在商店关门前为母亲办一些事情。”

她把我送到门口，看上去的确很虚弱，好像随时都有可能在我面前昏倒，她说：“亲爱的，好好照顾自己。在我们心目中，你还是那个敏感的小女孩。”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别担心。”我一边下楼一边说。看上去我母亲跟她的朋友们都谈过她的担忧，我正被她全力试图拉回到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中。但我对此丝毫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来纠缠这些琐碎小事。当我走出来的时候，眼睛被垃圾箱反射的太阳光晃了一下，而昨晚的那种味道混合着垃圾腐烂的臭味，又冲进了我的鼻子里。这次我已经很熟悉这种味道，但还是想不起它是从哪来的。

我飞快地赶到银行。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然而当出纳员尼扎数完那包两百谢克尔面值的粉色纸币时，我几乎惊叫出来：就这么多？相对于那个天文数字的总数，这包钱比我所期望的要小很多。不过当我接过银行附送的装着钱的小旅行袋时，我还是感觉到了它的重量，尽管很轻，但很真实。

到底是来自于我深深的焦急，还是来自于恼人的回忆？当我坐在低矮的柜台前的人造革沙发中一边点头一边填写表格的时候，那股微弱的味道又出现了，在空调吹出的人造冷气中显得突兀且不合时宜。

在回家的途中，我尽量放慢一点脚步。这需要很强的意志力，才能抑制自己想要疯狂得一阵风似的飞奔回家的冲动。又穿过一条街



道，再转过一个街角，走过三座房屋，再有五十块路砖就到家了，还有十块，五块，到了，我在楼梯间停了下来。我又闻到了那股诡异的气味，在我的周围，挥之不去。

不想面红耳赤、上气不接下气地进家门，我故意一步一个台阶地慢慢上楼。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至少在下一个小时里我不会手足无措。我一只手拎着那个装钱的小旅行袋，另一只手里握着自己的命运。这是我第一次掌握自己的命运，也是最后一次，就像一个在孤儿院和福利机构辗转多次的小婴儿最后回到它不称职的母亲怀里。

房子里干净清新，显然刚经历过一次大扫除。每周总有几天，母亲会带着人们通常在节假日才有的那种狂热，全身心地投入洗洗擦擦的旋风之中。客厅的地板还是潮湿的，所有的椅子都被翻转过来，纤细的椅腿对着天花板。我听到母亲正在厨房忙碌着，但我并没有先和她打招呼，而是仔细地看了看四处，好像这是我的最后一眼一样，试图把所有那些令人喜爱又令人痛苦的熟悉细节一一印在我的脑海中，为了让它们尽量保持新鲜和生动。绿色的沙发，母亲的深扶手椅，巴伐利亚的碗橱，老式的咖啡桌，盆栽的喜林芋，以及我的凳子——这片天地是我唯一可以成为主角的地方，是我生活戏剧的舞台。我把旅行袋连同我的睡衣和牙刷一起塞到一个塑料袋里。现在我已经准备好迎接即将来临的一切了。

意外地，我又闻到了那种气味。这一次，它变得更加强烈，盖过了清洁剂中的人造松油味，它嘲笑着我，转移我注意力的目标，以一种粗暴的熟稔硬缠着我，就像强奸犯对着自己的受害者耳语：我们认识，亲爱的，我们彼此非常熟悉。我闻了闻自己的腋窝和衬衣袖子，上面只有苏珊娜·拉宾的平常味道：香草和干叶子的混合味道。我只能猜测这种味道是在尼哈玛家里沾上的，也许是些她用的过时的清洁剂，比如来沙尔[①]之类的。当我喊了声母亲，她迎着我走过来的时候，那个味

① 来沙尔：用于一种防腐消毒液体的商标名。

道更猛烈地向我袭来，我一眼看到她正在用厨房的毛巾擦手，这一刻，我明白了那个气味是什么，以及我们是在何地互相认识的。

灾难的味道。

就是它。

灾难的可怕味道。

抓紧无法接受的事实发生前的一秒钟，我问道：怎么了？她说：没什么，我正在打扫屋子。我说：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她说：不用了，没什么，我已经都弄好了，如果你愿意，等一下可以把垃圾拿到楼下去。我转身走开，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脚弄脏干净的地板。她问：你要去哪？我说：我去看一下尼奥，有点事情要问他。她用一种淡淡的、几乎是不经意的语气说：尼奥已经走了。

虽然我心里已经明白了一切，但还是要继续坚守五分钟前的那种未知状态，在跳入失控的深渊之前，保持最后一刻的清醒，我说：什么？又去海法了？那两个家伙快把他逼疯了。她说：不，不是去海法。我说：我一会儿给卡秋莎打个电话，他一定在那里。屈从于这个场面的重要性，她不再擦手，直直地看着我，像是在说：我已经动员了一切，我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也准备好了应付一切。



“他走了，永远地走了。”她说道。

“他去哪里了？”我问道，“纽约吗？”

“我不知道，”她说，“我不认为他去纽约了，不过我不是很肯定。”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问道。

“昨天。”她说。

“可是他什么都没跟我说。”我说道。

“我知道。”她说。

“那么他肯定会回来的，我确定。也许他是因为工作上的什么事情才走的。”我说。

“他不会回来了，苏珊娜。”她居然还叫我苏珊娜！

“我肯定你错了，”我说，“这只是个误会，就像以前那次，还记得么，海法那次？”



“这不是误会，他走了，今天早上走的，他不会回来了。”她说。

“你在骗人。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一辈子都没有骗过你。”她说。

“你在骗人，你这个骗子，他哪里都没有去。”我说。

“你怎么敢这么和我说话。”她说，“我知道这很难，但这是事实，苏珊娜。尼奥走了。”

“你不知道，你什么都不明白。”我一边大喊，一边飞奔过去把客人的房门一把撞开。

我看到房间里的样子时，感觉就像被人当脸啐了一口痰似的。客人的所有痕迹都已经消失了，他的东西都不见了，他的衣服、他的烟头、纸张、零钱，还有他的气味。床上铺着从前的床单，壁橱关着，桌子已经被擦干净了。

我像一个绝望的吸毒者一样冲进这个已被洗劫一空的无人居住的房间，拉开抽屉，打开壁橱门，掀开床垫，趴到床底，试图找到任何迹象，任何残留物，任何手印。在他房间里找了一遍之后，我推开站在门口像哨兵一样观察着我的疯狂举动的母亲，冲到厕所，也许那里还有他的杂志；冲到母亲的房间，也许他正藏在那里，只是在和我开玩笑；冲到我的房间，也许他留了封信给我；然后冲到洗澡间，希望能找到他的牙刷，挂在毛巾架上穿过的汗衫，或是一瓶忘带的须后水。但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所有一切都被收拾干净，擦掉了，好像他在我们房子中过去三个月的存在都被某个强大老练的间谍机构拭去了。

我回到客厅，仅仅在房间中走了几步后就想到：地板还是湿的，我的鞋会踩脏它的。于是我停下来，不敢再动，好像被一个魔圈围困住了。

“现在，我建议你试着冷静下来。”她一边说着，一边把倒放在沙发上的一个椅子拿下来。所有我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我站在房屋的中央，一点都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我只好坐下来。而她决心用冷静来驯服我的狂怒，走过去把所有的椅子都放下来，挪了一下扶手椅，把咖啡桌放到原来的位置，然后在我对面坐下。

“我想原原本本地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你，这样你就永远不会再叫我骗子了。不能因为你很伤心，就可以胡来。”她说。

“这不是你和我之间的事情。”我说。

“我其实不需要告诉你的。”她说。

这不过是她的游戏，我正掌握在她的手心里。我用舌头轻轻卷起嘴唇上的一点干皮，脑子里空空荡荡的，空空的脑子中不停地闪现着某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懒散的银行出纳，尼哈玛家的沙发，利波和阿拉伯人。这些杂乱的影像力图把一个可怕之极、令人无法承受的想法挤到一边——是我，我应该对发生的这一切负责。我，像一条的贪婪的吸血虫一般用尽全力紧紧吸附着他，企图让他依赖于我，感激我，同我牢牢地绑在一起。是我的贪婪把他赶走了。

母亲以一种与成人对话时特有的冷静语调缓慢而谨慎地说：“在此之前有段时间，我就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一种怀疑。就像你知道的那样，我是一个热心、淳朴又直爽的人。我张开双臂欢迎尼奥的到来，不去在意尼哈玛和阿曼德的废话。我相信我的直觉。”

“但是昨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到底怎么了？”

“让我慢慢说。”她要让我明白控制权在她手里，我没有选择，只有服从。

“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我这种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所以我决定给白艾蜜打个电话，结果发现她早已经不住在我好几年前知道的那个地址了。我想方设法找到了她的新电话，打了过去。她听说尼奥和我们待在一起非常惊讶，她说她从来没有写过那封信。而且她现在正在服丧，赫伯六月的时候过世了，而尼奥根本没有说过一个字。”

“他说过！”我喊道，“他告诉我了。他只是不想让你难过，仅此而已。”我又燃起了疯狂的希望，如果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缘由，那么我只要向她解释一下，之后我们就能找到尼奥，把他带回来了。只要一个小小的谎言就可以安抚她。想到这我几乎笑了出来。

“你知道却没有告诉我？”她提高了嗓门，但是立刻克制住了自己，因为她还有很多事情要说。



“他说他会找个合适的时间自己告诉你,不过这没什么意义。”

“意义大得很,”她丝毫没有缓解紧张气氛的意思。“我个人认为,他不告诉我的原因不是他怕我难过,而是怕我打电话安慰白艾蜜,那样真相就暴露了。”

“什么真相?你到底在说什么?什么真相?”

她给自己点了根烟,却没有递给我一根。

“我和白艾蜜交谈了很久,我一下明白了很多事情——不好的事情。三个半月以前,她保险箱里价值40000美元的证券不知去向,这是她从银行取出来放在家里准备支付赫伯的治疗费用的,费城大学医院正要用一种新疗法治疗他的淋巴癌。你知道的,美国的医疗保险赔付范围非常小,最后她不得不一分钱一分钱地算着花,保险柜并没被破坏过,肯定是一个知道密码的人打开的,她确定是尼奥干的,因为过去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尼奥有赌瘾,他为此接受过很多治疗,大部分是白艾蜜和赫伯付的钱。几个月前,那大约是他戒赌两年后,他又开始赌博了。她也坦率地跟我说起尼奥的学业问题:他从来没拿到他的学士学位,更不用说什么在伦敦拿的硕士了。她在电话里哭得那么伤心,听得我的心都快碎了。她说这个孩子就是她生命中的灾难,除了失望还是失望。她不停地接到尼奥债主的电话和恐吓。他以前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叫米里亚姆什么的讲师报了警,因为他当掉了人家的珠宝还有……”

“米里亚姆!”我抓住了这个熟悉的名字,好像它是一个线索,能带我找到客人,“当然,米里亚姆·沙利文,她曾经是他的女友!她一定能帮我们找到他。”

“你有没有听到我说的话——她已经起诉他了!别再这么愚蠢了!你不是个小孩子了!你也不是个弱智!白艾蜜也去找了警察,现在他一踏进机场就会被逮捕,我相信他只要还有一点常识,就不会回纽约。”

“但是这又有什么好震惊的呢?你早就知道他有点问题,你以前也没有这样啊。你们曾经是朋友,他带给我们很多欢乐,他让我们觉

得很开心。为什么他离开得那么突然？为什么他不留下和我告别？我不明白。”

这些问题的答案每个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我无法等着她一个一个地慢慢回答，这种一无所知的痛苦实在是太烦扰了，我必须马上弄明白。

“我让他马上离开，不要留下来等你。”

“你做了什么？！”

虽然我的声音非常低，几近耳语，但是我的表情一定非常恐怖，因为她警惕地看着我，站了起来，朝我靠近。

“我让他离开这个房子，马上离开，并且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这个国家。”

我就像被扔进了冰冻的河流里，浑身发抖，牙齿打战。我也站起来，站在椅子后面，双手紧握着靠背，咬紧牙关，尽量停止发抖。

“他就同意了？就这样？我不相信你！你又在骗我！他至少得和我告个别。”

“我说过不准你再叫我骗子！”她尖叫着，谈话刚开始时的那种镇静已经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狂怒，一种带有负罪感的狂怒。

“但你就是个骗子。”我冷冷地说，好像在陈述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继续啊，”我鼓励她反驳我的话，“告诉我你和他都说了些什么。”我的声音平静而危险。

“我肯定会告诉你我和他是怎么说的。我没什么可惭愧的。我告诉他，我已经通知过阿曼德那个在警察局的兄弟，如果他不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这个国家，我就会起诉他企图偷窃。我可不是三岁小孩——什么在海法的兄妹？该查的我都查过了，亲爱的！”

“这是真的？你去了警察局？”我声音中的那种缓慢和平静让我自己都感到恐惧。完全遵循着我们的连通器原理，母亲变得越来越不安。

“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吗？我们在谈的是个有病的人，一个精神病，你应该听听他和我说话时候的腔调——他说：你所有的问题都该怪



我，是我把你给埋没了。”

“他还说什么了？告诉我。”我的口气甚至变得有些友善，同时尽力让牙齿不再打战。

“最荒谬的是，他说因为我，你放弃了你自己的生活，我永远都在给你制造问题。太盛气凌人了！他以为自己是灵魂专家么？他知道什么？他明白什么？他想告诉我，我都替你做了什么，又没替你做什么！一点价值都没有！你还问我有没有去找警察？这是什么话！我怎么知道他下面会干些什么？说不定他还会杀人呢?!”

顷刻间，我，这个房间以及房间里的所有东西，我的眼睛，还有空气本身，所有的一切都变得煞白。我觉得我的全部血液瞬间变成了白色。我向她跳了过去，用手去抓她的脸，想把她丑恶的眼睛抠出来，但她迅速地闪到一旁，我扑了个空，摔倒在地上，我跪在地上，抓住她的裙边，想把她拉倒，嘴里发出动物一样嘶哑的吼叫声：“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你听着，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她摆脱我的纠缠，背靠着巴伐利亚碗橱站着，不再有一丝之前的镇静，用战栗的声音对我喊道：“苏珊娜，停下来，你怎么了？难道你认为他会和你一起生活，给你一个家么？那全是谎言和幻想。他一无是处，是个人渣。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为了不让你受到伤害，而他……他就像一辆推土机一样冲进来，践踏着这一切。”

而我，半躺在地板上，扭曲着，好像陷阱中的野兽。出于某种回应和解释的本能，我冲着她喊道：“我没要他给我一个家，我不想要一个家，你明白么？我不想要一个家。”

但是她不想听，害怕我的言语和痛苦中的某个东西会让她失常，会带给她无法忍受的自责。她又开始对我喊叫：“银行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你想动用你的储蓄户头的时候，你说我会怎么想？你想干什么？难道我能看着他光天化日之下把你抢劫一空？就像他抢劫他父母那样，抢劫所有他认识的人那样？”

“他没找我要过钱，”我喊道，“他从来没向我要过钱。”我爬向沙发，那上面放着那个塑料袋，我把旅行袋从里面拿出来，试图打开它。

但拉链卡死了，最后我只好把它撕开。我把那包钱拿出来，扯掉橡皮带，把钱扔给她。钞票飞扬在空中，好像粉红色的花瓣，又好像我们身处在某个谴责物质主义的政治集会上，这个景象太有戏剧性了，以至于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在地板上爬着，把钱捡起来，然后再一次抛到空中。“拿走吧，把钱拿走，拿走你这些烂钱，拿啊，拿走，拿走……”我一直重复着，直到我发觉这种举动非常的白痴，然后开始为这种奇怪的情形大笑起来。她说：“你疯了么？快马上停下来。”我想忍住不笑，结果像个受到责备的小女生一样，闷闷地傻笑着。我也不明白自己在笑什么，只是一直笑着，最终慢慢地停了下来，感觉就像沉到了深渊的底部。

我开始无声地哭泣。她向我这边移动了一下，但我马上向后退了一步，她便站在碗橱旁边原地不动。我们就这样僵持着。我听到自己的眼泪无声而温暖地沿着脸颊流下，流进嘴里，从我的下巴滴落到衬衣和地上，就像黑白电影中一个水滴落下的长镜头特写。

她说：“你想要什么，孩子？你以为会发生什么？”

我说：“我爱他，我没有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我爱他。”

她说：“这不是爱情，这不过是一种冲动而已。发生然后结束。真正的爱情是完全不同的，相信我。”

由于某些原因，比起她的愤怒和苛刻，她这种温柔的声音激起了我更多的愤怒。我冲上去，用尽全力把她推到巴伐利亚碗橱上，我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我抓住她的肩膀，不停地前后摇晃，每当她的头撞到玻璃碎片里露出的碗橱架板，我都用低沉而沙哑的声音重复着说：“你知道什么是爱，你这个疯婊子，你知道什么是爱？”而每次当我停下来看着她，似乎期待着她回答我的时候，她看上去都是那么的惊恐，就像个破娃娃一样，还没尝试反抗就屈服于我的殴打之下。一滴血从她的发际流了下来，明亮鲜红的颜色令人震惊。但这只会让我像只猎狗一样变得更加疯狂。我一次又一次地把她的头重重地撞向碗橱，把架子上易碎的瓷器扫落到地下，直到我精疲力竭，然后我们两个一起滑倒在了地板上，相互抓着对方，躺在玻璃和瓷器的碎片中，就像纳粹大



屠杀后的幸存者。

她背靠着碗橱坐在地上，而我，则用光了所有的气力，把头靠在她宽广的胸部，她身体的味道就像吗啡烟一样环绕着我。我轻轻的呜咽着，她用手抚摸着我的头，用那种熟悉的、充满哀伤和同情的声音对我说："我的孩子，我可怜的孩子，亲爱的孩子，会过去的，一切，一切都会过去的。"

当一个人的心脏从跳动的肌肉变成一堆碎片时，上帝所能赐予他的最大的恩典，就是让他的肉体得病。没有比这个更能在转移思想同时减轻灵魂中难以忍受的痛苦的了。不像父亲去世后的那次一样，这次没有任何这样的转移。

我一如运动员般健康。暴露在痛苦的毒气室中。

在我和母亲大闹一场的那天，我就猜得到在这之后会有什么情景等待着我。我没有崩溃，没有把自己埋进床单里，相反的，我像基布兹里的志愿者一样冷漠而勤奋地帮助她收拾客厅。当她打扫地上的碎片时，我温顺地拿着簸箕；她把钱从地上捡起，我接过来，重新整理成一叠，用厨房抽屉里找到的橡皮捆起来，然后把这沓没用也没有意义的钱交给她。她用湿布擦地的时候，我会合作地抬起椅子，让她擦掉我那些漫无目的的脚印。我把满满的一袋垃圾拿到楼下。我们认真地相互配合，试图用这种单调的动作来抹去记忆中刚才那夸张而不寻常的戏剧性一幕，将那充满俄国式哀伤的场景，改写成一个美国式的克制的灰色短篇故事。当屋里恢复了表面的秩序以后，我们默默地坐在客厅里。我不时地想要哭出来，但是这次我的眼泪却再也流不出来了，它们被一种我不熟悉的新的责任感所阻塞，这种责任感要我独自面对自己内心的一切。

我给卡秋莎打了个电话，她听上去好像正在忙自己的事情，显得很不耐烦。"苏西，"她说，"尼奥是那种即使他出去买包烟，我都不知道他是否会回来，或者什么时候回来的人。他现在的生活非常非常的复杂。现在这种样子也挺好的。"

那天晚上画像修复家瓦弟姆带来了一封客人给我的信。母亲请他喝咖啡，他谢绝了，看起来比平时还要害羞和不安，好像他才是那个坏蛋和逃离这里的人。

我很快便将信的内容牢记在心，我记得每个字符，以及每个单词之间的空格。在接下来的几周中，我忙于在脑海里翻阅这封信，在字里行间寻找那些隐藏的含义。到了最后，在我眼中，所有的单词都失去了原本的意思，信的原文也成为恶魔的字谜，我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揭开——我将每个字母进行重新排列，想得到其真实的意思。

有首诗说过，当一个男人在深夜从飞机上落下，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他。但是我的上帝却一次一次地用他特别的沉默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假如我不是那个顺从的苏珊娜·拉宾，也许我也会像某个伟大的哲学家一样有勇气宣称：上帝已死。但这是一种我无法承受的奢侈。我的无神论是如此肤浅。不管怎样，在内心深处，我必须依赖于信仰，一旦失去对上帝的慈悲的希望，任何事情都会变得毫无目的。我试图通过解码客人的信来得到上帝的慈悲，并迷失于其中。但是这些密码对我来说太过深奥了，当我为破解其微妙的秘诀而感到绝望时，这封信便又恢复了它的本意，以亵渎的言辞讥讽着我的无能。

亲爱的苏珊娜，

诱惑，是的，诱惑在对你说：我们听到过海上女妖的歌声，但是人类的声音唤醒了我们，我们溺死在海中。因为分别总是一种梦魇。我并没打算做你的情人，这是事实，也许这个事实现在对你来说也像一种梦魇。但是你错了。虽然我认为所有的痛苦本身都是毫无意义的，但对这件事，你要相信我所说的话：在我们的相遇中，有一点很重要，冥冥之中我们的相遇是有目的的，也许你现在还看不出来，但你最终一定会明白的，我确信。

你也许记得我刚到的那天晚上，我说过，若想创造艺术，就必须偷取众神之火，来交给人类，就像普罗米修斯。是的，你让我觉得自己也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当然，我也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在我的一生当中，我是真的很想创造出接近我梦想的事物，但我从来没有成功过。就像艾达肯定会告诉你的一样，我在艺术学校的第三年就放弃了学业。总之，我的简历上是一片空白，无法向家人交代。即使我有很高的智商和许多的天赋，我也没有能完成我小时候梦想的百分之一。但是和你一起的短短几个月间，我觉得自己成为了自己本应有的样子。这并不是因为如此天真的你会被我的怪异外表所打动（我相信你能看到外表之下的内心），而是因为你让我可以为了你去完成我的梦想。这种感觉是如此的激动人心，我想谢谢你，因为以前我从来没想过我能拥有这样的经历。

现在请你注意一下，因为这一点非常关键：如果你不能继续沿着我们所走过的路前行，那么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将是毫无意义的。你必须继续向前，你必须得到自由，我相信你能做到，不要害怕，我知道你有能力去创造，去创造自我，去创造自己的世界，无论它在哪里，你有能力打开逃离黑暗力量的舱门，释放你内心中隐藏的光明力量。的确，自由也是一种监牢，但事实是，这种牢狱是我们注定要承受的惩罚，我们不应试图逃离它，因为逃避自由就是欺骗自我的巨大谎言。与那些小谎言不同，这种巨大的谎言意味着死亡和荒芜，而你是不属于这些的。

希望你能拥有你所需要的全部勇气，前进吧。

漂浮的理智

夏天已经离去，接踵而来的，是以色列温暖柔和的秋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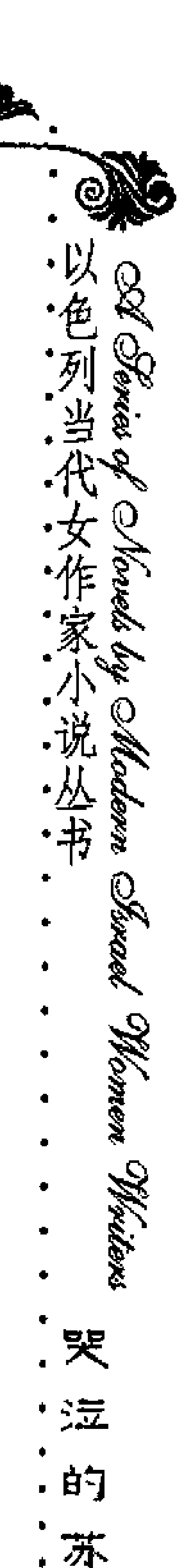
拖着迟钝的步子，我笨重而孤独地在家里各个房间来回走动，在经历了那么多的跌宕起伏之后，家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拥有它原本庇护的意义。我毫无防护地忍受着煎熬。我无处可逃，屋里屋外，痛苦无所不在，如同我呼吸的空气，如同光明，如同黑暗。它就像我体内每一个完整的细胞所固有的一部分。即使我把肉体全部砍去，痛苦仍然会存在我大脑的迷宫中，即使我死了，它依然存在。

当那封信的力量被耗尽，我只能寻找新的方法来帮助我把痛苦赶进意识的密室。但这次上帝对我不加理睬，拒绝让我用病痛、发烧和眩晕来模糊我的思维。我只能自己将自己从比死亡还痛苦的境地中拯救出来。一种失去控制的癫狂——也许实际上是一种清醒——正威胁着要用它全部的重量将我碾碎。

那段日子，我一直抱着客人可能回来的疯狂希望。白天等待的时候，电话铃每次响起我都会跳起来，我会在阳台上一待就是几个小时，眼睛像狗仔队的镜头一样盯着街角，期待抓拍到他修长的身影出现的那个瞬间。

那段日子，我恨客人，在脑子里不停辱骂着他，分析他性格的缺点，或是简单地不停重复着我母亲说过的那些脏话："你一无是处，你是一个毫无价值的可怜骗子，我恨不得你早点死。"

那段日子，我也担心他。当我开始担心他的时候，其他的一切关于他的想法都会被放到一边，我喃喃地向我那沉默的遭人诋毁的上帝



祈祷:让他好好照顾自己就成了,让他顺利就成了,别让他受到伤害,让他健康,让他一切都好。

那段日子,我在房间中不停地哭泣,好像一个极度忧伤的送殡者。

那段日子,我忍受着种种的痛苦:无休止的期待、对过去瞬间的回顾、交谈片段的回忆、莫名的恐惧、许多次的争吵及和解。

那段日子,我着了魔一样地从一个房间徘徊到另外一个房间,身体和精神都陷入了不安的状态,连安静地坐一秒钟都不能。

那段日子,当我感觉稍微好一些,我就会对自己说:这些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会克服它,我还有我自己,还有我的生活。但是这些想法立刻会被反驳掉,我马上又被扔回到那个巨大的痛苦真空当中。

那段日子,我会连着画上好几个小时的画,试图让自己完全沉浸于过去的这种爱好中,但这种解脱是偶然而短暂的,它来去自由,与我的意念完全无关,最后,我完全放弃了。

那段日子,我试着分析和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两个当初为什么会那样做,谁应该被责备,我做错了什么。所有这些都是我同自己内心的对话。但是,因为我一辈子都习惯了和母亲进行这种类似的事后争论,没有她,我就无法独自产生任何有趣或启发性的洞察。

那段日子,我在昏昏沉沉中为客人再也不会回来的想法所刺痛,夜不能寐。这痛苦永远也不会消失。

那段日子,我有几次回头咒骂和质问母亲,但是她话中丝毫没有任何破绽足以推翻上次谈话的内容。当我一意识到这点,就开始用一种安静平和的礼貌来对待她。

当我不再有决心和希望,当所有的愤怒和眼泪都离我而去,当我不再试图对所发生的一切刨根问底,我所剩下的,就只有感官知觉。我似乎已经失去了同时拥有这些感觉的能力,只能一次集中于一种知觉。

我闭上眼睛,感受生命的声音。异教徒们用低沉的羊角号声宣布沉静的赎罪日的到来,重新有了信仰的嬉皮士们在旁边屋顶上的苏克

棚(sukka)[1]中唱着宗教歌曲，半夜洗手间冲水的声音，两条街外水泥搅拌机忙碌的声音，在灰白的黎明中鸟儿的啁啾声，还有那淅淅沥沥的初雨声，如同拥挤的房间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美丽的女子一样，充满了戏剧性。

我把所有随意看到的物件都孤立开来看待，抛开它们本来的内容，专心致志地观察着——不锈钢洗碗池中的一点污泥，隔壁门廊上的那根长条日光灯，掉在烟灰缸外面的一小块灰白的烟灰，客厅沙发下母亲那只破旧褪色的拖鞋，灯座上忘记拿掉的价格标签，以及洗澡间镜子上的指印。

在无眠的夜里，我触摸着头下面枕着的枕头，触摸着干燥的、无动于衷的木质床腿，触摸着客厅橱柜光滑的漆面以及墙上粗糙的胶粒。

我闻着自己的经血，它是如此的低俗和不合时宜，好像一个糕点师，不知趣地跑到一个刚刚丧子的家里，找人家要孩子的生日蛋糕钱。我闻着自己点着却忘了抽的香烟飘起的烟雾，闻着自己的手掌心，闻着正慢慢侵蚀空气的凉爽把夏天抛在了身后，使之成为过去时，把经历中有机的现实体做成了木乃伊，放在记忆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



只有我的味觉背叛了我，它几乎完全消失了。多亏了某种原始的动物本能，使我还能区分出盐腌黄瓜的咸味和番石榴的甜味。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吃得越来越多，拒绝向这种味觉障碍屈服。这就像故事片中，一个刚瘫痪的退伍老兵强烈地坚持要走路，把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摔出轮椅。直到有一天我厌倦了所有这些徒劳的尝试，便干脆什么也不吃了。偶尔，我也会在母亲焦虑的哄劝下，吃一些稀粥或黄油面包——在她看来，这些食物既清淡又有营养。对我来说，则没有什么区别，反正所有的东西尝起来都是一个味道。她让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

① 全球的犹太人会庆祝一个称为“苏考特”(Sukkot)的感恩祈祷的节日。这一盛事长达九天之久，在此期间，一家人会搭建一个“苏克棚”(sukka)，并饰以树叶、树枝、还有刚摘的水果蔬菜。餐桌就设在棚内，人们就在此用餐。此外，这个棚子还是进行祈祷的地点。



虽然比以往多了几天阳光灿烂的日子，但是冬天还是姗姗而来。我虚弱的身体迫使我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得在床上度过。我发现这很方便。母亲的身影变成了一幅空洞的全息图，时有时无地在我眼前晃动然后消失。在冷漠的侵袭下，我的痛苦被覆盖，回忆也变得模糊。我感觉有一条心怀恶意的小虫子正得意扬扬在我脑子里四处爬动——我死抱着这唯一显示我还活着的迹象不放。每当母亲拿着一杯鲜橙汁或者一份报纸的周末增刊出现在我房间的时候，这只小虫子就向我传递活动的信号——一种微弱的脉冲刺激。苏珊娜·拉宾的命运是如此捉弄人，就像现在，在她成功地对一切失去了兴趣的时候，她仅存的生命力却要维系于母亲在她身边的永恒存在。我的上帝也许是一个沉默的观众，但毫无疑问他很喜欢这样的场景：欣赏他所设定的法则在那些最不利的环境下取得胜利，为挫败每一个试图改变现状的企图而欢欣鼓舞。

我们之间也会有些乏味的交流。总是由母亲主动发起一些简短的对话——有时候，她会告诉我她做过的家务，或者是关于阿曼德和尼哈玛的事。有时候，她会尽最后的努力，力图挽回我们之间过去的那种和谐，跟我谈她的想法和苦闷，谈奥斯陆协议的结局，谈她那恼人的背痛，还谈人性。一开始，我还会不时地点点头或者应付地提些问题以表示我在听她说话，到了最后，我连这些反应都停止了。

我记得——在父亲死后，上帝保佑我得了脑膜炎，使我发着高烧在生死之间徘徊了好几个星期，而那场病造成的严重后遗症使我成了一个瘦弱而多病的女孩。正是在那些年里，我和母亲之间形成了关键而绝妙的纽带。那是一种只有当事人才明白其意义的秘密联盟，一个拥有自己的语言、法律、兴趣和历史的联盟，一个拥有独立存在所必需的所有特征的微型文化。但如今，这一文化已经被玷污、被扰乱、被瓦解了。在一股强势的外来力量的入侵下，它的根基已经受到了动摇。

当侵略者的军队将整座城市烧毁一空后，在神庙的大理石废墟之上，你将怎样开始修复那些耗费多年的辛勤劳动所造就的宏伟建筑？谁将埋葬死者，治疗伤者？谁将教孩子们学习那被忘却的母语和父辈

们的风俗？谁将重新树立起那美好、完整和永恒的信仰？又有谁来补救失败和背叛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伤害，和受损的一切？

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呢？

除了母亲的悲痛还能给我带来一种解恨的满足感之外，我对一切都漠不关心。正如大家所知，母亲的痛苦是为爱情落空而奄奄一息的苏珊娜的生命源泉。（"啧、啧、啧"，奥林匹斯山上的复仇女神用舌头发出失望地感叹。多么的不孝啊！）

至于母亲，无论她怎样努力地做出自信和坚强的样子，她的一举一动都揭露出了笼罩着她的悲伤——她那牵强的微笑；她把粥碗放到我床头桌子上时微颤的双手；当我闭上眼假装睡着，她离开我房间时的踌躇。

于是，有一天，当她坐在我的床边，我在她的眼睛中看到了决断。她决定唤醒我沉默而虚弱的躯体，把我带回到属于她和我的生活中。从那决定性的一刻开始，她不再把自己的才智浪费在悲伤和担忧中，她的行为举止从胆小、犹豫和负疚变成了活泼、果断，充满了活力和热情。从此之后，她有了目标。

我一直都知道她对我的爱有多么的强烈，为了我，她可以不惜一切、赴汤蹈火。但这一次，她的行动不仅出乎我的意料，甚至连她自己或许都感到惊奇。

当我不再起床后，一项新的紧急措施被采用了。每隔一天，她就会把我拉到洗澡间，以一种笨拙但却小心翼翼的仪式帮我洗澡——打肥皂，用水冲净，在淋浴喷头下把我翻过来转过去，当我缓慢而机械地刷牙时轻轻拍着我的后背。然后，把我擦干，梳好我的头发，用婴儿用棉签清理我的耳朵，剪掉我长得太长的指甲，把我不听话的脑袋和四肢塞进睡衣或者尼哈玛买给我的那套灰色的减价运动装里。幸亏我还能自己上厕所，也亏得我那超斯巴达式的饮食[①]，我并不需要经常去厕所。

---

① 斯巴达式的饮食：指非常简朴的饮食。



我欣然地接受了这个新的生活制度，它允许我停止了让自身机能正常运转的最后尝试。我可以一言不发，一动不动。从此以后，母亲不再从我的身上寻求任何反应的迹象，对我不再有任何要求。这也难怪——她什么都不需要，为了拯救我，她调动了一切，万事俱备。她对我使出浑身解数，把使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心思和才干花在我身上。

每天，她都会在我的床边坐上几个小时，给我读书读报，或是跟我说话，她有时会温柔地耐心哄劝我，有时只是告诉我她的一天，对我讲述她的回忆，向我抱怨某些琐事，或是笑着说一些老笑话。那个蓝花瓶终于恢复了它的正常用途：里面的花每周都会换一次，每次都不一样。她把我屋里桌上堆着的小画像、画板和几盒色粉笔全部清理掉，然后，她买了一套小立体音响放在桌上，不停地给我放音乐，主要是莫扎特（她的女性杂志推荐这个可以用来改善情绪）和维瓦尔第（出于同样的原因），但也有些以色列的老歌（你父亲喜欢它们），各种各样的地方流行歌手（年轻人们喜欢这些），查理斯·阿森纳沃尔（阿曼德推荐的），以及一个叫“婴儿淋巴瘤”的演唱组合（尼哈玛的孙子塔路什是这个乐队的主唱，该乐队以侯赛因国王的病命名）。此外，还有一些为了收集成套而购买的光碟被严禁对我播放，比如舒伯特（太悲伤了）和肖邦（原因同前，波兰伤感主义的音乐也是一样）。夜里我无法入睡的时候，我会听到她尽量把沉重的脚步放轻，走进来帮我盖好毯子，抚顺我蓬乱的头发。她现在吃饭都在我的房间里，还特地为此买了一个折叠桌。有时候，她会躺在我身边，轻抚我的后背，按摩我的肩膀。阿曼德用一个专用的金属架把电视固定在我对面的墙上。最后，我的屋子装满了这些家用电器和康复器具，看上去就像一个放贼赃的储藏室。厚重昂贵的新美术书籍放在我旁边，耐心地等待着我的注意，有贾斯珀·约翰斯、劳申伯格[1]、波洛克[2]以及赛尚[3]等。一个包装精美的包裹在我眼前打开着，里面是一册册小巧雅致的拜伦、雪莱和

① 贾斯珀·约翰斯、劳申伯格：两位当代美国画家，是波普艺术的代表人物。

② 波洛克（1912—1956）：美国画家，抽象表现主义的主要代表。

③ 保罗·塞尚（Paul Cezanne，1839—1906）：后期印象画派的代表人物。

济慈的诗集——这是尼哈玛的儿子阿米尔勒送的,他是从著名的亚马孙网站订购的。

我再也吃不下固体的食物。我床边的柜子上放着一些专门用于增强体质的小罐头食品,里面装的是一种浓稠的、带香草味的白色液体,富含卡路里和基本的营养物质。我每天用吸管喝三次。筋疲力尽的我早已无力抗拒母亲单调的哄劝:"来,孩子,再吃一点,你必须变得强壮起来,来吧,再吸一点,对,就这样,好孩子。"

她留意地使我有一些访客——在她看来,积极的社交生活是恢复常态的表现之一。尼哈玛每两天就会来一次,虽然她现在身体已经感觉好多了,她在这里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用来抱怨上我家的那三十六级台阶。显然,多发性硬化症是她经常性跌倒的原因,但是抱着强烈的乐观态度,以及有益健康的克制,那就好像是某种新的灵丹妙药,使她继续顽强地坚持着对生活的狂热欲望,并且拒绝屈服于对未来的了解。

一天,卡秋莎带着阿瑟来了。阿瑟穿着一件黄色的塑胶外衣,带着羊毛帽子,活像安东尼·阿尔托[①]的《残酷剧场》里白雪公主的七个小矮人中的一个。卡秋莎说:"你瘦多了,苏西,有时候太瘦就不漂亮了。我的问题正相反——我变得越来越胖,现在得穿 40 码的了。为我不得不去买新衣服,我只喜欢设计师品牌的衣服——比如范思哲和唐纳·凯伦,那些衣服非常贵。"她还说,"明年,阿瑟就会进入普通班了,不再上特别教育班学习了。"我对他们笑了笑。

莉维基来了两次。第一次,她说:"记得伊斗么?上次你们在电影院碰到的那个人?我们分手了。真是个混蛋。他当自己是什么性感的种马,结果传染了疱疹给我,还有脸抱怨我啰唆。是的,我不对,但是对我来说,谈恋爱就意味着亲密和交谈。男人们能说的只有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汽车,一群自大的家伙——总是在说谁的阳具最大,谁的手机最小,他们真是可怜。我现在每个礼拜到性侵害受害者中心做

① 安东尼·阿尔托(1896—1948):法国剧作家。



一次志愿者。我上次还从防止虐待动物协会领养了一只半波斯种的猫，但一周后它就死了。我正在考虑领养一只狗。”

莉维基第二次来看我的时候，先是瞥了一眼我的房门口，确定母亲不在附近后，跟我说：“我想让你知道，罗西皮那的事我一直帮你盯着呢。我是那种说到做到的人。这件事情有了点眉目，因为那儿有个人自杀了，好像是某个雕塑家，所以空出来一个名额。当然目前还不能确定可不可行，不过没关系，你先养好身体，然后我们再说。”

阿曼德用法语为我读魏伦①和波德莱尔②的诗。在我无尽的沉默面前，他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开始自己把诗翻译成古希伯来文，然后念给我听：“我是远古的时期，千年的回忆……”

母亲为我拿来了所有的以色列“像极了”节目录像带，每天晚上给我放。有时，她也会放从录像店租回来的电影，这时候，她会坐在我的床上，或评论、或叹气、或同情，那样子就像回到了我们一起看电影的快乐的往昔。有时，她会和我聊起父亲，在床上铺满了老相片，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想用这些相片来激发我的生命力，全然不顾我对这些相片早已了如指掌的事实。她讲述着每张相片照的时候的情况，照相那天他们都做过些什么，是什么时期照的，那时候他们对将来的打算和期望，她从哪里买了相片里穿的那条裙子，我那时候在哪里，我为什么不在相片里……

我知道迟早有一天，我所筑造的包围自己内心的围墙，会在她这种坚持不懈的爱的雪崩中坍塌。相信有人和我一样的明白：变化，无论它是多么隐蔽和具有颠覆性，都终将来临。

那条心满意足的恶毒虫子蜷缩进了一个毫无生气的茧，在多日的爱护和关怀的充分滋养下，遵从于永恒的自然法则，蜕掉了它的外皮，像一只美丽而鲜艳的蝴蝶，怀着期待和感激破茧而出，迎接光明。

一开始是梦，它们取代了那些空洞随意的打盹和无法入眠的夜

---

① 魏伦(Paul Verlaine,1844—1896)：法国象征派诗人。

② 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著名诗人，现代派诗歌的先驱，象征主义文学的鼻祖。

晚。这些梦清晰而明亮。客人出现在每一个梦之中,有时候我可以看到他的脸在远处微笑;有时候他出现在陌生而又复杂的故事场景里,其中大多数场景我醒的时候都忘掉了;有时候,我们在一个阳台上喝茶,眼前是壮观的清真寺、棕榈树,还有远处黎凡特城市的海滩,由于起得太晚,我们都有点困,我对他说:詹姆斯,你又去典当祖母的珍珠了么?而客人则用一种贵族式的英语慢吞吞地对我说:苏珊,亲爱的,讲点道理啊——我们正组织星期天到金字塔去野餐,总要有人付钱给行李工们吧。

之后,我的味觉也回来了,不再对各种酸甜苦辣感觉迟钝了。刚开始,我只是从母亲的盘子里取一点吃,但没过多久,我就能够接受并吃掉自己那一整餐盘的食品——黄油面包、鸡肉片、全麦饼干还有橙子片,就像异乡人第一次在本地人的厨房里面大快朵颐一样。

看着我在那吃面包,母亲一言不发地遵从我各类简短的指示,像是害怕会破坏了我这小小的进展,就像在春风中摇曳的树枝上的一片嫩叶,风稍微大一点就会把它吹走一样。她再也不必帮我洗澡了——有一天,我对她说:"不,母亲,今天我自己来。"从那以后,我都是自己洗澡,并且对每个细节都一丝不苟:无力地坐在浴缸沿上,直到护发素的柔发效果开始见效;徐徐地剃掉我腋窝和腿上的毛发;涂上护手霜;擦掉镜子上的水蒸气,仔细地审视自己的脸。

电视被放回到客厅里的老地方,我安静地蜷在沙发上看晚间新闻,偶尔随口说上几句话:这就是奥斯陆协议的下场。那个留胡子的议员是谁?真的是利伯曼[①]在管理国家!查一下《宋飞正传》[②]几点开始播。母亲则会加入进来,把那些琐碎的评论整理成理论并进行解释,报告一些报纸上没有登,但在"不骗你"超市"情报局"里广为人知的琐闻:那个萨拉·内塔尼亚胡,比比[③]夫人,得了强迫症,跟那个接受

① 约瑟夫·利伯曼:美国民主党参议员。

② 《宋飞正传》(*Seinfeld*):也有人译作《欢乐单身派对》,美国电视喜剧影集,描述公寓生活的零星琐事。

③ 比比:内塔尼亚胡的昵称。





戏剧疗法的脸上长粉刺的胖女孩得的病一样，记得么？尼哈玛说是安全局派人把拉宾给杀了，你怎么看？当然，她还声称也门人也是同谋，那都是女人的废话。希拉里·克林顿就像我和你父亲一样——一个严肃的女人却有一个孩子气的丈夫。我觉得她很了不起，祝她好运。据说他们俩当律师的时候，她比克林顿挣得多。

后来，我们重新开始了正常的对话，虽然比以前冷淡了许多，但是我开始对她讲的笑话报以微笑，对她说的街道新闻产生兴趣：尼哈玛的健康问题，HMO诊所里新来的耳鼻喉科大夫的人品和水平。她告诉我碰到了吉第·伯查科跟他的狗，他祝愿我早日康复，还有尼哈玛和阿曼德，他们也向我表示同样的衷心祝愿。不久前，他们应我的请求（康复中需要休息），停止了对我的探望，母亲机智老练地处理了这件事。当她在厨房里忙活或是打扫屋子的时候，我就会搬张凳子坐在她边上，主动帮她做些轻活，比如削掉萝卜皮，把糖从纸袋倒进塑料罐里，把洗碗机设定到恰当的程序。早上我们坐在厨房里喝咖啡，交换着看报纸，给对方大声念一些政治丑闻、降价广告和新的医疗发现（婴儿尿可以用来治疗过敏，吃全麦面包对精神状态的影响，计算机化助听器）。关于客人的话题从未被提起，只有一次，她在整理卧室的衣柜时，突然扯出那个装灰色裙子的包裹，说："我该怎么处理这件东西，它真占地方。我们是不是该把它捐给新移民援助协会呢？"我说："不，还是留着，我知道该把它给谁。"她看了看我，见我什么也没说，也就痛快地把那件裙子递给我，仿佛在说：我不干涉你的事。

我和母亲之间的那道冰墙令人愉快地渐渐融化了。我们相互关切，踮着脚尖走过我俩之间的那座脆弱的谅解之桥。小心点，别急，别太过了，动作要谨慎，说话要合时宜。尽管有着微妙而隐蔽的情绪活动，它的正面结果似乎十分稳定和成功。我们的爱回来了，虽然它还没有稳定成型的规则，但却不时地流露出来——在对脱口秀中的易装癖者[1]或算命者的胡说置于一笑的时候，在表面上的不经意的接触中，

① 易装癖者：一个以一种通常与异性相关的风格或方式穿着和行动的人。

以及每天不起眼的关心话语中:给,母亲,靠着这个垫子,你会舒服些。

春天令人焦急不安地徐徐露出她的脸,就像夜总会里的脱衣舞女,在除掉身上的衣服物件的间隔中,跳着性感的舞步,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有耐心看,观众们都在焦急地等待她解开胸罩的钩子。

开始的时候,我需要靠在母亲的胳膊上才能下楼,我们坐在公寓楼门对面低矮的水泥墙上,抬头看着像是患了贫血症的太阳。后来,我开始可以自己出门散步了,尽可能地推迟和尼哈玛、阿曼德见面以及去"不骗你"超市进行例行购物的时间。我通常辞别母亲后,就选择与以往相反的方向,走到那个有很多狗的公园,然后再溜达回来。有一天我遇到吉第·伯查科,他看起来一副忧心忡忡、孤僻内向的样子。我在他身旁的长椅边上坐下,点了支烟,他对我笑了笑,"你好么?看到你真好。"他的狗跑了过来,坐在我面前,喘着气,歪着脑袋看着我。

"给,扔这个,她想玩。"吉第递给我一根骨头样子的短棒。我无力地把它甩了出去,掉到离我们不远的一丛芙蓉灌木中,狗跑了过去,开始试图去够那个玩具。

"你那个很帅的表哥怎么样了?他已经回去了么?"

他对客人的提及让我的心备受思念的煎熬。

我点了点头,然后问道:"他叫什么名字?你的狗。"

"是她,"吉第说,"她叫扎拉。"

在我们说话的当间,狗已经成功地把棒子从灌木丛中弄了出来,跑了回来,坐在我面前,把棒子叼在嘴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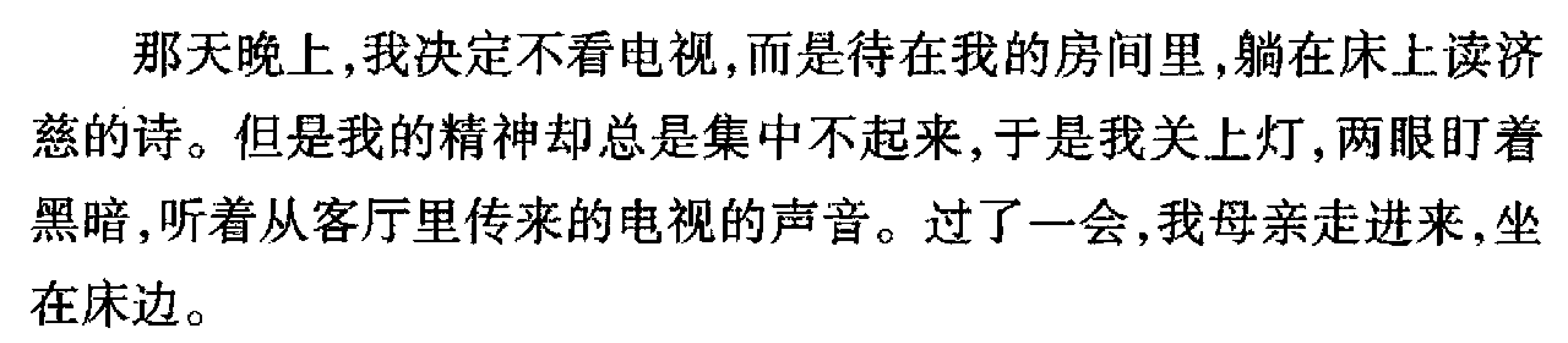
我摸了摸她宽平的大脑袋。

"她很喜欢你呢,"吉第说,"事情往往是这个样子,一开始你恨一个人,然后你又会疯狂地爱上他。"他叹气道。

我又把棒子扔了出去,这次,棒子远远地飞了出去,越过了我瞄准的废物箱。出于某种原因,这一体力的展现让我傻乐了好一阵子。

我说:"行了,我得走了。我明天可能会再来,我现在每天都出来散一会步。"

"保重。"吉第说。



那天晚上，我决定不看电视，而是待在我的房间里，躺在床上读济慈的诗。但是我的精神却总是集中不起来，于是我关上灯，两眼盯着黑暗，听着从客厅里传来的电视的声音。过了一会，我母亲走进来，坐在床边。

“孩子，今天你累了吧。”

她小心平静的声音在我听来是如此的甜蜜，我转过身来，把头靠在她的腿上。对我们之间关系的恢复感到十分放心，我决定打破提及客人的禁忌，我说：“你觉得他从来没有爱过我么？”

她沉默了许久，抚摸着我的头，然后说道：“你知道，对像尼奥这样的人来说，你不能说爱还是不爱。他们不爱任何人，甚至包括他们自己，他们太自私自利了，你明白吗？”

我在她的腿上点了点头。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油彩画画，在我看来，这无异于是在亵渎艺术。我是什么人？竟然要用这种真正的艺术家才用的材料。我不再在乎我没有东西可表达，没有坚定的世界观、文化深度、才智和世故。我如何看待自己也不再那么重要。我不是寻求什么卓越的实践，而只是在寻找一个能够立刻救助自己的实际方法，一个我能立足的地方，哪怕只能用脚尖站立，以免被威胁着要把我永远淹死的激流所吞没。我把自己完全投入到工作当中，就像被魔鬼控制了一样，尝试着各种技巧，我像是敢死队员在进行最后诀别的战斗，猛烈地攻击着画布。我不知道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无论是创新的还是传统的技巧，我都不熟悉。带着苛求和近乎情欲的不安定，我将自己尽情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忘掉自我，想起自我，在模糊的遗忘中，在清醒的记忆中，把颜料用力地涂抹到画布上。我教会自己在绝望、冷漠、痛苦、压抑、快乐和厌倦中工作，我的日常活动不再受到内心状态的支配。有的时候，我会像波洛克做过的那样，把画布铺在地上，在上面泼洒颜料，这期间，我弯着腰，流着汗，只穿着内衣，一连好几天都不让母亲进我的房间。我在画布上、胶合板上或者工业纸板上画画。我用刷子、用手、用我的整个身体作画。当兴奋感和注意力不再充当我的盔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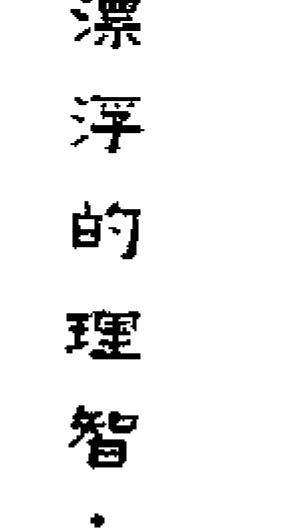
我就直直地在椅子上坐上好几个小时，抽着烟，盯着空中，等待兴奋感和注意力的回归。在失意的时候，我感觉双腿之间的腹股沟处传来的紧张感，到目前为止，我只有和客人在一起的时候才有过这种紧张感。当我看到他修长的肌肉发达的后背，他手臂上细腻的皮肤下透出的血管，还有他手腕上轻柔跳动的脉搏的时候，这种紧张感就抓住了我。

我每天都会忠实地到那个有许多狗的公园去散步。

在因为下雨而不能出去的日子里，我会焦急地盼望着第二天。

在吉第和扎拉来晚的日子里，我发现自己陷入了担心他们来不了的焦虑恐慌之中，我紧张地抽着烟，无法将视线从公园里他们通常出现的那边移开。

我有时会和吉第说些这个那个的，但主要的是我喜欢和扎拉一起玩。这只可怕的大黑狗真的爱上我了。从未有过任何一个生命会像她这样，见到我这么开心，这么热情洋溢。如果我比他们晚到公园，她会在看到我的一瞬间就冲过来，用前掌一下子扑到我身上，几乎要把我推倒，像小狗一样发出呜呜声，围着我绕圈，试图舔我的脸，我会拍拍她那小牛一样宽厚的脖子，亲亲她潮湿的嘴，说："你好，美女！你真是件杰作，我的甜心！"



吉第告诉我他是怎么开始养她，那时候她已经两岁了，事实上是他救了她的命。之前，扎拉是他的两个老处女姨妈养的，她们把她当成一只看门狗。但是，她们不懂得如何对待一只狗。她们惩罚她，一连好几天都不给她吃饭。如果她不听她们的话，她们就打她，并把她锁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她会这么害怕陌生人，尤其是女人，"吉第说，"她有很强的攻击性，但一旦她明白没有人会伤害她的时候，就会变得像羊羔一样温顺。"

"那么，你是不是认为我和母亲让扎拉想起了你的那两个疯姨妈？"

吉第看上去有些不好意思，但是他想要告诉我的理论实在是很有趣，这让他不能因为礼貌的缘故而保持沉默。

"嗯，估计是你母亲和利波太太，说不定还有你。看看她现在多粘



你,我想,我们一辈子都在寻找那些能让我们回忆起最初的心灵创伤的人,因为只有和这些人的帮助下,我们才能弥补创伤或者恢复tikkun[①]。"

我耸了耸肩:"这话听上去有点像伪流行心理学。"

"也许吧,"他说,"不过我提醒你一句,tikkun 是个 Kabbalistic[②] 词汇,不是心理学术语。"

"好的,那就是伪流行 Kabbala(传统)。"

我们一起大笑了起来。

吉第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他不会坚持自己的看法,这表现出他具有怀疑论者的性情,我喜欢他这点。他个子很高,长相一般,但看上去却很文雅而有教养。我喜欢看他双脚穿着锃亮的昂贵的意大利皮鞋,身上穿着那件缝得很完美的复古皮外套的样子。他右手上戴着一枚刻有贵族盾形纹章的信印戒指,那是他在伦敦的伯尔图贝勒大街上的一家古玩店买的。他不是个健谈的人,但是我的沉默逐渐产生了效果,他开始主动和我交谈。和客人不一样,吉第 · 伯查科总是谈论他自己,而从不编自己的故事说。他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诚实得令人悲哀,还有一点自怨自艾的倾向,不过这些性格也都是我喜欢的。

吉第 · 伯查科的心碎了。大约两个月前,他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男人,那人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他是来以色列度假的,现在已经回美国了。他在临走前向吉第表白了爱意,并邀请他一起走。为此,吉第非常痛苦,心中充满了因相隔两地而产生的挫败感,又没办法鼓起勇气下决心去美国。优柔寡断是吉第 · 伯查科另一个突出的性格特征。在不顺心的日子里,他可以花上整整十分钟,来决定是在公园里抽掉他每天定量的五根香烟中的第三根,还是等回到家后一边喝咖啡一边抽。

"刚开始的时候我简直受不了他。"他向我讲述他这次恋爱的经过。"我是在特拉维夫一幢豪华大厦顶楼举办的聚会上遇到他的,他

---

① 希伯来文:和谐。

② 希伯来文:传统的。

看我的那个样子，就像那种有钱的中年商人一样，就是那种每天晚上用一顿饭钱来操一个不同的男孩的那种人。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吧。”

我只好点了点头。出于他自己才知道的原因，吉第·伯查科自始就把我看成一个熟悉生活中更阴暗一面的人。

“不过之后我发觉，他是世界上最亲切、最聪明的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一个研究淋巴癌新疗法的特别研究机构的主管。”

“是在费城大学吗？”我问道。

我花了很多工夫才使他相信我不是女巫或者通灵者——他是个特别迷信的人，这是他另外一个打动我的特征。所有男人都是我的兄弟。

吉第是如此的神经质和犹豫不决，因此能为他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替他做决定：现在就抽烟，先带扎拉去看兽医，然后再去约会。让清洁女工周二来。忘掉四频道放的电影，改看家庭影院频道的。值得称道的是，他从来没有对我的建议提出过异议，而且总是很感激我替他做的这些决定，仿佛这是真诚关心的一种表达方式。

“我认为你应当去。”在他跟我详细地讲述了所有他不可能去美国的原因后，我对他说。

接着，我一样接一样地向他解释，他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都是如何可以毫不费力地解决掉的。

他沉默了一会，思考着我说的话。然而，我提出的这些解决方法都太简单了，而诱人的简单使得吉第产生了怀疑，更糟的是，激发了他发现新障碍的惊人创造力。

“那我要是走了，扎拉怎么办？”

这的确是一个重量级的问题。

“把她委托给你的父母或是你的某个朋友。”

“别逗了，她的名声就像一个疯狂的食人魔。”

“我明白，”我说道，“我会想办法的。”

当天晚上，我向母亲抱怨说我觉得很空虚。

“哪一种？”她问道。认识苏珊娜·拉宾的人都知道空虚有着很多



种面孔。

"孤独的那种,我在想也许应该养一只宠物来让我照料。"

"你小时候养过一只仓鼠。不过照顾它的人是我。总之,你别介意我这样说,仓鼠非但不能减轻,反而会增加你的孤独感。除此之外,它们还很臭。"

"是的,你是对的,也许换一种更聪明的动物会好些。"我试探道。但母亲自有她一套应付危险事物的严格方法,她给这次讨论画上了一个句号:"要是你经常和我一起去拜访尼哈玛或阿曼德,你会感觉好点的,他们就是更聪明的动物。"说完,还为自己的恶作剧笑话而大笑不已。

我只好自己行动,希望事情发生之后能平息。

一周后,万事俱备,吉第·伯查科已经在一家旅行社订好了机票,我的床下已经藏好了一大袋狗粮和两个大塑料碗。当母亲宽广的背影消失在前往"不骗你"超市的方向之后,我立刻跑到公园把扎拉带回到公寓。我和吉第的计划是,我先每隔一天带扎拉回家过一夜,一方面可以让她适应一下环境,另一方面是出于对母亲考虑,免得她突然发现自己要面对一个既成的事实而遭受太大的打击。

到我家后,扎拉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以一泡和雨季的维多利亚湖一样大小的液体作为这个重要时刻的标记。紧接在这之后,她突然爆发出一股淘气的高兴劲,打碎了那个蓝花瓶。我跟她一样高兴极了,和她一起在那满是水和黄百合的蓝色花瓶碎片旁跳来跳去,一边拍手,一边喊着"好啊!"百货公司的销售之神已经注定让这个蓝色的花瓶成为苏珊娜·拉宾生活中的一个多功能的符号。

之后的几个钟头里,我觉得扎拉一定是喜欢上了我们的公寓——她从一个房间跑到另外一个房间,在墙角闻来闻去,翻腾东西,查看床铺,所过之处都留下她那短直的毛发。吃光所有我在厨房能够找到的熏牛肉、烤肉排和饼干之后,我们的新宠物躺在沙发上,流着口水,勤勉地嚼着母亲最喜欢的那些靠垫。

晚上,我们三个,扎拉、母亲和我,第一次一起出去散步。

“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母亲说，“别的什么，”她语重心长地重复着，“除了这家伙，可以让你快乐的东西？”她紧张地使劲拽着拴狗的皮带，活蹦乱跳的扎拉正全力准备要沿着黑暗的街道狂奔。

“我现在还想不出。”我捂着鼻子嘀咕着，我正屏着气，忙于用一块弯曲的纸板，把一大堆新鲜的狗粪拨进塑料袋里。我对生物排泄物的反感，使得这一所有尽责的狗主人每天例行的任务，一点都不比从生化武器的导弹攻击下逃离更容易。我们与扎拉的首次散步是一次相互熟悉和适应的练习。

凌晨四点半，我被狗那低沉而痛苦的哀叫声吵醒。我一给她套上项圈皮带，她就用力地把我往门口拉。我设法从架子上把母亲的旧外套抓了下来，然后在半睡半醒中光着脚由着扎拉把我拽下楼。

“你想吉第了，是吧？”我疲倦地问道。我蜷缩在外套里，坐在人行道边，解开了她的项圈。“去吧，去跑一会。”但是，狗却坐在我的身边，拒绝接受这突然而来的自由。

天气很冷，月亮看上去好像是荒凉的化身，那样的苍白，圆的不完整，似乎在对我说：生活永远不会是它应该的那个样子。

我用手捂住自己的脸，我的心已经没了，剩下的只是关于客人的记忆在身体里跳动。他的面容就像文在了我的眼皮里面一样，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爱他。狗儿撒了泡尿，用她那双浑圆忧虑的眼睛看着我，仿佛是在为她的粗俗、为她丰富的生命力的迸发而感到内疚。

“我们会为你找一个更合适的对象的，甜心。”我对她说。

我让她睡在我的床上，盖着我的鸭绒被。

两天后，那是在扎拉回到吉第家之后，我母亲召集我进行谈话，坚持要我放弃正在作的油画，她的样子看起来十分肃穆和神秘。需要母亲梳妆打扮的场合很少，今天，她穿上蓝色的埃及绸裙，别上带有一对盛开的玫瑰形状的银胸针，脚穿那双黑色的低跟鞋，那又低又宽的鞋跟活像只牛蹄。更少见的是，今天她还在耳后喷上了法国香水，在干涩的嘴唇上涂上了珊瑚色的唇膏。以往，每当她出席重要场合的时候，只需要做上述打扮中的一项就行了，要么只是裙子，或者只是唇

膏,那就足够了,反正又不是要参加选美。但这次则是一整套:裙子、胸针、鞋、香水、唇膏等。她看上去那么的漂亮和端庄!唯一遗憾的是她平时没能多做一些这样的打扮。

"谁死了?"我问道,然后一屁股坐在扶手椅里,有点兴奋。这时,我注意到她还拎着她最好的一个手提包。那个包她只有上剧院或者去特拉维夫购物时候才舍得带。她用双手紧紧把它抱在怀里,好像里面装的是偷来的珠宝一样。

"我要你认真听我说,苏珊娜。"她的声音里饱含着决定性的重要意味,"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思考。突然,我认识到应该做什么了。"

"关于什么事?"

"关于你,关于我,关于生活。"

"你觉得生活怎么了?你为什么要打扮?你包里放的是什么?说来听听。"虽然我知道我的不耐烦和她所努力营造出来的这种戏剧性紧张气氛有点不合调,但我还是忍不住。这种神秘感已经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

"我们刚经历过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她把包放在桌子上,但双手仍然没有放开它,"这个危机如此巨大,以至于现在看到你开始渐渐康复,恢复你自己,我还是不敢冒险谈及自己的快乐。"

"好的,没关系,你有什么就尽管说好吧。"我鼓动她,但她只是把包抓得更紧了。

"我想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不是没意义的,也许我们经历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对我们有所启示。"

我一边听一边摆出一副烦躁的面部表情,希望能让她快点切入正题。

"我意识到我们所需要的是变化,某个重大的变化。我反复想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决定我们将做什么。"她不再说话,看着我,好像我已经知道她指的是什么,所以期待着我的回应。

"母亲!你比尼哈玛更糟,我发誓。"

她将手提包推给我，然后把胳膊交叉抱在胸前。我把包打开。虽然我对里面东西的期望十分模糊，但是当我看到里面装满了纸张和彩色小册子，还是感到了一阵失望。我随便拿出来一个，看到上面有白色的海滩和青绿色的海水。

"这是什么？"

"接着拿，把它们都拿出来。"

我把包里的东西都倒在桌上，在我面前的是一堆简介，那是一家大旅行社散发有关各种旅行路线的介绍手册，上面有许多旅游景点以及恬静的希腊海滨的鲜艳图片。

"你想我们参加去希腊的旅行团？"我惊讶地看着她。

的的确确，关于拉马特甘母女的冒险经历的喜剧（也许是悲喜剧）又揭开了新的一幕。苏珊娜和母亲又出发了。苏珊娜和母亲的归来。苏珊娜和母亲追随亚尔古英雄①的足迹。

我撅着嘴唇，把腮帮鼓圆了，紧接着，我开始狂笑。

母亲急忙向我递来一包香烟，让我安静下来。

"别笑了！听我说，我想让我们去做一次私人旅行。我们有钱，你的储蓄金——感谢上帝。"她笑了一下，然后又马上严肃了起来。"我自己还有一笔更多的钱，是我多年攒下来的，反正我又不能把这些钱带到棺材里。我们必须过好每一天，你同意么？"

"去希腊？"我问道，想听听她的想法，"只有你和我？"

"实际上我想我们可以跟尼哈玛和阿曼德一起出发，在某个岛上休息几天，之后他们直接回拉马甘特，我们则继续旅行，就你和我两个。记得你父亲在世的时候，你有那么多关于神话英雄的幻想，有奥林匹斯山、万神殿、特洛伊和奥德赛，天晓得还有什么别的。看，阿曼德为了庆祝这次旅行还特地给你买了本诗集。"她交给我一本薄册子，上面写着《希腊岛》，诗人的名字我没听说过。

"但是……"一想到要和尼哈玛以及阿曼德一起待在某个希腊小

① 希腊神话中随同贾森乘亚尔古舟，去海外寻找金羊毛的英雄。

岛上,那里的景色就一点都不诱人了。

“但是什么?没什么好但是的。我们只能活一辈子。在我们一起度过那可怕的梦魇后,也应当给自己找一点乐子了。”

我们一起度过?我想反问,但还是忍住了。难道我还想和她争辩谁最痛苦么?我真是不可救药。

“你不开心吗?”她站起来,向我走过来,搂着我的肩膀,和我一起看一个介绍册,封面印着一个没有头的胜利女神像。

“我不知道该怎么想。”

事实上,有何不可?就如同当初我像吉第一样为了到底是出去散步还是在家看脱口秀而犹豫不决的时候,客人所说的:无产者除了枷锁,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

母亲也已经下定了决心,她不会再浪费时间来揣摩我的心意,以她对我的了解,她可以轻而易举地猜出来。

“没什么好想的,你要去哪里?你梦想去哪里?”

我不由自主想了一会,说:“斯巴达,我们能去斯巴达么?”

“斯巴达,雅典,任何地方,怎么了,孩子?你不高兴么?”

我站起来,用双臂抱着她,把我的脸埋在她的肩膀上,鼻子在她喷了香水的脖子上蹭了蹭。

“我当然高兴,妈咪,非常的高兴。”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明白,原来和空虚一样,快乐也有着很多张面孔。

开始我还有点犹豫,随着热情的慢慢增加,我开始和母亲一起翻阅彩色的宣传册。到了最后,我们的样子如同一对兴奋的小姐妹在看从可敬的父母的卧室里发现的一堆色情杂志。我们说说笑笑着互相打断,把材料从对方手里抢来抢去,停下来一会,用饱含深情的相互理解的眼神看看对方,然后又认真地阅读起材料的内容来,接着又用笑声、玩笑和对未来的幻想打破紧张的气氛。

母亲脱掉了去旅行社穿的衣服,换上她那件破旧的长袍。我们一起坐到沙发那里,蜷在格子花呢的毯子下面,把咖啡桌当成书桌,在上

面堆着各种纸张、几个烟灰缸、几本便笺簿、几支笔，这对于我们这样两个活跃积极、充满了各种计划的女人来说，非常合适。我们不时地轮流站起来沏茶，然后继续计划我们的战役。

我们直到深夜还在钻研着这些册子，选择目的地，查看价格和日程表，争论，达成一致，记下需要确认的问题，翻阅父亲的老地图集，再选择，发现新的令人激动的可能，再反悔，诸如此类，直到母亲沏了最后一轮茶，把阿曼德送的书放到我手里，让我去睡觉。

我累极了，但出乎意料的是，我进屋之后并没有直接倒在床上进入甜美的梦乡，而是不安地感觉到极度的清醒。

房间里很黑，我走到床边，看着街道，人行道是湿的，刚下过阵雨，这是这个季节里最后的几场雨之一了。我打开窗户，呼吸着有早春迹象的空气，湿润清新，消除了残留的腐败气息。我的生活就存在于面前这条市郊的平凡街道上，存在于水坑反射街灯的光亮中，存在于夜晚陈腐的魔力里。有时候，我会觉得奇怪，像我这么单调平凡的人，居然能和那些富有的名人一样，享受这些神奇的事物——雨水的味道，苍白的冷月，以及活着所带来的强烈刺痛感。

我存在，我活着。

我，我，这就是我，在房间里浓烈的油画颜料的味道中，在小女孩一样窄小的床上，在呼吸着空气和尼古丁的肺部里，在抚摸客人肌肤的回忆中，在我内心那永远无法填满的黑色深渊里，在我干枯嶙峋的手里，在隔壁屋中沉睡的母亲身上，在我身上每个毛孔的呼吸都透出的对生与死的渴望中。

我，独一无二的我，单独存在的我，完全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生物，无论是活的还是死的，不同于任何一种鸟类或物质，不同于任何一个女人，任何一个灵魂。

我关上了窗户。

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内心中的焦灼。只要睡着了就好了。但还有梦。无论我的梦境是多么的引人入胜，它也无法告诉我别的任何事情，除了梦中模糊的词句和背景，以及令人愉快的清晰的洞察。



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就是不值得用言语来表达的，它的存在纯属偶然，毫无关联。

怎么办？

除了一些实用的和实际的经验外，我同样无法从我的经历和记忆中得出结论。因为每一次的经历都完全不同于其他的经历。怎样才能从一件事情里看出另外一件事的端倪？怎样才有可能学会要如何设计出一套制度来指导自己在不同场合下的行为？我想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想什么，该怎么行动。然而，我所想过的每件事都是怎么想本身，没有丝毫附加的价值，没有任何隐含的内容。除了想，就是想。

"我必须离开，"我大声地说了出来，"这是我必须做的。"

我的声音使我平静下来，描绘出了现实的硬朗的轮廓。我又说了一遍，用因为一晚上抽掉一包烟而变得嘶哑的声音，"我这就离开。"

我打开台灯，阅读阿曼德送给我的那本书，里面的诗是诗人在爱奥尼亚海中某个岛屿居住的时候写的。其中一首特别吸引我的注意，它的名字叫《游行队伍》。在脚注里，作者解释道，和希腊的其他岛屿一样，这个岛屿也有自己的圣徒，是16世纪一个名叫杰拉斯莫（Gerasimo）的拜占庭圣徒。杰拉斯莫是那些精神病人、有精神问题或者沮丧痛苦的普通人的守护神。每年，有数千人会从全希腊各地来到这个小岛上，排着队伍从圣徒的教堂走到他亲手种下的一棵悬铃树下，那棵树的叶子会把所有苦闷的灵魂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

我闭上眼。客人现在在哪里呢？他还好么？他开心么？他的生活如意么？我试图集中精神，把我的爱传给他，给予他庇护。哪怕只是一点点，也许这样可以使他避免那些他自己造成的问题和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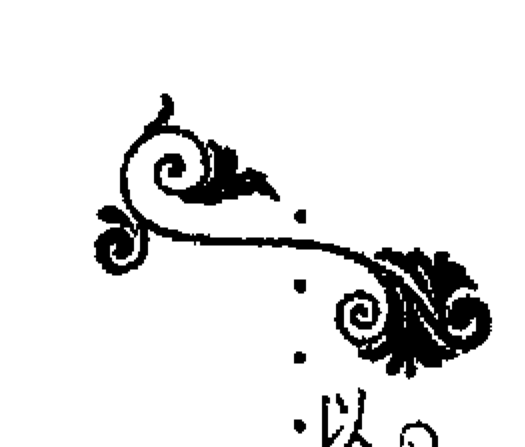
我想象着游行的队伍，前面是演奏着进行曲的铜管乐队，军号和长号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其后是教会中的权贵们，那些主教和牧师；再之后是那些肩膀宽厚的留着胡子的忠实信徒，他们举着旗子、十字架、圣像，还有装着圣徒的遗骨盒；普通民众们走在最后，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从痛苦中被拯救、被洗涤，他们痛苦的脸庞被热情照亮，眼中充满了希望。

我看到了周围的岩石山峰，还有山峰脚下的一个小村落。开满鲜艳花朵的庭院围绕着白色的房屋，屋顶上的瓦片已经褪了色。落满了尘土的橄榄树和一丛丛多刺的灌木散布在岩石间。远处的山羊正在吃草，抬头奇怪地看了看喧闹的游行队伍，然后继续啃着低矮的植被。我向山下望去，看到海面闪耀着绚丽的光辉，广阔无边，海水湛蓝而平坦，充满了希望，仿佛是一个坚固的实心体，而不是我们天天生活着的地球。

在行进的队伍里，我看到母亲、尼哈玛还有阿曼德在炽热的太阳下流汗。阿曼德拿着我母亲的包还有一瓶矿泉水，尼哈玛嘟哝着，要求他给她折一枝艾菊花，或者在路突然变陡的时候扶她一把。我看到母亲坚决地大步前进着，不让自己被周围壮丽的景色转移注意力，她的精神完全集中在自己的目标上。

我看到卡秋莎抱着阿瑟在石路上蹒跚前行，一边用俄语向孩子抱怨。阿瑟戴着圆边的草帽，眼睛斜斜地盯着乐队里金色的长号。我看到莉维基精力充沛地往山上爬，头发蓬乱，双眼炯炯有神，不时地用袖子擦掉脸上的汗。我看到吉第，穿着他优雅的衣服，汗流浃背，白色的丝衬衣和后背粘在了一起。我看到扎拉蹦来跳去，她一会儿停下来嗅嗅荒坡上的死山羊骨头，一会儿用她的大脚爪践踏蚁丘，引起蚂蚁的骚乱，一会儿又去是追逐蝴蝶。我看到白艾蜜和赫伯，白艾蜜穿着高跟鞋踉踉跄跄地走着，对这艰难的旅行条件直摇头，赫伯已经被病痛完全耗尽了体力，吃力地靠在她胳膊上。我看到我父亲踩着轻快的步伐毫不费力地走着，有时嘴里含一片草叶子，有时手里拿一根干树枝，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孩子，踢着路上遇到的石子和橄榄树干。我看到客人戴着墨镜在那沉思，他边走边抽烟，偶尔吹个口哨，看看周围的风景，然后又陷入了深思之中。我看到我自己，完全就像一个从来没认识过一个男人的希腊处女，穿着黑色的衣服，露着我那张弗拉基米尔市圣母的面孔，夹杂在其他妇女的行列之中——里面有孤独的寡妇、担忧的母亲、名声不好的女孩以及精神错乱的老妇。

圣徒杰拉斯莫站在悬铃树下，他的面容就是客人很喜欢的圣像中



一个年老的拜占庭圣徒的样子,那类粗糙而奇怪的画像有着极强的表现力,远远超过那些颜色和线条精致的画像。我们每个人,依次跪下亲吻他嶙峋的双脚,他的脚踝纤细,指甲扭曲,像流浪汉的脚一样布满老趼。他把因年老而颤抖的双手放在我们布满尘土的头上,为我们祝福,我们的头发沐浴在地中海的阳光下,顷刻间,所有的痛苦都消散了,远离了我们疲倦的灵魂。伤感,就像一只黑鸟,冲出了我们的心灵,飞入蓝天,消失在山峦的背后。而口中唾液的甜蜜代替了失落的苦涩。

之后,我看到我们每个人又都回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回到奇异而无法回避的命运之中。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呼吸着颜料的气味,回忆着童年,感受着时间的流逝,专心工作。当黑暗降临并笼罩着我,阻碍我所有的思考,把我所有的想法埋藏在它无形的子宫当中,让我在不可救药的渴望之中透不过气来时,我就解开皱巴巴的手绢上的结,呼吸着从悬铃树上摘下来的叶子的干燥味道。

我打开头顶上的灯,看着画架上未完成的作品。我把它拿下来,绷上一张新的画布,然后开始作画,先是慢慢地画,探索那难以掌握的注意力,用老练的追求者所惯用的小把戏来捕捉它——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呆板的样子,做一些几近随意的活动,付出最小的努力,直到它屈服于我并主动来巴结我,使我忘记了这个夜晚、这个房间、我虚弱的身体所带来的负担、我苦涩的灵魂、我母亲和客人,有一两回我甚至忘记了自己——奇怪的苏珊娜·拉宾。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快乐呢?

我一直工作到早上。期间,有时会坐下来休息几分钟,抽支烟或者只是凝视着周围的空间,然后突然站起来接着画画。

阳光透了进来,使灯光渐渐显得微弱,并最终抹去了后者的痕迹,当真正的明星在舞台上出现,野心勃勃的配角只能被挤到角落中去。我听到母亲清晨的活动,冲水声,关门声,脚步声,还有在厨房洗盘子的声音。

我用一块浸过松节油的破布擦了擦手。

我把画笔蘸上黑色,在完成的作品的右下角写上几个笨拙的字:

"苏珊娜·拉宾。"

我十分平静。

母亲走入我的房间,她发现我躺在床上,用毯子蒙着头,于是她轻轻地走了出去。我一直等到听见她关上前门和钥匙的咔嗒声,马上冲到电话前,还被一个摆错位置的椅子绊了一跤。我拨通了门诊所的号码。

"找莉维卡·芬瓦赛尔,"我说,"有急事。"

"不行,"我听到接线员冷漠的声音,"她今天的工作都排满了,她不让任何人打搅她。"

"但我是她的客户,我是说我是她的病人。"我结结巴巴地解释着我和我的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关系。

"对不起,她特别交代过,不要转任何的电话给她。"我可以听到她正有力地嚼着口香糖。

"那就告诉她我是苏珊娜,还有这很紧急。"

"我已经告诉你了,小姐,这不可能。"我听着她口中的口香糖泡泡在我耳中爆破。

"告诉她是苏珊娜,苏珊娜·拉宾。你就明白她会接这个电话的。"此时,我几乎是在恳求了。

"对不起,小姐。"

"只要跟她说是苏珊娜·拉宾,就告诉她这个。"我喊叫着,拼命地试图阻止她挂掉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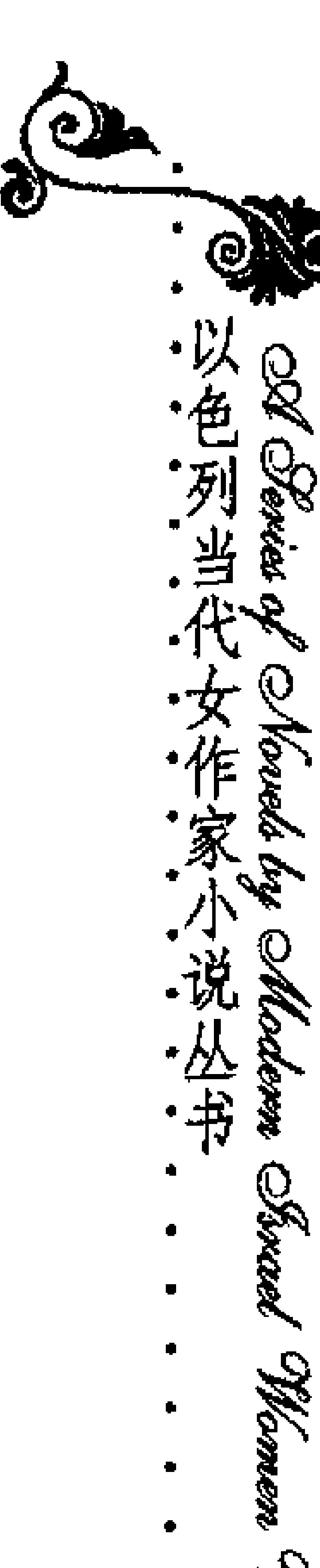
"苏珊娜什么?"咀嚼的声音停止了一会。

"拉宾,苏珊娜·拉宾。"

电话线另一段的沉默比顽固的拒绝更令我害怕,她现在就会挂上电话。

"拉宾? 就像伊扎克·拉宾? 你是他的亲戚么?"

"是的,"我大声叫道,问题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解决了,我无法控制内心的兴奋,"当然,我是他亲戚,我是他姨妈……我是说表亲,第二代的表亲,就是这样。"



凝固的现在

美是心灵中的瞬刻——
灵魂出口的断续显迹，
但在肉体中，它不朽。

肉体死亡；肉体的美依然留存。
黄昏亦死亡，在它们的绿色中逝去，
一丝波浪，永无止境地流淌。
花园亦死亡，它们温顺的气息嗅感
冬日的僧衣，在忏悔中了结。
少女亦死亡，去向少女合唱队
玫瑰色的庆典。

——华莱士·史蒂文斯①

令人相当意外的是，离别感人而不伤感。大家都来道别，阿曼德、卡秋莎和阿瑟、莉维基、吉第·伯查科，当然还有尼哈玛，她又一次坐着轮椅，由母亲格外熟练地推着。为了和客人的忠实信徒身份相一致，我拒绝了他们要开车送我去的提议，坚持自己一个人坐出租车走。在共同享用了一顿节日般丰盛的早餐后，大家都站在楼门口，一起等

---

① 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1879—1955)：美国诗人，被认为是当代最特立独行的诗人，曾获普立兹奖。该段诗选自《大键琴上的彼得·昆》(*Peter Quince at the Clavier*)，该诗中提到了苏珊娜和长老的故事。

那辆要载我去罗西皮那的出租车。在春天的阳光里,他们的面容苍白而脆弱。

我生活过的这条街道展现在我的眼前,它已经做好了将来要充当我记忆博物馆里的展品的准备,仿佛它被看不见的栅栏围了起来,前面竖着一块"请勿触摸"的小标牌。街道的每一个细节都很显眼地单独展示着:一个个垃圾箱,表皮粗糙的夹竹桃和芙蓉树,一只骨瘦如柴的猫一边抓搔自己一边用充脓的眼睛盯着我们,远处收破烂的叫卖声,对面人行道上推着婴儿车拿着手机的老奶奶。

我走到阿曼德面前,他正抱着阿瑟,我把自己的脸颊贴上他的,先是左边,然后是右边,然后再是左边,同时做出轻轻的亲吻状,就像人们在法国做的那样。

"A bientôt[①],阿曼德。"我说。

"A bientôt,苏珊娜,ma chère[②]。"

如果我那糟糕的法语足够好的话,也许我还会说些别的事情,我会和他说:看,我已经赶上你了,凭我的那些记忆,我算得上是一个千岁老人了。也许说一些不一样的话——有人情味的,简单的,精确的话。可是,除了夸奖和告别的话以外,我还会什么呢?

我用手背抚摸着孩子的宽脸颊,"你是个了不起的孩子,阿瑟。"我说。他抽了抽鼻子,斜斜地盯了我一眼。

卡秋莎为了庆祝这个场合,不顾空气中的寒意,穿了那件吊带灰色丝绸裙子。她轻快地在我的脸上亲了两下。

"祝你好运,苏西,我希望你没后悔送给我这条裙子。"

"当然不会,我太瘦了,穿不了它。"我笑道。

莉维基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手里拿着拴扎拉的皮带,扎拉紧挨着她的腿坐着,急促地喘息,喷着热气,热情地看着正在发生的事情。

"先再见了,莉维基,"我说,"谢谢你做的一切。"

"谢我?我应该谢谢你,亲爱的,我说不出和她在一起有多开心,

① 法语:再会。

② 法语:亲爱的。





她是一只非常棒的狗。你要离开这去艺术学院真是太了不起了。相信我,对一个女人来说,再没有比了解她自己更重要的了,再没有了。我就不再废话了,自我认知就是一切。"

我用胳膊搂着扎拉的脖子,她兴奋地扭动着,来回晃着她那条被切掉一半的尾巴。"乖乖待在这,小甜心。"她舔我的脸,把我的太阳镜推到了一边。

一辆出租车停在我们旁边。"拉宾,是你们要去罗西皮那么?"

每个人都动起来,想找点事情来帮着做,但是我只带了一个手提箱,以及那个有银行标记的小旅行袋。

"是的,是我们。"吉第·伯查科说。他和司机一起把手提箱放到汽车后部的行李箱里。他边走边问我:"苏珊娜,我定不下来,到底是应该先去取票,还是应该先停在纤金(Sheinkin)街买鞋。"

"先取票,再买鞋。"我断言道。

我弯下腰,紧紧拥抱了尼哈玛,亲吻她布满皱纹的面颊,她脸上扑的粉已经和眼泪混在了一起。

"照顾好自己,尼哈玛,也照顾好我妈妈。我会按说好的那样,打电话或写信回来的。"

"我会的,你要照顾好自己,在学校……"

"尼哈玛!"即便是在这么困难的时候,我母亲仍然维持着她的高度警觉。

"好的,好的,对不起,那个艺术中心,有一次我和利波去加利利[1]那里的一个温泉区,因为——我告诉过你——他有结肠炎,而吃蔬菜可以缓解他胃的问题,所以我很了解那周围的地方,那里有很多著名的景色,像杰泽瑞尔谷,胡拉沼泽,秋鹤,还是春鹤来着?顺便说一句,苏珊娜,你知道本·古里安么?那个为了取悦美国人把胡拉沼泽无端弄干了的浑蛋,说是要根除疟疾,实际上他根除了什么——什么没有清除,在那里人们像苍蝇一样地死去。这点上我同意阿曼德的看法,

① 加利利:以色列北部一地区。

他完全是个疯子，也许都是因为他脑袋里的那些念头。你知道……”

“尼哈玛！”母亲维持秩序的要求来得正是时候，因为出租车司机已经坐在方向盘后抱怨出城的交通有多么的拥挤。

吉第热情地握着我的手。

“好的，我必须走了。那么，我是先去旅行社，然后去买鞋，对吗？”

“完全正确，吉第。”

尼哈玛自己转动轮椅朝出租车的方向去，唯恐错过和司机的争论。

我热切地猜想着未来的味道。

咳嗽薄荷糖的味道，冰凉如舌下的体温计。

我的眼睛寻找着母亲的面孔，她站到一边，用脚后跟碾着一分钟前她刚点燃的香烟。我看着她纤细脚踝的动作。

我想：就是这个味道，它正发生着。

清醒的现在，被凝固的一刻。

我站在母亲面前，仔细端详她的脸，试图把它深深地印在心底，在我未来记忆的石板上铭刻它每一个细节，哪怕是最细微的皱纹。我们俩之间短短的距离里充满了感情。我甚至可以感觉到那曾经由助产士小心剪断的脐带依旧以某种秘密的方式存在于我俩之间。一个柔软的有机组织将我们的腹部连接在一起。我会继续永远这样呆站着，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我的每一条纤维都依附着她。也许我会一直这样，要不是母亲闭上眼又睁开眼，温柔但明确地命令我道：“去吧，孩子，现在就去吧。”



附:人物及地名对照

Susannah 苏珊娜

Nehema 尼哈玛 又称 Mrs Lieber 利波太太

Amir 阿米尔(尼哈玛的儿子)

Armand 阿曼德

Margalit 玛格利特

Aziz 阿齐兹

Ada 艾达

Avram Rabinyan 阿弗兰穆·拉宾尼安

Theo 特奥

Aharon 阿哈隆

Bat-Ami 白艾蜜

Noah 诺亚 Nioma 耐奥麦 Abrashka 阿伯拉什卡

Neo 尼奥

Rivki 莉维基 Rivka Finkwasser 莉维卡·芬瓦赛尔

Rosnow 罗丝诺

Moish 莫依希

Gidi Bochacho 吉第·伯查科

Zara 扎拉(吉第·伯查科的狗)

Noam 诺阿姆(酒吧经理)

Katyusha 卡秋莎 Arthur 阿瑟(卡秋莎的儿子)

Shalva 夏尔瓦

Mustafa Elharizi 穆斯塔法·艾尔哈里兹

Vadim 瓦弟姆

Na'ama 娜爱玛(病友名)

Rosh Pinna 罗西皮那

Ben-Shemen 本-西门

Nisim Babjani　尼森姆·巴伯加尼

Menahem Shriki　曼拉罕姆·史瑞奇

Moshe　莫希

Meyer　牛仔裤大亨迈耶

Kostabi　科斯达毕

Harvey Keitel　哈维·凯特尔

Elinor　伊琳娜

Miriam Sullivanta　米利亚姆·沙利文

Eviata　爱维阿塔

Nicky and Sandra　尼奇和桑德拉的画廊

Ido　伊斗

Nahima　娜西玛

Aryeh　阿耶

Nitza　尼扎